

已经制作了以下书籍，可在 <http://iask.sina.com.cn/u/1408815407/ish> 或 <http://blog.sina.com.cn/u/1408815407> 查阅更新和下载，或加入科学心理学与书籍交流群，群号 42506864

1.进化心理学 by 巴斯 2.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by wilson 3.谁会认错？我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愚蠢的信念错误的决定和让别人受伤的行为 4.社会心理学-阿伦森版 5. 布鲁克林有棵树 6. 学习的艺术 维茨金 著 7. 疯狂实验史 8. 哪来的天才 9.为什么选错的总是我 10.思维改变生活 11. 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 12.欲望之源 13. 吃的真相 14. 直觉——你所不知的潜力与危害 by 迈尔斯 15.进化的大脑 16.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 by 津巴多 17.害羞心理学 by 津巴多 18. 简捷启发式 19. 学习乐观 by 塞利格曼 (现有的版本是超星的，不太清晰) 20. 认知心理学 第五版 艾森克著 21. 实验心理学 (原书第八版) 索尔索 22. 生命的心流 23.幸福的真意 24. 别太苛求：摆脱完美主义的束缚 25. 批判性思维:思维、写作、沟通、应变、解决问题的根本技巧 26. 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 (How we decide) 27. 心理和脑 脑与心智历程 100 项 28. 心理和脑与生活 训练脑与心智的 75 项窍门 29. 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 30.颠倒思维 31.动机心理学 皮特里著 32.决策的艺术 33.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34.象与骑象人 35.心理学研究方法 by 舒华 36.美丽圣经 by 宝拉·培冈 37.撬动幸福 by 奚恺元 38.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39.思维与决策(第四版) 40. 内向者优势 如何在外向的世界中获得成功 41. 行为科学统计 第七版 42.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 43. 心理资本 打造人的竞争优势 44. 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 45. 电醒人心——20 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人生传奇 46.集合起来_群体理论与团队技巧》第 9 版 47. 学会批判性思维 跨学科批判性思维教学指南 48. 社会学与生活(插图修订第 9 版) 49. 简体版 路西法效应 by 津巴多 50.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彭凯平 51.跨文化社会心理学 52. 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 郭永玉 53.现代心理学 张春兴 54.学会批判性思维 55.社交商 56. 孤独是可耻的 57.学会接受自己——全新的接受与实现疗法 58.幸福是陷阱 59.被遗忘的性 60.人类的性存在 61. 爱情心理学 斯滕伯格 62. 当心！你的记忆会犯罪 by 伊丽莎白 洛夫特斯 63. 改变人生的快乐实验 by 埃德.迪纳 64. 心理学研究手册 by Frederick 65.学习理论：教育的视角 by 戴尔.申克

图片来自读秀网，我用的是简单的办法——咨询下载，但每次只能咨询 50 页，咨询时间选在晚上 22 点以后可以免受咨询不得超过 80%的限制。具体咨询下载的方法我会公布在我的博客上。

快捷的办法是直接从掌握读秀、超星漏洞的那些人手里购买，价格基本在 1 元/100 页左右 (taobao 上搜索读秀或超星 咨询 下载即可，可以讲价的)，或者在读书宝库、诺贝尔学术网等论坛上通过论坛币来求助。

推荐些绝对值得一看的书籍：

心理学类:学习乐观 社会性动物 少有人走的路 社会心理学(阿伦森版) 决策与判断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亲密关系 影响力 拖延心理学 害羞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 无从选择 思维改变生活

其他类:如何阅读一本书 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 把时间当做朋友 神奇的睡眠 中国健康调查报告 外语学习的真实方法及误区 异类



中国心理学会推荐图书

The New Psychology of Love

爱情心理学

[美] 罗伯特·J·斯腾伯格 凯琳·斯腾伯格 编著 李朝旭 等译 (最新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心理学会推荐图书



运用科学心理学范式探讨爱情这一浪漫而神秘的人类活动主题，是对现代社会心理学一个新兴领域的创建与发展，需要研究者拓荒的勇气和智慧。《爱情心理学》（最新版）正是汇集了当今国际爱情心理学的最新进展，可谓名家荟萃。在以人为本、共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将本著作引入我国，意义非同寻常，必将有助于建设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与和谐家庭！

沈德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会长，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

本书从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了近二十年来爱情心理学理论的最新进展，不仅带给人们一种崭新的认识和体验，而且必定是研究爱情心理学的后继者们无法绕过、只能越过的里程碑之作！

乐国安（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

爱情是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也会伴随每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与其爱情历程有关。虽然爱情究竟是什么，需要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灵和生命去体验，但是，科学爱情心理学的知识积累，无疑会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爱情的本质，并更好地珍惜和体验真爱，这也正好是《爱情心理学》（最新版）的价值所在。

金盛华（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http://www.wpcbj.com.cn>

责任编辑：石孟磊
装帧设计：黑羽平面工作室

上架建议：心理学/社科

ISBN 978-7-5100-1771-1



9 787510 017711 >

ISBN 978-7-5100-1771-1/C · 86

定价：39.00元

The New Psychology of Love

爱情心理学

[美] 罗伯特·J·斯腾伯格 凯琳·斯腾伯格 编著 李朝旭 等译 (最新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心理学 (最新版) / [美] 罗伯特·J·斯腾伯格 (Sternberg, R.J.), [美] 凯琳·斯腾伯格 (Sternberg, K.) 编著; 李朝旭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5

书名原文: The New Psychology of Love

ISBN 978-7-5100-1771-1

I. 爱… II. ①罗… ②凯… ③李… III. ①心理学 ②恋爱心理学 IV. C9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0837 号

Robert J. Sternberg and Karin Sternberg

The New Psychology of Love

0-300-11697-7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6 by Yale Universit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 reserved.

For sal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sively (except Taiwan, Hong Kong SAR and Macau SAR).

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销售发行。

爱情心理学 (最新版)

编 著 者: [美] 罗伯特·J·斯腾伯格 凯琳·斯腾伯格

译 者: 李朝旭 等

责任编辑: 石孟磊

装帧设计: 黑羽平面工作室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21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07-2813

ISBN 978-7-5100-1771-1/C · 86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引论 1
凯琳·斯腾伯格 (Karin Sternberg)

第一部分 生物学说

第二章 爱的动态进化观 15
道格拉斯·T·肯里克 (Douglas T. Kenri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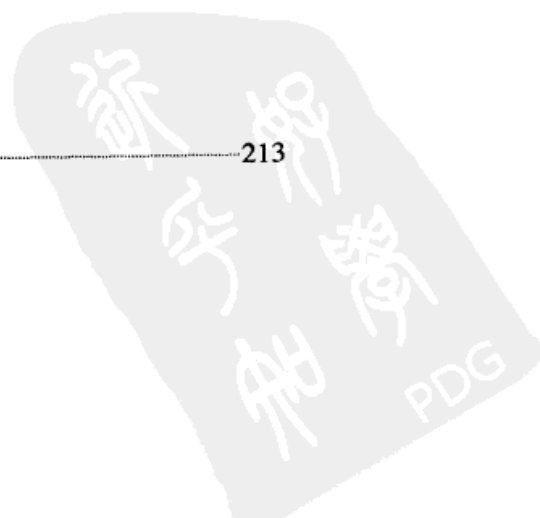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浪漫之爱关系中的行为系统：依恋、呵护与性 37
菲利普·R·薛佛 (Phillip R. Shaver)
马里奥·米库利茨 (Mario Mikulincer)

第四章 爱情的进化 67
大卫·M·巴斯 (David M. Buss)

第五章	爱情的内驱力：择偶的神经机制	91
	海伦·费希尔 (Helen Fisher)	
第六章	依恋和连结的生物行为模型	123
	詹姆斯·F·莱克曼 (James F. Leckman)	
	莎拉·B·赫尔迪 (Sarah B. Hrdy)	
	埃里克·B·凯维纳 (Eric B. Keverne)	
	C. 苏·卡特 (C. Sue Carter)	

第二部分 爱情类型

第七章	浪漫之爱的风格	157
	克莱德·亨德里克 (Clyde Hendrick)	
	苏珊·S·亨德里克 (Susan S. Hendrick)	
第八章	探索“爱”的真谛	181
	埃伦·伯奇德 (Ellen Berscheid)	
第九章	爱情的二重理论	195
	罗伯特·J·斯腾伯格 (Robert J. Sternberg)	
第十章	爱即“共有应答性”的给予和接受	213
	玛格丽特·S·克拉克 (Margaret S. Clark)	
	琼·K·莫南 (Joan K. Monin)	



第三部分 内隐理论

第十一章	爱情研究的原型说	239
	贝费利·费荷 (Beverley Fehr)	

第四部分 文化学说

第十二章	爱情的进化与跨文化观点：性别、人格和当地生态 对恋爱关系中情感投资的影响	263
	大卫·P·施密特 (David P. Schmitt)	
第十三章	激情之爱：跨文化与进化观点	289
	黛布拉·雷博曼 (Debra Lieberman) 伊莱恩·哈特菲尔德 (Elaine Hatfield)	
第十四章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爱情心理学	315
	卡伦·K·迪恩 (Karen K. Dion) 肯尼思·L·迪恩 (Kenneth L. Dion)	
第十五章	结论：各种爱情理论的本质及相互关系	329
	凯琳·斯腾伯格 (Karin Sternberg)	
参加撰写人员		343
译后记		345

中文版序^①

虽然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人们都有可能恋爱和失恋。这本《爱情心理学》（最新版）试图解决爱情的本质以及如何通过实征^②方法研究爱情的问题。这本著作提出了诸如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怎么形成的，如何理解跨文化的爱情，以及什么导致爱情发生或什么损害爱情等问题。它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是由爱情及相关领域的名家提出的。

很荣幸能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多种多样的合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学问上的共同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很多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学习，也有很多美国人去中国提升自己的研究。我们希望这本书可以促进中美之间的学术合作，这可能有助于一些共同研究课题的立项！

本书的第一主编曾经访问过中国，还饶有兴致地惦记着那次旅行。他建立了许多直到现在仍在持续的合作结盟和友好关系。我们都有关于下一次行程的计划，我们希望这本著作能够促成我们的访问，增加我们与令人尊重的中国同仁合作的潜在机会。

我们从编撰这本著作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并在阅读它的过程中同样有所收获。

RJS（罗伯特·J·斯腾伯格）

KS（凯琳·斯腾伯格^③）

① 本序言原为英文电子邮件，作者的发送时间为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3月10日上午10点54分，由李朝旭博士收到后翻译成中文。——译者注

② 我们借鉴香港高尚仁和杨中芳博士的译法，将英文“empirical”翻译成为“实征”，以区别于positivism对应的“实证（主义）”。下文同。——译者注

③ 作者凯琳·韦斯现在改姓，因为她已经于2007年成为斯腾伯格博士的妻子。——译者注

前言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本书的第一主编罗伯特·J·斯腾伯格（Robert J. Sternberg）鉴于爱情研究领域的充分进展，认为有必要编写一部爱情心理学的著作。1988 年，《爱情心理学》一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是由罗伯特·斯腾伯格和迈克尔·巴恩斯编写的。它共有 16 章内容，基本涵盖了当时所有的爱情理论。这些年来，这部著作非常畅销；对于那些渴望将探讨爱情本质的理论一览无遗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有用的参考书。本书不仅介绍了理论，还提供了用来支持这些理论的数据资料。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爱情心理学》这本书显得有些过时。学者已经提出了新的理论，即便是那些在 1988 年就存在的旧理论，其中一些理论也得到了修正。一些旧理论的魅力已经远不如当年。另一些仍然引人注意的理论也得到了 1988 年之后新数据的支持。曾经参加编写《爱情心理学》的第二作者迈克尔·巴恩斯当年还是研究生，如今他已经离开了心理学界，于是斯腾伯格与现就读于海德堡大学的研究生凯琳·斯腾伯格通力合作，着手开始了《爱情心理学》（最新版）的编写工作。他们共同制定了本书的写作计划，为不同的章节遴选作者，并完成了统稿定稿工作。

我们非常乐意介绍一下《爱情心理学》（最新版）。每一章内容都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展开：

1. 你如何定义爱情？
2. 你提出或者运用的爱情理论是什么？
3. 有什么论据
(1) 支持该理论？



(2) 反对该理论?

4. 你关于爱情的研究取向和其他相关的取向有哪些异同?
5. 你认为你的理论有怎样的实践启示?

由于这些问题是固定的, 所以人们才有可能对比各种不同的理论及其检验数据。

本书第一部分涉及生物学说, 详细介绍了爱的动态进化观 (Douglas T. Kenrick)、浪漫之爱关系中的行为系统取向 (Phillip R. Shaver & Mario Mikulincer)、爱情的进化论 (David M. Buss)、爱情的内驱力 (Helen Fisher)、依恋与连结的生物行为模型 (James F. Leckman, Sarah B. Hrdy, Eric B. Keverne & C. Sue Carter)。第二部分涉及爱情类型, 包括恋爱风格 (Clyder Hendrick & Susan S. Hendrick)、探索“爱”的真谛 (Ellen Berscheid)、爱情的二重理论 (Robert J. Sternberg) 和爱即“共有应答性”的给予与接受 (Margaret S. Clark & Joan K. Monin)。第三部分涉及内隐理论, 只有一章内容, 提出了爱情研究的原型说 (Beverley Fehr)。第四部分涉及爱情文化学说, 介绍了基于情感投资的爱情进化与跨文化视角 (David P. Schmitt)、激情之爱的跨文化与进化观点 (Debra Lieberman & Elaine Hatfield) 以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爱情心理学的关系 (Karen K. Dion & Kenneth L. Dion)。凯琳·斯腾伯格撰写的“结论”一章对全书进行了总结性的讨论。

乔纳森·布伦特为本书签署了出版合同, 基思·康顿在出版过程中给予许多帮助, 谢里·斯塔尔则提供了编辑上的大力支持, 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引论

凯琳·斯腾伯格 (Karin Sternberg)

人类的许多互动以及人类对世界的一般知觉和理解，都是以一对对的关系为中心的。这种配对有助于人们将其生活的世界变得井然有序，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切。

在美国尚未成立、哥伦布还没有到达美洲的时候，生活在北美大陆的人们已经试图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遇到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雷雨暴风、干旱、西南部峡谷的壮观落日，还有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关系既包括他们部落内部的关系，也包括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人们试图通过给地点和事件赋予意义来组织他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印第安人村庄里的孩子小时候就开始以对比的方式认识世界。他们学习那些相匹配的事物，如白天和晚上、太阳和月亮、男性和女性。通过这样的分类，他们的世界变得井井有条 (Iverson, 1992)。

这本书也是讲述成双成对的，只不过是关注人类彼此关系中的成双成对，尤其是关心两个人结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成对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英语里用“love”^①这个词标注。

让我们回到现在，看看人类之间三种不同的关系。首先思考下面的例子。

玛芮亚和琳达成为朋友已经六年了，当时她们都刚到镇上，从那时起她们开始一起学习。通常她们每周见面一次或两次，一起聊天或是晚上外出。玛芮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她时常感到难以完成学校的课业。她总是害怕考试，尽管通常她考得很好。现在又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玛芮亚面对的不仅是考试压力，还要去找工作，搬到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镇，她感到严重的抑郁又向她袭来。玛芮亚难以入睡，无法复习学习笔记，非常害怕口语考试不及格。由于恐惧，玛芮亚已经错过了一次考试。尽管琳达必须准备她自己的考试，但她还是帮助玛芮亚复习，鼓励玛芮亚和她一起参加考试，同时每天都去看望她。考试前的那个周末，玛芮亚的情况恶化，她恐惧，害怕独处。琳达搬来和玛芮亚一起过周末，并一直待到下一周的星期二——举行考试的那一天。为了确保玛芮亚能参加考试，琳达和她一起到了考场，等在那儿直到考试结束。玛芮亚通过了考试，得了一个B。

琼尼在玩耍的时候追着球跑，却没有看到一辆汽车正从马路上开过来。他被撞伤，右腿骨折，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琼尼是一个害羞的孩子，非常害怕新环境。他妈妈在他住院期间辞去了工作，并在他醒着的时候尽可能地陪着他。妈妈要确保在她回家的短暂时间里琼尼可以玩他喜欢的玩具，这样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妈妈在家给儿子做他喜欢的饭菜，然后带到医院，这样琼尼就不必吃医院提供的食物。

马丁和朱丽娅考入了同一所大学。在筹备一个学生咨询会时，他们第一次相遇。马丁立刻被朱丽娅迷住了。他喜欢朱丽娅的黑色长发，迷恋她黑褐色的眼睛。她有着他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在他们的谈话中，她口齿伶俐，风趣幽默。于是，马丁开始邀请朱丽娅与自己和朋友们一起外出。他经常幻想着自己

^① 英文“love”和中文“爱情”并不对应，其实译作“爱”更为贴切一些，但考虑到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具体章节中采取了两种译法并存的处理。——译者注

和朱丽娅一起营造的生活和他们将组建的家庭。然而，朱丽娅对他的爱毫无反应。她感到马丁不断地干扰她，到最后她只好尽可能地躲开他。

正如我们看到的，爱并不是一个统一固定的现象。这种关系有无数种变式：母爱使她甘愿耗费所有可能的时间在医院里陪伴孩子；朋友之爱使其义无反顾地对处于困境中的朋友给予及时帮助；恋人之爱是他们坠入爱河时感到的激情之爱。还有一种无私的爱，即人们帮助那些和自己没有亲密关系的人，甚至是他们不认识的人。爱所呈现的不同模式都是爱的理论所要探索的内容。其中一些理论涉及的是爱的一个方面，主要是爱情；而另一些理论扩展了爱的类型，包括对老人福利医疗的照顾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其他一些理论关注的是性行为，以及为什么很多人并不感到近亲具有性的吸引力。

所有的这些理论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事实：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88年出版的《爱情心理学》是此领域中的第一部专著，涵盖了一系列爱的心理学理论。那时，爱情研究对于心理学领域来说仍然比较新鲜。之前，心理学家将爱的研究权拱手让给诗人、作曲家、哲学家等等。直到最近，关于爱的研究才披荆斩棘，从选题支离破碎的状态摇身一变成为行为科学研究的拿手好戏。爱的研究被长期忽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心理学家认为爱难以界定，无法对其进行研究。爱似乎难以成为系统测量和分析的对象（Berscheid, 1988）。

从那以后，关于爱的研究出现了很大的改观。现在研究者有更多的理论和方法去评定它们。学者开发了新的量表，比如爱和性的感知量表（Hendrick & Hendrick, 2002），爱情故事量表（Sternberg, Hojjat, & Barnes, 2001）以及性感七测度（Schmitt et al., 2003）。生物测量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展。随着爱的科学研究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研究者的人数以及相关研究的数量都有了飞速的增长。因此，今天获得了比过去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的实征依据。研究的焦点开始转移，新的爱情研究开始出现。诸如性欲、配偶选择等的跨文化研究占据了中心地位，因此，《爱情心理学》（最新版）这本书应运而生，它涵盖了爱情领域中的最新研究。

这本书包含四大部分，涉及爱的不同理论：生物学说、分类学、内隐理论以及文化学说。第一部分是“生物学说”，涵盖了从生物和进化论的层面上探讨爱情的五个理论。第二部分是“爱情类型”，包含四个理论，试图把爱的现象划分成不同的风格。第三部分是“内隐理论”，仅有一章，是非专业人员对爱情的理解。第四部分是“文化学说”，将爱置于文化背景之中。在书的结尾，作者整合了前面几章所介绍的爱的理论。

第一部分：生物学说

生物学说是内容最多的部分。第二章是“爱的动态进化观”，道格拉斯·T·肯里克（Douglas T. Kenrick）提出爱情是一系列以基因优化为目的而进化出来的决策偏好，这种目的有利于繁衍后代。这些偏好影响人们的注意、记忆和决策。例如，当一个人与陌生人互动时出现的利他行为要少于与拥有同样基因的亲戚互动时出现的利他行为。肯里克强调爱情的动力源于伴侣之间不断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形成了个体对对方的行为与后续回应的反应，因此，浪漫之爱是人性中一种本能的部分。人类面临着与生存和繁衍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寻找配偶、维持配偶关系、亲代抚养——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这些方式是从每个目标系统中发展出来的不同决策偏好。不同类型的爱对应不同的领域。一个人感受到的伴侣之爱不同于他感受到的子女之爱。肯里克承认在爱和相应的行为中存在着文化差异。他认为这些不同的文化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社会和自然生态存在着变异，适宜一种环境的行为并不一定适于另外一种环境。

第三章是“浪漫之爱关系中的行为系统：依恋、呵护和性”，菲利普·R·薛佛（Phillip R. Shaver）和马里奥·米库利茨（Mario Mikulincer）假设有三种行为系统：依恋、呵护和性。依恋系统的目标是通过与能够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他人保持亲密关系，从而确保个体的安全。依恋系统是可以被激活的，比如，当不能保持亲近、面临威胁时，它就会被激活。在这种情况下，就

要重新寻找监护人。呵护系统的目标是利他，它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了支持和照顾。这个系统的核心在于对方的幸福和发展。性系统则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作为它的首要目标。因此，个体必须对生殖力的信号敏感，并对异性感兴趣，并且能够提升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还要掌握能引起潜在伴侣兴趣的有效策略。这些行为系统包括特定的目标和一组可以达到相应目标的行为策略。如果个体多次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次级策略（过度激活和去激活策略）就要起作用，应对由失败引起的苦恼。这些策略能使个体努力以另外一种方式达到目标。过度激活策略（*hyperactivating strategies*）是一种激烈化的初级策略，即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目标行事。例如，假如一方不想做另一方所希望的事情，另一方可以抗议并且试图让对方顾及自己的需求。去激活策略（*deactivating strategies*）正好相反，它会关闭整个系统，以避免因个人不能达到目标而产生的沮丧和忧伤。这时，个体不再试图让对方做自己希望的事情。当一方没有反馈，甚至破坏系统的初级策略时，人们会使用去激活策略。例如，当一方亲近另一方却经常遭到拒绝，那么，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他或她会为了避免被拒绝，就不再试图与对方建立亲密关系。

第四章是“爱情的进化”，作者大卫·M·巴斯（David M. Buss）阐述了爱情是进化过程中解决繁衍问题的一种适应行为。如爱情提供了性接触，传达了性忠诚的信号，并象征着承诺。因此，爱情的意义是普遍的，并不拘泥于西方文化之中。所处的环境不同，恋爱的经历也不同。例如，如果一个人的伴侣从未做过让人嫉妒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不一定会体验到嫉妒。巴斯提出，爱情是获得承诺的策略，主要存在于长期的配偶关系中。爱情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发展有关。因为男性不能查明女性的排卵，那么，他就要和一位女性待在一起，并在她的月经生理周期中与之发生性关系。男性也开始注重培养他的后代，警惕与自己争夺伴侣的对手。与此同时，女性专注于和一位男性繁衍后代。基于巴斯的理论，男人比女人更可能一见钟情；当男性失恋时，他们表现得更激烈。女性则相反，她们更可能产生嫉妒，不太可能接受无爱的性关系。

第五章是“爱情的内驱力：择偶的神经机制”，作者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提出了三种相关的动机系统: 依恋、吸引(浪漫之爱)和性驱力。性驱力与那种渴望和他人有性接触的欲望有关, 它指向潜在的伴侣。哺乳动物中的吸引与我们人类所称的“浪漫之爱”相对应, 它涉及的内容有把注意力聚焦于某一特定的配偶身上, 向对方显示自己的隶属关系, 并努力避免他或她的伴侣落入竞争者手中。依恋的特征是感到安全舒适, 同时寻求亲近。在人类中, 依恋也被认为是伴侣之爱。费希尔将这三个系统还原到与它们相关的神经中枢之中。性驱力尤其与睾丸激素相关; 浪漫之爱与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有关; 依恋和催产素、抗利尿素有关。在所有的驱力(包括神经介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背后都存在导致动机产生的一般性的唤醒成分, 还可能存在一个更特殊的大脑系列, 激发特殊的想法、感觉和行为, 这些想法、感觉和行为与每个与爱有关的生理需求相联系。这个观点暗示诸如拒绝、一夫一妻和通奸行为都与特殊的神经系统有关。浪漫之爱是与其他基本内驱力相似的一种交配驱动力。

第六章是“依恋和连结的生物行为模型”, 作者詹姆斯·F·莱克曼(James F. Leckman)、莎拉·B·赫尔迪(Sarah B. Hrdy)、埃里克·B·凯维纳(Eric B. Keverne)和C. 苏·卡特(C. Sue Carter)论述的内容是源于连结和依恋, 以及反过来对连结和依恋产生影响的有意识的主观体验, 而不是论述“爱”这个术语。通过观察各种哺乳动物, 他们发现相对来说人类较少出现普遍固定的行为(universal fixed behaviors)。他们指出, 有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文化中都存在浪漫之爱, 还表明浪漫之爱和父母之爱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例如, 两种类型的爱都导致对被爱一方责任感的增强, 都促使施爱一方依照被爱一方的需求来行动。此外, 催产素和类吗啡物质对哺乳动物的连结和依恋的重要性在各种研究中已经得到了阐释。早期的生活经历对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有重要的影响; 然而, 婴儿的应答性也受到基因的影响。因此, 行为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 旨在促进父母的敏感性和孩子安全性依恋的行为干预程序也可能被开发设计出来。

第二部分：爱情类型

这一部分阐述了三种爱的分类理论，这三种理论把与爱有关的现象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爱。第七章介绍了克莱德·亨德里克（Clyde Hendrick）和苏珊·S·亨德里克（Susan S. Hendrick）“浪漫之爱的风格”。亨德里克采纳了约翰·李（1973）的爱情分类观点，即认为爱情有六种不同的类型：激情型（eros）、游戏型（ludus）、友谊型（storge）、实用型（pragma）、利他型（agape）和占有型（mania）。每一种爱情都含有特定的态度和信念。在任何特定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产生某一特定类型的爱情，这就使评定一个人在每种爱情类型中的表现程度成为可能。爱情类型能调节个体坠入情网和恋爱的体验，例如，爱情类型可以影响一个人坠入情网的快慢或是否充满激情。爱情类型也和几种人格特质有关。例如，激情型和人格的宜人性、外倾性和公正严谨性成正相关，和神经质成负相关，而游戏型和神经质成正相关，和宜人性、公正严谨性成负相关。此外，爱情类型也与性态度如放纵（游戏型）和负责的性欲（激情型）有关。我们发现不同爱情类型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男性更多地认同游戏式、无需承诺的爱情，相反女性更多地赞同友谊型或实用型。爱情类型可以运用到夫妻关系的调适，参考他们各自的爱情类型有助于理解自我和伴侣。

第八章是埃伦·伯奇德（Ellen Berscheid）的“探索‘爱’的真谛”。爱在这里被划分为四个不同类型：依恋之爱、温情之爱、伴侣之爱和浪漫之爱。依恋之爱可能是天生的，它能满足保护的需要。害怕的体验会让个体寻求与他人亲近。依恋能给人提供庇护。温情之爱关注的是他人的幸福，通常也被称为利他式的爱情。鲍尔比（Bowlby）的呵护系统是这种爱情的基础。伴侣之爱也被称为喜欢之爱或现实之爱。它基于报偿和惩罚的原则。这意味人们通常喜欢给予他们褒奖的人，而不喜欢惩罚他们的人。第四类爱情是浪漫之爱，它含有情欲，因此通常又叫做激情之爱或性欲之爱。每一种爱的类型都由不同的原因所激活，随后带来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在关系中，个体体验到的爱可能不止一种

类型。伯奇德也阐述了“爱”(love)和“相爱”(to be in love)之间的差异。“相爱”仅指一种类型的爱情，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处于相爱的状态，那么另一个人必须在被喜欢的同时，又具有性的吸引力。相反，“爱”这个词的意义更加宽泛，它可以指许多不同类型的爱。

第九章是斯腾伯格(Sternberg)的“爱情的二重理论”，包含两个亚理论，即爱情三角形理论和爱情故事理论。爱情三角形理论认为爱情包含亲密、承诺和激情三要素，它们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三角形的图形取决于几种要素的总量(三角形的大小)和它们之间的平衡(三角形的形状)。由于一个具体的爱情关系中会存在一种或更多的要素，这就可组合成八种不同类型的爱情。例如，亲密加激情构成浪漫之爱^①，而亲密加承诺构成了伴侣之爱。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的爱情三角形，如现实的三角形和理想的三角形，行动的三角形和意识的三角形。爱情故事理论指的是由个体特质与环境交互作用而引发的爱情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并试图在生命中实现它。这些故事有些是关于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有些是关于恐怖分子和无辜者的恐怖故事，有些是关于两个商业伙伴的商业故事。爱情关系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两个人故事的相似性与相容性。

第十章介绍玛格丽特·S·克拉克(Margaret S. Clark)和琼·K·莫南(Joan K. Monin)的“爱即‘共有应答性’的给予和接受”理论，这个理论关注的是共有应答性，爱情双方要无条件地关心对方的幸福，致力于对方的需要、愿望和目标，不要利用对方的弱点。应答性的五种类型是：(1)帮助(如某人受到伤害或有特殊的目标或行动的需要)；(2)为未来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如倾听或提供建议)；(3)在与他人的协作中创造条件(如在一起跳舞或游戏)；(4)在他人违约时表达关心(如原谅对方因为繁忙而忘记赴约)；(5)象征，在看似不需要的情况下，一方仍向另一方表达关心。与共有应答性有关的过程和通常被人描

^① 原文为“passionate love”(激情之爱)，应该对应于斯氏三角形理论中的“romantic love”(浪漫之爱)，但前者不是八种类型之一，判定此处作者用词不当，故译为后者。——译者注

述的爱情关系是一样的。共有应答性可以为个体提供安全感和舒适感。在爱情关系中，表达需要和开放自己能增强彼此相爱的感受。同时，那些看起来能被接纳的行为有可能破坏共有应答性。共有应答性不是定义爱情的唯一方式，它却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爱情，因为它与由强烈激情引发的焦虑和悲伤无关。

第三部分：内隐理论

本书只介绍一种爱的内隐理论。第十一章论述了贝费利·费荷（Beverley Fehr）的“爱情研究的原型说”。费荷不仅探讨她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是如何看待爱情的，还研究普通人眼中的爱情。她发现伴侣之爱是爱情的中心部分。在看待爱情上也存在性别差异。通常女性更多地赞同伴侣之爱，而男性却更多地持有激情式的爱情观。在爱情上，女性更多的是友谊型和实用型，而男性报告他们更可能一见钟情，并且通常都持有真爱永恒的浪漫观。这些人们通常如何看待爱情的原型也会透露出他们的爱情关系。研究表明，与其他不太典型的特征相比，被破坏的原型特征越典型，那么人们感知到的爱情被颠覆得越严重。那些对于爱情采取原型观的夫妇对夫妻关系更满意，而且更爱对方。原型也被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爱情类型，而所有的类型都有相同的核心特征。

第四部分：文化学说

另外三种理论强调的是爱情的文化方面。第十二章是“爱情的进化和跨文化的观点：性别、人格和当地生态对恋爱关系中情感投资的影响”。大卫·P·施密特（David P. Schmitt）介绍了一个被称为“情感投资”的多元爱情维度。这个维度包含爱情的许多核心特质，包含斯腾伯格的爱情二重理论中的亲密、激情和承诺三种成分。情感投资这一构念与外向性和宜人性和都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在一个维度得分较高，那么另一维度的得分也较高。然而，不

同类型的爱情在与人格特质的相关程度上存在差异。施密特报告了他和他的同事对来自 48 个国家的 15000 人所做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不同文化中的爱情的概念是非常相似的。在一种关系中的情感投资和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人们的安全依恋和个人主义存在正相关，也与短期约会兴趣和离婚率成正相关。在压力水平高的文化中，例如，由于经济困难和苛刻的物理环境所造成的状态，儿童倾向于表达较低水平的情感投资。另一个成果是大多数国家中两性在情感投资上存在差异，男性的得分通常低于女性。

第十三章是“激情之爱：跨文化和进化观点”。黛布拉·雷博曼（Debra Lieberman）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指出尽管激情之爱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但是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影响着爱情这一术语的精确含义。他们陈述了浪漫之爱的概念，例如，它能够很好地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相契合，但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的融合度较低。在中国，人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情感，还要考虑他们对其他人（如他们的父母）所担负的责任。然而，对于一些特质，性别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文化的影响，如良好相貌在婚配中的重要性。文章的作者观察到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正在减少，因为年轻人渐渐采取了西方典型的方式，比如，在爱情和性的方面主张男女平等，结婚是因为爱情，而不再是以前的包办婚姻。他们也采取措施去避免近交（inbreeding）。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为选择合适的性伴侣，对亲属关系的检测尤为重要，厌恶情绪是为了避免与近亲发生性接触。

第十四章介绍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爱情心理学”。卡伦·K·迪恩（Karen K. Dion）和肯尼思·K·迪恩（Kenneth L. Dion）认为，在一个特定文化中人们对个人和集体关系的信仰会影响人们对爱情的理解。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与相对开放的爱情观相关，永远爱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小，对家庭成功的知觉感受更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把爱情看成是建立在友情和利他的基础上的，强调的是呵护而不是强烈的喜爱。亲密关系的发展也是存在文化差异的。美国的夫妻尽力在他们的婚姻期间保持高水平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尽力留有空间以发挥他们的自主性。日本的夫妻在结婚的第一年里不得不照顾他们大家庭中其他成员的需要，并倾向于在以后的

婚姻生活中变得更加亲密。这些研究被拓展到对老年人的照顾上。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人把情感和依恋作为照顾老年人的主要原因。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中则依靠责任以及把照顾老年人当做一种普通存在的负担的认识。然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父母力图与已成年的孩子保持较高的独立水平。

结论

第十五章是“结论：各种爱情理论的本质及相互关系”。凯琳·斯腾伯格探讨了这本书中介绍的各种理论，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整合。例如，本章探究不同类型的爱情是否都有普遍的共性，或者至少部分是具有共性的。而且，本章总结了一些有关环境、人格、时间和文化对爱情的影响的成果。本章还从另一个视角看待此书中所提出的旨在解决各种爱情问题和关系问题的不同机制。最后，本章提出了一些更加开放的问题，并描述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 Berscheid, E. (1988). Some comments on love's anatomy.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2002). Linking romantic love with sex: Development of the Perceptions of Love and Sex Scal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 361-378.
- Iverson, P. (1992). Taking care of the earth and sky. In A. M. Josephy, Jr. (ed.), *America in 1492: The World of the Indian Peoples Before the Arrival of Columb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Lee, J. A. (1973). *The Colours of Lov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ays of Loving*. Toronto: New Press.
- Schmitt, D. P., Alcalay, L., Allik, J., Ault, L., Austers, I., Bennett, K. L., et al. (2003). Universal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sire for sexual variety: Tests from 52 nations, 6 continents, and 13 islan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85-104.
- Sternberg, R. J., Hojjat, M., and Barnes, M. L. (2001). Empirical tests of aspects of a theory of love as a 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5(3): 199-218.

第一部分

生物学说





爱的动态进化观

道格拉斯·T·肯里克 (Douglas T. Kenrick)

详细描述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分析的第一步，但对于研究爱的学者们来说，这个步骤是无法确定的事情。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爱你”这一表述可以以十分真诚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下说出来：可以是母亲面对自己的婴儿时，可以是少男面对前一天在墨西哥海滩上遇见的女士时，也可以是异性恋的女性面对最好的女友时。那么，如果母亲对子女的爱与情侣间的浪漫之爱以及朋友间的柏拉图式爱恋之间有关系，那么它们两两之间可能存在什么关系呢？即使仅仅是浪漫之爱，女性和男性向对方说“我爱你”时，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内容吗？

在回答“‘爱’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心理学家们通过实征和理论研究，清晰而明确地阐述了与大众观点相吻合的结论，即爱的类型并不单一，可能有六种甚至更多（如 Fehr & Russell, 1991; Hendrick & Hendrick, 1986; Sternberg, 1986）。大部分实征研究把重点放在爱的现象学上，试图解析爱的内心体验。例如，一些研究人员研究了爱的体验由几个层面组成（如 Aron & Westbay, 1996; Sternberg, 1986），另一些人则探讨了不同的人是如何把爱的各个层面相

结合形成不同类型的爱（如 Fehr & Russell, 1991；Sprecher & Regan, 1998）。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努力探索爱的各个层面是否受到不同生理解剖系统的控制（如 Diamond, 2003）。

在本章中，我将从爱的动态进化视角来讨论不同类型的爱。爱的动态进化模型的核心理论如下：

1. 爱是以一系列进化决策偏差为基础的。这是对一系列观点的综合，这些观点都基于现代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整合（如 Kenrick, 2001；Kenrick, Sadalla, & Keefe, 1998；Lumsden & Wilson, 1981；Tooby & Cosmides, 1992）。此观点认为，心理由一系列内在偏差构成，这些偏差影响我们选择注意的内容，对事件如何解释，从记忆中提取的内容，以及做出怎样的决策。一般而言，这些偏差是以促进种族繁衍行为的发生为目的的。因为强大的社会连结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是必不可少的，促进这些连结的决策偏差可能在当时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
2. 推动恋爱关系的决策偏差存在性别差异。雌性哺乳动物要做出最小化投资，而雄性则不然，这一简单事实使男女两性在择偶游戏中的表现大相径庭（Geary, 1998；Trivers, 1972）。尽管爱的现象学研究提示男性和女性具有相似的经验，但是进化的普遍原则引导我们预期发现男女之间在亲密关系的前因和后果方面所表现出的重大差异。
3. 心理是模块化的，决策偏差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表现截然不同。解决不同的问题涉及不同类型的强大连结关系。寻找情人和维持情侣关系不是同一类问题，涉及的决策偏差完全不同。同样，抚养后代和保持朋友关系也是如此。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同类型的爱在功能上可能都具有加强社会关系的共性，但是，它们各自的内在动机却可以严格区分为饥饿、口渴或恐惧。
4. 个体的决策偏差进入人际交往环境，就成了动态变化的过程。每一种影响爱的关系的决策偏差都遵循“如果—那么”的条件规则，他人的选择决定了条件提出者采用哪种备选方案。一方选择的变化会改变另一方的选择方

案，同样，决策规则也因受到其他许多人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是只有两个人就可以跳探戈，而且也很少有哪两个人会躲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单独跳探戈；相反，人们往往聚集在人多的舞厅里，伴着音乐的节拍，相互之间默契地配合，在同一时间迈出同样的舞步，并且时不时地更换舞伴。

5. 在人际互动与非社会环境特性的互动下，爱赖以存在的文化规则就显现出来。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现象相对多见，这就给表达强大的社会连结增加了许多跨文化变量（如 Crook & Crook, 1988）。跨文化变量既不是无限增加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我们个人的决策偏差归根结底是建立在进化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我们的祖先为了解决种族繁衍的问题而建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心理是一本彩色的书，而不是黑白版——选择哪种颜色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整体布局却已经由一些深重的暗线限定好了（Kenrick, Becker, Butner, Li, & Maner, 2003）。

本能、心理模块和领域特异性

爱的关系中常常包含强烈的情绪，其中某些情绪似乎会干扰理性的决策过程，由此，研究爱的体验或许是研究人类本能的一个巧妙的角度。当然，社会科学家不大相信直觉可以作为一种科学证据。同样，心理学家也比较反对本能的观点（Krueger & Funder, 2004）。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出发，浪漫之爱可能是人性本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一个为社会科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则与之针锋相对——爱情是历史和文化上的临时构念。事实上，一些社会科学家确信现代西方社会中非常强烈的浪漫之爱体验在其他社会形态和其他历史时期是不存在的（参见 Jankowiak & Fisher, 1992）。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一立场显然是违反直觉的证据，不过，跨文化研究和生理研究的结果已表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Diamond, 2003；Jankowiak & Fischer, 1992）。爱的体验不受物种的限制，是普遍存在的，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本能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鉴于爱的类型多种多样，本能这个词也具有多重含义。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90）把本能看做一种先天固有的能力，表现为“在没有结果预期，也不对行为表现进行早期教导的情况下，仍产生结果”（第二卷，383页）。詹氏的本能原型是打喷嚏——由某些感觉刺激物（这里是嗅觉刺激）自动引发的反射冲动。詹姆士的确把他的本能概念扩展到更加复杂和更易感知的程度，其中包括社会偏好，如他提出的著名问题：“一旦少年喜欢一位少女，那么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没有什么事物比与少女有关的一切更重要和更有意义了，这是为什么呢？”（第二卷，第386页）

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 1908）对本能的解释更接近于现代对情绪的定义：“是一种遗传或先天的心理生理状态，决定了哪类事物会引起个体的感知和注意，对这类事物引发哪种情绪体验，以及采取哪种特定行为，或者至少产生采取哪类行为的冲动。”（第29页）麦独孤认为有七种强烈的情绪和本能相联系：（1）恐惧，（2）厌恶，（3）惊讶（与好奇相关），（4）愤怒，（5）屈从（羞耻或尴尬），（6）得意（骄傲），（7）父母本能（亲切、共情）。此外，他还提出了两个与情绪无关的社会动机——生殖本能和交往本能。

人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本能对环境刺激物的不灵活性或麻木不仁。恰恰相反，詹姆士相信本能“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卷，第389页），实际上，“动物记忆中的任何一种本能活动在重复过程中必须摆脱‘盲目’的照搬照抄”，如果不受外界刺激物的影响，脱离了环境的评价尺度，先天的反应系统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尽管20世纪的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本能和学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无论应用于人类还是其他动物，这样的结论都是行不通的（Alcock, 2001）。

本能的行为活动往往不是简单的“刺激—情绪—反应”链，而是随时间的变化逐渐积累的复杂结果。例如，莱尔曼（Lehrman, 1965）指出斑尾林鸽的求偶过程包含一系列步骤：在求偶初期，一组刺激引发某些激素变化和行为反应，继而出现生理变化，导致鸟类专注于不同的刺激并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莫里斯（Morris, 1958）在观察刺鱼的交配行为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即一系

列固定程序性行为的增加。由异性引发的本能行为反应中的相似阶段可能代表了人类和其他动物求偶行为的复杂过程（Kenrick & Trost, 1987）。

模块化的现代观

詹姆士认为人类大脑是由彼此相对独立的若干模块组成的，现代的一些进化心理学家也持此观点。例如，鸟类的食物定位和鸣叫学习隶属于不同的记忆系统；人类语言的各个要素都有其特殊的作用机理，学习控制厌食和恐惧的机制与其他类型的学习不相容，社会契约中对欺骗的逻辑推理能力存在分化（如 Ohman & Mineka, 2001；Pinker, 1994；Rozin & Kalat, 1971；Sherry & Schacter, 1987；Sugiyama, Tooby, & Cosmides, 2002）。当人类再次面临曾经历过的威胁或机遇时，在以目标为导向的系统中，情绪或动机会促进适应性反应的产生。这是由麦独孤提出，并为现代进化观所继承的又一个观点（如 Cottrell & Neuberg, 2005；Plutchik, 1980）。

继詹姆士和麦独孤之后，现代心理学家对本能行为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要想把这些机制进一步细化到各个不同类别，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一类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有多少种人类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由进化形成的模式所控制的。这些问题与对不同类型的爱的探索都有着特殊的关系。

社会生活领域

动态进化模型假设人类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各种问题可以划分到几个不同的领域（Kenrick, Li, & Butner, 2003；Kenrick, Maner, & Li, 2005）。无论身处何方，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不断遇到下列几类问题：

- **亲和（Affiliation）**：人类祖先生活在内部高度依赖的小团体中（Sedikides & Skowronski, 1997）。为了生存繁衍，每一个人类个体都需要与团体中的其他人合作。

- **地位 (Status)**: 无论在哪里, 人们无一例外地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同伴在当地处于哪一阶层 (Goldberg, 1981)。无论男女, 地位的提高都意味着资源范围的扩大。但对于男性来说, 提升地位同时具有生物学意义, 因为男性的身份地位是女性择偶的一项参考因素 (Li, Bailey, Kenrick, & Linsenmeier, 2002; Sadalla, Kenrick, & Vershure, 1987)。
- **自我保护 (Self-protection)**: 远古时代, 人类常常遭受外族部落的攻击 (Baer & McEachron, 1982), 偶尔, 同一部落的内部成员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Daly & Wilson, 1988)。识别这种威胁的能力或倾向在当时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
- **求偶 (Mate-seeking)**: 自然选择的中心问题离不开物种的繁衍,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而是因为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后代生存而克服了重重困难。古代的男性和女性在抚育后代上的分工不同, 据此, 人们猜测两性的择偶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例如 Li et al., 2002)。
- **配偶关系维持 (Mate retention)**: 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 配偶的选择过程通常是雄性努力展示自己, 真正做出选择的是雌性。它们在求爱之前已经选好了心仪的配偶。在人类, 由于后代出生时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 为了让他们存活, 需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因此, 人类祖先保留了与配偶一起生活的习惯, 即男性与女性合作抚育后代 (Geary, 1998)。尽管配偶连结 (pair bonds) 的形式和配偶的数量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 但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存在一定形式的两性之间的长期婚姻关系 (Daly & Wilson, 1983)。
- **亲本抚育 (Parental care)**: 人类的亲子连结 (parental bonds) 的终极功能是抚育后代。父母和子女相互依存, 但父母之间和亲子之间的连结的强制性程度, 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流规则却大相径庭。

由于不同领域的问题在解决方法上往往缺乏一致性, 据此, 人们猜测人类具有一套模块化的目标执行系统, 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领域的问题。

一个领域的普适模型 (domain-general model) (例如, 做什么可以获得奖励, 什么是收益/付出比率平衡的结果) 并不足以解决跨领域的问题 (例如, 激情四溢的热吻可以是恋人的奖励, 但如果发生在朋友之间就不是件好事; 男士可能希望和朋友平摊餐费 [或这次我来付, 下次由对方来付], 但如果在初次约会时女士要求付账单, 这很可能意味着交往的终止)。

每一种社会目标体系都是以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决策偏差 (decision biases) 体系为基础的。例如, 从整体适应度 (inclusive fitness) 的角度出发, 人们会认为无血缘关系的人与自身后代应采用不同的资源分配法则。因为子代有一半的基因与父/母亲相同, 而无血缘关系的人则不具备这一特点, 如果把资源给了“外人”, 自己后代获得的资源就打折扣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和其他物种一样, 人类的决策过程受血缘关系的影响非常大 (Alcock, 2001; Laham, Gonsalkorale, & Von Hippel, 2005; Smith, Kish, & Crawford, 1987)。

这一模型也假设决策规则具有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功能, 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变化着。例如, 为了养育后代, 女性要经历怀孕、生产、抚育的过程, 这些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此, 在远古时代, 和男性相比, 女性从潜在的配偶中做出选择时通常有更高的要求。这一假设得到了大量的证据支持 (如 Buss & Schmitt, 1993; Clark & Hatfield, 1989; Kenrick & Luce, 2000)。

哪些社会领域是爱滋生的土壤?

《韦氏新大学词典》第九版中, 关于爱的定义前三条是: (1) “血缘关系或个人关系中产生的对某人的强烈情感” (如母爱); (2) “以性欲为基础的吸引”; (3) “由仰慕、仁爱或共同兴趣所引发出的情感”。多样性的含义为后来的爱体验研究指明了方向 (如 Fehr & Russell, 1991; Sternberg, 1986)。不同类型的爱与不同的社会领域更符合。例如, 以性欲为基础的激情之爱更容易产生于寻求伴侣的社会领域, 而强度稍逊的基于仰慕、仁爱或共同兴趣的爱更容易出现在

维持伴侣关系的领域之中，血缘关系中强烈的喜爱则在亲本抚育中不可或缺，朋友之间的爱在社会合作领域中显得恰到好处。

是否有一些共有的潜在生理学或现象学成分把不同类型的爱联系在一起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们已经把重点聚焦于垂体后叶催产素（oxytocin）之类的激素和依恋感来寻找可能的答案（如 Zeifman & Hazan, 1997）。然而，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差异性可能比相似性更重要。例如，在浪漫之爱中，一旦睾丸激素（testosterone）发挥了作用，主体的内心体验和行为结果与催产素单独作用所诱导的依恋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是不是像愤怒和恐惧一样，每一种类型的爱都是一种独立的情绪，当触发某一领域的问题时，就会引起相应的情绪反应呢？例如，激情之爱是不是求偶执行系统中的动机成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臆测充其量是不准确的。例如，尽管激情之爱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求偶领域，但这种体验（以及潜在的激素水平）也可能产生于对孩子、长期伴侣，甚至是朋友的爱之中，不同类型的爱交织在一起（尽管不是很强烈）。此外，尽管由睾丸激素引发的性唤起在求偶的早期阶段起着核心动力的作用，但这种性欲在其他领域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分手之后对新伴侣的渴望；或者凌晨三点钟，性欲充分满足之后对伴侣的一切产生强烈的兴趣）。

虽然像字典中对爱下的定义一样，心理学研究把重点放在与爱相关的积极情绪体验上，但是，在某些时候，消极情绪在维持强烈的社会连结中也可能发挥着作用。例如，性嫉妒是令人生厌的自私情感，但也可以成为维持长期关系的动力因素。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除了引发积极的关爱之情，亲代之爱可能也包含着对父母关系破裂后孩子抚育问题的担心。此外，所有类型的爱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特点，即对消极情绪的压抑。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朋友或爱人把你提供的食物一半都浪费了，半夜在你耳边尖叫把你吵醒，几个月来喋喋不休地抱怨所遭受的虐待，除非你是圣人，否则，你早就也向他尖叫，并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与他绝交。然而，这就是大多数婴儿所做的事，但很少有人因此抛弃他们。恰恰相反，人们总是用完全理解的温柔细语回应他们的独霸专横

和无理要求。

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领域和不同的情绪情感要素之间并不存在精确的一一对应关系，在理解爱这个术语的不同含义及其功能时，这种臆测并不是最佳选择。

爱在决策偏差中的应用

从我们提供的视角来看，要想对所有类型的爱有更全面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贯穿不同领域的决策偏差中得到一些启发，这些决策偏差潜藏在强大的社会连结之中。表2-1列出了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或称我们爱的人）在日常交往中可能涉及的偏差。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决策中偏差的产生机制不一定是有意意识的、“理性的”或复杂的，相反，决策偏差的产生往往以易感素质为基础，这些素质包括选择性地注意社会环境中的某些特征（与迅速注意到他人面部情绪的倾向类似），并对这些特征产生某种特殊的感受（例如，当看到一位彪形大汉怒气冲冲地向我们走来时，我们会感到害怕）。

表2-1列出的认知偏差中，尽管有一些没有得到验证，但大部分都有实验证据的支持。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反馈给被试的信息是他们组在益智游戏中的成绩不错，并让他们分别评价自己和搭档对成功所承担的责任。当与陌生人一起做游戏时，人们出现典型的“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把成功大部分归因于自己。当与熟悉的人一起游戏时，人们出现“他人服务偏差（other-serving bias）”，把成功更多地归因于他人（Ackerman, Ledlow, & Kenrick, 2003）。在其他研究中，被试分别和陌生人、朋友或家人一起玩各类资源困境游戏（如Ledlow & Linder, 2003）。当被试得知自己在和家人而不是陌生人一起玩游戏时，他们表现得更加宽容合作。被试对待朋友虽然不如对待家人好，但要比对待陌生人好。结论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家族进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少得可怜（Daly, Salmon, & Wilson, 1997）。不过，这种局面已经开始扭转（如Laham et al., 2005; Park & Schaller, 2003）。

表 2-1 不同领域中强大的社会连结的功能及伴随的认知偏差

社会领域	强大社会连结的功能	认知偏差举例
结盟 (coalition formation)	巩固互惠联盟 从团体合作中受益	求同存异 忽略短期的不公平
地位 (status)	依靠成功关联使自己的 声望得到提高 与获胜团体分享利益 鼓励追随者的行为	在令人尊重的权威面前放弃批判 性思维 喜欢自己所在的群体，不喜欢其 他群体的信息偏差 注意到获胜者与自己的共性，与 失败者划清界限
自我保护 (self-protection)	防止外群体成员或内群 体的叛变者掠夺资源或 伤害自己	对内外群体成员势不两立的认知 偏差 容易看到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 倾向
建立关系 (gaining mates)	获得心仪的富有生殖力 的伴侣	男性相对更关注身体吸引，年轻 女性更关注地位 男性更容易从潜在伴侣身上发现兴 趣点，并从中感受到激情之爱 女性相对不容易对潜在伴侣建立 信任
保持关系 (retaining mates)	维持生殖连结 (repro- ductive bonds)	对不公平的觉察力降低 对潜在的不忠行为和对有性魅力 特征的潜在插足者过度警戒 对潜在插足者穷凶极恶
照顾家人 (familial care)	养育亲人	更容易注意到其他关系中的不公 平情况，而最容易忽视家庭中的 不公平情况 过度关注子女的健康情况

注：本表中的例证并不全面。

更多的研究关注男性和女性怎样看待潜在的伴侣。例如，有一个系列的实验研究揭示了人们对有魅力的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水平的认知加工过程的反应。眼球追踪器记录结果显示男性把目光更多集中到漂亮女性身上，并且，男性对她们理所当然地持有更多的认知加工偏差，他们估计漂亮女性有更好的先天禀赋，这两项结果都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Maner, Kenrick, Becker, Rebertson, Hofer, Neuberg, Delton, Butner, & Schaller, 2003）。在一项注意力集中游戏中，男性对漂亮女性位置的记忆能力表现出特别优秀的成绩（Becker, Kenrick, Guerin, & Maner, 2005）。在所有的认知加工水平上，女性同样青睐漂亮女性，而对英俊的男性不那么“热衷”。女性会注视英俊的陌生男性数秒钟，却没有进一步的认知加工偏差（对英俊男性的记忆与普通男性没有差别，也没有出现与男性对漂亮女性的估计偏差类似的认知偏差）。

研究者让男性被试对“中性的面部表情是否能引发性唤起”作出判断，当显示的面部是有魅力的女性，或被试存在择偶动机时，被试才作出肯定的判断（Maner et al., 2005）。另一项系列研究发现女性更容易对男性的爱的表白持怀疑态度，而男性则把性欲望归结到女性头上——除非那个人是自己的同胞姐妹（Haselton & Buss, 2000）。这些研究结果与亲本投资差异模型是一致的，这个模型认为如果在择偶时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女性比男性的损失更大（如 Kenrick, Groth, Trost, & Sadalla, 1993; Kenrick, Sadalla, Groth, & Trost, 1990）。

迄今为止，我们仅对这些决策偏差的本质属性有一些大致的了解。后续研究和理论的发展有望从定性的偏差研究转变到定量的决策权衡。这需要在更多的理论指导下提出各种假说。在社会动力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个人偏差会在群体水平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些偏差的消亡（play out）也是必要的（Kenrick & Becker et al., 2003）。

这些决策偏差的背后是为自私基因牟利的冷酷无情的经济规则。但它们总是与一定的情感状态相伴，这些情感状态可能是温暖而又朦胧的，甚至是深情而又热烈的。为什么情感有时要与冷冰冰的决策规则相伴，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情感体验可能与荷尔蒙水平的变化相关，而荷尔蒙的变化可能有助于对任

务集中注意力，直到目标实现。例如，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迅速，在毫秒之内就能引起意识加工方向的变化，尽管自主神经系统也会在瞬间完成注意转变，但其荷尔蒙的分泌会存在一段时间的滞后。当足够数量的性激素进入血液的时候，除非出现了性行为而引起了其他激素的释放，从而使这一目标状态终止（优先级更高的活动也可执行这一功能），否则，血液中激素水平的下降将十分缓慢。

爱与人际动力学

如果我们想了解爱的功能，仅仅明白某一种类型的爱的内在体验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交互作用系统。想想亲代之爱。就在我写这段文字之时，我15个月大的儿子正由保姆陪着在隔壁的房间中玩耍。当我经过他的房间，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抱起他，和他一起玩（他的笑容就是对我的奖赏，这是在我有孩子之前未曾想过的）。如果我要离开他重新回到工作，他就会变得非常不安。于是，我不得不继续留在那里，和保姆一起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之后再偷偷溜出来。他喜欢我胜过喜欢保姆，但如果他妈妈在旁边，我就要屈居第二了。他对祖母的喜欢也超过保姆，但不会超过他的父母。我不得不说，这些事实是进化心理决策法则和自身经验互动的作用。经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举个例子来说，除非与祖母交流，否则婴儿是无法认识祖母的。但是，许多经验本身就造成了决策偏差，这些偏差植根于人类进化史，成为可信赖的社会动力学。祖母能比一般的保姆赢得婴儿更多的依恋，但和母亲相比依然逊色不少——婴儿不能容忍母亲数个小时不在身边。

上述家庭动力学的内容是美国文化独有的吗？即使世界上存在能够创建出没有决策偏差文化的物种，把上述现象解释为美国特有的现象也不妥当。首先，跨文化研究发现了世界各地的家庭动力学都是类似的（如 Geary, 1998; Hrdy, 1999）。其次，祖辈之爱同样遵循整体适应度法则，其方式在无形中与

祖父母得到自己的祖父母之爱的方式是类似的 (Laham et al., 2005)。祖辈的情感遵循更多的家族规则。即姥姥比奶奶付出的情感更多, 爷爷付出的情感最少。上述情况与确定性 (certainty) 有关, 由于体内受精, 母亲毫不怀疑孩子会遗传自己一半的基因, 父亲却不会那么肯定。从爷爷到孙子 (女) 这一辈, 则经历了两个这样的步骤, 而从姥姥到外孙 (女) 却不会节外生枝。姥爷和爷爷与 (外) 孙子 (女) 不太亲近, 除非他们对基因的肯定性大一些 (例如, 外孙 [女] 要比孙子 [女] 的确定性大)。如果自己没有女儿, 爷爷奶奶才会对孙子 (女) 的投入更多, 从整体适应度的角度来看, 这是退而求其次的策略。

个体决策规则 (如表 2-1 列出的) 根据对方的偶发反应方式而采取“如果—那么”的形式。相应的, 任何个人的决定也是周围人采取某种策略的依据。因此, 决策规则的差异对于正确理解不同社会关系中社会动力学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实验中, 与家属和非家属互动时动力学的变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图 2-1)。囚徒困境是经典的经济游戏, 面对警察的审讯, 两个囚徒面临着利益冲突。如果两个囚徒能够合作, 都保持沉默, 他们的审判结果要好于两个人都坦白 (比较左图左上方框和右下方框)。困境的产生是因为如果囚徒 A 坦白, 而囚徒 B 否认, 那么, A 会得到更大的奖赏, 而 B 受到更严厉的审判, 反之亦然。因此, 两个囚徒都倾向于供出对对方不利的证词来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类似的利益关系会在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个体之间制造出进退两难的局面, 但如果是和一级亲属 (平均有一半的基因相同) 一起参加游戏, 结果大不相同 (Kenrick & Sundie, 待出版)。站在基因的立场上, 兄弟俩每人都能分得对方所获奖励的一半, 如下面的利益矩阵所显示, 无论另一个人采取哪种方案, 双方都从合作中获益。结果, 为了得到证词而设置的奖励以及由此而生成困境便不复存在。

个人的决策偏差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但是也有助于我们的关系向有意义的方向转变。我在脑海中与你作决策, 而你也会在脑海中与我作决策, 这样我们之间的互动就会协调一致。当然, 与此同时, 我们双方也和许多其他人作决策, 这些人也都有自身的决策偏差。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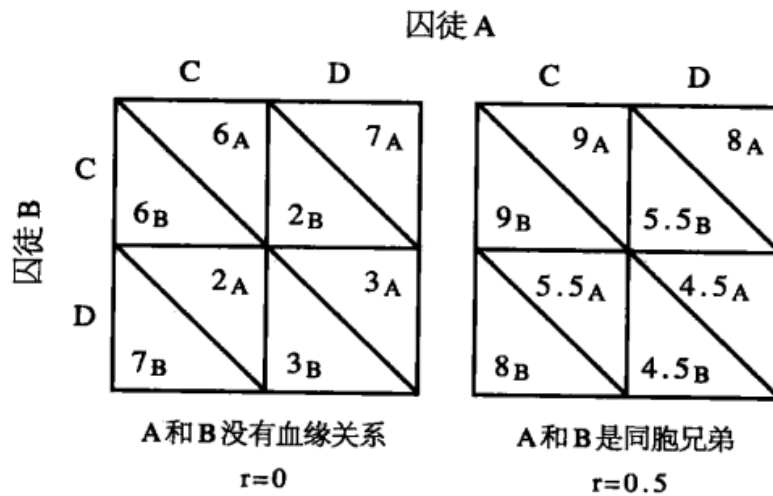


图2-1. 根据整体适应度的观点, 人们总是寻求更好的结果, 这就给非血缘关系的两个个体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经典的囚徒困境问题变成了每人获得的奖励是自己所得奖励加上自己兄弟所得奖励的一半, 主导策略就会由背叛(D)转变为合作(C) (Kenrick & Sundie, 待出版)。吉尔福德 (Guilford) 出版社重印。

并不是一团乱麻, 而往往呈现一种自我组织 (self-organization) ——井然有序的状态取代初始的随机状态。计算机模拟技术论证了为什么这种自我组织倾向于合作, 就像有些邻里之间会变得高度合作, 而另一些邻里之间则变得激烈竞争, 因为人们总是试图配合邻居的行为 (Kenrick, Li, & Butner, 2003)。交配策略也存在相同的标准自我组织。如果大部分邻居都忠于婚姻, 那么不加约束的性行为就难以出现, 如果大多数邻居的性关系随意, 那么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则难上加难。尽管开始时邻居采取的交配策略有许多种, 每一次可能随机采取不同的方案, 但最终会形成与所在地区的标准相一致的标准 (Kenrick, Li, & Butner, 2003)。

不同决策规则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与每一种社会领域相对应的社会几何学 (social geometry) 的分化。例如, 长期关系的变化更加复杂 (和老朋友相比, 新朋友带来的收益要超过付出; 但如果换成配偶关系, 情况则刚好相反)。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规则

每一社会领域中行为背后的决策规则都是“如果—那么”的形式，其中“如果”的内容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输入，“那么”是策略反应变量，决定了在某种情境下出现适应性更好的行为。社会和自然生态中的经常性变异决定了哪种反应具有适应性。例如，如果女性对男性的性别比增高，那么男性的行为限制会减少，社会标准也会朝着乱婚的方向变化（Guttentag & Secord, 1983）。如果男性的比例过高，相对更多的男性竞争少数几个达到婚龄的女性，那么，男性就会更加有责任感，社会标准就会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承诺。

证据表明，这种生态因素对关系的心理判断具有直接和即刻的影响。例如，当男性可以接触到许多漂亮的女性时，对现有伴侣的承诺就会大大减少（Kenrick, Gutierrez, & Goldberg, 1989; Kenrick, Neuberg, Zierk, & Krones, 1994）。另一方面，如果女性周围有许多英俊的男性，她们不会受影响，但如果可以接触到许多成功的男性，她们对现有伴侣的承诺也会打折扣（Kenrick & Neuberg et al., 1994）。此外，同性竞争者的信息对自我评定似乎也能起到调整的作用。当男性接触了特别成功的男士，而不是接触了有魅力的男士之后，会降低自我评价；女性恰恰相反，接触漂亮女性要比接触成功女性更容易降低自我评价（Gutierrez, Kenrick, & Partch, 1999）。

与爱有关的跨文化变异常常是这些策略和生理社会环境特征的动态连结的简单延伸。例如，动物界的一妻多夫制相当罕见，当出现资源匮乏时，这种现象就会增多。一妻多夫制往往涉及雄性同胞之间的合作，抚养同胞的后代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自身基因的损失（在一妻多夫制下，无血缘的雄性和他们的后代可能根本没有基因关系）。在人类中，一妻多夫制也相当罕见，但同样也会在资源匮乏时出现，也同样容易涉及几个同胞兄弟娶同一个女性为妻（Crook & Crook, 1988）。另一方面，一夫多妻制在动物界更常见，和一妻多夫制相比，前者与雄性占有的资源变量的质的差异关系更密切（例如，一些雄性比另一些雄性占有更富饶的土地）。人类的一夫多妻制也与男性占有的资源变量高度相

关，地位高又有钱的男性更容易拥有多个妻子（Crook & Crook, 1988）。

跨文化变量表现在女性和丈夫年龄的差异上，这与进化生物历史模型（*evolutionary life history*）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即对后代的资源分配是人类社会生态学和性别差异之间互动的结果。在北美社会中，二十岁左右的女性一般会 and 稍大一些的男性结婚。人们往往把这一点归结为北美社会的特殊标准，但是，同样的模式不仅存在于德国、荷兰，也存在于印度、菲律宾、非洲、南美洲，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小岛上（Harpending, 1992; Kenrick & Keefe, 1992; Otta, Queiroz, Campos, Da Silva, & Silveira, 1998），这种理论就难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了。进化生物历史模型把这种模式广泛传播的原因归结为对后代资源投入的基本生物学差异。在人类中，女性直接贡献出身体资源，但这种能力在她们三十五岁左右就开始减少，到绝经时完全消失。男性则贡献出其他资源，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这些资源一般会继续积累。

澳大利亚的提威群岛人却是这种普适模式的罕见例外，年轻的提威群岛男性通常和很老的女性（往往是绝经后的女性）结婚。乍一看，这种安排似乎违背了所有的生物学模型、进化论或其他假说，让人们不得不质疑这一社会成员是如何繁衍后代的。答案是提威群岛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多种模式。这个社会是一夫多妻制的，所以第一位（年老的）妻子往往不为男性生儿育女。通过和老年女性结婚，年轻男性可以巩固与老年男性的关系，而这些老年男性掌管着年轻女子们的婚姻。提威群岛的族长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至于所有的年轻女子都必须嫁给他们中的一位（实际上女孩在出生时就已注定要嫁给谁了）。社会标准要求所有女性都要结婚，包括老年寡妇，但是拥有年轻妻子的老族长对寡妇不再感兴趣。于是，与一位族长的老年女性亲属结婚会使年轻男性获得娶到年轻妻子的机会（Hart & Pillig, 1960）。在提威群岛社会中，规范性法则只是被稍微篡改，但并非把人类繁衍的所有规则都取消。无论如何，尽管方式有些特殊，人类普遍的性差异仍然表现出来。以前人们认为浪漫关系中绝大多数的文化变异都是完全任意的，现在看起来可能恰恰表明局部社会和自然生态因素与基本的人类进化趋势之间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合

乎情理的互动。

结论

爱的动态进化模型认为强大的社会关系在许多方面都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处理与恋人、朋友、长期伴侣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最终都能联系到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决策偏差。由于互动的另一方也存在其自身的决策偏差，所以决策偏差带来的影响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果，不同的爱的客体引起了不同的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和社会几何学（social geometries）的产生。这些决策偏差会随着社会生态因素的波动而上下浮动，并趋于精确，所以，在同一社会的内部或跨社会情境中会出现与当下的社会自然环境特点相联系的变异，这具有生物学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键问题在于探讨不同类型的爱的作用，而不是对爱进行描述。基于这一视角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仍有待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与每种社会关系相关的决策偏差的确切本质是什么？在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到底是社会自然环境的哪些特征与决策偏差互动的结果？

致谢

马克·夏勒（Mark Schaller）为本章提供了有用的反馈意见，在此致谢。

（李颖 初译）

参考文献

Ackerman, J. M., Ledlow, S. E., and Kenrick, D. T. (2003, February). Friends are family, friends are strangers: Social cognition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ustin, Tex.
- Alcock, J. (2001). *The Triumph of Sociob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ron, A., and Westbay, L. (1996). Dimensions of the prototyp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535-551.
- Baer, D., and McEachron, D. L. (1982). A review of selected sociobiological principles: Application to hominid evolution. I. The development of group social structur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Biological Structures*, 5, 69-90.
- Becker, D. V., Kenrick, D. T., Guerin, S., and Maner, J. K. (2005). Concentrating on beauty: Sexual selection and sociospatial memor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1643-1652.
- Buss, D. M., and Schmitt, D. P. (1993).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human mat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204-232.
- Clark, R. D., and Hatfield, E. (1989).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ceptivity to sexual offer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2, 39-55.
- Cottrell, C. A., and Neuberg, S. L. (2005). Different emotional reactions to different groups: A sociofunctional threat-based approach to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770-789.
- Crook, J. H., and Crook, S. J. (1988). Tibetan polyandry: Problems of adaptation and fitness. In L. Betzig, M. Borgerhoff Mulder, and P. Turke (eds.), *Human Reproductive Behaviour: A Darwinian Perspective*, pp. 97-1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ly, M., Salmon, K., and Wilson, M. (1997). Kinship: The conceptual hole in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In J. A. Simpson and D. T. Kenrick (eds.),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pp. 265-296. Mahwah, N.J.: Erlbaum.
- Daly, M., and Wilson, M. (1983). *Sex, Evolution, and Behavior*, 2n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 . (1988).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Gruyter.
- Diamond, L. M. (2003). What does sexual orientation orient? A biobehavioral model distinguishing 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desi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173-192.
- Fehr, B., and Russell, J. A. (1991). The concept of love viewed from a prototyp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25-438.
- Geary, D. C. (1998). *Male, Fema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 Differen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oldberg, L. R. (1981). Languag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search for universals in personality lexicons. In L. Wheeler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pp. 141-165.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Gutierrez, S. E., Kenrick, D. T., and Partch, J. J. (1999). Beauty, dominance, and the mating game: Contrast effects in self-assessment reflect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te sele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1126-1134.
- Guttentag, M., and Secord, P. F. (1983). *Too Many Women? The Sex Ratio Ques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Harpending, H. (1992). Age differences between mates in southern African pastoralist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5, 102-103.

- Hart, C. W. M., and Pillig, A. R. (1960). *The Tiwi of North Australi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Haselton, M., and Buss, D. (2000). 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biases in cross-sex mind rea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81-91.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S. (1986). A theory and method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92-402.
- Hrdy, S. H. (1999). *Mother Nature: A History of Mothers, Infants, and Natural Selection*. New York: Pantheon.
-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 vols. New York: Henry Holt.
- Jankowiak, W. R., and Fisher, E. G.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31, 149-162.
- Kenrick, D. T. (2001). Evolution, cognitive science, and dynamical systems: An emerging integrative paradig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13-17.
- Kenrick, D. T., Becker, D. V., Butner, J., Li, N. P., and Maner, J. K. (2003). Evolutionary cognitive science: Adding what and why to how the mind works. In K. Sterelney and J. Fitness (eds.), *From Mating to Mentality: Evaluating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p. 13-38.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Kenrick, D. T., Groth, G. R., Trost, M. R., and Sadalla, E. K. (1993). Integrating evolutionary and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s on relationships: Effects of gender, self-appraisal, and involvement level on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951-969.
- Kenrick, D. T., Gutierrez, S. E., and Goldberg, L. (1989). Influence of erotica on ratings of strangers and mat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159-167.
- Kenrick, D. T., and Keefe, R. C. (1992). Age preferences in mates reflect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5, 75-133.
- Kenrick, D. T., Li, N. P., and Butner, J. (2003). Dynamic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dividual decision-rules and emergent social norm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3-28.
- Kenrick, D. T., and Luce, C. L. (2000). An evolutionary life-history model of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 Eckes and H. M. Trautner (eds.), *The Develop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of Gender*, pp. 35-64. Mahwah, N.J.: Erlbaum.
- Kenrick, D. T., Maner, J., and Li, N. P. (2005).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From selfish genes to collective selves. In D. M. Buss (e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p. 803-827. Hoboken, N.J.: Wiley.
- Kenrick, D. T., Neuberg, S. L., Zierk, K., and Krones, J. (1994). Evolu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Contrast effects as a function of sex, dominance, an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 210-217.
- Kenrick, D. T., Sadalla, E. K., Groth, G., and Trost, M. R. (1990). Evolution, traits, and the stages of human courtship: Qualifying the parental investment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3, 97-116.
- Kenrick, D. T., Sadalla, E. K., and Keefe, R. C. (1998). Evolutionary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 missing heart of modern cognitive science. In C. Crawford and D. L. Krebs (eds.),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p. 485-514. Mahwah, N.J.: Erlbaum.

- Kenrick, D. T., and Sundie, J. M. (in press). Dynamic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Quantifying the implications of qualitative biases. In S. W. Gangestad and J. A. Simpson (eds.), *The Evolution of Mind: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Controversi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Kenrick, D. T., and Trost, M. R. (1987). A biosocial model of relationship formation. In K. Kelley (ed.), *Females, Males and Sexuality: Theories and Research*. Albany: SUNY Press.
- Krueger, J. I., and Funder, D. C. (2004). Towards a balanced social psychology: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ures for the problem-seeking approach to social behavior and 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7, 313-376.
- Laham, S. M., Gonsalkorale, K., and Von Hippel, W. (2005). Darwinian grandparenting: Preferential investment in more certain k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63-72.
- Ledlow, S. E., and Linder, D. E. (2003, May). Kinship, familiarity and frame in a simulated social dilemm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ancouver, B.C.
- Lehrman, D. S. (1965).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reproductive cycle of the ring dove. In F. A. Beach (ed.), *Sex and Behavior*, pp. 355-380. New York: Wiley.
- Li, N. P., Bailey, J. M., Kenrick, D. T., and Linsenmeier, J. A. (2002). The necessities and luxuries of mate preferences: Testing the trade-of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 947-955.
- Lumsden, C. J., and Wilson, E. O. (1981). *Genes, Mind, and Culture: The Coevolutionary Proc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ner, J. K., Kenrick, D. T., Becker, D. V., Delton, A. W., Hofer, B., Wilbur, C. J., and Neuberg, S. L. (2003). Sexually selective cognition: Beauty captures the mind of the behold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 1107-1120.
- Maner, J. K., Kenrick, D. T., Becker, D. V., Robertson, T. E., Hofer, B., Neuberg, S. L., Delton, A. W., Butner, J., and Schaller, M. (2005). Functional projection: How fundamental social motives can bias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63-78.
- McDougall, W. (190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Methuen.
- Morris, D. (1958).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the ten spined stickleback (*Pygosteus pungitius* L.). *Behavior*, suppl. 6.
- Öhman, A., and Mineka, S. (2001). Fears, phobias, and preparedness: Toward an evolved module of fear and fear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483-522.
- Orians, G. H. (1969). On the evolution of mating systems in birds and mammals. *American Naturalist*, 103, 589-603.
- Otta, E., Queiroz, R. D., Campos, L. D., Da Silva, M., and Silveira, M. T. (1998). Age differences between spouses in a Brazilian marriage sampl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 99-104.
- Park, J. H., and Schaller, M. (2005). Does attitude similarity serve as a heuristic cue for kinship? Evidence of an implicit cognitive associ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6, 158-170.

- Pinker, S. (1994). *The Language Instinc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Plutchik, R. (1980). A general psychoevolutionary theory of emotion. In R. Plutchik and H. Kellerman (eds.), *Emo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ozin, P., and Kalat, I. W. (1971). Specific hungers and poison avoidance as adaptive specializations of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79, 259-276.
- Sadalla, E. K., Kenrick, D. T., and Vershure, B. (1987). Dominance and heterosexual att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730-738.
- Sedikides, C., and Skowronski, J. J. (1997). The symbolic self in evolutionary contex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 80-102.
- Sherry, D. F., and Shachter, D. L. (1987). The evolution of multiple memory systems. *Psychological Review*, 94, 439-454.
- Smith, M. S., Kish, B. J., and Crawford, C. B. (1987). Inheritance of wealth as human kin investment.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8, 171-181.
- Sprecher, S., and Regan, P. C. (1998). Passionate and companionate love in courting and young married couples. *Sociological Inquiry*, 68, 163-185.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135.
- Sugiyama, L. S., Tooby, J., and Cosmides, L. (2002). Cross-cultural evidence of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among the Shiwiar of Ecuadorian Amazon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9, 11537-11542.
- Tooby, J., and Cosmides, L. (1992).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 J. H. Barkow, L. Cosmides, and J.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pp. 19-13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ivers, R. L. (1972).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B. Campbell (ed.),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1871-1971*, pp. 136-179. Chicago: Aldine.
- Zeifman, D., and Hazan, C. (1997). Attachment: The pair in pair bonds. In J. A. Simpson and D. T. Kenrick (eds.),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pp. 237-264. Mahwah, N.J.: Erlbaum.





浪漫之爱关系中的 行为系统：依恋、呵护与性

菲利普·R·薛佛 (Phillip R. Shaver)
马里奥·米库利茨 (Mario Mikulincer)

在《爱情心理学》(Sternberg & Barnes, 1988)一书中,薛佛、哈赞和布莱德肖(Shaver, Hazan & Bradshaw)提到,鲍尔比(1969/1982)在他的依恋行为理论中将浪漫之爱定义为三个行为系统。他认为依恋、呵护和性(还有亲和[affiliation]、探究[exploration])等系统作为先天的动力系统,一直处在进化发展之中,因为它们增加了婴儿活到生育年龄,并将基因传到下一代的可能性。在1988年,鲍尔比的理论尚未被大多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们所熟知。那时的研究集中在亲子关系(婴儿的依恋系统和母亲的呵护系统互为补充)上,因此,尽管鲍尔比(1979)声称依恋系统“自摇篮至坟墓”一直都是活跃的,大多数的发展心理学家们还是认为“事不关己”,认为它与他们的研究工作无关。如果鲍尔比对呵护和性系统做过更多叙述,他毫无疑问也会将它们描述成在人的一生中是活跃的。

20世纪80年代,少数研究爱情的人格心理学家采用了一种描述性的、非

理论性的方法，他们将爱情视为一种态度（attitude），试图描述爱情的不同类型而很少谈论它们存在的原因（Hendrick & Hendrick, 1989; Rubin, 1973）。例如沃斯特和沃斯特（Walster & Walster, 1978）区分了激情之爱和温情之爱之间的差别，却没有给出有关它们发展的起源或者适应性功能方面的理论。作为少有的对爱情进行的理论导向研究之一，伯奇德和沃斯特（Berscheid & Walster, 1974）采用了沙赫特（Schachter, 1964）的情绪二因素理论，指出爱情体验包含弥散性的生理唤醒以及由什么引起（通常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的事物）的认知解释。这个方法无意中剥夺了爱情的独立存在与作用，只将爱情视为另一例被错误标记的唤醒（mislabeled arousal），就像愤怒或者欣快（euphoria）（曾被沙赫特所研究的两因素）那样。不论将爱情视为一种态度还是两因素，这都很好符合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心中普遍存在的爱情信念，即爱情是西方文明的一种文化产物（e.g., Averill, 1985; De Rougement, 1940），这使那些呼吁生物学或进化的观念看上去仿佛是误人子弟。

时代在变迁。而今，“进化心理学”（Buss, 1999; Simpson, 1999）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认知、情绪和社会行为的研究途径。而进化心理学理论中的依恋理论则成为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核心学说。依恋理论已经为社会心理学家们所熟知，同样，文化人类学家也改变了他们关于爱情跨文化普遍性的基调（Chisholm, 1999; Jankowiak, 1995）。这种强烈的情感已经在他们研究过的每种文化下成员的文艺作品、诗集和日常思考中表达出来了。

在薛佛等人撰写《爱情心理学》（1988）一书中有关章节的时候，哈赞和薛佛（1987）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包含爱情的一种初步的行为系统模式，以及爱情中依恋类型的简单测度。该文成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自35年以来引用率最高的十篇文章之一。因此，我们在本文中的任务不是辩解依恋理论或者更一般的行为系统理论应该成为一种爱情的研究途径，而是总结一下我们从1988年以来研究的各种理论的优点和局限中能获得哪些经验教训。还要说明在根据先天的行为系统以及这些系统参数（parameters）中的个体差异来定义爱情时，我们要做什么。关于这三个行为系

统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征资料，因此，我们有必要叙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简要介绍薛佛等人（1988）撰写的章节，说明鲍尔比的理论及其关键的动机构念（**motivational construct**）、行为系统，描述依恋、呵护和性行为系统中标准化的个体差异成分。同时介绍一下行为系统的激活和抑制模型，以及行为系统参数中系统的个体差异如何有助于解释爱情的动力性。其次，总结一下关于个体差异是如何影响浪漫关系品质的，还有依恋、呵护和性系统如何动态地相互影响。最后，我们将探讨一下理论的整合，尤其是爱情的三角形理论（**Sternberg, 1987**）及其互倚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ies**）（**Holmes & Cameron, 2005**；**Thibault & Kelly, 1959**）。

爱如依恋

鲍尔比（1969/1982, 1973, 1980）在其经典的《依恋与缺失》三部曲（一部在同时代的心理学著作中引用最多的作品之一）中试图描述并解释婴儿如何对最初的呵护者产生情绪依恋，当被迫与他们分离时为什么会感到忧伤。鲍尔比（1969/1982）像哈洛（**Harlow, 1959**）一样，反对经典的精神分析（**classical psychoanalytic**）和巴甫洛夫的行为主义框架，因为后两者将情绪连结（**emotional bonds**）描述为养育的继发效应。相反，鲍尔比认为婴儿是天生的关系寻求者，会自然导向哈洛所称的“触摸就感到舒适”，向满足其需要的对象寻求亲近。鲍尔比在此基础上做出推断，婴儿与最初的呵护者之间情绪联系的形成依赖于其寻求亲近的自然倾向，依赖于呵护者对婴儿亲近愿望（**proximity bids**）的回应，以及当婴儿有需要时呵护者提供保护和安慰的能力。根据鲍尔比的观点，这些提供呵护的“依恋对象”尤其要给婴儿提供“安全的避风港”（保护、支持和减轻痛苦）和“安全的基地”，使婴儿能够在安全的环境里探索和玩耍。

鲍尔比（1979）在其著作里还强调，对安慰对象的需要和对安全提供者的



情绪依恋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十分明显的，这可以解释家庭内的情绪体验，包括爱情。他说：

在人类大部分强烈的情绪之中，很多情绪产生于情感连结的形成、维持、中断和再续，这也是我们有时称之为情绪连结的原因。根据个人的主观体验，一个连结的形成被描述为陷入爱河，连结的维持是一直爱着某人，失去伴侣则被称为哀悼某人。同样，面临失去的威胁会产生焦虑，而真正失去则会导致悲痛，同时这两种情形都有可能产生愤怒。最后，没有挑战性的维持让人体验到安全，而失而复得则是高兴的来源（Bowlby, 1979, p. 69）。

在鲍尔比的引导下，薛佛等人（Shaver et al., 1988）提出成人之间的浪漫连结是情绪依恋，这和婴儿与其早期监护人之间的情绪连结在概念上是相似的。用他们的话来说，“依恋每一个被证实的特征在爱情上都有类似的特征，爱情大部分被证实的特征在婴儿身上也有类似被证实的、似乎可能的特征。”（p. 73）对于婴儿和成人来说，爱包括眼神交流，支持，触摸，爱抚，微笑，哭泣，坚持，苦恼时从对方（父母、情人或者配偶）那里获得安慰的愿望，分离或失去时的愤怒、焦虑和悲痛，以及重聚时的幸福与喜悦。此外，一种安全关系的形成依赖监护人/伴侣的敏感性以及对日益依恋的个体亲近愿望（proximity bids）的回应。这种回应使依恋个体感到更加自信、安全、幸福、好交际和对他人友善。再者，在这两种关系中，当被依恋者对依恋者的亲近不再给予回应时，对于爱或不爱、赞成或拒绝的征兆，后者会变得担忧、关注和异常敏感。一方面，分离或者无回应会增加婴儿或者成人寻求亲近行为的强度；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导致依恋者与被依恋者之间产生防御性的距离，以避免这种令人挫败的关系所带来的痛苦。这些相似之处使薛佛等人（1988）得出结论，那就是婴儿对双亲的依恋与成人之间的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说法。

薛佛等人（1988）进一步主张，艾斯沃斯等人（Ainsworth et al., 1978）在其经典的婴儿与双亲依恋的研究中观察到的三种依恋模式（类型）——安全、

焦虑 (anxious)、回避——可以从成年人和恋人交往的不同方式上得以体现。哈赞和薛佛 (1987) 开发出测量成人依恋类型的一种自陈法，适用于实验和调查。这种方法最初的形式包含对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和行为的三种简要描述，比照婴儿的三种依恋类型刻画成人的爱。让被试阅读这些描述，并根据他们在浪漫关系中主要的情感和行为将自己归于三种依恋类型中的一种。这三类描述如下：

安全：我发现自己比较容易与他人接近，并且与他们相互依赖时感到舒适。我不担心被遗弃或者与人过于亲近。

回避：当接近他人时，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发现完全信任、依赖他人是困难的。与任何人过于接近时，我都感到紧张，他人经常希望我在自感舒适的基础上与其更加亲密。

焦虑：我发现他人难以像我希望的那样接近我。我经常担心伴侣不是真的爱我或者不愿意与我在一起。我很想亲近我的伴侣，但这有时会把人吓跑。

无论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的报纸调查，还是对大学生进行的典型研究中，哈赞和薛佛 (1987) 都发现成人中这三种依恋类型的发生频率与婴儿相似，并且被试对他们浪漫爱情关系的描述与他们的依恋类型成系统相关。把自己归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将他们的爱情关系描述为友好的、温暖的、信任的和支持的。他们强调亲密是这些关系中的核心特征；并且，他们相信爱情的存在以及长时间维持强烈爱恋的可能性。回避型的人将他们的浪漫关系描述成缺少温暖、友好互动以及情感卷入。他们相信爱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而小说和电影中描述的那种浪漫之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相反，报告自身是焦虑类型的人将他们的浪漫关系描述成魂牵梦绕、激情、强烈的身体吸引、结合的愿望或者与伴侣融为一体，并且容易很快坠入爱河，甚至也许是饥不择食的。他们将爱人的特征描述为靠不住的、不支持的，他们报告了与伴侣之间强烈的嫉妒和愤怒的较量，伴随着被拒绝和抛弃的忧虑。

哈赞和薛佛开创性的研究被许许多多的研究者所追随，他们调查了成人依恋类型的人际与个人内在的相关（Shaver & Hazan, 1993; Shaver & Mikulincer, 2002）。然而，由于哈赞和薛佛（1987）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依恋类型的个体差异的界定和评估，因此，研究者们后来进行的许多研究都集中于这些个体差异，而不是鲍尔比理论的中心论点，像依恋行为系统的动力性或者是其他行为系统（性和呵护）的功能。最近这种不平衡已经开始被纠正，已经有更多的人致力于成人依恋系统的标准化功能（Shaver & Mikulincer, 2002）以及依恋、呵护和性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Collins & Feeney, 2000; Kuncze & Shaver, 1994; Schachner & Shaver, 2004）。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要探讨鲍尔比（1969/1982）关键的动机构念和行为系统，描述一下包含于浪漫关系中的三个主要行为系统的操作参数（operating parameters）：依恋、呵护和性。在表3-1中，我们用一个简表概括一下这三个系统中具有个体差异的标准化参数。

依恋、呵护和性行为系统的操作参数

在解释依恋、呵护和性行为的动机基础时，鲍尔比（1969/1982）借用了习性学中的概念——行为系统，它是一个带有物种普遍性的神经程序，能够支配行为顺序的选择、激活和终止，从而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产生功能性的改变，而这对于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来说具有适应性的益处。每一个行为系统都包含特殊的预定目标（例如，获得一种安全感，减轻其他个体的苦恼，促进他们的幸福，通过怀孕或者使伴侣受孕而将自己的基因传到下一代），还有一套可互换的功能相同的行为，这些行为组成系统的初级策略以达成其特殊的目标状态（例如，通过接近、保护或者安慰、诱惑他人来获得安全）。当遇到一定刺激或者处于某种情境时（例如，发出危险信号的高噪音、遇到苦恼或有需要的人、个体的生活中一个有吸引力的潜在性伴侣的出现），这些行为会自动被激活而使特殊的预定目标变得突出；当另一些刺激或情境发出预定目标已实现的

表 3-1 依恋、呵护和性行为系统标准的、个体差异的参数示意表

参数	依恋系统	呵护系统	性系统
生物学功能	对支持个体保持亲近以确保其远离危险	当他人需要时提供保护和支持	把基因传给下一代
设定目标	避免危险与威胁；缓和个体自身的苦恼	减少他人的痛苦，促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发生性关系（经常是迂回的，实现怀孕的目标）
情境触发点 (contextual triggers)	实际或者象征性的威胁；支持对象不可触及	他人的依恋行为或者需要的信号	遇到一个有吸引力的、具有性唤起或者生育能力的伴侣
初级策略 (primary strategy)	向外部或者内部的支持对象寻求实际或者象征性的接近	移情应答性，观点采择，敏感的、有效的帮助	性的方法，性吸引和性的说服
最佳功能发挥的相关支持或限制因素	当需要时对敏锐和能提供支持的对象的可得性	帮助的意愿和能力，他人对呵护意愿的接受	对他人性吸引的能力，对性爱愿望的接受
最佳功能的情绪获益	安全和被爱的感觉，有效的情感调节	繁殖、爱和交流的感觉，怜爱	喜悦，活力，力量，爱和亲密的感觉
过度激活策略 (hyperactivating strategies)	对伴侣的注意和关心的强烈需要；对威胁和拒绝征兆的过度警惕性	对他人需要的夸大，对他人痛苦的过度警惕性，侵犯性和强制性的呵护风格	侵犯性和强制性的性爱尝试，对伴侣的性吸引、拒绝信号的过度警惕性
去激活策略 (deactivating strategies)	依恋需要的否认，避免接近亲密，强制性的自我信任	对移情式帮助的抑制，对他人的痛苦不予理睬，远离需要帮助的人	性需要的忽视，与性唤起的伴侣保持距离，性滥交（作为自我膨胀的形式）

信号时，行为会“去激活”或者“终止”（Bowlby, 1969/1982）。由于每一个行为系统是在进化过程中“设计”的，以便提高其适应环境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它的最佳功能对于心理健康及其调节来说就具有重要的含义。

鲍尔比（1969/1982）同样假设，行为系统中包含“个体发展中习得的”调节，这些调节反映了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历史，在环境中行为系统被激活，成功或失败地完成预期目标。由于一个行为系统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依赖于个体与世界的实质互动，因此每个系统都包括认知—行为机制（像监控和评价特殊情境中行为的有效性），当必须把个体放回达成目标的轨道中时，它允许系统规划中灵活的、目标校正的调节。随着时间的逝去，当个体的行为系统在特定的环境中反复操作时，它们会被社会所塑造，对神经系统/行为的能力进行规划，以便使它们能适合重要关系伙伴（如父母）的行为，并且能在相关环境中产生有效的行为。在此过程中，个体试图使他的行为系统符合环境的要求，并对达成目标的可能性通路和障碍形成了较可靠的预期。这些预期（鲍尔比称之为“自我和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1973）成为行为系统程序的一部分，是系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内部连续性的基础。

行为系统程序的改变还包括摆脱在完成系统预定目标时一再失败的初级策略。这些失败是挫折、痛苦和忧伤的主要来源；它们引起了自我和他人的消极工作模型（例如，“我没有必要的资源来帮助我的伴侣”，“当有需要时，我不能信任我的伴侣”）和信号，这时初级策略将会被二级策略取代。依恋理论家们（如Cassidy & Kobak, 1988; Mikulincer & Shaver, 2003）强调以下两种二级策略：系统的过度激活与去激活策略。过度激活策略是抗争（或者“坚持”、“抗议”）反应，它加强了系统的初级策略，目的是强迫对方与系统的目标表现一致（例如，提供主要的支持，接受个体更多帮助，拥有性爱）。它们长期保持行为系统的激活直到完成预定目标。这些反应是在社会环境中习得的，该社会环境将个人置于一种寻求坚持性的部分强化程序（通过目标达到的零散体验）之中。它们是基于个体对积极地应用这些初级策略地回报的解释，因为这些应用至少有时候看似是成功的（或者在过去已经成功）。令人遗憾的是，虽

然有时这些反应对某些相互影响的伴侣是成功的，但它们还会导致抑郁的加剧和对个体自身效能和社会价值的持续性忧虑。这些很容易鼓励侵入的、控制的和好斗的反应，而这会导致彼此关系的功能紊乱、伴侣的不满、最终的拒绝和遗弃。讽刺和悲哀的是，持过度激活策略的人绝大多数害怕这种结果。

相反，去激活策略是“逃走”（或者回避）反应，它要求关闭或者（用鲍尔比的术语来讲）终止一个行为系统，以避免因达成系统的目标时不努力而导致的挫折、痛苦和忧伤。一般都认为这些反应产生于与那些不赞成甚至惩罚运用系统初级策略（像寻求亲近、关心或帮助，或者表现出性兴趣）的关系伙伴的互动过程中。在这样的社会遭遇中，如果初级策略的迹象被隐藏或抑制，个体学会期待更好的结果，并且尽管目标尚未达成，行为系统也不再被激活。这些策略的问题是它们要求一个狭窄的人际活动（例如，亲密，提供关心，或者从事令人愉快的性交往），达成重要的目标时经常失败，它们使个体认识不到在特殊的行为系统中，不是所有的新伴侣都会像以前的伴侣那样做出不良的要求。总之，在大部分有益的生活体验中，有些会被放弃，以避免某些挫折、失望和惩罚。

依恋行为系统

我们假设依恋系统的生物学功能是通过确保个体一直靠近那些关心和支持他的人（依恋对象），使其（尤其是在婴儿期和儿童早期）避免危险。系统的目标是客观的保护或支持和伴随的主观安全感（Sroufe & Waters称之为“感觉到的安全 [felt security]”，1977）。当个体遭遇到实际的或者象征性的威胁和警告而依恋对象没有给予回应时，个体体验到的与行为系统相关的消极情绪尤其强烈（Bowlby, 1969/1982）。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恋系统被激活，它驱使个体寻找并重建与外在或者内化的依恋对象之间实际或者象征性的亲近（系统的初级策略），直到感觉安全的预定目标达成为止。鲍尔比（1969/1982, 1988）设想，尽管依恋系统激活（attachment system activation）的效果在婴儿期就很可能

易被观察到,但是,正如成人对亲近、支持和安全的需要所显示的那样,这个系统在人的一生中一直起作用(Hazan & Zeifman, 1999)。

依恋系统要想顺利发挥作用,这要求依恋对象在个体需要时是可得的,能敏感地回应其亲近的意愿,并能有效地减轻他的痛苦。这种积极的互动促进了内部的依恋安全感(基于对重要人物在需要时的可得性和支持性的期待)并且使基于安全上的情感调节(affect regulation)策略变得稳固(Mikulincer & Shaver, 2003)。这些策略旨在减轻痛苦,形成舒适的、支持的亲密关系,增加个体自身的调节而不产生消极的副作用(爱泼斯坦和梅尔[Epstein & Meier, 1989]称之为“建设性的应对方式”的策略)。基于安全的策略包含困境管理的乐观信念,对他人善意的信任,一种被爱、尊重、理解和接纳的感觉,当需要支持时得到爱人亲近的自我效能感。这些策略还包括对苦恼或脆弱的承认和表达,并寻求情感支持来抑制苦恼,集中应对问题(Mikulincer & Shaver, 2003)。

当个体的依恋对象是不可得、不支持的时候,个体不能获得依恋的安全感,并且他的苦恼混合了关于获得安全感可能性的严重怀疑和惧怕,“这个世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吗?”“需要时我能相信我的伴侣吗?”“我拥有吸引伴侣的必需的资源吗?”这些关于自我和伴侣的担忧使个体的精神被威胁和保护需要所占据,并且彻底干扰了其他行为系统的功能。

消极的依恋互动显示,初级的依恋策略、寻求亲近和支持不得不过度激活或去激活策略所取代。依恋系统的过度激活(鲍尔比称之为“对抗”,1969/1982)被证明是积极地、坚持不懈地使无回应的伴侣给予注意、关心和支持。这些策略都是作为一种保护源而存在的,包括执著和控制性反应以及认知和行为的努力,以确定身体接触、感知到自我与他人的相似性、同一性和过度依赖伴侣(Shaver & Mikulincer, 2002)。过度激活策略维持依恋系统长期被激活,始终警惕威胁、分离和背叛,因此,加剧了相关的苦恼和冲突(Mikulincer & Shaver, 2003)。这种策略妨碍了良好的交流、情绪的平静和个人

的发展。

依恋系统的去激活包括抑制亲近的需求和鲍尔比（1980）“强迫的自我信任”和“分离”的教养。这些策略要求拒绝依恋需要，回避亲近、亲密（intimacy）和密切关系内的依赖，从认知、情绪和身体上最大限度地远离他人，力争自我信任和独立（Shaver & Mikulincer, 2002）。它们还包括自动忽略危险与个人弱点，以及阻止和抑制能唤起苦恼和脆弱情绪的想法和记忆；由于这些想法能引起依恋系统不必要的激活，个体相信这不会带来想要的结果（Fraley, Davis, & Shaver, 1998）。

呵护行为系统

据鲍尔比（1969/1982）所讲，呵护系统在进化中变得更精细，为长期依赖或者暂时需要的个体提供保护和支持。它的目标是完全利他性的，并且在他人的依恋系统发出需要的信号时给予回应。呵护系统的预定目标是减少他人的苦难（鲍尔比称之为提供“安全的避风港”，1969/1982），或者抚育他人成长和发展（鲍尔比称之为提供“探究的安全基地”，1969/1982）。达到这些目标的初级策略是采用巴特森（Batson, 1991）所说的移情态度，例如，采择伴侣的观点以便敏感和有效地帮助伴侣减少苦恼或者鼓励其积极的成长发展。呵护系统关心他人的福祉，因此，将注意力指向他人的需要、愿望、情绪和意图，而不是自身的情绪状态。在浪漫关系领域里，一方的呵护系统会自动被另一方的依恋行为或者需要信号所激活，目标是改变伴侣的状况，直到安全感和幸福感增强的迹象变得明显为止。

呵护系统顺利发挥作用，依赖于个体移情和有效帮助伴侣的能力和愿望，还有伴侣对个体呵护意愿的回应。这些积极的互动促进了一种内在感觉，埃里克森（Erikson, 1950）称之为“繁殖性”——一种个体不仅超越了被包的（encapsulated）自我，还能为别人的福祉作贡献的感觉。它是一种真正利他的、

同情式的爱（[Lee, 1977]称为“利他型”），旨在减轻苦恼，有益于他人。繁殖性的意思包括个体拥有良好品质，并能表现良好行为的感觉；在需要时能提供帮助的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对自己人际交往技能的自信；与伴侣之间的爱、共有、连通性（connectedness）的感觉增强。换句话说，与另一个行为系统相比，呵护系统的顺利发挥作用导致了对自我的正向情绪，尽管它最初的目标是为了有益于他人。

与依恋系统一样，呵护系统的功能紊乱也能引发过度激活或者去激活的策略。过度激活的呵护策略是干扰的，安排不足和需要努力的；它们意图使个体成为对方必不可少的人，使其感到胜任监护人的工作。通过以下方式能够达成这些目标：夸大他人的需要，用过于警惕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苦恼，表现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呵护意愿的行为，集中他人的需要而忽视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当伴侣寻求亲近时，去激活策略阻止移情和有效的呵护，正好扩大了人际距离。因此，去激活的呵护系统对他人的需要给予更少的敏感和回应，不考虑或者不重视他人的苦恼，抑制与他人需要和脆弱有关的想法，压抑移情和同情。

性行为系统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性系统的重要功能就是将基因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Buss & Kenrick, 1998）。此系统的预定目标是与异性伴侣的性交，还有怀孕（对于女性而言）或者使对方怀孕（对于男性而言）。当个体遇到一个有吸引力的、感“性”趣或性唤起的或者有生育能力的异性伴侣时，这个目标经常变得特别明显。完成预定目标的初级策略是接近对方，说服他（或她）与自己发生性行为，参与性生殖的过程。也就是说，性系统的初级策略包括通过提高对生育信号的敏感度和对异性的兴趣，增加自己作为潜在伴侣的吸引力，运用有效的说服技巧诱惑性伴侣，与有生育能力的伴侣发生性行为。这样看来，性吸引力是一种激发力量，它驱使个体去寻找与短期或者长期的性伴侣性交的机

会（如 Buss, 1999）。非普遍性的同性恋人之间的吸引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但达尔蒙（Diamond, 2006）在依恋理论的相关内容中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性系统顺利发挥作用，这要求双方的动机和反应是对等的。它依赖个体吸引对方并确保他（或她）与自己发生性行为的能力，还依赖对性意愿的可得性、敏感性和回应。这些相互调整的互动能导致双方满足彼此的性需要和拥有愉快的（性）高潮体验。此外，它们让人产生有活力和精力充沛的感觉（赖安和弗雷德里克 [Ryan & Frederick] 称之为“自身活力”），有吸引力和强烈的自我知觉，吸引关系伴侣和渴望发生性行为时强烈的自我效能感、被爱和自尊感，与特殊的伴侣之间爱、感激、亲密和交流的感觉。

就像其他系统一样，性行为系统的功能紊乱也可以被界定为过度激活和去激活策略。过度激活策略包括以全力的、精神上着迷的，有时侵入的，甚至是以强迫性的方式试图说服伴侣与之发生性行为。在此过程中，个体过分强调关系中性行为的重要性，夸大了伴侣的性需要，对伴侣的性唤醒、吸引和拒绝的信号采用过于警惕的态度。相反，去激活策略具有以下特征：阻止性要求，要么采取恐惧性爱的回避态度对待性，要么采取肤浅的态度对待性，这使性脱离了其他的考量，像友好和亲密。性的去激活策略包括不考虑性需要，远离或者轻视表达性兴趣的伴侣，抑制有关性的想法和幻想，压抑有关性的记忆，阻止性唤起和性高潮的喜悦。然而，矛盾的是，它们同样促进了由自恋引起的性滥交，或者缺乏强烈的性驱力或性快感的自慰（Schachner & Shaver, 2004）。

测量问题

前面讲过，在 1988 年《爱情心理学》的那一章里，薛佛等人主要集中于依恋系统的个体差异的界定和测量方法。结果，大量围绕这些个体差异的研究涌现，而很少有人注意浪漫关系中其他行为系统的变量：呵护和性。也就是说，我们有了高信度和结构效度的工具来评定依恋系统的过度激活和去激活，

却缺少程序性的、理论可靠的评定工具研究呵护和性系统中的个体差异。

在依恋领域，哈赞和薛佛（1987）最初关于成人依恋风格三种类型的测量在许多复杂的心理测量研究中被详细阐述（如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 Fraley & Waller, 1998），这表明依恋风格被很好地界定为连续二维空间中的一部分。第一个维度是依恋回避，反映了个体不信任关系伴侣的善意，去激活依恋系统，维持行为独立并在情绪上远离伴侣的程度。第二个维度是依恋焦虑，反映了个体担心在需要时伴侣不可得的程度以及使用过度激活策略的程度。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都低的个体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安全依恋的。这两个维度可以采用可信和有效的自陈量表进行测量，像《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xperi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 scale）》（简称 ECR; Brennan, Wu, & Loev, 1998），它们在理论假设上也与情感调节（affect regulation）、自尊、心理幸福感和人际功能联系在一起（见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Shaver & Clark, 1994; Shaver & Hazan, 1993）。

在呵护领域，目前还没有评定工具来评价过度激活和去激活策略。然而，对呵护反应自陈测量的项目分析揭示它们确实找出功能紊乱的一些方面。例如，戴维斯（Davis）的《人际反应性指标（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包括引发去激活维度的《移情分量表（Empathetic Concern subscale）》（如“我经常体贴地对待比我不幸的人们”）和引发过度激活维度的自我集中方面的《个人苦恼分量表（Personal Distress subscale）》（如“紧张的情境让我感到恐惧”）。坎斯和薛佛（Kunce & Shaver, 1994）对浪漫关系中呵护的测量包括远离有痛苦的伴侣和对需要的信号缺乏敏感性等项目（如“我有时会离开我的伴侣，尽管他/她看起来需要我”，“我有时会忽视那些表示伴侣感觉如何的微妙信号”），还有引发担忧的强制性呵护项目（例如，“我倾向于过分陷入伴侣的问题和困难”）。然而，研究者们仍然缺乏像依恋领域中的 ECR 量表一样可信、有效、设计明确的量表，以评定过度激活和去激活呵护策略的变量。

尽管在呵护领域中，目前还没有设计出评定性系统中关于过度激活和去

激活的研究工具，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评定性态度和行为的量表设计中得到启示。例如，《性爱偏好—性爱恐怖量表（erotophilia-erotophobia scale）》（Fisher, Byrne, White, & Kelley, 1988）在接近或回避项上评定对性刺激反应的倾向性，这接近于我们对去激活维度的理解（例如，“性幻想时我感觉不到快乐”）。《莫舍尔内疚量表修订版（The Revised Mosher Guilt Inventory）》（Mosher, 1988）、《性焦虑量表（Sex Anxiety Inventory）》（Janda & O’Grady, 1980）与《（异）性交体验量表（Experience of Heterosexual Intercourse）》（Birnbbaum & Laser-Brandt, 2002）评价了性系统过度激活中某些与焦虑有关的方面（例如，“性交时，恼人的想法总是干扰我集中注意力”）。

浪漫关系中的依恋、呵护和性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一下依恋、呵护和性系统参数中的个体变异如何影响浪漫关系品质的观点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三个系统中的个体差异对于理解浪漫之爱是重要的，因为这些系统顺利发挥作用将关系双方结合在一起，增加了身体和情感上的亲密性，增强了对伴侣的爱、感激以及被爱和尊重的感觉。平稳操纵这三个系统对于形成和保持亲密的、令人满意的和长久的浪漫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斯腾伯格（1986）的爱情三角形理论，通过增加其三个成分（亲密、承诺和激情）的强度，依恋、呵护和性系统的最佳功能扩大了“爱情三角形”的面积。正如前面所讲，这三个行为系统顺利地发挥作用，倾向于引起与伴侣交流、连结和归属的感觉，因此，维持了爱情中的“亲密”成分。依恋和呵护系统加强了爱情中被斯腾伯格界定为“承诺”的成分。与可得的、有回应的伴侣之间的积极互动不仅能产生安全感，还能产生感激和爱的感觉，这依次激发了有安全感的个体保持爱情关系，致力于维持它，并促进伴侣的幸福。此外，个体有效地促进伴侣幸福的积极互动，并加强了其情感的投入，以及对伴侣的责任感，因此，维持了浪漫之爱中的“承诺”成分。最后，爱情中的“激情”

成分与性行为系统中的激活和机能密切相关，这引起了关系内部的吸引、唤醒、活力和兴奋等感觉。

依恋研究者们已经成功地创立了大量具有理论一致性的研究成果，它们显示无论是尚在约会中的情侣还是已婚的夫妇，安全型依恋都与高水平的关系稳定性和满意度相联系（详细综述见 Mikulincer, Florian, Cowan, & Cowan, 2002; Shaver & Mikulincer, 发表中）。研究结果也将安全型依恋与爱情中亲密、承诺测量的高分联系在一起（如 Collins & Read, 1990; Mikulincer & Erev, 1991; Shaver & Brennan, 1992; Simpson, 1990），并且还关于伴侣行为的情绪反应的关系加强模式和冲突解决策略联系在一起（如 Rholes, Simpson, & Orina, 1999; Scharfe & Bartholomew, 1995）。还有更广泛的证据表明安全型依恋与对伴侣行为的积极期待（Baldwin, Fehr, Keedian, Seidel, & Thomson, 1993; Mikulincer & Arad, 1999）和对伴侣消极行为的关系加强解释（Collins, 1996; Mikulincer, 1998）联系在一起。在呵护领域中，有关证据正在迅速积累，那就是个体对伴侣的依恋行为和需要信号给予敏感的注意和移情的反应，会导致亲密和爱的感觉加强（Reis & Patrick, 1996），同时对彼此关系的满意度会提高（Collins & Feeney, 2000; B. Feeney, 2004; B. Feeney & Collins, 2003）。还有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满足了彼此需要的性交，有益于关系的满意和稳定性（Sprecher & Cate, 2004）以及爱与承诺感的加强（Pinney, Gerrard, & Denney, 1987; Sprecher & Regan, 1998; Waite & Joyner, 2001）。

我们相信依恋、呵护和性系统的功能紊乱，即过度激活维度和去激活维度，关于理解爱情病理学、相关的压力和冲突以及情感连结的消逝是至关重要的。在依恋领域中，过度激活策略会导致焦虑型依恋的个体由于爱与支持的需要未得到满足而长期感到沮丧，导致他们对人际冲突采取悲观的评价，导致其夸大对伴侣善意的担心和怀疑，并且加强了对伴侣的不可得和无兴趣的情绪和行为反应（Collins, 1996; Shaver & Brennan, 1992; Simpson, Ickes, & Grich, 1999）。结果，由于焦虑型依恋个体频繁的猜疑，这些策略可能使伴侣感到自己被怠慢，感到卷入他或她的结合愿望之中，并且感到被他（或她）执著的行

为和高警惕性所控制。这些消极的情绪可能导致伴侣远离焦虑型依恋的个体，反过来这可能增强对方的不安全感。这样，引发了自我扩大的双向循环的不满，从而最终摧毁浪漫的关系。

依恋系统的去激活在关系的品质和稳定性方面也有消极的作用。它减少了个体的情绪卷入、承诺和亲密（如 Collins & Read, 1990; J. A. Feeney & Noller, 1990; Shaver & Brennan, 1992），并且能导致伴侣感到困扰，因为他们的亲密愿望和情感被回绝，需要的信号和苦恼被对方忽视。此外，回避型个体避免讨论相关问题（如 Gaine, Reis, Summers, Rusbult, Cox, Wexler, Marelish, & Kurland, 1997; Scharfe & Bartholomew, 1995）的倾向可能留下悬而未决的冲突，并且增加个体被激怒的感觉和愤怒感觉。结果，关系满意度受到损害而分开的可能性增加。

呵护系统的功能紊乱（不能移情式地回应伴侣需要和拒绝帮助伴侣减轻苦恼）是相关紧张和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紧张和冲突能减少亲密与承诺，并且引起很多损害性关系的担心、态度和行为（如 Collins & Feeney, 2000; B. Feeney, 2004; B. Feeney & Collins, 2003）。过度激活策略伴随着个人苦恼的加剧和对呵护效用的怀疑，当对方存在需要时，这会削弱呵护反应的效力，个体无力处理的苦恼和挫折会使伴侣饱受困扰和打击。这些策略形成强制性和控制性的行为，旨在强迫他人接受个体的呵护意愿，这反过来导致伴侣的拒绝，有关的苦恼迅速增加并加速了功能紊乱的“呵护”反应（Kunze & Shaver, 1994）。去激活策略包括每当伴侣表达脆弱或苦恼时远离他（或她），这反过来增加了伴侣依恋的不安全感，并且加强了回避型个体的消极表达，他们被认为是不可得、冷酷和拒绝性的（Collins & Feeney, 2000）。这些不安全感 and 消极信念逐渐瓦解伴侣对爱情的感觉，并且减少其处于令人挫败的关系中的可能性。

浪漫关系中中性系统的过度激活也对浪漫之爱、关系满意度和稳定性具有消极的作用。长期的性系统激活伴随着不断增加的焦虑和担忧，这些焦虑和担忧是关于个体性吸引力、个体能满足伴侣和伴侣对其性请求的回应程度（Birnbaum & Iaser-Brandt, 2002）。这些焦虑和担忧可能鼓励干扰或者侵犯性

的反应，旨在强迫伴侣与之发生性行为，这反过来能增强与性有关的冲突的频率，因此导致了关系的不满意感（Long, Cate, Fehsenfeld, & Williams, 1996）。去激活性策略的普遍特征是每次伴侣表达性兴趣时，就阻止性唤起和性高潮时的快感，即采取疏远的态度。它能使个体产生性挫败感，增强了有关被吸引和被爱的怀疑，鼓励其对备选伴侣产生兴趣（如 Hurlbert, Apt, Hurlbert, & Pierce, 2000）。

依恋、呵护和性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爱情心理学》（1988）中，薛佛等人明确表达了关于依恋系统功能的个体变量如何使呵护和性系统机能有所偏差的外显假设。由于依恋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在生命的第一年），它的功能模式和功能紊乱的特殊形式（过度激活或者去激活）能影响后来出现的其他两个系统（对痛苦和需要的个体产生共情反应，早在二岁时出现[如 Kestenbaum, Farber, & Sroufe, 1989]，明显的性生殖特征在青春期出现）。尽管薛佛等人（1988）的基本原理是基于鲍尔比关于行为系统互动的理论著作，但是，他们没有实验证据证明关于“依恋焦虑和回避可能是影响呵护和性的途径”这一假设。然而，随着成人依恋过程研究的进步，这个实验的缺口正在逐渐被填满（Collins & Feeney, 2000; Kuncze & Shaver, 1994; Schachner & Shaver, 2004）。本节中，我们对累积的证据进行简要的回顾。

依恋和呵护

根据鲍尔比（1969/1982）的观点，依恋系统的激活干扰了被界定为其他行为系统产物的非依恋活动。艾斯沃斯、布莱哈和沃尔（Ainsworth, Blehar, & Wall, 1978）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过程，他们的研究是当要求依恋对象离开房间时，禁止儿童在实验室这个“陌生情境”中进行探究。同样的情况也经常浪

漫关系中发生 (Kunze & Shaver, 1994): 当要求个体为有不安全感的、苦恼的、需要支持和安慰的伴侣担当监护人的时候, 监护人一般转向他人寻求支持, 而不是首先考虑为伴侣提供支持。只有当监护人恢复了他(或她)的依恋安全感并调整消极的情绪后, 他(或她)才能很容易将注意力和精力指向呵护伴侣, 并且将伴侣知觉为需要和应该受到安慰与支持的人。

沿着这条路线进行推理, 薛佛等人(1988)假设安全型依恋的人比非安全型依恋的人更可能对有需要的伴侣提供有效的关心(因为当安全型依恋个体应对困难时, 他们体验的安全感和其持有的乐观信念有关, 而这种乐观信念是关于应对苦恼及维持自我效能感的)。此外, 薛佛等人(1988)还假设依恋焦虑和回避将导致呵护中不同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远离伴侣并且不理睬其需要信号的回避型个体, 他们很少愿意同情有需要的伴侣, 也不愿意提供照料。相比之下, 向浪漫的伴侣寻求亲近、并且经常关注于自己需要的焦虑依恋型个体, 会掺杂自己的苦恼去回应他人的不幸, 而不是移情, 那可能会产生无感觉的、干扰的无效关心。

现在很多证据表明, 依恋安全感与对伴侣有回应的敏感呵护联系在一起。例如, 一些研究运用自我报告方法测量呵护回应, 发现有安全感的个体比不安全感的个体更可能报告自己会为苦恼的伴侣提供情感支持(如 Carnelley, Pietromonaco, & Jaffe, 1996; J. Feeney, 1996; J. Feeney & Hohaus, 2001; Kunze & Shaver, 1994)。另外, 回避型个体疏远有需要的伴侣。相反, 焦虑型的人过度参与伴侣的问题, 并且表现出强迫性的、侵入式的呵护。这些发现在自我报告和伴侣报告中是一致的。

自我报告研究中发现的依恋安全感和敏感呵护之间的联系已经在观察研究中得到证实, 对约会的双方进行录像, 观察在一方遭受应激体验时另一方的表现(B. Feeney & Collins, 2001; Simpson, Rholes, & Nelligan, 1992; Simpson, Rholes, Orina, & Grich, 2002)。总体而言, 安全型依恋的被试主动为苦恼的伴侣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此外, 较有安全感的或者伴侣寻求更多支持的被试做出恰当的反应, 并且提供较多的帮助; 而当伴侣寻求较少的支持时, 安全型的被

试实际上提供的支持也较少。相反,大多数回避型的个体提供了较少的支持,不论其伴侣寻求多少的支持。克林斯和菲尼(Collins & Feeney, 2000)报告了类似的发现,他们对约会的伴侣进行录像,研究当一方向另一方揭露自身问题时对方的表现。

依恋和性

鲍尔比(1969/1982)认为行为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尤其是依恋系统在系统间的冲突中起到主要影响。依照这个观点,薛佛等人(1988)假设,焦虑依恋型的个体主要寻求自身的保护和安全感,他们很难顾及伴侣的性需要和偏好。焦虑型的人被认为在维持相对放松和安全的精神状态方面是有困难的,这种精神状态助长了双方的性满足(Shaver et al., 1988)。回避型的依恋也被认为是干扰或者扭曲了性系统(Shaver et al., 1988),但这种干扰来自缺少照顾或者情感的亲密。回避型依恋鼓励情感的疏离,然而,恋人之间对性的需要和快感的探索经常要求或者鼓励心理上的亲密和一定程度的开放。这种增强的亲密会导致回避型的个体在性交时感到不舒服。

关于依恋过程塑造了性爱的动机、体验和行为的证据正在累积。与不安全型的个体相比,安全型的个体(那些在焦虑和回避上得分低的人)在发生性行为时更多地向伴侣示爱,更开放地探索性爱,更可能拥有一个性爱的积极自我计划,不太可能在性交时体验到消极情绪(Brenna et al., 1998; Cyranowski & Andersen, 1998; Davis, Shaver, & Vernon, 2003)。还有证据表明在回避项目上得分高的人不大可能拥有和享受亲密的性爱,并且更容易用性操纵和控制他们的伴侣,保护自己远离伴侣的消极情绪,或者达到其他非浪漫的目标,像较少的压力或者增加在同伴中的威信(Davis et al., 2004; Tracy et al., 2003; Schachner & Shaver, 2004)。焦虑型依恋的人倾向于用性作为达到个人安心和避免被抛弃的一种手段,即使当特殊的性爱动作是令他讨厌的(Davis et al., 2004; Tracy et al., 2003; Schachner & Shaver, 2004)。

关于关系互倚的一种行为系统观点

我们对爱情中依恋、呵护和性的分析与亲密关系的互倚理论有很多共通之处（例如 Holmes & Cameron, 2005; Thibault & Kelley, 1959），后者关注作为分析单元的人际互动，并且强调某一个体的反应对另一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正如前面提到的，行为系统产生了关系行为（寻求亲近、呵护或者性愿望），并且对一般的关系情境（context）和伴侣在特殊场合中的反应是敏感的。事实上，依恋、呵护和性系统的最佳功能取决于伴侣的可得性、敏感性和接受性（见表3-1）。另外，这种功能的品质对伴侣有关的情绪和行为以及个体自身的行为系统激活和功能有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每一个体的行为系统操作受到其自身的工作模式、其伴侣的工作模式和伴侣双方在特殊的相关情境中所出现的特殊互动模式的影响。

然而，与互倚理论不同的是，我们对爱情的看法并不将它全部当做是关系性的。每个人在进入某一特定关系时都带有过去的行为系统功能以及那些塑造关系感受与行为的内部模式。这会使其对伴侣的情绪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有所偏差。结果，一个特定伴侣的反应可以改变个体行为系统功能的习惯模式，而这一作用被个体自身的工作模式引起的主观评价偏差戏剧化地调和了。例如，在依恋领域里，焦虑型个体的过度激活策略加强了对依恋对象行为警惕性的监控，并且倾向于注意或者想象伴侣的兴趣、可得性和回应的不充分性。回避型个体的去激活策略干扰了对依恋对象的可得或不可得的线索的监控，因而增加了依恋对象可得信号被遗漏的可能性（Mikulincer & Shaver, 2003）。结果，伴侣的反应被解释是使它们适合于并增强内部工作模式和行为系统功能的习惯模式，因此，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这些反应改变有问题的行为系统操作的作用。

就情境和人格而言，我们关于行为系统功能的分析都是敏感的（正如我们在依恋理论文献的一些评论中解释和论证过的那样，如 Mikulincer & Shaver, 2003）。一方面，行为系统的激活和功能会受到伴侣具体反应的影响，这在个体的分级工作模型中促发了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激活适合的心理表征，并在

行为系统功能中产生迅速的变化。另一方面，这项功能受到长期接近的工作模型的影响，使个体对伴侣的意图和反应的评价有所偏差。这些偏差是自上而下加工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加工过程使一个行为系统的功能与长期的工作模型相一致。总之，我们承认情境（行为系统在其中被激活）以及个体特殊变量（来自对关系的体验和长期接近的工作模型）的重要性。

互倚理论和我们关于爱情行为系统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中强调的“个人”和“情境”之间普遍张力的特殊事例（如 Mischel & Shoda, 1995）。没有人怀疑安全依恋的个体（例如较多或较少安全感）依赖于有关的情境，但是，在这样的情境（尤其是特殊个体选择进入的那一个）中，平均起来，安全感要多于不安全感。因此，如果一位研究者想知道人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将会如何反应，则有必要按照情境对行为系统功能塑造的影响来描绘它们的特征，有必要理解它们对上行或下行调节接近、亲密、关心、性欲和爱的作用。相反，如果个体想知道典型安全依恋的个体的大脑或行为反应与非安全依恋的个体有何不同（Gillath, Bunge, Shaver, Wendelken, & Mikulincer, 2005; Mikulincer, Gillath, & Shaver, 2002），那么一个非常普通的实验室情境可能足以揭示这种差异。我们一再发现依恋类型在更广泛的情境中具有理论预见的作用。

这提出了研究者们可能愿意界定和测量的重要问题，即行为系统功能中个体差异的特异性和普遍性问题。在人格领域，一直追溯到奥尔波特（1961）和艾森克（1947）早期时代，在研究人格时有很多关于“习惯”或“特质”结构的讨论。艾森克（1947）谈到了一种人格层次理论，（自下而上）包括特定情境行为、习惯化行为（各种行为的集合）、特质和特质群（megatraits）的整合类型。目前，大五人格量表（Costa & McCrae, 1982）包括低水平特质“方面”，每一个分量表包括更特殊的倾向和行为项目。类似的，在情境方面，个体能谈到我与“玛格丽特”的关系，我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与同性、异性朋友之间的关系，与各性别各年龄的人的关系，甚至与“众生（在佛教文献中普遍提到）”之间的关系。不用怀疑，在特质层次论和相关的情境结构论中都有很多不同的特异性水平或抽象水平。当我们抽象地看待事物时，我们遗漏了很多

细节；当我们在特殊情境中看待个别行为时，我们遗漏了很多的一般倾向性或特质。我们认为，特殊的研究问题将决定我们要集中于研究何种现象以及在何种水平上进行研究。例如，当研究“安全”对“不安全”的心理时，我们怀疑通过测量关于特殊情境的具体工作模式能有很多收获。然而，当在具体的浪漫关系和情境中考察人际互动时，通过测量与依恋、呵护和性有关的一般与特殊的认知和情绪，我们将获益更多。

结束语

薛佛等人（1988）认为浪漫之爱可以被界定为鲍尔比（1969/1982）所提出的三个行为系统：依恋、呵护和性。这种对于爱情的理解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因为它将爱情置于进化与发展的框架之中，认为爱情具有人类普遍性，而不认为它是一个文化建构性的产物，并对爱情的某些方面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测量。（艾斯沃斯与其同事（1978）在研究婴儿与监护人之间的依恋时提到的。）这些年来，研究爱情的这种构思方法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且扩充了进化心理学的文献。

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需要类似的量表，用以测量鲍尔比探讨过的所有行为系统的激活和去激活策略：依恋、呵护、性、探究、亲和以及愤怒/攻击。我们要更多地学习这些系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以最优化或非最优化的方式发展的。我们需要探索用临床或教育干预来纠正非最优化发展的手段。在依恋、呵护和性系统的交汇处，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运用更多的方法，包括研究生理和神经基础。我们要用这些现象中深刻的、有效的其他方法来整合我们关于爱、呵护和性的方法。本章通过强调张力观和爱情的依恋、三角形与互倚理论之间可能的交叉观点，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小例子。当继续探索爱情复杂性的时候，希望我们能为更广阔的、更人性化的和更广泛应用的关系心理学（一个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个人和情境中的心理学中），贡献更多有用的观点。

（徐伟 初译）

参考文献

-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C., Waters, E., and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Allport, G. W. (1961).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Averill, J. R.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ove. In K. J. Gergen and K. E. Davis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 pp. 89-109.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Baldwin, M. W., Fehr, B., Keedian, E., Seidel, M., and Thomson, D. W. (1993).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al schemata underlying attachment styles: Self-report and lexical decision approach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746-754.
- Bartholomew, K., and Horowitz, L. M. (1991).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226-244.
- Batson, C. D. (1991). *The Altruism Question: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swer*. Hillsdale, N.J.: Erlbaum.
- Berscheid, E., and Walster, E. (1974). A little bit about love. In T. Huston (ed.), *Foundations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pp. 355-38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irnbaum, G. E., and Laser-Brandt, D. (200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ence of heterosexual intercourse. *Canadian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11, 143-158.
- Bowlby, J. (1969/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79).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ectional Bonds*. London: Tavistock.
- .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Sadness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88). *A Secure Bas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Brennan, K. A., Clark, C. L., and Shaver, P. R. (1998). Self-report measurement of adult attachment: An integrative overview. In J. A. Simpson and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46-7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rennan, K. A., Wu, S., and Loev, J. (1998).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physical contact in the context of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J. A. Simpson and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394-42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uss, D. M. (1999).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uss, D. M., and Kenrick, D. T. (1998).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and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vol. 2, pp. 982-1026. New York: McGraw-Hill.

- Carnelley, K. B., Pietromonaco, P. R., and Jaffe, K. (1996). Attachment, caregiving, and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in couples: Effects of self and partn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257-277.
- Cassidy, J., and Kobak, R. R. (1988). Avoida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defensive processes. In J. Belsky and T. Nezworski (eds.),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pp. 300-323. Hillsdale, N.J.: Erlbaum.
- Chisholm, J. (1999). *Death, Hope, and Sex: Steps to an Evolutionary Ecology of Mind and Mor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N. L. (1996).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Implications for explana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810-832.
- Collins, N. L., and Feeney, B. C. (2000). A safe haven: An attachment theory perspective on support seeking and caregiving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1053-1073.
- Collins, N. L., and Read, S. J. (1990). Adult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dating coup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644-663.
- Costa, P. T., Jr., and McCrae, R. R. (1982).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PI-R) and 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 (NEO-FFI) Professional Manual*. Odessa, Fl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 Cyranowski, J. M., and Andersen, B. L. (1998). Schemas, sexuality, and romantic attach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364-1379.
- Davis, D., Shaver, P. R., and Vernon, M. L. (2004). Attachment style and subjective motivations for sex.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1076-1090.
- Davis, M. H. (1983). Empathic concern and the muscular dystrophy telethon: Empathy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9, 223-229.
- De Rougement, D. (1940). *Love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Diamond, L. M. (2006). How do I love thee?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same-sex love and desire. In M. Mikulincer and G. S. Goodman (eds.), *Dynamics of Romantic Love*, pp. 275-292.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Epstein, S., and Meier, P. (1989). Constructive thinking: A broad coping variable with specific compon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332-350.
- Erikson, E. H.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 Eysenck, H. J. (1947).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Tubner.
- Feeney, B. C. (2004). A secure base: Responsive support of goal strivings and exploration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31-648.
- Feeney, B. C., and Collins, N. L. (2001). Predictors of caregiving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 attach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972-994.
- . (2003). Motivations for caregiving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on caregiving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950-968.

- Feeney, J. A. (1996). Attachment, caregiving,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401-416.
- Feeney, J. A., and Hohaus, L. (2001). Attachment and spousal caregiv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 21-39.
- Feeney, J. A., and Noller, P. (1990). Attachment style as a predictor of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81-291.
- Fisher, W. A., Byrne, D., White, L. A., and Kelley, K. (1988). Erotophobia-erotophilia as a dimension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5, 123-151.
- Fraley, R. C., Davis, K. E., and Shaver, P. R. (1998). Dismissing-avoidance and the defensive organization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J. A. Simpson and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49-27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Fraley, R. C., and Waller, N. G. (1998). Adult attachment patterns: A test of the typological model. In J. A. Simpson and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77-114.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Gaines, S. O., Jr., Reis, H. T., Summers, S., Rusbult, C. E., Cox, C. L., Wexler, M. O., Marelich, W. D., and Kurland, G. J. (1997). Impact of attachment style on reactions to accommodative dilemma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 93-113.
- Gillath, O., Bunge, S. A., Shaver, P. R., Wendelken, C., and Mikulincer, M. (2005). Attachment-style differences and ability to suppress negative thoughts: Exploring the neural correlates. *NeuroImage*, 28, 835-847.
- Harlow, H. F. (1959). Love in infant monkeys. *Scientific American*, 200, 68-86.
- Hazan, C., and Shaver, P. R.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Hazan, C., and Zeifman, D. (1994). Sex and the psychological tether. In K. Bartholomew and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5, *Attachment Processes in Adulthood*, pp. 151-177.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 (1999). Pair-bonds as attachments: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In J. Cassidy and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p. 336-354.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S. (1989). Research on love: Does it measure u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784-794.
- Holmes, J. G., and Cameron, J. (2005).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ories of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An interdependence theory perspective. In M. W. Baldwin (ed.),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pp. 415-447.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urlbert, D. F., Apt, C., Hurlbert, M. K., and Pierce, A. P. (2000). Sexual compatibility and the sexual desire-motivation relation in females with hypoactive sexual desire disorder. *Behavior Modification*, 24, 325-347.
- Janda, L. H., and O'Grady, K. E. (1980). Development of a sex anxiety inventor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8, 169-175.
- Jankowiak, W. (ed.). (1995). *Romantic Passi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stenbaum, R., Farber, E. A., and Sroufe, L. A. (1989).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mong preschoolers: Relation to attachment history. In N. Eisenberg (ed.), *Empathy and Related Emotional Competenc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no. 44, pp. 51-64.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Kunce, L. J., and Shaver, P. R. (1994). An attachment-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aregiv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K. Bartholomew and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5, pp. 205-237.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Lee, J. A. (1977). A typology of styles of lov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 173-182.
- Long, E. C. J., Cate, R. M., Fehsenfeld, D. A., and Williams, K. M. (1996). A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a measure of premarital sexual conflict. *Family Relations*, 45, 302-308.
- Mikulincer, M. (1998).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nd the sense of trust: An exploration of interaction goals and affect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209-1224.
- Mikulincer, M., and Arad, D. (1999).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nd cognitive opennes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 test of chronic and temporary accessibility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710-725.
- Mikulincer, M., and Erev, I. (1991). Attachment style and the structure of romantic lov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273-291.
- Mikulincer, M., Florian, V., Cowan, P. A., and Cowan, C. P. (2002). Attachment security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A systemic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dynamics. *Family Process*, 41, 405-434.
- Mikulincer, M., Gillath, O., and Shaver, P. R. (2002). Activation of the attachment system in adulthood: Threat-related primes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fig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881-895.
- Mikulincer, M., and Shaver, P. R. (2003). The attachment behavioral system in adulthood: Activation, psychodynamic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pp. 53-15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ischel, W., and Shoda, Y. (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246-268.
- Mosher, D. L. (1988). Revised Mosher Guilt Inventory. In C. M. Davis, W. C. Yarber, and R. S. L. Davis (eds.), *Sexuality-Related Measures*, pp. 75-88. Lake Mills, Iowa: Davis.
- Pinney, E. M., Gerrard, M., and Denney, N. W. (1987). The Pinney Sexual Satisfaction Inventory.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3, 233-251.
- Reis, H. T., and Patrick, B. C. (1996). Attachment and intimacy: Component processes. In E. T. Higgins and A. E.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523-56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Rholes, W. S., Simpson, J. A., and Orina, M. M. (1999). Attachment and anger in an anxiety-provoking sit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940-957.

- Rubin, Z. (1973). *Liking and Loving: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Ryan, R. M., and Frederick, C. (1997). On energy, personality, and health: Subjective vitality as a dynamic reflection of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5, 529-565.
- Schachner, D. A., and Shaver, P. R. (2004). Attachment dimensions and motives for sex.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 179-195.
- Schachter, S. (1964).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arfe, E., and Bartholomew, K. (1995). Accommodation and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in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2, 389-401.
- Shaver, P. R., and Brennan, K. A. (1992). Attachment styles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Their connection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romantic relationship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 536-545.
- Shaver, P. R., and Clark, C. L. (1994). The psychodynamics of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In J. M. Masling and R. F. Bornstein (eds.), *Empirical Perspectives on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Empirical Studies of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vol. 5, pp. 105-15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Shaver, P. R., and Hazan, C. (1993).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D. Perlman and W. Jones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4, pp. 29-70.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Shaver, P. R., Hazan, C., and Bradshaw, D. (1988). Love as attachment: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behavioral system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68-9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aver, P. R., and Mikulincer, M. (2002). Attachment-related psychodynamics.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4, 133-161.
- . (in press). Attachment theory, individual psychodynamics, and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In D. Perlman and A. Vangelisti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mpson, J. A. (1990). Influence of attachment styles o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871-980.
- . (1999). Attachment theory in moder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J. Cassidy and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p. 115-140.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impson, J. A., Ickes, W., and Grich, J. (1999). When accuracy hurts: Reactions of anxious-ambivalent dating partners to a relationship-threatening sit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754-769.
- Simpson, J. A., Rholes, W. S., and Nelligan, J. S. (1992). Support seeking and support giving within couples in an anxiety-provoking situation: The role of attachment sty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434-446.
- Simpson, J. A., Rholes, W. S., Orina, M. M., and Grich, J. (2002).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support giving, and support seeking in a stressful situ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598-608.

- Sprecher, S., and Cate, R. M. (2004).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expression as predictors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stability. In J. H. Harvey, A. Wenzel, and S. Sprecher (eds.), *Handbook of Sexual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35-256. Mahwah, N.J.: Erlbaum.
- Sprecher, S., and Regan, P. C. (1998). Passionate and companionate love in courting and young married couples. *Sociological Inquiry*, 68, 163-185.
- Sroufe, L. A., and Waters, E. (1977). Attachment as a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 *Child Development*, 48, 1184-1199.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135.
- . (1987). Liking versus lov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or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2, 331-345.
- Sternberg, R. J., and Barnes, M. (eds.). (1988).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hibault, J. W., and Kelley, H. H. (195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s*. New York: Wiley.
- Tracy, J. L., Shaver, P. R., Albino, A. W., and Cooper, M. L. (2003). Attachment styles and adolescent sexuality. In P. Florsheim (ed.), *Adolescent Romantic Relations and Sexual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pp. 137-159. Mahwah, N.J.: Erlbaum.
- Waite, L. J., and Joyner, K. (2001). Emotional satisfaction and physical pleasure in sexual unions: Time horizon, sexual behavior, and sexual exclusiv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 247-264.
- Walster, E., and Walster, G. W. (1978). *A New Look at Lov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爱情的进化

大卫·M·巴斯 (David M. Buss)

谚语有云：“爱情是盲目的。”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爱情是一个新近的事物，它仅仅有几百年的历史。”也有一些人则认为，“爱情仅限于西方文化。”本章将会解释为什么上述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爱情是一种适应，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解决生存和生殖等特殊问题的精密的复合适应装置。它是一套人类经过精细打磨的心理装置，在非常特殊的情境中具有必不可少的实用功能。这些功能非常多，足以使人相信另一句更接近真理的谚语——“爱情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非群居的动物（像大熊猫和豪猪）对爱情的需要很少。他们独自居住和生存，只有交配时才短暂地在一起，然后很快就分开。与之相比，人类则是“社会性动物”（Aronson, 2004），我们的居住方式是群居，其他人是我们生存和遗传所依赖的“工具”，其中一些“工具”非常重要，以至于我们赋予它们心理、情绪和物质方面的投资。一些“工具”对于我们的繁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让他们茁壮成长。

自然选择是进化过程的引擎，它所遵循的是适者生存。现代观点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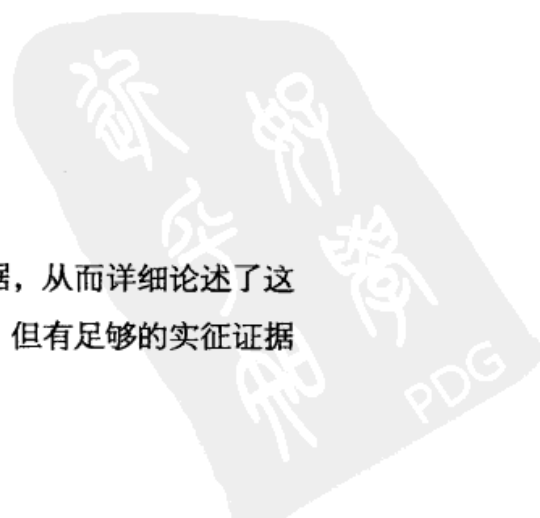
适应是生存和繁衍这些周期性问题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解释 (Hamilton, 1964)。适应进化的一个严格的必要条件是环境结构跨时代的统计再现。统计规律有很多种——磨损和皮肤损害之间的关系，配偶价值观差异和配偶发生不忠行为可能性之间的联系，长时间注视和性兴趣之间的联系，对称特征和没有环境危害之间的联系。

当这些统计规律一代代地重复出现，当它们提供了有助于成功繁衍的信息时，选择能够利用这些统计规律产生检测它们，并对它们起作用的适应 (Adaptation)。例如，“茧子”的产生，这一适应现象解决了由于反复与粗糙的表面进行摩擦而引起的损伤问题；嫉妒适应能够使个体对伴侣可能的不忠产生警惕 (Buss, 2000)；求爱的适应能使之对性兴趣信号做出反应 (Greer & Buss, 1994)，并且能够形成以生理健康为基础的魅力标准 (Sugiyama, 2005; Symons, 1979)。

我们称之为爱情的这一复杂心理状态，包括情绪状态、信息加工装置和一些外显的爱情行为，是一种进化而来以解决繁衍问题的适应吗 (Buss, 1988b)? 这一章探讨了有关爱情适应功能的几个假设。根据先前的进化论分析，爱情进化出以下几个功能 (Buss, 1988b)：

- 显示有关生殖的资源
- 提供性接触
- 标志性的忠诚
- 通过配偶监护提升关系的独有性
- 显示许诺和承担的义务
- 改善能成功繁殖的行动
- 提供亲代投资的信号

这一章通过对爱情适应功能提出假设、提供实证证据，从而详细论述了这一进化理论。尽管并不存在决定性的证据支持这些假设，但有足够的实证证据



支持这一理念：如果不理解爱情的功能——解决适应问题，就不可能完全理解爱情心理。

爱情的普遍性

从爱情进化论中得出的一个最直接的预测是爱情的心理回路应该是普遍性的，而不是限于西方文化的。当然，心理适应的普遍性并不表示外显体验的普遍性。就像一个人所经历的人生中他或她的嫉妒回路从来没有被激活过——例如，他（或她）的配偶从来没有表现出不忠和背叛的信号——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没有体验过爱情。尽管如此，大多数人拥有这一心理回路，所以这个世界的每一种文化中，很多人会体验到爱情——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预测，并且它无法从除进化论之外的其他爱情理论中推论得到。

从试图消除爱情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爱情的普遍性以及对压制爱情的坚决反对（Jankowiak, 1995）。在19世纪，奥奈达人（威斯康星州的印第安人）认为浪漫之爱仅仅是被伪装的性欲，没有理由鼓励这种欺骗。再如，以崇尚独身主义为宗旨的美国基督教派宣称浪漫之爱有损于尊严，并且威胁到更大团体的目标，因此试图废除它。摩门教徒（一夫多妻制度）在19世纪也认为浪漫之爱是破坏性的，因此也试图阻止它。然而，在上面的三个社会中，浪漫之爱一直在个体中存在并延续，虽然有时是秘密的，但他们反对废除，躲避着族群长辈严厉的目光。所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如果他人越想方设法阻止爱情，反而可能使爱情之火越燃越旺，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一样。相爱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可以暂时地压制他们的情感，或压抑他们情感的表达，但他们却不能把爱完全驱除。

强制包办婚姻和允许一夫多妻的文化提供了一个评判案件——哪一种体制更能破坏爱情呢？在男性的第一个妻子已被选定的配偶体制中，爱情会起作用吗？即使当长辈已经为他选择了第一任妻子，男性通常还会因为爱情娶

第二个妻子，比如阿拉伯的一夫多妻文化就是如此。事实上，泰塔的女性声明她们更愿意成为第二任或第三任妻子，而不是第一任妻子。她们希望自己更可能为爱情而结婚，因此也期望从丈夫那里得到更好的待遇和更多亲密的情感（Jankowiak, 1995, p. 11）。

关于爱情普遍性的另一个证据来自调查研究，即简单地询问一些男性和女性他们当前是否在恋爱。苏珊·斯普瑞彻（Susan Sprecher）及其同事访谈了来自三种不同文化的1667名男女（Sprecher, Aron, Hatfield, Cortese, Potapova, & Levitskaya, 1994），73%的俄国女性和61%的俄国男性承认他们当前正在恋爱，63%的日本女性和41%的日本男性承认当前正在恋爱。美国人也大致处于相同的水平，63%的女性和53%的男性承认目前正在恋爱。另一项跨文化的人种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爱情都包含一些爱情体验的外显标志——爱情誓言、爱情歌曲、单恋的痛苦表达等等（Jankowiak & Fisher, 1992）。

最后，对遍及六个洲五个岛、包括37种文化的10047名被试进行的配偶偏好的研究证明，在每种文化中选择最多的几乎都是“相互吸引和爱情”（Buss, 1989; Buss, Abbott, Angleitner, Ashrian, & Biaggio et al., 1990）。如果爱情体验或表达只限于某些文化，爱情的进化理论也将站不住脚。现有的证据表明爱情确实是一种普遍的体验；缺乏爱情体验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但是，爱情的普遍性并不代表男性和女性爱情适应的心理装置是相同的。

爱情心理装置的性别差异

在关于人类交配的文献中，大量可重复验证的研究发现，在选择长期配偶的时候，男性比女性更重视体貌（Buss, 1989, 2003）。这并不是因为男性肤浅、没有头脑，只根据事物的外表来判断。体貌能够提供一个女性在青春和健康方面的大量信息，因此也可以反映出她的生育能力（性交后怀孕的可能性，排除使用现代节育手段）和生殖价值（将来生殖的潜力）。这也并不是说，女

性在择偶的时候就不考虑体貌，她们在择偶时也会看一个人的外貌，外表所提供的健康信息在女性择偶的时候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Buss, 2003）。但是，外貌能提供的是与生育能力密切相关的青春方面的更多信息，因此体貌在配偶选择中对于男性来讲更重要。

体现女性魅力的体貌特征都支持吸引力—生育能力强之间的联系：光滑如脂的肌肤，长而有光泽的秀发，匀称的体型，没有明显的伤疤、脓疱和伤口，腰肢纤细，胸部丰满，腰臀比例小（参见 Sugiyama, 2005，最近一份对实证证据的全面总结）。

对女性长期择偶起关键作用的许多特性并不是轻易根据体貌来评定的。这些特性包括男性的抱负、勤勉、魄力、身份地位——它们都是和资源获得有关的特性（Buss, 1989, 2003; Buss & Schmitt, 1993）。这些特性和影响女性选择短期配偶的特性形成鲜明对比，比如优良的基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体貌来评定（Gangestad & Thornhill, 1997; Sugiyama, 2005）。然而，这种暂时的性关系通常不会产生爱情，爱情主要还是在长期配偶的情况下形成的。

因为爱情是一种局限于长期配偶的感情，因为生育能力和繁衍价值对于男性选择长期配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体貌能够提供很多关于女性繁殖力和繁衍价值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预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一见钟情”。实证研究支持这一推测，报告一见钟情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得多（Brantley, Knox, & Zusman, 2002; Kanin, Davidson, & Scheck, 1970），这一证据支持爱情的心理回路装置存在性别差异的假设，关于这一假设另外的证据集中在责任义务方面。

一般来说，处于短期配偶关系中的女性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她们付出的代价要高于男性（Buss & Schmitt, 1993）。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通过草率的性交，女性会有和心目中非理想的男性怀孕的危险——比如说这个男性可能没有良好的遗传基因，或者是不会为她或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尽管在某些情境中女性可能会从短期的配偶关系中获益（Greiling & Buss, 2000），但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草率的性交不会像男性那样转变成线性增加的生殖成功。因为男性

在繁殖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与他们在一次单纯的性行为中的投入一样多，而女性必须经过九个月的孕期才能分娩，因此，男性期望和寻求暂时的性行为的动机更强烈。

你同意下面的说法吗？“没有爱的性也不错。”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你很可能就会同意这种观点，但大多数女性则不会赞成这种观点。正如元分析（Oliver & Hyde, 1993）和跨文化资料（Buss, 2003；Schmitt, 2005）所揭示的那样，对这种无爱的草率性行为的态度仍然是性领域中最大的性别差异问题之一。

这些发现支持爱情心理装置存在性别差异这一重要的假设。对于女性来说，爱和性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认为没有爱也可以有性。这带给我们爱情进化理论的另一个假设：爱情的情感体验是增加承诺可能性的一种手段。

作为承诺装置的爱情

如果爱情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为什么进化论首先把爱看做是人脑的功能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来自人类和其最相近的灵长类祖先的三个独特变化：（1）长期配偶的进化；（2）女性排卵的隐蔽性；（3）男性对孩子的大力投入。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主要是在雌性进入发情周期的时候交配，在发情期她鲜红的生殖器开始膨胀，再加上嗅觉的气味使雄性进入性狂躁的状态；而在发情期以外的时间，雄性在很大程度上对雌性是无关紧要的。而人类排卵则是隐蔽或秘密的，至少绝大部分是如此。尽管女性会有一些微妙的身体变化——比如皮肤有轻微的光泽或是性欲有细微的增强——但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当女性排卵时男性能够觉察出来（Buss, 2003）。

排卵的隐蔽性还与其他的一些主要变化相一致。女性在整个月经周期里都可以与男性发生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在排卵期前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男性和女性都是结合成对的长期配偶关系。但是，和黑猩猩不同的是，男性开始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后代身上，他们猎取的食物不仅仅供应给配偶和家

族，而开始转向给孩子。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这些特殊的变化。很多女性开始把她们整个的繁殖生涯和单一男性联系起来，而不是在她们排卵期偶然遇到的处于统治地位的任何男性。男性开始提防那些可能引诱他们配偶的情敌。在许多物种中，那些原来用来诱导雌性交配的过剩资源也开始转向给妻子和孩子。确实，男性提高了获取更多资源的诱因，主要是以猎取食物的形式。简而言之，长期的配偶关系使男性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把与生殖相关的资源分派给单一的配偶。

基础经济学告诉我们那些拥有有价值资源的人不会不加区别地分送这些资源。确实，进化论会无情淘汰那些在长期的配偶关系中浪费宝贵的生殖资源而不获益的人，长期配偶关系的进化机制需要在人类心理结构中安置一套回路（circuits），确保把自己的全部资源分派给自己唯一的伴侣以得到合理的生殖报偿。这需要一些手段来确定这个特定的配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能胜过其他潜在的伴侣，和自己共同面对。这一承诺问题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我的爱情进化理论（Buss, 1988 b）最初的纲要和进化论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观点相一致：我们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诺问题的一种进化的解决办法（Frank, 1988）。如果一个伴侣出于某些理性的原因选择了你，那么他或她也会因为同样理性的原因离开你：依据这些“理性”标准，他或她会发现更有魅力的人。这就产生了一个承诺问题：你怎么才能确定这个人会永远和你在一起？如果你的配偶被无法控制的爱情蒙住了眼睛，他对你的爱是唯一的，那么即使当你生病或贫穷的时候，这种承诺也不会动摇。爱情超越了理性。正是由于这种感情，当出现更中意的人时，你也不会离开原来的配偶。简而言之，爱情使配偶感觉到强烈而长久的意图和决心，这可能是承诺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种因果方向当然也很有可能颠倒过来，爱情也可能是当承诺问题成功解决时我们体验到的一种心理奖赏。这是一种精神/身体麻醉（鸦片），说明择偶、性交、献身、忠诚等适应性问题得以成功解决（Fisher, 2004）。对此的科学

解释是进化论在人类大脑中建立了一个奖赏机制，使我们能够保持执行能成功生殖的行为。但是，有时这种麻醉作用会逐渐减弱以致消失（Fisher, 2004）。没有什么东西能得到一生的保证，在麻醉作用渐渐消退以后，我们可能断绝曾经海誓山盟的恋爱关系，而又重新爱上别人。承诺并不意味着要承诺一生。

爱情既是承诺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也是成功解决后一种令人陶醉其中的奖赏。爱情的错综复杂性在我的个人研究中首次体现出来（Buss, 1988b）。我调查了几百名男女，让他们描述标志一个人坠入爱河的行为表现，于是一个独立样本（分离样本）诊断出115种爱情行为中的每种行为表明浸入爱河的程度。

承诺是最具诊断性的，但是承诺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一个人可以承诺把食物、庇护所和身体保护等资源长期提供给他/她的伴侣，也可以通过保持性忠诚或充满激情的做爱来承诺性资源，爱人可以向他们所爱的人承诺生殖资源，如怀孕、妊娠和分娩。另外，爱人还要向他们爱情的结晶承诺双亲资源。

这些行为都体现了一种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了爱人更大的需要，把自己的利益和兴趣放在一边，为了爱人做出重大的牺牲，并且为了陪伴爱人放弃大量的自由时间。还有其他一些在非恋爱关系中缺乏的承诺信息（如性开放和性信任）：比如尝试不同的性交体位或实现爱人内心最深处的性幻想。

情感方面的承诺体现在爱情的各种行为中，包括全神贯注并饶有兴趣地倾听爱人的问题，当爱人真正需要对方的时候能够放弃有趣的娱乐活动陪伴在他/她的身边，并且要对爱人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有些相爱的人描述了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他们的爱人是如何给予他们希望的。当他们陷入绝境时，他们的爱人把他们从绝境的深渊里拉了出来，共同渡过难关。

这些发现支持了假定与爱情相关的另一组特征——承诺的特殊化形式。

爱情伊甸园里的蛇

不幸的是，爱情进化故事的结局并不美满，花园里会有蛇，爱情的伊甸园

里也会有麻烦。一类麻烦来自人类交配的双重策略。一旦爱情的愿望存在，它就会被无情利用和操纵。比如，为了获得短期的性，男性会在爱的程度上欺骗女性（Haselton, Buss, Oubaid, & Angleitner, 2005）。就像奥维德两千年前写的那样，“爱情是一种性行为运动，……一个男性为了赢得女性的芳心，进而和她发生性行为，有可能会表里不一或不诚实。”反过来，女性在同意和男性发生性行为之前往往会制造一个较长的求爱过程，试图识别男性的诡计，并形成破解非言语信号的超凡能力，以防止自己在性方面被欺骗（Buss, 2003）。

女性有时也会不诚实，但是她们的不诚实和男性不同。男性通常会为了发生性关系而假装爱上对方，而女性通常把性作为一种获取爱的手段（Buss, 2003）。这种策略属于“诱导转向法”，在短期交配的情况下女性可能提供“不花钱”的性，然后就会把自己植入男性的中心，把这种短期交配的关系转变成长久的爱。就好像女性会防御自己陷入男性的爱情谎言中一样，我们可以合理推导出，当自己的利益受损时，男性也会防止自己被引诱而陷入长期的爱情当中。这种欺骗和反欺骗、策略和对策的军备竞赛仍然继续，而这种比赛没有终点。因为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利益很少会完全一致，因此进化论下采取的策略只有在损害一种性别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关于两性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较为危险的嫉妒情绪方面。

危险的激情

嫉妒形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让我们看一下这些研究发现：一个团体样本中有46%的人声明嫉妒是真爱的一个必然结果（Mullen & Martin, 1994）。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所宣称的“没有嫉妒就没有爱情”也指明了爱情和嫉妒之间的联系（Claypool & Sheets, 1996）。莎士比亚笔下痛苦的奥赛罗“一方面那样痴心爱恋，一方面又是那样满腹狐疑”。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把嫉妒看做是爱情深度的一个标记，爱人之间没有嫉妒，就意味着缺乏爱情。

马西斯（Mathes, 1986）对一些正在浪漫恋爱的未婚被试做了一项关于嫉妒的测验。七年以后，他联系这些被试并询问他们这种关系的当前状况，大约有25%的被试已经结婚，而75%的被试则分手了。那些已经结婚的被试在七年前嫉妒测验中的平均得分是168分，而那些已分手的被试在七年前的嫉妒测验中的平均得分明显较低，是142分。因为这个研究是小样本研究，所以这一研究结果应该谨慎地加以解释。尽管如此，它还表明了嫉妒可能和长久的爱情有关。

另一研究和上一研究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在对651名正在积极约会的大学生样本所做的调查中，超过33%的被试报告说嫉妒对他们的当前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Riggs, 1993）。这些影响包括从自尊心丧失到言语辱骂，从激烈的争论到深深的厌恶。

自相矛盾的是，强烈而持久的爱会产生嫉妒，而嫉妒又会破坏这种最和谐的关系。O. J. 辛普斯（O. J. Simpson）的陈述就反映了这一矛盾性：“比如我犯了罪（杀了前妻尼柯尔·布朗·辛普斯）。即使我真的这样做了，那也是因为我爱她爱得太深了，对吧？”（《新闻周刊》，1998年12月28日，第116页）能保护这种关系免受第三者破坏的嫉妒情绪，“可以把作为爱情避难所的家庭变为斥责和憎恨的地狱”。

研究发现，嫉妒常常与爱情相伴（Mathed, 1991）。它不仅保护爱情免于失败的危险，同时其更深远的意义是保护自己的爱情，而不会输给情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可能会让你产生嫉妒的场景：

由于宿命（灾祸）造成的失败：你深爱的人在一场汽车交通事故中丧生。

由于爱人的命运造成的失败：你深爱的人由于升职被调往另一个遥远的城市，你知道你将再也见不到他（她）了。

由于拒绝而造成的失败：你深爱的人，解释说他（她）不再爱你了，想结束这种恋爱关系，你知道你将再也见不到他（她）了。

由于情敌造成的失败：你深爱的人爱上了别人，并想和你结束这种爱情关系。你知道你将再也见不到他（她）了。（Mathes, 1991, pp. 93-94）

在一项实验中，马西斯（Mathes）询问被试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感到嫉妒吗？”结果得分从4分到28分，差距很大，在嫉妒量表上由于宿命而造成爱情失败的项目上仅得7分，由于命运而造成爱情失败的项目上的得分为13分，几乎是前者的两倍，由于拒绝而造成爱情失败的项目上得分为16分，而由于情敌而造成爱情失败引起的嫉妒得分最高，为22分。进化使嫉妒不仅起到防止爱情失败的作用，因为进化是内在的竞争过程，它还逐渐发展以避免输给情敌造成爱情失败而受到“双重打击”。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嫉妒可以准确地解释为爱情的行为（Buss, 1988a）。比如，一个男性意外拜访他的恋人，去看看她正在做什么，这是一种警戒式的嫉妒，这种形式的嫉妒可以在谈情说爱的同时保护这种独享的安全港湾。再比如，一个女性晚上失眠，辗转反侧地思念她的爱人，并担心他是否同时脚踏两只船，这既表明了她爱他的深度，同时也表明了她嫉妒的强度。当一个男性告诉他的朋友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性的时候，其实他在传达两个目的，一个是告知别人他恋爱了，一个是告诉他的潜在情敌对这个女性不能再有非分之想。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流行的“开放式婚姻”失败说明了要从情人的生活中去除嫉妒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婚姻能够容忍第三者。嫉妒的一个好处是它能保护内心的圣所，使它免受心怀叵测的第三者的破坏。潘斯认为，保护爱情是嫉妒的一个主要功能：“嫉妒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浪漫的爱情关系。它不是一种无用的非理性状态，而是人们可以学会正确解释的有用信息……嫉妒使人们审视他们的关系……它教导夫妻不要总认为彼此理所当然……确保他们仍能够重视彼此……这表明了人们非常重视其所保护的这种爱情关系。”（Pine, 1998, pp. 205-206）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安全港湾不太可能存在。像新闻记者朱迪

思·维奥斯特所写的那样：“不幸的是，这个花花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靓丽佳人——秘书、牙医助理、女服务生、女经理……这样经常外出旅行的丈夫对潜在的诱惑有了更广泛的选择——环球航空公司的空姐、旧金山袒胸的舞女、明尼阿波利斯的旧情人和底特律刚出道的模特，这加速了他们夫妻关系的恶化。”（Viorst, 1998, p. 24）

讽刺的是，爱情的维系也取决于经常存在的情敌威胁和由此引起的嫉妒。维奥斯特则认为：“在那些日子里，我突然感到了成熟与安全。我承认如果一个男性对别的女性没有吸引力，如果一个男性不是朝气蓬勃而招惹其他女性，如果一个男性不能使我产生嫉妒情绪，那么这个男性也不会是我所喜欢的类型。”（Viorst, 1998, p. 24）

致命的爱情

另一个问题是流行的事物通常很快会结束。人们放弃爱情的速度和他们坠入爱河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能确定地预测谁的爱情会失败，但是最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当人们的欲望逐渐得到满足时，人们开始坠入爱河。一旦违背了愿望，就很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分歧。比如，选择一个男性是因为他的善良和干劲，但是当他变得残酷和懒惰时，这个男性就会被拒绝；选择一个女性是因为她的年轻和美丽，但当出现一个更年轻和漂亮的模特引诱她的情人时，这个女性就很有可能失去这段爱情。一个最初体贴入微的伴侣也可能变得堕落，而且，当多次重复的性行为后仍没有怀孕，这会促使他们在别处寻求更有收获的婚姻（Betzig, 1989）。

对长期爱情一个最具决定性的打击来自于对于婚配市场的苛刻权衡（harsh metric of the mating market）。一对夫妇一开始在总体需求上大致是相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距。让我们来看一对初涉工作的职业夫妇，如果女性的事业正像流星焰火一样迅速上升，而男性则被解雇，那么他们

的市场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给他们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或使他们身心处于紧张状态。身份地位的突然提升会增加一些新的婚配机会，以前得不到的“9”现在可以得到了。在婚配进化的残酷事实中，当一个男性失败的时候他的妻子仍然支持他，那么我们会赞美并钦佩她的行为。但我们的祖先中很少有人这样做，现代人类继承了我们祖先的做法，因此，当收益足以承担各种花费时，人们通常去买更高价的东西，结果导致关系破裂（Buss, 2000）。

爱情失利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爱情带来的愉悦只会持续一时，而爱情带来的伤痛却会延续终生。”（塞莉斯泰因，法国寓言家）这种失败会给女性带来身体伤害，并且会给双方带来心理创伤。爱情失利所引起的悲伤是一个人所经历的最有压力的生活事件，它所产生的心理创伤超过了其他事件，当然，孩子死亡这样可怕的事情除外。被深爱的女性拒绝的男性经常对她们进行感情侮辱与身体虐待。一些男性经常不断地打电话骚扰他们的前妻，或是突然拜访她们，给她们施加暴力威胁，而遭到偷袭的受害人经历了心理恐怖、工作破坏或者新恋情遭到干扰。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被抛弃的男性中相当多的人开始产生杀人的想法（Buss, 2005）。不幸的是，有时这些想法竟然变成了现实。

失去爱情足以使一个男性做出杀人的举动。下面的这个案例，来自对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年以来所有杀人事件的系统整理，描述了爱情和失去爱情的强大威力。

191号案例是起因于家庭争吵。一位37岁的妇女和她42岁的丈夫喝了酒开始吵架。这个妇女一开始跑到隔壁她姐姐的公寓，却发现只有她11岁的外甥醒着。她离开她姐姐的房屋去寻求邻居的援助。当她穿越车道时她的丈夫截住了她，接着又吵了起来，她一边从她丈夫身边跑开，一边大声呼救。当邻居发现她的时候，她已倒在人行道的血泊里，人们叫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往医院。她的丈夫告诉警察整个事情的经过，因为他的妻子不再爱他了……导致他在冲动之下拔出随身携带的小折叠刀刺向妻子的胸部。（Lundsgaarde, 1977）

简而言之，失去爱情对于拒绝者和被拒绝者来说都会留下精神创伤。就像进化论所建立的奖赏机制，当婚姻成功时，我们大脑的血液中会产生一种复合胺，使我们产生愉快的感觉；同样，当我们经历失败的婚姻时，这一大脑回路也会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许多失败的爱情会使人付出悲惨的代价，导致关系出现重大的适应问题。

2002年7月24日晚上，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家旅馆的停车场里，44岁的克莱拉·哈里斯（Clara Harris）驾驶奔驰汽车杀了她44岁的丈夫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他是一位牙齿整形医生（《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日报》，2003年1月24日，p.1）。克莱拉把她的汽车撞向她的丈夫，但她的怒气没有平息，她绕着停车场转了一圈，又从她丈夫的身上压了过去，旅馆安全照相机上的录像带显示克莱拉·哈里斯总共撞击了她丈夫三次。当最后她停下来时，奔驰车仍碾压在她丈夫身上。一些人认为克莱拉·哈里斯非常狠毒，理应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起杀人事件是情有可原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

大卫·哈里斯和他以前的同事盖尔·布里奇斯（Gail Bridges）曾有非常狂热的性关系。当克莱拉·哈里斯开始产生怀疑时，她雇佣了私人侦探，发现了她丈夫的不忠。在大卫死亡的那天早上，他面对克莱拉·哈里斯发誓说一定会断绝这种关系。那天深夜，克莱拉和她的继女林赛（Lindsey）开始寻找大卫·哈里斯。终于她们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大卫。据林赛说，“她说她要杀了他，自己会逃脱罪责。”确实，当克莱拉发现她丈夫不忠的时候，她曾付出很多努力设法使她丈夫回头。克莱拉曾经是一个选美大赛的皇后，在私情被发现之后，大卫在克莱拉和他的情人之间逐点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觉得他的妻子过于肥胖，他的情妇比较纤细并且“特别适合睡觉，可以整夜搂在怀里”（《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日报》，2003年2月8日，p.A4）。

大卫好像被他情人丰满的胸部给迷住了，尽管他承认克莱拉的手、脚和眼睛更漂亮，但他认为他的情人有“完美的身材”。林赛说克莱拉发誓要使自己变得真正漂亮，这样父亲就会想要她而不是情人盖尔。在谋杀的前一周，克莱

拉·哈里斯参加了一个减肥俱乐部，她花时间参加了一个美容沙龙，并且每日去见美容师。她还咨询了一个整形外科医生，并且同意付5,000美元的定金做吸脂术和丰胸手术。在凶杀案的当天，克莱拉花了15英镑做头发护理，并穿上看似更性感的衣服。

使克莱拉妒火冲天的可能是那个旅馆，十年前她和大卫曾经在那里结婚。当克莱拉看到她的丈夫和其情妇手拉手地出现在旅馆电梯上时，克莱拉失去了理智。她朝着情敌尖声喊叫起来：“你！他是我的丈夫！”她撕掉了情敌的上衣，并把她摔在了地上。她的丈夫把克莱拉从情人身上拉开，旅馆服务员把克莱拉护送出旅馆。当克莱拉离开旅馆大厅时，大卫朝她吼道：“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据她的继女说，那时克莱拉·哈里斯显得出奇平静。她止住了眼泪，默默地走进她的奔驰车内。大卫·哈里斯走向他的雪弗兰越野车，每个人都认为这场冲突已经结束了。突然，克莱拉猛地踩下油门，汽车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克莱拉开着车撞向她的丈夫。接着，她绕着停车场转了一圈，又从她丈夫身上碾过。然后，又绕了一圈，再一次从她丈夫身上压过去。最后，她终于停下车，林赛说：“你杀了我父亲。”

当大卫·哈里斯被压在前轮胎下面的时候，克莱拉走下车并开始道歉，她告诉她丈夫她爱他。在审判期间，克莱拉仍然坚持说她还爱她的丈夫。根据她的具体情况，得克萨斯州的很多人认为克莱拉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并不恶毒，一些人则认为大卫·哈里斯罪有应得。但法官和陪审团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和公诉人认为“如果男性对你不忠，你可以像其他的女性那样做——粗暴地批评他（抢或骗他的钱），但你不能杀了他”（Madigan, 2003）。他们判她二十年的监禁并罚款10,000美元。

嫉妒的情绪驱使克莱拉·哈里斯在旅馆的大厅里袭击她的情敌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同样，当她发现丈夫的不忠时感到极度愤怒也不罕见；中产阶级的夫妇住在估价超过600,000美元的日子里也不奇怪。当发现丈夫的不忠行为

时，所有阶层的女性都会由于嫉妒而怒火中烧。这一案例中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大多数妇女发现丈夫的出轨行为时一般不会做出过激的杀人举动，而很多男性会这样做。

从1976年到1984年，美国平均每年有4507名妇女被谋杀（Campbell, 1992）。被谋杀者不存在种族差异。三分之一以上的受害者是非裔美国妇女，三分之二是欧裔美国妇女，大部分是被深爱着她们的男性所杀的。一项对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被谋杀的女性所做的研究显示了和大多数研究相似的比例：有19%被她们的丈夫所杀，8%被当前的男朋友所杀，17%被已分居的丈夫所杀，8%被先前的性伴侣所杀。在代顿市这一比例竟达到被谋杀女性的5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一年，只有3%被谋杀的男性是死在爱着他们的女性手上。

代顿所显示的数据并不是一个特例。对美国1976年至1998年的杀人事件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被她们的亲密伴侣所杀，而只有4%的男性被其妻子或情人所杀（Greenfield, Rand, Craven, Klaus, Perkins, Ringel, Warchol, Maston, & Fox, 1998）。对全世界范围（包括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到印度的蒙达族）的谋杀案件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统计结果（Easteal, 1993; Saran, 1974）。

爱情所产生的激烈的混乱情绪会导致罪恶和血腥的死亡，这听起来可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毕竟，爱情是浪漫的，是充满激情的，是制造新生命的。而杀人正好是相反的——破坏、毁灭、最终死亡。这些在人的大脑中明显对立的内容如何融合在一起呢？这些荒谬的情绪在大脑中是一种纠缠不清的混乱状态吗？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案例。

她说自从四月她回来后，她和另外一个男性大约发生了十次性关系。我和她说你怎么能一边跟一个男人谈婚论嫁，一边和另一个男人上床呢。我当时疯狂地失去了理智。我到厨房里拿了一把刀子，然后回到我们的卧室问她，她告诉我的那些是认真的吗？她说是的。我们在床上打了起来，我拿刀子刺向了她。她的祖父走上来试图夺走我手

里的刀子，我跟他说去叫警察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杀了她，我是爱她的。（这是一个31岁的男子对警察的供词，他在和妻子分离六个月后团聚时杀害了他20岁的妻子）

然而，杀掉配偶引出了一个更难理解的问题。这种奇怪的行为模式怎么可能发展进化呢？杀掉配偶破坏了关键的生殖资源。由自然选择主导的进化过程更倾向于保留（而非破坏）重要的生殖资源。杀掉配偶似乎是非常残忍的，这与自我本位的生殖生存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深入研究婚配市场逻辑的基本细节（Buss, 2005）。首先，在大多数案例中，杀掉不忠配偶通常会给杀人者造成伤害。一个不忠诚的女性对于她的丈夫来说可能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生殖资源。如果她仍然是他的生殖资源，那么杀掉她会破坏他的适宜生活，比如说烦琐的、报复性的怨恨。就像威尔逊和戴利给出的恰当的描述：“要取代一个被谋杀的女性代价是很高的。”（Wilson & Daly, 1998）如果这个女性曾经生过小孩，那么杀了她会严重地危害他孩子的生存和健康成长。另外，杀了她，这个被戴绿帽子的男性还会有被报复的危险，可能会激起被杀女性的哥哥或父亲的复仇心理。综上所述，杀掉配偶通常是对通奸问题的一种非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但是，成本—效益公式中的成分有时会发生变化。不忠的行为可能标志着男性对他的配偶永远丧失了性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暂时丧失或部分丧失。他们可能没有孩子，所以杀了她并不会伤害她孩子的生存。在传统社会里，异族通婚是很平常的，所以通常她的父亲或兄弟可能不在附近居住（女性在结婚以后会离开自己的亲属，搬到丈夫家族那边居住）。另外，妻子的不忠可能会严重损坏一个男性的社会声誉，以至于男性要采取极端的行为来终止它。身份地位的损失会使配偶价值急剧下降，这会破坏一个男性对其他异性的吸引力。最后，一个男性在性上的损失也意味着其情敌在性上的获得，本来属于他的有价值的生殖资源现在变成情敌的了。

让我们在婚配以外的情境中考虑一下上述的逻辑关系。如果你刚刚杀了一

只狩猎动物要给自己以及饥饿的家人，而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吃的时候，过来一只食腐动物把它偷走了，你遭受损失。但是如果你的对手偷走了这块肉，在进化链条中这一损失就变得复杂化，因为自然选择是按照相对繁衍成功的原则进行的。你的损失就意味着直接竞争者的获得，竞争者的孩子幸存下来并健康成长，你的孩子可能面临挨饿或死亡。

同样，这一逻辑也适合婚配。如果你的婚配对象正好变成了你直接对手的性对象，那么这一被戴绿帽子的男性的适宜成本就变得复杂。这一理论会产生一种违反直觉的预言：这个不忠的女性越年轻、越健康、越有魅力，这一被欺骗的男性的损失就越大，而和他配偶睡在一起的竞争者的获益就越大。这还会产生一个令人烦扰的预言：这个不忠的女性越有吸引力、越健康、越有生殖力，那么当她的配偶发现她性不忠时，杀掉她的动机就越强烈。

惊人的是，美国每年被杀的3,400名女性中大约有一半可能被曾经爱着她们的丈夫、男朋友、前夫或前男友所杀害，那些情境都非常相似。永远失去的爱情有时会激活男性进化的杀人回路。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除了彻底疏远和脱离关系以外，女性的不忠是使男性反复产生杀掉他们伴侣念头的两个最有力的预兆之一。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她谴责我对她不忠，我非常生气并断绝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仍然爱着她。她决定开始和我最好的朋友上床。我愤怒了，因为她说过我是她的唯一。她真是一个婊子，但是，不幸的是婊子必须漂亮。我想让她死 (to be gone)，也想让我那个最好的朋友死……我们在她的船上，我开始斥责她。她要求我离开并开始变得神经质，所以我绑住她的双手和双脚，并用皮带把她绑在方向盘上，打得她脑浆迸裂。然后我让她喝了许多酒以至于她不能清楚地思考。我卡住方向盘，使它朝着房前的悬崖方向一直开去。然后我跳下了船，看着船发生了爆炸。(什么能阻止你杀了她?) 我是一个明智的人，我认识到她

只是一个愚蠢的婊子，当她老的时候她会变得既肥胖又丑陋。（什么促使你动了杀机？）在我们仍然出去约会的时候，我把她和我最好的朋友捉奸在床。

在这一幻想的理由中值得注意两个因素。首先，受害人既年轻又漂亮，表明她具有很高的生殖价值。第二，她和她丈夫最好的朋友发生性关系，当然，这个人现在变成她丈夫的情敌。进化论心理学家布雷思克和沙克尔福德（Blaske & Shackelford, 2001）进行的研究表明，最痛苦的是，情敌往往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与陌生人相比，朋友更有机会和配偶偷情，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配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在或不在，并且他们熟知我们的关系，知道何时可能出现裂痕并扩大。至少29%的女性和18%的男性报告说他们的同性朋友有时和她（他）们的爱人调情，这一数字无疑低估了实际的发生率，因为大多数偷情者都是秘密进行的。布雷思克和沙克尔福德发现同性朋友在这一问题上欺骗了他们的“朋友”。关于暗中侵犯朋友配偶的欺骗是同性友谊中最常提及的欺骗形式。而女性往往告诉她们的同性朋友关于她们先前性史和所拥有的性伙伴数量的一些错误信息，这可能是试图缩小偷情的潜在威胁。

一个男性爱一个女性的程度通常反映在他杀人念头的强度上，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145号案例：我认识她五年了，和她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大声尖叫着并撕毁了她所有的照片，并把与她通奸的那个人打得满地找牙……与我交往了五年多的女朋友，一年半以前开始和一些可卡因成瘾者约会，给我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在她是个“鸡头”，她和她遇见的那些杂种发生关系，我尽我所能地帮她戒掉毒瘾，但我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想掐住她的喉咙，把她举起来，朝着她的脸大声喊叫，说出她所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以及我的感觉。然后我想射死她和那些诱她上钩的卑鄙混蛋……有时我赤手空拳，有时候用枪……（是什么阻止了你这样做）我的良心和活生生的生命。我知道我实在没有理由杀掉我所爱的人。我认识到我的每一个行为都会产生

后果……事实上我爱这个女孩胜过我整个生命中所爱过的其他所有东西。我本应该和她结婚，本来可以幸福地为她死去。但是因为我对她的伤害比我一生中所受过的伤害都要大，我不想再活下去了，也不想让她活下去了。

维尔森和戴利（Wilson & Daly, 1992）在加拿大对 17 个配偶谋杀案所进行的研究揭示了爱情和不贞的短暂混合。这些案例中有 6 个归因于“精神错乱”。剩下的 11 个谋杀者“都承认他们深深地爱着受害者”。而且，在这 11 个案例中，受害者都和另外的男性有性关系或者她们让罪犯认为自己对他们不忠诚。在这 11 个案例中，10 位受害人并没有刻意隐瞒她们的非正当关系。

我们的研究发现想法和行为密切相关。比如，一个女性的出轨会强烈地激起她配偶的杀人想法，这些想法又驱使一些男性将这些致命的行为付诸行动。

跨文化研究表明，女性的性背叛是导致男性杀害她们的两个主要动机之一。在太平洋的雅浦岛上，被戴绿帽子的男性“有权杀掉他的配偶及其奸夫，或者是在房子里烧死他们”（Muller, 1917, p. 229）。在美拉尼西亚，法律规定当一个男性的妻子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时，这个男性的愤怒及狂暴是可以推断与原谅的。岛上的居民说“他好像猪被偷了一般”，但这种愤怒被合理扩大了（Hogbin, 1938, 236-237）。

结论

这里所提出的爱情进化理论包含爱情非进化理论中所没有的一些关键特征：爱情在解决特定适应性问题时的功能假设，这些是人类在寻求成功婚配时反复面对的问题。它还包括可验证的（因此是假说）有关爱情心理装置的预言，包括装置特征中主要的性别差异。尽管进化理论需要更多的实证性检验，但已获得的证据支持下面几个预言。

第一，一些证据表明爱情体验具有普遍性，而不是限于西方文化。第二，有证据支持爱情主要形成于长期配偶的假设，而短期配偶则很少产生爱情。第三，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生“一见钟情”，这表明体貌和身体诱惑力更能激活男性的爱情回路。第四，大多数女性不同意“没有爱的性也美妙”这一观点，这表明和男性相比，女性的爱和性的联系更加紧密。第五，进化理论准确地预言嫉妒和爱情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当自己的配偶爱上别人的时候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嫉妒，而当发现配偶性不忠时男性则会比女性体验到更强烈的嫉妒（最近的研究提出了相对的观点，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的研究中嫉妒装置的性别差异非常大——参见 Buss & Haselton, 2005; Pietrzak, Laird, Stevens, & Thompson, 2003; Sagarin, 2005; Schützwohl & Koch, 2004）。第六，一些证据表明爱情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承诺装置，它标志着要把有价值的生殖资源奉献给自己的配偶。

悲惨的是，失去爱情特别是当一个女性永远离开深爱她的男性时，她就会处于暴力、偷袭和谋杀的危险境地——这些发现支持下面这一假设，即男性的爱情心理包含一些装置特征，激发他们占有一个女性并采取孤注一掷的手段阻止情敌占有她。

爱情渗透在人类婚配的方方面面。爱情在配偶选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使用一些爱情行为来吸引配偶，使他们留在自己身边。失去爱情，或是转而爱上了别人，会导致产生嫉妒、矛盾、暴力和关系解除。爱情会使人类产生最大的快乐，但是，失恋也会导致人间极度的悲伤。

致谢

十分感谢罗伯特·斯腾伯格和凯琳对本章的早期草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黄美玲 初译）

参考文献

- Aronson, E. (ed.). (2004). *Readings About the Social Animal*, 9th ed. New York: Worth.
- Betzig, L. (1989). Causes of conjugal dissolu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0, 654-676.
- Bleske, A. L., and Shackelford, T. K. (2001). Poaching, promiscuity, and deceit: Combating mating rivalry in same-sex friend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 407-424.
- Brantley, A., Knox, D., and Zusman, M. E. (2002). The when and why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saying "I Love You"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36, 614-615.
- Buss, D. M. (1988a). From vigilance to violence: Tactics of mate retention.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9, 291-317.
- . (1988b). Love acts: The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love. In R. Sternberg and M.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89).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mate preferences: Evolutionary hypotheses testing in 37 cultur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 1-49.
- . (2000). *The Dangerous Passion: Why Jealousy Is as Necessary as Love and Sex*. New York: Free Press.
- . (2003). *The Evolution of Desire: Strategies of Human Mating*, rev.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 (2005). *The Murderer Next Door: Why the Mind Is Designed to Kill*. New York: Penguin.
- Buss, D. M., Abbott, M., Angleitner, A., Asherian, A., Biaggio, A., et al. (1990). International preferences in selecting mates: A study of 37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1, 5-47.
- Buss, D. M., and Haselton, M. G. (2005). The evolution of jealous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9, 506-507.
- Buss, D. M., and Schmitt, D. P. (1993).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human mat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204-232.
- Campbell, J. C. (1992). "If I can't have you, no one can": Power and control in homicide of female partners. In J. Radford and D. E. H. Russell (eds.), *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 pp. 99-113. New York: Twayne.
- Claypool, H., and Sheets, V. (1996, June). Jealousy: Adaptive or destructiv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 Evanston, Ill.
- Easteal, P. W. (1993). *Killing the Beloved: Homicide Between Adult Sexual Intimates*.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 Ellis, H. (1928).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2, chap. 11. London: Heinemann.
- Fisher, H. (2004). *Why We Love: The Nature and Chemistry of Romantic Love*. New York: Henry Holt.
- Frank, R. (1988). *Passions Within Reason*. New York: Norton.

- Gangestad, S. W., and Thornhill, R. (1997).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extrapair sex: The role of fluctuating asymmetr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8, 69-88.
- Greenfeld, L. A., Rand, M. R., Craven, D., Klaus, P. A., Perkins, C. A., Ringel, C., Warchol, G., Maston, C., and Fox, J. A. (1998). *Violence by Intimates*, NCJ-167237.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Greer, A., and Buss, D. M. (1994). Tactics for promoting sexual encounter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 185-201.
- Greiling, H., and Buss, D. M. (2000). Women's sexual strategies: The hidden dimension of extra-pair mat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 929-963.
-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 and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52.
- Haselton, M., Buss, D. M., Oubaid, V., and Angleitner, A. (2005). Sex, lies, and strategic interference: The psychology of deception between the sex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3-23.
- Hogbin, H. I. (1938). Social reaction to crime: Law and morals in the Schouten Islands, New Guine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68, 223-262.
- Jankowiak, W. (ed.). (1995). *Romantic Passi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ankowiak, W., and Fischer, E.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31, 149-155.
- Kanin, E. J., Davidson, K. D., and Scheck, S. R. (1970). A research note on male-female differentials in the experience of heterosexual lov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6, 64-72.
- Lundsgaarde, H. P. (1977). *Murder in Space Cit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Houston Homicide Patterns*, pp. 60-6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digan, N. (2003, February 13). Trial in killing of orthodontist goes to jury. *New York Times*, p. A25.
- Mathes, E. W. (1986). Jealousy and romantic love: A longitudinal study. *Psychological Reports*, 58, 885-886.
- . (1991). *Jealousy: The Psychological Dat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Mullen, P. E., and Martin, J. (1994). Jealousy: A community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4, 35-43.
- Muller, W. (1917). *Yap*, vol. 2, part 1. Hamburg: Friederischesen.
- Oliver, M. B., and Hyde, J. S. (1993).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xuality: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4, 29-51.
- Pines, A. M. (1998). *Romantic Jealousy: Causes, Symptoms, Cures*. New York: Routledge.
- Pietrzak, R., Laird, J. D., Stevens, D. A., and Thompson, N. S. (2003).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jealousy: A coordinated study of forced-choice, continuous ratings-scale,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n the same subject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3, 83-94.
- Riggs, D. S. (1993). Relationship problems and dating aggression: A potential treatment targe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8, 18-35.

- Sagarin, B. (2005). Reconsidering evolved sex differences in jealousy: A comment on Harris (2003).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9, 62-75.
- Saran, A. B. (1974). *Murder and Suicide Among the Munda and the Oraon*. Delhi: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Schmitt, D. P. (2005). Sociosexuality from Argentina to Zimbabwe: A 48-nation study of sex, culture, and strategies of human mating.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247-311.
- Schutzwahl, A., and Koch, S. (2004). Sex differences in jealousy: The recall of cues to sexual and emotional infidelity in personally more and less threatening context condition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5, 249-257.
- Sprecher, S., Aron, A., Hatfield, E., Cortese, A., Potapova, E., and Levitskaya, A. (1994). Love: American style, Russian style, and Japanese styl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49-369.
- Sugiyama, L. (2005).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adaptationist perspective. In D. M. Buss (ed.),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Hoboken, N.J.: Wiley.
- Symons, D. (1979).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iorst, J. (1998). Confessions of a jealous wife. In G. Clanton and L. G. Smith (eds.), *Jealousy*, 3rd ed., pp. 17-24.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Wilson, M., and Daly, M. (1992). Till death do us part. In J. Radford and D. E. H. Russell (eds.), *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 pp. 83-98. New York: Twayne.
- . (1998). Lethal and nonlethal violence against wives and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male sexual proprietariness. In R. E. Dobash and R. P. Dobash (ed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199-230.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爱情的内驱力： 择偶的神经机制

海伦·费希尔 (Helen Fisher)

“自从开天辟地，你就是为我而生，我也是为你而活，我决不让你走。”张白对他的爱人美兰说（林语堂，1954，p.73）^①。中国人依然对12世纪的《碾玉观音》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传奇故事广为传唱。4000多年前的苏美尔诗歌中记载，杜穆兹（Dumuzi）对依楠娜（Inanna）宣誓：“我的爱人，是我眼中的光芒。”（Wolkstein, 1991, p.51）南阿拉斯加州一位不知名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爱你之痛犹如火焰刺穿我的身体。”（Hamill, 1996）

帕里斯和海伦、俄耳甫斯与欧律狄柯、阿伯拉和埃勒维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希瓦和赛缇、嫫拉和摩君……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中东地区、日本、中国、印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留下了许多书面和口头记录的浪漫情诗、情歌以及爱情故事。人类学家对166种不同文化

^① 《碾玉观音》剧中人的原名为崔宁与秀秀，但林语堂为何将这部宋代话本翻译为英文时采取了两个新杜撰的名字“Chang Po”与“Meilan”，我们不得而知。——译者注

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在147种文化中有浪漫之爱的资料（Jankowiak & Fischer, 1992），且没有发现否定资料。在其余的19种社会文化中，学者们未能查到有关人们浪漫之爱的资料。

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问道：“爱情是什么？”从古希腊到当代，无数的学者提出了关于爱情成分和爱情风格的诸多理论（Lee, 1988; Fehr, 1988; Aron & Westbay, 1996; Hatfield & Sprecher, 1986; Critelli, Myers, & Loos, 1986; Hendrick & Hendrick, 1986; Zick, 1970; Hazan & Shaver, 1987; Sternberg, 1986）。爱情无疑是一部变奏曲。然而，神经科学家认为基本的人类情感和动机是由不同的神经活动系统产生的，这种网络系统源于哺乳动物的始祖（Davidson, 1994; Panksepp, 1998）。这一章主要从神经学的角度探讨爱情，它不是要解释在儿童期形成的特殊的爱的方式，也不是要解释为什么个体选择这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它所研究的是爱情的神经机制，尤其是浪漫之爱的神经机制。

心理学研究表明，浪漫之爱与一些独立的情绪、动机和行为有关（Leibowitz, 1983; Hatfield & Sprecher, 1986; Tennov, 1979; Harris, 1995）。在浪漫之爱中，个体首先把另一个人看做是特殊的，甚至是唯一的，然后会高度关注他（她）所喜爱的这个人，夸大爱人的优点，而忽略或缩小他（她）的缺点。爱人们感到精力充沛、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冲动、精神欢快，情绪起伏不定。他们是目标导向的，并有强烈的动机以赢得所爱的人。逆境会增强他们的激情，就像我们所知道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或者说是“挫折吸引力”（Fisher, 2004），恋人们在感情上会变得彼此依赖，他们会重新做出安排，把自己和爱人的联系作为每天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当分开的时候会感到分离焦虑。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恋爱感到强烈的移情作用，许多人宣称他们甚至可以为爱人去死。

浪漫之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侵入性思维”。恋人们着迷似的想念他们心爱的人，他们渴望和他们的爱人达到情感上的最佳结合。2500年前，柏拉图在《会饮篇》里提到这一点，他说上帝的爱“生活在需要的状态中”。受爱情冲击的人会有强烈的性欲，并想强烈占有他们所爱的人。然而，他们对情意相通的渴望取代了性接触的欲望，结果，失恋的人经常变得反常，甚至采取一些危险

的举动以夺回他们的爱人。许多被抛弃的情人因被遗弃而狂怒、意志消沉，结果造成绝望、沮丧、自暴自弃、悲观的情绪（Fisher, 2004）。最后，浪漫之爱是无意识的、难于控制的和非永久的（Tennov, 1979; Hatfield & Sprecher, 1986; Harris, 1995），就像维奥莱塔在威尔第的悲剧歌剧《茶花女》中所唱的那样，“让我们独自快乐地生活吧，因为爱情会像花儿一样迅速凋谢”。

为了进一步确定上面所讲的这些特征是准确的，我在一份关于浪漫之爱的问卷中对这些特征做了调查，437名美国人和402名日本人完成了这份问卷。结果表明浪漫之爱并不随着年龄、性别、性取向和种族的变化而出现明显的变化。例如，超过45岁的被试和不足25岁的被试在82%的题目上都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美国男性和女性在87%的问题上的回答是相似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的被试在86%的问题上回答相似，美国白人和其他种族的美国人在82%的问题上回答相似。即使上面的这些群组在他们的反应中表现出统计学上的差异，通常是一组比另一组更有激情。其中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差异最大，在43个问题中，他们对绝大部分题目的回答都表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很小，而且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十二个问题似乎也可以用文化来解释（Fisher, 2004）。

世界诗歌、神话、传说和许多人类学、心理学的报告，以及这份调查问卷表明浪漫之爱在全人类是普遍的（Jankowiak & Fisher, 1992; Fisher, 1998; Hatfield & Rapson, 1996）。事实上，我开始相信浪漫之爱是三个分离而又相互关联的情绪/动机系统之一，所有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发展进化出这个系统以支配其求偶、交配、生殖和养育。另外两个是性驱力和依恋系统。每个脑系统与不同的感情和行为有关；每一个系统都对应着不同系列的神经结构；三种系统互动，形成许多连结，产生与所有形式的爱情相关的一系列情绪、动机和行为（Fisher, 2004）。

性欲、吸引力和依恋：爱情的三个脑系统

性驱力（力比多或性欲）的特点是渴望性满足；它通常指向许多伙伴。在哺乳动物中，性驱力主要与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有关；在人类中，雄性激素（尤其是睾丸激素）对男性和女性的性欲都非常重要（Sherwin, 1994；Van Goozen, Wiegant, Endert, Helmond, & Van de Poll, 1997）。人类性唤醒的fMRI研究表明性驱力和特定的脑网络系统的激活有关（Arnow, Desmond, Banner, Glover, Solomon, Polan, Lue, & Atlas, 2002；Beauregard, Levesque, & Bourgouin, 2001；Karama, Lecours, Leroux, Bourgouin, Joubert, & Beauregard, 2002；Tiihonen, 1994）。这些激活的网络系统并不相同，其中有下丘脑（Arnow et al., 2002；Beauregard et al., 2001；Karama et al., 2002）和杏仁核（Beauregard et al., 2001；Karama et al., 2002）。

吸引力（哺乳动物/鸟类和人类浪漫之爱相似）的特征是精力充沛、对特定配偶的极大关注、执著的追求、亲密的动作、占有式的配偶保护以及得到所偏爱的交配对象的动机（Fisher, Aron, Mashek, Strong, Li, & Brown, 2002, 2002 a；Fisher, 2004）。在人类中代表动物吸引力的高级形式有浪漫之爱、占有之爱、激情之爱或彼此相爱。最近的资料表明这一脑系统主要与脑的奖赏通路中的多巴胺活性增强有关，它还很可能与中枢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增强、中枢5-羟色胺的活性抑制有关，以及其他脑系统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系列与浪漫之爱有关的情绪、动机、认知和行为（Fisher, 1998, 2004；Fisher et al., 2002, 2002 a）。

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依恋的特征是对共有领地的防卫和/或筑巢、共同喂食、互相理毛、保持亲密、分离焦虑、双亲分担家务杂事以及亲和行为（Carter, DeVries, Taymans, Roberts, Williams, & Getz, 1997；Lim, Murphy, & Young, 2004；Lim & Young, 2004）。在人类中，伙伴依恋被认为是伴侣之爱（Hatfield, 1988, p. 191），人类依恋具有上述所提到的哺乳动物的特征，同时还有稳定性、安全感、社会性的慰藉以及与长期配偶之间的情感维系。动物研

究表明这一脑系统主要与伏隔核和腹侧苍白球中的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有关 (Lim et al., 2004; Lim & Young, 2004)。

每一个重要的脑系统在求偶、交配、生殖和养育中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 (Fisher, 1998, 2004; Fisher et al., 2002, 2002a)。性驱力促使我们的祖先在一系列合适的伴侣中寻求性交对象；吸引力（以及发展的人类形式——浪漫之爱）激发个体从可能的配偶中选择一个更喜欢的个体，并在这个喜爱的交配对象上集中精力，从而保存求爱时间和精力；依恋主要激发个体和生殖伴侣维持足够长的附属关系以完成特定物种的双亲职责。而且，这三个脑系统以各种方式互动，以支配与人类繁衍有关的行为、情绪和动机。

浪漫之爱的 fMRI 研究

为了研究人类浪漫之爱的生物学基础，我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同事露西·L·布朗 (Lucy L. Brown)、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亚瑟·阿隆 (Arthur Aron) 以及石溪分校的研究生格雷格·司昂 (Greg Strong) 和黛布拉·马舒克 (Debra Mashek) 对处于热恋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做了一项神经成像研究 (Fisher et al., 2003; Aron, Fisher, Mashek, Strong, Li, & Brown, 2005)。我的假设是浪漫之爱这一现象与中枢多巴胺和/或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增强以及中枢 5-羟色胺的活性降低有关 (Fisher, 1998)。

研究者使用 fMRI 技术，对正在恋爱的 10 名男性和 7 名女性进行了数据收集，被试年龄从 18 岁到 26 岁不等。他们平均恋爱的时间为 7.4 个月（中位数为 7；全距为 1—17 个月）；每一个被试看其爱人的照片和一张情绪中性的熟人照片，每看完一张照片后面都紧接着一个干扰任务，以缓解强烈的情绪。这个干扰任务是进行心算，从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如 9471）向后数，每次增加 7。基本程序包括：（1）正性刺激（30 秒）；（2）心算任务（40 秒）；（3）中性刺激（30 秒）；（4）心算任务（20 秒）。这一程序（或者顺序颠倒）要重复六次，实

验大约持续 12 分钟。

当看心爱的人的照片时有几个脑区被整体激活，其中最明显的是右部腹侧被盖区 (VTA) 和尾状核后背体及背尾部的活动 (Fisher, Aron, Mashek, Strong, Li, & Brown, 2003; Aron et al., 2005)。被激活的 VTA 含有丰富的能够产生多巴胺的细胞，并且这些细胞能将多巴胺输送到很多脑区，包括尾状核。此外，VTA 是大脑“奖赏系统”的中枢 (Schultz, 2000; Martin-Solech, Leenders, Chevalley, Missimer, Kunig, Magyar, Mino, & Schultz, 2001; Breiter, Gollub, Weisskoff, Kennedy, Makris, Berke, Goodman, Kantor, Gastfriend, & Riorden, 1997)，这一神经网络系统和快乐、普遍唤醒、集中注意以及寻求获得奖赏的动机有关 (Schultz, 2000; Delgado, Nystrom, Fissel, Noll, & Fiez, 2000; Elliott, Newman, Longe, & Deakin, 2003)。尾状核也与动机和目标导向的行为有关，同时，它在多巴胺能的奖赏系统内居于中心位置 (Martin-Soelch et al., 2001; Schultz, 2000)。

巴杜斯和扎奇也使用 fMRI 对 17 位自称正在“真正地、深深地、发狂地恋爱”的男女的脑活动情况进行了研究 (Bartels & Zeki, 2000, p. 3829)。然而，在这一研究中，被试报告的恋爱时间平均为 28.8 个月，比前一个研究的恋爱时间更长，这些被试恋爱的强度更小。因为我们的被试和巴杜斯与扎奇的被试在接受脑部扫描前都做了相同的问卷，即热恋指数量表 (Hatfield & Sprecher, 1986)，因此证实 (偶然发现的) 了上面所提到的被试差别。巴杜斯和扎奇 (2000, 2004) 的研究也发现背部尾状核和腹侧被盖区被激活。

上面的资料表明浪漫之爱的特征如集中注意、动机、目标导向行为与中枢多巴胺的活性增强有关。因为多巴胺的特殊活动与心醉神迷、精力旺盛、失眠、情绪波动、情感性依赖和渴望也有关 (见 Fisher, 1998)，因此很可能多巴胺对浪漫之爱的这些方面也起作用。

也许还涉及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增强以及中枢 5-羟色胺的活性减弱，尽管目前我只能得出一些推论性的证据。由交感神经系统分泌的去甲肾上腺素会

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以及产生其他的生理反应，这些现象是浪漫之爱所常见的（Fisher, 1998, 2004）。最近科学家研究了血小板中5-羟色胺载体的浓度：一共60个被试，其中20人的恋爱时间为6个月，20人患有强迫症（OCD），并没有用药物治疗，20人为没有恋爱的正常（对照组）被试（Marazziti, Akiskal, Rossi, & Cassano, 1999）。那些恋爱的被试和患有强迫症的被试血小板中5-羟色胺载体的浓度明显较低，因此身体（也可能是大脑）里5-羟色胺的活动减弱可能导致恋人们出现强迫性思考和冲动。

爱情的驱力

心理学家对情绪和动机做出了区分，这两者都是指向计划和寻求特殊需要与要求的脑系统。亚瑟·阿伦认为浪漫之爱不是一种情绪系统，而是使求婚者和所喜欢的恋爱对象建立并维持亲密关系的动机系统（Aron & Aron, 1991; Aron et al., 1995）。因为上面所提到的实验表明这种激情与VTA和尾状核的活动有关，因此阿伦的假设很可能是对的：动机和目标导向的行为是浪漫之爱的核心。这些发现给予我们启示，即浪漫之爱主要是动机系统——一个基本的交配驱动力（Fisher, 2004）。

道尔顿·普法夫把驱力定义为一种神经状态，它能激发和指导行为获取特殊的生物需要，进行生存或繁殖（Pfaff, 1999, pp. 7, 40）。浪漫之爱和基本内驱力有很多共同的特点：（1）像所有的内驱力一样，浪漫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烈的，情绪的消减和变化则要迅速得多；（2）浪漫之爱集中于一个特殊的奖赏（如所爱的人），而情绪集中于一系列现象，比如高兴和厌恶；（3）浪漫之爱并不伴随着某种特殊的面部表情，而所有基本的情绪都有典型的面部表情；（4）像所有的内驱力一样，浪漫之爱难以控制。例如，和生气相比，口渴更难控制；（5）和所有基本的内驱力一样（Pfaff, 1999），浪漫之爱和中枢多巴胺的活性增强有关。

内驱力是一个连续体 (Fisher, 2004)。比如说像口渴和温暖的需要, 在满足之前很难被消除, 而性驱力和母性的本能则会被改变方向, 恋爱似乎接近于这一连续体。比如说, 浪漫之爱比性驱力要强烈得多, 那些在性上被拒绝的人很少会自杀或杀人; 而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失恋会导致自杀或杀人, 很多人变得抑郁消沉。在一项研究中, 有 114 个在过去的八周内失恋的美国人, 其中 40% 的人被临床诊断为抑郁; 12% 的人从普通的抑郁转变为严重抑郁 (Mearns, 1991)。因为浪漫之爱是一种普遍和有力的人类交配内驱力, 所以它肯定是进化的结果。

浪漫之爱的进化: “配偶选择”的神经网络

自从达尔文 (1859, 1871) 提出用性选择的概念来解释鸟类和哺乳动物中的性模式以来, 科学家们描述了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发展形成了一些潜在地吸引配偶的一些身体特征和行为特征 (Andersson, 1994; Miller, 2000)。孔雀尾部的羽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脑中的显示选择器可以对这些特征做出反应, 从而开始喜欢一个特定的个体, 并把他或她的求爱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这一特定的同种对象身上, 但是其对应的脑机制并没有确定 (Fisher et al., 2002, 2002 a; Fisher, 2004)。

虽然所有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都会表现出择偶偏好, 交配却没有什麼差别。交配选择的现象在自然界中是非常普遍的, 行为学文献中经常使用一些术语来描述它, 包括个体偏好、偏爱、雌性选择、性选择、选择性的认知力和吸引力。在大多数哺乳类和鸟类物种中, 这种择偶偏好是非常短暂的。例如, 老鼠的求爱行为通常只会持续几秒钟; 大象通常持续三到五天; 狐狸大约持续两周 (Fisher, 2004)。但是, 所有的物种表现出相似的吸引力特征。在这些特征中, 具有吸引力的个体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喜欢的交配对象上, 并表现出精力旺盛, 强迫追随, 失眠, 食欲不振, 占有式的配偶呵护, 如轻拍、抚

摸、拥抱的亲密求爱姿态，目标导向的求爱行为以及得到这个特定个体的强烈动机（Fisher, 2004）。所有的这些特征同时也是人类浪漫之爱的典型特征。而且，许多人会立即表现出这一两性吸引力，这可能是人类一见钟情的预兆。

动物研究表明择偶偏好（或吸引力）与中枢多巴胺的活性增强有关，这是和人类浪漫之爱另一相似之处。当一只实验室饲养的雌性草原田鼠和一只雄性田鼠交配时，雌鼠对雄鼠会形成特殊的偏好，作为大脑奖赏系统的伏隔核中的多巴胺增加了50%（Gingrich, Liu, Cascio, Wang, & Insel, 2000）。如果在雌性老鼠的伏隔核中注入多巴胺抗体，这只雌性老鼠就不再喜欢这个配偶；如果给雌性老鼠注入多巴胺拮抗剂，她就会喜欢注入拮抗剂时在场的雄性老鼠，即使她并没有与这只雄性老鼠发生交配行为（Gingrich et al., 2000；Wang, Yu, Cascio, Liu, Gingrich, & Insel, 1999）。在雌性绵羊中也发现了交配吸引与中枢多巴胺的增加有关（Fabre-Nys, 1998）。

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吸引力系统很可能和人类有着相同的进化原因（即适应），它使个体选择一个特殊的配偶，由此保存宝贵的求爱时间和精力（Fisher, 1998, 2004；Fisher et al., 2002, 2002a）。然后，在原始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哺乳动物择偶偏好的神经机制发展成为人类浪漫之爱。这一过程可能追溯到350万年以前，并伴随着原始人类一夫一妻制的进化（Fisher, 1992；Reno, Meindl, McCollum, & Lovejoy, 2003），在大约200万年以前人类形体逐渐成形，大脑开始表现出一些人类特有的特征（Fisher, 2004）。

失恋的生物学

为了了解一系列与人类浪漫之爱相关的情绪、动机和行为，我和同事进行了另一项fMRI研究，这是关于失恋的研究。我们使用fMRI技术对10名女性和5名男性进行了研究，他们仍然沉浸在浪漫之爱中，实际已失恋。研究过程和研究幸福恋爱的被试的研究过程大致相同，失恋的被试交替地观看抛弃他或

她的爱人的照片和一张中性情绪的熟人照片，中间夹着一个注意分心任务。

关于积极—中性对比的初步分析表明在右侧伏隔核/腹侧壳核/苍白球，外侧眼眶前额皮质和岛叶/盖皮质区有显著的组间效应（Fisher et al., 2005）。

其他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选择有巨额收益或巨额损失的高风险投资（Kuhnen & Knutson, 2005）或期望有金钱报酬（Zald, Boileau, El-Dearedy, Gunn, McGlone, Dichter, & Dagher, 2004）时，我们发现在实验中有活性的伏隔核/腹侧苍白球/壳核区会变得更活跃。这一区域也是多巴胺奖赏系统的组成部分（Gingrich, Liu, Cascio, Wang, & Insel, 2000）。我们在实验中发现有活性的岛叶/盖皮质与皮肤、肌肉疼痛和焦虑有关（Schreckenberger, Siessmeier, Viertmann, Landvogt, Buchholz, Rolke, Treede, & Bartenstein, 2005）。我们发现有活性的眼眶前额皮质与“心理理论”（人类对某些想法和意图进行思考的能力）有关（Vollm, Taylor, Richardson, Corcoran, Stirling, McKie, Deakin, & Elliott, 2006）；这一脑区还与评价惩罚者（Kringelbach & Rolls, 2004）、适当的行为调节（Ridderinkhof, Van den Wildenberg, Segalowitz, & Carter, 2004）、强迫性行为（Evans, Lewis, & Iobst, 2004）以及控制愤怒（Goldstein, Alai-Klein, Leskovjan, Fowler, Wang, Gur, Hitzmann, & Volkow, 2005）有关。

这些结果表明多巴胺奖赏系统在刚失恋的男性和女性中仍然活跃，只是激活的精确区域有所不同。这些初步的结果还表明当一个人被所爱的人拒绝时，那些与高风险投资、身体疼痛、强迫性行为、对拒绝者的目的和行为耿耿于怀、评估决策和情绪调节有关的神经区域活性增强。

我们的研究是对失恋的第二个研究，即纳吉布及其同事（Najib et al., 2004）对九名刚失恋的“很悲伤的”女性进行的研究。初步的比较并没有发现有共同之处；事实上，在一些我们发现激活的区域，他们却发现去激活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被试都报告说他们仍很生气并期望和解，而纳吉布等人研究的被试大都报告说她们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我推测我们的被试处在失恋最初的抗议阶段，而纳吉布的被试处于后来的放弃/绝望阶段。

抗议：失恋的最初阶段

刘易斯、阿米尼和兰农把失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抗议阶段和放弃/绝望阶段（Lewis, Amini, & Lannon, 2000）。在抗议阶段，被抛弃的人表现出旺盛的精力、提高的警戒性和挽回心爱之人的强烈动机。精神病学家推论，这一“抗议反应”是由哺乳动物对任何社会关系破裂所做的基本反应进化而来的。而且，他们认为这一抗议反应与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增强有关，这些神经递质很可能提高警戒性、精力和动机，正如那些被抛弃的人所表现的那样，以期寻求帮助和寻回遗弃他们的人，通常是他们的母亲。

我们对失恋者的研究资料初步证明刘易斯、阿米尼和兰农的假设是正确的：多巴胺奖赏通路的激活很可能与失恋最初的抗议阶段有关。我们的结果还可能有助于解释“挫折吸引”——为什么失望的恋人开始更加充满激情地爱着拒绝他们的人（Fisher, 2004）。当一个奖赏延迟来临时，期待奖赏的神经元延长了它们的活性（Schultz, 2000），而多巴胺奖赏系统的活性与强烈的浪漫之爱有关。这一挫折吸引的现象似乎是不利于适应的，但是多巴胺所产生的旺盛精力、集中的注意力、强烈的动机以及目标导向的行为是重新夺得心爱之人的有用的生物学工具（Fisher, 2004）。

在抗议阶段，失恋者通常会体验“被遗弃的愤怒”（Meloy, 1998, 1999），这可能是与多巴胺奖赏系统有关的另一个特征。初步的愤怒系统有通向期望奖赏的前额皮质的通道（Panksepp, 1998）。动物研究表明这些奖赏和愤怒回路是紧密联系的。例如，当你爱抚一只小猫时，它会表现出快乐；当你取消这一刺激时，它通常会咬人（Panksepp, 1998），这是对没有实现的期望所做出的反应，通常称为“挫折攻击”。我们实验中被拒绝的失恋者的资料表明与这种愤怒反应有关的神经区域是外侧眼眶前额皮质，它和控制愤怒有关。

这些关于失恋的fMRI研究还表明遗弃愤怒和浪漫之爱的脑机制协力作用，生物学的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当前的行为研究。埃利斯和马拉缪特（Ellis & Malamuth, 2000）报告说失恋的男性和女性对拒绝他们的伴侣会感到非常愤

怒，但同时又深爱着他或她。而且，爱和憎恨有一些相似的行为，比如集中注意力、强迫性思维、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情绪、动机、渴望（Fisher, 2004）。所以，这些资料表明爱情的对立面并不是憎恨，很可能是漠不关心。像挫折吸引一样，遗弃愤怒似乎也具有适应不良的特征，比如心脏压力增加、血压升高、免疫系统受到抑制（Dozier, 2002）。但是它可能使被抛弃的情人迅速结束这一陷入绝境的关系，这样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开始恋爱，重新获得生殖优势（Fisher, 2004）。遗弃愤怒还激发人们去争夺他们后代的福利，这在离婚诉讼程序中经常可以看到（Fisher, 2004）。

放弃 / 绝望：失恋的第二个阶段

失恋的第二个阶段是放弃 / 绝望，这与皮层下多巴胺通路的活性降低有关。我推测这可能有三个原因。首先，一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猴子意识到所期待的奖赏永远不可能得到的时候，中脑制造多巴胺的细胞活性降低（Schultz, 2000）。第二，最近对刚刚失恋的女性所进行的一项 fMRI 研究（Najib et al., 2004, p. 2253）表明，背侧尾状核的活性降低，这一脑区富含多巴胺的受体。最后，长期压力会抑制多巴胺和其他单胺类的活性，从而产生沮丧、失望和抑郁情绪（Panksepp, 1998），而这些正是被抛弃的和意志消沉的情人的特征。

这一绝望的反应似乎也会起反作用。但是，科学家认为抑郁的高代谢成本实际上正是它的好处。他们推测抑郁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信号，它表明某些事情确实不妥当，所以它激励朋友和亲属在失恋者有强烈需要时支持他们（Hagen, Watson, & Thomson, 出版中）。抑郁也会激发一个人的洞察力（Watson & Andrews, 2002），头脑清醒可能会促进失恋者做出艰难的决定以促进繁殖的成功（Nesse, 1991）。

爱会伤人。最近的一项神经成像研究表明由社会排斥所引起的情感伤痛和

生理痛苦所激活的一些脑区相同 (Eisenberger, Lieberman, & Williams, 2003)。一些心碎的恋人甚至因为抑郁而引起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死去 (Rosenthal, 2002)。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经受同等程度的失恋之苦。在生命过程中, 个体对于胜任与否形成了不同的情感, 对爱情有不同的期待, 对拒绝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以及不同的应对策略, 从而便于他们在日后失意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Downey & Feldman, 1996; Downey, Freitas, Michaelis, & Khouri, 1998; Leary, 2001)。另外, 还有一些失恋者有更多的择偶机会, 这样的选择会减轻抗议、愤怒和绝望的情绪。

两性在失恋的处理上也表现出一些差异 (Baumeister, Wotman, & Stillwell, 1993; Buss, 1994; Hatfield & Rapson, 1996)。男性因失恋导致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三到四倍 (Hatfield & Rapson, 1996), 他们还很可能偷偷接近拒绝他的恋人, 袭击她或杀掉她 (Meloy, 2001; Meloy & Fisher, 2005)。失恋的女性报告说失恋之后有非常严重的抑郁情绪 (Mearns, 1991; Hatfield & Rapson, 1996), 陷入长期的紧张和沉思 (Nolen-Hoeksema, Larson, & Grayson, 1999)。女性经常谈论她们的创伤, 有时候还会在这个过程中不经意地使自己再次受到伤害 (Hatfield & Rapson, 1996)。

但是, 很少有人能避免失恋带来的痛苦。在一个大学社区的调查中, 93% 的男生和女生报告说他们曾经被他们深爱着的人所抛弃; 95% 的人报告说他们曾拒绝过深爱他们的人 (Baumeister et al., 1993)。这些失恋者遭受着由重要的进化原因而带来的痛苦。被抛弃的情人则浪费了宝贵的求爱时间和新陈代谢的能量; 他们繁衍后代的可能性连同社会联盟、自尊心和幸福都受到了危害。

浪漫之爱：脑系统的联合

上述资料表明, 中枢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与其他神经系统相结合, 以不同的比率对浪漫之爱的各个方面起作用。但是, 这些神经递质也



对其他情绪和动机起作用，它们并不只对浪漫之爱起作用。这是预料之中的。普法夫（Pfaff, 1999）提出所有的驱力都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一般唤醒系统，产生获得任何生物需要的能量和动机；一种是特殊脑系统群，产生与每种特殊的生物需要有关的感情、思维和行为。普法夫报告说，所有驱力的一般唤醒成分都与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以及其他的脑化学物质有关。每种特殊的驱力都与其特定的脑系统群相连。我们的fMRI技术只揭示了浪漫之爱的“一般唤醒”组成成分。

然而，我们在其他一些脑区和通道中发现了激活和去激活现象，它们特定的结合可能是对浪漫之爱起特殊作用的。右前内侧尾状核体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区域（Aron et al., 2005），因为我们在扫描前对幸福恋爱中的被试进行了《爱情指数量表》（Hatfield & Specher, 1986）的测验，那些高分被试的这一脑区活性更强。杏仁核的去激活作用可能也对爱情体验起着重要的作用（Aron et al., 2005；Bartels & Zeki, 2000），还有其他边缘系统和皮层区域的激活和去激活作用。但是，与浪漫之爱相关的思维、情绪和动机可能因个体的不同而出现很大差别，在同一个体身上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因此，可能无法通过群体分析而得出与浪漫之爱相关的整个动态的平行的神经系统。

爱情能持久吗？

然而，这些fMRI实验显示出参与浪漫之爱的一些主要神经传递系统，它们还揭示了强度的持续时间、浪漫之爱的早期阶段。

尼萨（Nisa），是博茨瓦纳的喀拉哈里沙漠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对爱情的轨迹进行了简洁的概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刚擦出爱情的火花，激情燃烧，过一段时间之后，爱情之火渐渐平息下来，接下来就是如何维持的问题。他们仍然彼此爱着对方，但是，这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爱——亲切和可靠的爱。”（Shostak, 1981, p.268）浪漫之爱可以长时间地维持

下去，但是通常会变得平淡，不像开始充满激情（Traupmann & Hatfield, 1981; Wallerstein & Blakeslee, 1995）。早期阶段强烈的浪漫之爱特有的短暂性很可能是一种适应机制。浪漫之爱的新陈代谢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这一脑系统可能进化，以使我们的祖先把求爱时间和交配能量集中到一个首选的偏爱的个体身上，这样有足够长的时间怀孕。然后，这种强烈的激情逐渐衰减，绝大多数的夫妻会把这种感情转向孩子，他们可以一起平静地抚养孩子。

有两项研究探讨了浪漫之爱早期阶段的强度变化轨迹。其中一项研究是关于5-羟色胺递质中血小板的密度，结果表明浪漫之爱在第12到18个月间的强度比较大（Marazziti et al., 1999）。我们对长期维持幸福爱情关系（7到18个月）的个体进行了被试间分析，显示了这种热情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之所以开始进行这两项研究，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研究中那些幸福恋爱的被试与巴特尔斯、扎奇研究中的被试相比，表现出一些不同的脑激活模式。但是，如先前提到的那样，我们的被试恋爱时间平均为7.4个月，而巴特尔斯和扎奇研究中的被试的恋爱时间平均为28.8个月。所以，我们单独分析了我们研究中幸福恋爱关系比较长的被试，结果表明这些被试的脑激活模式和巴特尔斯、扎奇研究中的被试非常相似（Aron et al., 2005），特别是前扣带皮层和岛叶皮层的活动。这些资料表明在爱情过程中认知和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浪漫之爱：一种成瘾？

这些关于浪漫之爱的fMRI研究给医学和法律社会及个体提供了一些启示。对于他们来说，浪漫之爱非常容易上瘾。因为浪漫之爱有集中的注意、精神欣快、渴望、强迫观念、强迫性冲动、歪曲现实、个性改变、情绪和身体依赖、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行为、容忍、戒断症状、旧病复发、失去自我控制等特征，因此心理学家一度把它视为一种嗜好（Peele, 1975; Carnes, 1983; Halpern, 1982; Tennov, 1979; Hunter, Nitschke, & Hogan, 1981; Mellydy, Miller, & Miller, 1992; Griffin-Shelley, 1991; Schaeff, 1989; Findling, 1999）。上述对浪漫之

爱的 fMRI 研究支持这一假设。那些沉浸在幸福爱情中的被试在与可卡因快感相关的区域表现出相同的神经活动，而那些失恋之人的神经活动与那些冒着极大危险进行赌博的人的神经活动一样。

其他研究也支持了浪漫之爱 and 上瘾之间可能存在的平行关系。巴特尔斯和扎奇比较了幸福相爱的被试和那些被注射可卡因或鸦片的被试的脑扫描图，发现其中一些相同的脑区被激活 (Bartela & Zeki, 2000)。另外，对动物 (David, Segu, Buhot, Ichaye, & Cazala, 2004; Duffy, 1998; Wise & Hoffman, 1992) 和人类 (fMRI) (Breiter et al., 1997) 进行的可卡因成瘾研究表明吸毒成瘾与 VTA (腹侧被盖区) 有关，而浪漫之爱也与这一脑区有关。最后，对巧克力的需求渐减 (厌恶) 与 VTA 的活性降低也有关 (Small, Zatorre, Dagher, Evans, & Jones-Gotman, 2001)。外行认为通常有五种主要的生理成瘾：食物、酒精、药物、赌博和尼古丁。浪漫之爱可能是另外一种成瘾。

浪漫之爱中的个体差异

这些 fMRI 的资料还表明，为什么一些人的爱情比另一些人更有规律或更有激情。毫无疑问，一个人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的经历会对其产生影响。但是，多巴胺和 5-羟色胺的基线水平由特殊的基因所支配，这些基因是多形态的；在这些神经递质系统中会产生个体差异 (Gibbons, 2004; Lesch, Bengel, Heils, Sabol, Greenberg, Petri, Benjamin, Muller, Hamer, & Murphy, 1996)。人们会遗传这些潜在的生物倾向，因此，一些男性和女性与其他人相比，会更容易陷入爱情或更富有激情。

一个人的习惯和疾病也会影响他对浪漫之爱的生物敏感性。例如，每天服用药物会改变其大脑奖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改变的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或几年 (Nestler, 2001)。而且，精神分裂症、帕金森氏病和其他疾病会改变多巴胺的通道，甚至环境和社会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对浪漫之爱的感受性。比

如，新奇的境遇会刺激一个人的浪漫感觉（Norman & Aron, 1995; Aron & Aron, 1996; Dutton & Aron, 1974），这很可能是因为新奇（危险）性增强了中枢多巴胺的活性（Fisher, 2004）。

但是，对于为什么我们和这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产生爱情这个问题，上述 fMRI 研究没有做出任何解答。“什么激活了这一脑系统”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和社会因素的支配。其中时机起到重要作用，当人们有心理准备的时候更容易陷入爱情（Hatfield, 1988）。亲近能够促使爱情产生火花（Pines, 1999）。就像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所写的“当她在身边时会发出巨大的魔力”。大部分男性、女性会和自己各方面差不多的人恋爱，比如相同种族、社会、信仰、教育和经济背景，相似的外表魅力、智力水平、态度、前景期望、价值观和兴趣以及有着相似的社会和交往技能（Rushton, 1989; Laumann, Gagnon, Michael, & Michaels, 1994; Pine, 1999; Buston & Emlen, 2003）。人们通常被那些符合他们的爱情模板或地图的人所吸引（Fisher, 2004），珍特拉（Zentner, 2005）称之为个体理想配偶的个性观念。这一爱情模板无意识地列出了个体要寻找的完美伴侣应该具有的特性。当个体长大后，爱情模板也会随之发展，并会变得越来越精细。

生物学也会影响我们寻找有魅力的人。人们往往会爱上那些有点神秘的人，可能部分是因为新奇性增强了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女性更容易被具有不同免疫系统的男性所吸引（Wedekind et al., 1995），这一进化机制可能发展进化为繁衍更多种类的后代。像许多动物一样，人们也更容易被那些外表看似匀称的人所吸引（Gangestad & Thornhill, 1997）。科学家记录了从 21 岁至 35 岁的异性恋男性在观看具有匀称面貌的女性时的脑活动情况，他们的腹侧被盖区被激活（Aharon et al., 2001）。我推测科学家会找到人容易被特殊个体所吸引的生物学机制。

但是，到底是这些环境和生物刺激激发了与浪漫相关的脑回路，还是浪漫的脑回路为何刺激一个人对特殊的个体产生爱情的火花，这一问题尚未确定。上述的 fMRI 资料并不能解决脑和心理孰因孰果的形而上学问题。

性欲、浪漫和依恋：交互作用

不管怎样，从这些 fMRI 研究中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三个基本的求偶驱力（性欲、浪漫的爱和依恋）之间的精神生物学方面的交互作用。

那些疯狂坠入情网的人，通常会发现他们所爱的人拥有巨大的性吸引力，浪漫之爱和性驱力之间的生物学交互作用可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浪漫之爱有关的多巴胺能刺激产生一连串的反应，包括释放睾丸激素，这是有关性欲的荷尔蒙（Wenkstern, Pfaus, & Fibiger, 1993; Wersinger & Rissman, 2000; Szezyпка, Zhou, & Palmiter, 1998; Hull, Du, Lorrain, & Matuszewick, 1997）。事实上，多巴胺活性增强通常会增加一个人的性驱力、性唤醒和性能力（Clayton, McGarvey, & Warnock, 2000; Heaton, 2000; Walker, Cole, Gardner, & Hughes, 1993; Coleman, Cunningham, Foster, Batey, Donahue, Houser, & Ascher, 1999; Ascher, Cole, Colin, Feighner, Ferris, Fibiger, Golden, Martin, Potter, Richelson, & Sulser, 1995）。浪漫之爱与性欲之间的生化联系有一定的进化意义：如果浪漫之爱能够刺激一个人向喜欢的人求爱，它也能激发性驱力，以开始交配过程。

但是，暂时的性行为能激起浪漫的爱情吗？很多思想开放的成人可能和一个朋友或熟人发生性关系，却从来没有爱上他/她，但是，爱情仍可能会发生。尼泊尔土著人把这个称为“Naso pasyo, maya basyo”或“阴茎进来了，爱情来临了”（Ahearn, 2001）。这很可能是因为性活动增加了大脑多巴胺的活性（Damsma, Pfaus, Wenkstern, Phillips, & Fibiger, 1992; Pleim, Matochik, Barfield, & Auerbach, 1990; Yang, Pau, Hess, & Spies, 1996）。事实上，女性更容易对暂时的性伙伴产生爱情，因为精液中含有多巴胺和酪氨酸，它们是多巴胺的组成部分（Bruch & Gallup, 发表中）。性行为也能通过性高潮来刺激依恋感，性高潮能使血液中产生后叶催产素和抗利尿素（后叶加压素），这些神经肽与人的依恋感有关（Carmichael, Humbert, Dixen, Palmisano, Greenleaf, & Davidson, 1987）。

因为这三种主要的交配驱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精神病学家 J. 安德森·汤姆森 (J. Anderson Thomson) 和我都认为，选择性 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 (SSRIs) 能够危害一个人对新奇的对象产生浪漫激情的感觉以及对长期配偶深深的依恋感 (Fisher, 2004; Fisher & Thomson, in press)。这些药物抑制了多巴胺通道，它们还使人的情绪变得迟钝，使人的强迫性思维受到抑制，而这些都与浪漫之爱及其早期阶段有关。70% 的病人在服用后感到性欲下降、性唤醒水平低及缺乏性快感。性快感的缺乏可能会危害对长期伴侣的依恋感。

一个病人的报告也反映了选择性 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对浪漫之爱及依恋感所产生负面的生物学效应，他写道：“在十年中，我经历了两次抑郁症，临床医师建议我一直服用 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令我感动的是，我恢复了健康，但是，我发现原来充满激情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味，我对妻子的浪漫感觉急剧下降。经过临床医师的同意，我逐渐停止了服用药物，我对生活的热情又回来了，我和妻子的浪漫感觉如以前一样强烈。如果需要的话，我准备和抑郁症作另一场斗争，但是在我的例子中，长期药物的副作用使它们不敢再来侵袭。”

这三个脑系统之间复杂而动态的互动表明，任何改变它们之间相互制衡的药物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求爱、交配和养育策略，并最终影响一个人的生殖和遗传可能性。

系列一夫一妻制和 通奸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上述 fMRI 研究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系列一夫一妻制 (serial monogamy) 和暗中的通奸行为。但是，若要讨论这些资料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人类生殖策略的核心要素。

只有 3% 的哺乳动物配对结合在一起来养育它们的后代，人类就在其中。

现在,除了几个国家以外,大约90%的男性和女性在他们年龄之和大约为50岁的时候结婚(Bruce et al., 1995),跨文化资料表明人类主要实行的是社会一夫一妻制,也就是每次和一个单独的配偶形成社会认可的一对夫妻(Fisher, 1992)。尽管人类社会中有84%的文化允许一夫多妻,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文化中,实际上只有大约10%的男性同时拥有两个或多个妻子(Fisher, 1992)。而且,人类一夫多妻通常与等级和财富联系在一起,因此,戴利和威尔逊推测一夫一妻制在史前文化、没有阶层划分的社会中更为普遍(Daly & Wilson, 1983)。事实上,人类学家重新测量了南猿骨骼化石的大小,报告说大约350万年以前男性和女性在性方式上和现代人大致相同。他们推测原始人类生活的社会单位和现代人类相同,这些祖先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Reno et al., 2003, p. 1073)。

人类有时也会不忠。位于芝加哥的国家民意研究中心报告,大约25%的男性和15%的女性在婚姻期间会在一些事情上欺骗对方(Laumann et al., 1994),其他研究表明有30%至50%的已婚男性和女性有婚外情(Gangestad & Thornhill, 1997)。由于报告偏见,学者们可能从未确定过两种性别中通奸的真实概率。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通奸研究却报告了这一事实(Fisher, 1992),可获得的资料表明婚外性行为在其他所有社会中都频繁发生(Frayser, 1985),在许多其他的群居的一雌一雄制物种中也是如此(Fisher, 1992, 1999)。人类睾丸的大小依据人种的主要生殖策略而不同,这表明两性的通奸行为在史前的原始人类中也很普遍(Miller, 2000)。

人类离婚和再婚也受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从1947年到1989年美国人口统计年鉴中选取的58个人类社会的资料表明,离婚高峰通常是在婚后的第四年(Fisher, 1992)。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四年是典型的生产间隔时期,其他许多一雌一雄制生活方式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配对结合的时间只持续到抚养它们的孩子到幼年期为止,我推测跨文化的人类离婚高峰期表现出原始祖先的生殖策略,即两人至少要在孩子婴儿期时一起抚养。

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孩子们在断奶后不久就会加入一个混合的游戏群体，群体中那些年长的同胞和其他亲属会负责照顾他们。所以当孩子断奶以后，两个人仍然要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压力就会变小，除非他们再次怀孕。而且，在原始人类时期离婚很可能有适应性价值：那些与断奶的孩子有关联的实行系列一夫一妻制的人在他们的血统中会产生健康的遗传变种（Fisher, 1992）。

那些不熟悉人类生态学的人往往对这样的进化假设持怀疑态度，我觉得持这种态度的人的目光非常短浅。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学家和许多其他的学者辛辛苦苦地积累了许多关于人类行为以及其他物种中相似动物的资料，运用逻辑科学的推理把这些不同的资料进行整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并能促进评论，从而对人性这一难题发起新的探究。

但是，不管人类进化为系列一夫一妻制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促使人类离婚的生物社会影响是什么（Fisher, 1992），在世界各地拥有经济资源的男性和女性，离婚和再婚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秘密通奸和系列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双重”生殖策略的主要内容，上述对浪漫之爱的fMRI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人类模式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这些fMRI资料表明，浪漫之爱的脑回路与性驱力和依恋的脑回路是不同的。轶事资料支持这一结果：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深深的依恋时，他还可以对其他人有浪漫的激情，同时也可以对很多其他人产生性驱力。这三种交配驱力在生物学方面相对的独立性使我们的祖先选择一夫一妻的方式生活，但同时或接下来他们也在寻找机会通奸（Fisher, 2004）。但是，这三种交配驱力神经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同时期的跨文化模式，比如与伴侣关系不稳定相关的调情、性嫉妒、潜近、配偶虐待、为爱杀人、为爱自杀、临床抑郁。

爱情易变但又永久的特性

爱情是疯狂的。几乎在生命过程的每一阶段这种激情都能够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甚至四岁的孩子和比较年长的人都报告有这种渴望（Hatfield, Schmitz, Cornelius, & Rapson, 1988；Hatfield & Rapson, 1987；Purdy, 1995；Fisher, 2004）。孩子的浪漫之爱会发展进化，推动他们在最重要的生活任务中锻炼，以选择一个合适的交配对象。一个人年纪大的时候仍然很浪漫，会使体质增强、头脑灵活，并提供给爱人友谊、乐观和能量。

因为fMRI技术和其他的研究技术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科学家会证实更多关于孩子和成年人的浪漫之爱。未来的研究也会精确地证实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如何影响浪漫激情的脑活动；一些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帕金森氏病）以及各种成瘾如何影响这一回路；为什么某种人格类型比其他人更易于恋爱；为什么一些人在失恋后体验到较少的痛苦；“谈话疗法”以及“十二步骤”程序如何影响失恋者的脑回路；浪漫之爱的脑机制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种浪漫的激情如何转换为对一个长期伴侣的依恋感；一些夫妻如何在长期的伴侣关系中维持浪漫之爱；新奇的情境、休假、通奸行为、离婚和童年经历以及其他生活情况如何与脑机制互动而影响我们爱谁、什么时候爱、怎样表达爱。未来研究甚至可能帮助我们解释那些似乎和浪漫之爱无关的现代流行的一些疾病。例如，与强烈的浪漫之爱有关的脑系统，可能也会影响一些强迫性疾病的发展和各种成瘾的形成。

古希腊人把浪漫之爱称为“上帝也疯狂”。研究所有种类激情的生物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疯狂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在一项对37种社会的研究中，男性和女性把爱情或者说是相互吸引作为选择配偶的首要标准（Buss, 1994）。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人歌颂爱、祈祷爱、为爱工作、为爱生活、为爱杀人、为爱而死。即使在准备结婚时，人们常常也会产生爱情。没有什么能够消除人类追求爱情的动机。

（黄美玲、邵景进 初译）

参考文献

- Aharon, I., Etcoff, N., Ariely, D., Chabris, C. F., O'Connor, E., and Breiter, H. C. (2001). Beautiful faces have variable reward value: fMRI and behavioral evidence. *Neuron*, 32 (3): 537-551.
- Ahearn, L. M. (2001). *Invitations to Love: Literacy, Love Letters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ersson, M. (1994). *Sexual Sel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nou, B. A., Desmond, J. E., Banner, L. L., Glover, G. H., Solomon, A., Polan, M. L., Lue, T. F., and Atlas, S. W. (2002). Brain activation and sexual arousal in healthy, heterosexual males. *Brain*, 125 (5): 1014-1023.
- Aron, A., and Aron, E. N. (1991). Love and sexuality. In K. McKinney and S. Sprecher (eds.), *Sexual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5-48. Hillsdale, N.J.: Erlbaum.
- Aron, A., Fisher, H. E., Mashek, D. J., Strong, G., Li, H. F., and Brown, L. L. (2005). Reward, motivation and emotion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early-stage intense romantic love: An fMRI study. *Journal of Neuropsychology*, 94, 327-357.
- Aron, A., Paris, M., and Aron, E. N. (1995). Falling in love: Prospective studies of self-concept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1102-1112.
- Aron, A., and Westbay, L. (1996). Dimensions of the prototyp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535-551.
- Aron, E., and Aron, A. (1996). Love and expansion of the self: The state of the model.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45-58.
- Ascher, J. A., Cole, J. O., Colin, J. N., Feighner, J. P., Ferris, R. M., Fibiger, H. C., Golden, R. N., Martin, P., Potter, W. Z., Richelson, E., and Sulser, F. (1995). Bupropion: A review of its mechanism of antidepressant activit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56 (9): 396-402.
- Bartels, A., and Zeki, S. (2000). The neural basis of romantic love. *NeuroReport*, 11, 3829-3834.
- . (2004).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maternal and romantic love. *NeuroImage*, 21, 1155-1166.
- Baumeister, R. F., Wotman, S. R., and Stillwell, A. M. (1993). Unrequited love: On heartbreak, anger, guilt, scriptlessness and humili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377-394.
- Beauregard, M., Levesque, J., and Bourgouin, P. (2001).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 self-regulation of emo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1 (18): RC165.
- Breiter, H. C., Aharon, I., Kahneman, D., Dale, A., and Shizgal, P. (2001). Functional imaging of neural responses to expectancy and experience of monetary gains and losses. *Neuron*, 30, 619-639.
- Breiter, H. C., Gollub, R. L., Weisskoff, R. M., Kennedy, D. N., Makris, N., Berke, J. D., Goodman, J. M., Kantor, H. L., Gastfriend, D. R., Riorden, J. P., Mathew, R. T., Rosen, B. R., and Hyman, S. E. (1997). Acute effects of cocaine on human brain activity and emotion. *Neuron*, 19, 591-611.

- Bruce, J., Lloyd, C. B., and Leonard, A. (1995). *Families in Focus: New Perspectives on Mothers, Fathers, and Children*. New York: The Population Council.
- Burch, R. L., and Gallup, G. G., Jr. (in press). The psychobiology of human semen. In S. Platek and T. Shackelford (eds.), *Female Infidelity and Paternal Uncertainty*.
- Buss, D. M. (1994). *The Evolution of Desire: Strategies of Human Ma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ston, P. M., and Emlen, S. T. (2003).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human mate cho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perception and mate preference in Western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 8805-8810.
- Carmichael, M. S., Humbert, R., Dixen, J., Palmisano, G., Greenleaf, W., and Davidson, J. M. (1987). Plasma oxytocin increases in the human sexual respons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64 (1): 27-31.
- Carnes, P. (1983). *Out of the Shadows: Understanding Sexual Addiction*. Minneapolis, Minn.: CompCare.
- Carter, C. S., DeVries, A., Taymans, S. E., Roberts, R. L., Williams, J. R., and Getz, L. L. (1997). Peptides, steroids, and pair bonding. In C. S. Carter, I. I. Lederhendler, and B. Kirkpatrick (eds.), *The Integrative Neurobiology of Affiliation*, pp. 260-272.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807.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Clayton, A. H., McGarvey, E. D., Warnock, J., et al. (2000). Bupropion as an antidote to SSRI-induced sexual dysfunc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New Clinical Drug Evaluation Unit Program, Boca Raton, Fla.
- Coleman, C. C., Cunningham, L. A., Foster, V. J., Batey, S. R., Donahue, R. M. J., Houser, T. L., and Ascher, J. A. (1999). Sexual dysfunc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 placebo-controlled comparison of bupropion sustained release and sertraline treatment. *Annals of Clinical Psychiatry*, 11, 205-215.
- Critelli, J. W., Myers, E. J., and Loos, V. E. (1986). The components of love: Romantic attraction and sex rol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4 (2): 354-370.
- Daly, M., and Wilson, M. (1983). *Sex, Evolution and Behavior*, 2nd ed. Boston: Willard Grant.
- Damsma, G., Pfaus, J. G., Wenkstern, D. G., Phillips, A. G., and Fibiger, H. C. (1992). Sexual behavior increased dopamine transmission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and striatum of male rats: Comparison with novelty and locomotio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06, 181-191.
- Darwin, C. (1859/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Random House.
- . (1871/n.d.).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David, V., Segu, L., Buhot, M. C., Ichaye, M., and Cazala, P. (2004). Rewarding effects elicited by cocaine microinjections into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of C57BL/6 mice: Involvement of dopamine D(1) and serotonin (1B) receptors. *Psychopharmacology (Berl)*, 174, 367-375.
- Davidson, R. J. (1994). Complexities in the search for emotion-specific physiology. In P. Ekman and R. J. Davidson (eds.), *The Nature of Emotion: Fundamental Ques-*

- 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gado, M. R., Nystrom, L. E., Fissel, C., Noll, D. C., and Fiez, J. A. (2000). Tracking the hemodynamic responses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 the striatum.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84, 3072-3077.
- Downey, G., and Feldman, S. 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6): 1327-1343.
- Downey, G., Freitas, A. L., Michaelis, B., and Khouri, H. (199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rejection by romantic partn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7): 545-560.
- Dozier, R. W. (2002). *Why We Hate: Understanding, Curbing, and Eliminating Hate in Ourselves and Our World*.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 Dutton, D. G., and Aron, A. P. (1974). Some evidence of heightened sexual attrac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anx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 (4): 510-517.
- Eisenberger, N. I., Lieberman, M. D., and Williams, K. D. (2003). 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 *Science*, 302, 290-292.
- Elliott, R., Newman, J. L., Longe, O. A., and Deakin, J. F. W. (2003). Differential response patterns in the striatum and orbitofrontal cortex to financial reward in humans: A parametric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3 (1): 303-307.
- Ellis, B. J., and Malamuth, N. M. (2000). Love and anger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 discrete systems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 (3): 525-556.
- Evans, D. W., Lewis, M. D., and Iobst, E. (2004). The role of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in normally developing compulsive-like behaviors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rain and Cognition*, 55 (1): 220-234.
- Fabre-Nys, C. (1998). Steroid control of monoamines in relation to sexual behaviour. *Reviews of Reproduction*, 3 (1): 31-41.
- Fehr, B. (1988).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love and commi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4): 557-579.
- Findling, R. (1999). *Don't Call That Man!: A Survival Guide to Letting Go*. New York: Hyperion.
- Fisher, H. (1992). *Anatomy of Lov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onogamy, Adultery and Divorce*. New York: Norton.
- . (1998). Lust, attraction, and attachment in mammalian reproduction. *Human Nature*, 9 (1): 23-52.
- . (1999). *The First Sex: The Natural Talents of Women and How They Are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 (2004). *Why We Love: The Nature and Chemistry of Romantic Love*. New York: Henry Holt.
- . (2006). Broken hearts: The nature and risks of romantic rejection. In A. Booth and C. Crouter (eds.), *Romance and Sex in Adolescence and Emerging Adulthoo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pp. 3-29. Mahwah, N.J.: Erlbaum.
- Fisher, H., Aron, A., Mashek, D., Strong, G., Li, H., and Brown, L. L. (2002).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mate choice: A hypothesis. *Neuroendocrinology Letters*, suppl. 4 (23): 92-97.

- . (2002a). Defining the brain systems of lust, romantic attraction and attachment.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1 (5): 413-419.
- . (November 11, 2003). Early stage intense romantic love activates cortical-basal-ganglia reward/motivation, emotion and attention systems: An fMRI study of a dynamic network that varies with relationship length, passion intensity and gender.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New Orleans.
- . (2005). Motivation and emotion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romantic love following rejection: An fMRI study. Program no. 660.7. In *Abstract Viewer/Itinerary Planner*. Washington, D.C.: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 Fisher, H., and Thomson, J. A. (in press). Lust, attraction, attachment: Do the sexual side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 jeopardize romantic love and marriage? In S. Platek (ed.), *Evolutiona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Frankel, J. (May 11, 2004). Reviving romance. *New York Times*, p. F4, Letters.
- Frayser, S. (1985). *Varieties of Sexual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Sexuality*. New Haven, Conn.: HRAF.
- Gangestad, S. W., and Thornhill, R. (1997).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extrapair sex: The role of fluctuating asymmetr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8 (2): 69-88.
- Gibbons, A. (2004). Tracking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a "warrior" gene. *Science*, 304, 818-819.
- Gingrich, B., Liu, Y., Cascio, C., Wang, Z., and Insel, T. R. (2000). D2 receptors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are important for social attachment in female prairie voles (*Microtus ochrogaster*).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14 (1): 173-183.
- Goldstein, R. Z., Alai-Klein, N., Leskovjan, A. C., Fowler, J. S., Wang, G. J., Gur, R. C., Hitzemann, R., and Volkow, N. D. (2005). Anger and depression in cocaine addiction: Association with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Psychiatry Research*, 138 (1): 13-22.
- Griffin-Shelley, E. (1991). *Sex and Love: Addiction, Treatment and Recovery*. New York: Praeger.
- Hagen, E. H., Watson, P. J., and Thomson, J. A. (in press). Love's labours lost: Major depression as an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to obtain help from those with whom one is in conflict.
- Halpern, H. M. (1982). *How to Break Your Addiction to a Person*. New York: McGraw-Hill.
- Hamill, S. (ed.). (1996). *The Erotic Spirit: An Anthology of Poems of Sensuality, Love and Longing*. Boston: Shambhala.
- Harris, H. (1995). Rethinking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 in Polynesia: A case study of Mangaia, Cook Island. In W. Jankowiak (ed.), *Romantic Passi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tfield, E. (1988). Passionate and companionate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tfield, E., and Rapson, R. (1987). Passionate love/sexual desire: Can the same paradigm explain both?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6, 259-278.

- . (1996). *Love and Sex: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Hatfield, E., Schmitz, E., Cornelius, J., and Rapson, R. L. (1988). Passionate love: How early does it begi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1 (1): 35–51.
- Hatfield, E., and Sprecher, S. (1986). Measuring passionate lov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 383–410.
- Hazan, C., and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Heaton, J. P. (2000). Central neuropharmacological agents and mechanisms in erectile dysfunction: The role of dopamine.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4 (5): 561–569.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1986). Research on love: Does it measure u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3): 784–794.
- Hull, E. M., Du, J., Lorrain, D. S., and Matuszewick, L. (1997). Testosterone, preoptic dopamine, and copulation in male rats.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44 (4): 327–333.
- Hunter, M. S., Nitschke, C., and Hogan, L. (1981). A scale to measure love addic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8, 582.
- Jankowiak, W. R., and Fischer, E. F.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31 (2): 149.
- Kalivas, P. W., and Duffy, P. (1998). Repeated cocaine administration alters extracellular glutamate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 70, 1497–1502.
- Kapit, W., Macey, R. I., and Meisami, E. (2000). *The Physiology Coloring Book*. New York: Addison-Wesley Longman.
- Karama, S., Lecours, A. R., Leroux, J. M., Bourgouin, P., Beaudoin, G., Joubert, S., and Beauguard, M. (2002). Areas of brain activation in males and females during viewing of erotic film excerpts. *Human Brain Mapping*, 16 (1): 1–13.
- Kringelbach, M. L., and Rolls, E. T. (2004). The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the human orbitofrontal cortex: Evidence from neuroimaging and neuropsychology.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72 (5): 341–372.
- Kuhnen, C. M., and Knutson, B. (2005). The neural basis of financial risk taking. *Neuron*, 46, 763–770.
- Langlois, J. H., and Roggman, L. A. (1990). Attractive faces are only averag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 115–121.
- Laumann, E. O., Gagnon, J. H., Michael, R. T., and Michaels, S. (1994).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ary, M. R. (ed.). (2001).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J. A. (1988). Love-style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38–6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esch, K. P., Bengel, D., Heils, A., Sabol, S. Z., Greenberg, B. D., Petri, S., Benjamin, J., Muller, C. R., Hamer, D. H., and Murphy, D. L. (1996). Association of anxiety-related traits with a polymorphism in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regulatory region. *Science*, 274, 1527–1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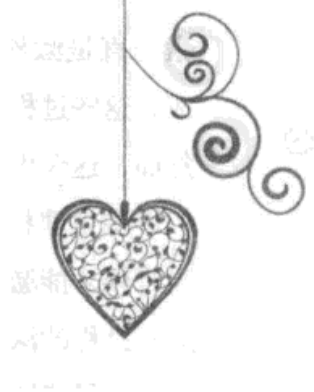
- Lewis, T., Amini, F., and Lannon, R. (2000). *A General Theory of Lo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iebowitz, M. R. (1983). *The Chemistry of Love*. Boston: Little, Brown.
- Lim, M. M., Murphy, A. Z., and Young, L. J. (2004). Ventral striatopallidal oxytocin and vasopressin V1a receptors in the monogamous prairie vole (*Microtus ochrogaste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468, 555-570.
- Lim, M. M., and Young, L. J. (2004). Vasopressin-dependent neural circuits underlying pair bond formation in the monogamous prairie vole. *Neuroscience*, 125, 35-45.
- Marazziti, D., Akiskal, H. S., Rossi, A., and Cassano, G. B. (1999). Alteration of the platelet serotonin transporter in romantic lov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9, 741-745.
- Martin-Soelch, C., Leenders, K. L., Chevalley, A. F., Missimer, J., Kunig, G., Magyar, S., Mino, A., and Schultz, W. (2001). Reward mechanisms in the brain and their role in 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neurophysiological and neuroimaging studies. *Brain Research Reviews*, 36, 139-149.
- Mearns, J. (1991). Coping with a breakup: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and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end of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327-334.
- Mellody, P., Miller, A. W., and Miller, J. K. (1992). *Facing Love Addiction*. New York: HarperSan Francisco.
- Meloy, J. R. (2001). When stalkers become violent: The threat to public figures and private lives. *Psychiatric Annals*, 33 (10): 658-665.
- Meloy, J. R., and Fisher, H. E. (2005). Some thoughts on the neurobiology of stalking.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50 (6): 1472-1480.
- Miller, G. (2000). *The Mating Mind: 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Doubleday.
- Najib, A., Lorberbaum, J. P., Kose, S., Bohning, D. E., and George, M. S. (2004). Regional brain activity in women grieving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breakup.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1 (12): 2245-2256.
- Nemeroff, C. B. (1998). The neurobiology of depress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78 (6): 42-49.
- Nesse, R. (1991). What good is feeling bad—The evolutionary benefits of psychic pain. *The Sciences: Journal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31, 30-37.
- Nestler, E. J. (2001). Molecular basis of long-term plasticity underlying addic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 (2): 119-128.
- Netter, P., Hennig, J., Meier, B., and Rohrman, S. (1998). Testosterone as an indicator of altered 5-HT responsivity in aggressive subjects. *European Psychiatry*, 13 (4): 181-185.
- Nolen-Hoeksema, S., Larson, J., and Grayson, C. (1999). Explain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1061-1072.
- Norman, C., and Aron, A. (1995). The effect of exciting activities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Conference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lliamsburg, Va.

- Panksepp, J. (1998). *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and Animal Emo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ele, S. (1975). *Love and Addiction*. New York: Taplinger.
- Pfaff, D. W. (1999). *Drive: Neurobiologic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Sexual Motiv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Pines, A. M. (1999). *Falling in Love: Why We Choose the Lovers We Choose*. New York: Routledge.
- Pleim, E. T., Matochik, J. A., Barfield, R. J., and Auerbach, S. B. (1990). Correlation of dopamine release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with masculine sexual behavior in rats. *Brain Research*, 524, 160-163.
- Purdy, M. (November 6, 1995). A sexual revolution for the elderly. *New York Times*, p. A16.
- Reno, P. L., Meindl, R. S., McCollum, M. A., and Lovejoy, C. O. (2003). Sexual dimorphism in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 1073.
- Ridderinkhof, K. R., Van den Wildenberg, W. P., Segalowitz, S. J., and Carter, C. S. (2004).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 of cognitive control: The role of prefrontal cortex in action selection, response inhibi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reward-based learning. *Brain and Cognition*, 56 (2): 129-140.
- Robbins, T. W., and Everitt, B. J. (1996). Neurobehavioural mechanisms of reward and motiv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6, 228-268.
- Rosenthal, N. E. (2002). *The Emotional Revolution: How the New Science of Feelings Can Transform Your Life*. New York: Citadel Press.
- Rushton, J. P. (1989). Epigenesis and social prefer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 31-32.
- Schaeff, A. W. (1989). *Escape from Intimacy: The Pseudo-Relationship Addic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 Schreckenberger, M., Siessmeier, T., Viertmann, A., Landvogt, C., Buchholz, H. G., Rolke, R., Treede, R. D., and Bartenstein, P. (2005). The unpleasantness of chronic pain is encoded by the insular cortex. *Neurology*, 64 (7): 1175-1183.
- Schultz, W. (2000). Multiple reward signals in the brai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 199-207.
- Shakespeare, W. (1936). *As You Like It*, act V, scene 2. In W. A. Wright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New York: Doubleday.
- Sherwin, B. B. (1994). Sex hormones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29 (3/4): 423-430.
- Shostak, M. (1981).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all, D. M., Zatorre, R. J., Dagher, A., Evans, A. C., and Jones-Gotman, M. (2001). Changes in brain activity related to eating chocolate: From pleasure to aversion. *Brain*, 124, 1720-1733.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1 (2): 119-135.
- Szezykka, M. S., Zhou, Q. Y., and Palmiter, R. D. (1998). Dopamine-stimulated sexual behavior is testosterone dependent in mic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12 (5): 1229-1235.

- Tennov, D. (1979). *Love and Limerence: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 Love*. New York: Stein and Day.
- Tiihonen, J., Kuikka, J., Kupila, J., Partanen, K., Vainio, P., Airaksinen, J., Eronen, M., Hallikainen, T., Paanila, J., Kinnunen, I., and Huttunen, J. (1994). Increase in cerebral blood flow of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in men during orgasm. *Neuroscience Letters*, 170, 241-243.
- Traubmann, J., and Hatfield, E. (1981). Love and its effect on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In R. Fogel, E. Hatfield, S. Kiesler, and E. Shanas (eds.), *Aging: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Family*, pp. 253-27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Van Goozen, S., Wiegant, V. M., Endert, E., Helmond, F. A., and Van de Poll, N. E. (1997). Psychoendocrinological assessment of the menstrual cyc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rmones, sexuality, and mood.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6 (4): 359-382.
- Vollm, B. A., Taylor, A. N., Richardson, P., Corcoran, R., Stirling, J., McKie, S., Deakin, J. F., and Elliott, R. (2006). Neuronal correlates of theory of mind and empathy: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in a nonverbal task. *NeuroImage*, 29 (1): 90-98.
- Walker, P. W., Cole, J. O., Gardner, E. A., Hughes, A. R., et al. (1993). Improvement in fluoxetine-associated sexual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switched to buprop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54, 459-465.
- Wallerstein, J. S., and Blakeslee, S. (1995). *The Good Marriage: How and Why Love Last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Wang, Z., Yu, G., Cascio, C., Liu, Y., Gingrich, B., and Insel, T. R. (1999). Dopamine D₂ receptor-mediated regulation of partner preferences in female prairie voles (*Microtus ochrogaster*): A mechanism for pair bonding?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13 (3): 602-611.
- Watson, P. J., and Andrews, P. W. (2002). Toward a revised evolutionary adaptationist analysis of depression: The social navig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72, 1-14.
- Wedekind, C., et al. (1995). MHC-dependent mate preferences i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60, 245-249.
- Wenkstern, D., Pfau, J. G., and Fibiger, H. C. (1993). Dopamine transmission increases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of male rats during their first exposure to sexually receptive female rats. *Brain Research*, 618, 41-46.
- Wersinger, S. R., and Rissman, E. F. (2000). Dopamine activates masculine sexual behavior independent of the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 (11): 4248-4254.
- Wise, R. A. (1996). Neurobiology of addiction.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6, 243.
- Wise, R. A., and Hoffman, D. C. (1992). Localization of drug reward mechanisms by intracranial injections. *Synapse*, 10, 247-263.
- Wolkstein, D. (1991). *The First Love Stori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Yang, S. P., Pau, K. Y. F., Hess, D. L., and Spies, H. G. (1996). Sexual dimorphism in secretion of hypothalamic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nd norepinephrine after coitus in rabbits. *Endocrinology*, 137 (7): 2683-2693.

- Yutang, L. (1954).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Pocket Books.
- Zald, D. H., Boileau, J., El-Dearedy, W., Gunn, R., McGlone, F., Dichter, G. S., and Dagher, A. (2004). Dopamine transmission in the human striatum during monetary reward task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4, 4105-4112.
- Zentner, M. R. (2005). Ideal mate personality concepts and compatibil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 (2): 242-256.
- Zick, R. (1970). Measurement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 265-273.





依恋和连结的 生物行为模型

詹姆斯·F·莱克曼 (James F. Leckman) 莎拉·B·赫尔迪 (Sarah B. Hrdy)
埃里克·B·凯维纳 (Eric B. Keverne) C. 苏·卡特 (C. Sue Carter)

人们在世间所能遇到的一切爱情，都是根据同样的法则产生、成长和死亡，或者升华到不朽。^①

马利-亨利·贝尔 (司汤达)^②，1822

人类的大脑是进化的卓越产物。虽然脊椎动物大脑的基本机制在四亿五千万年前已经形成，但我们这一亚种（智人）的出现却仅发生在十万年到二十万年前。在生存竞争中，某些特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推测，自从大约三亿年前第一个泌乳的哺乳动物出现，与成功繁衍相关的心理和行为要

① 对于这句名言的中文翻译，我们参考了崔士篪所译的司汤达的《爱情论》第3—4页的译法，该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3月出版。——译者注

② 司汤达的原名应为 Marie-Henri Beyle，英文原版误做 Henri Marie Beyle，中译已更正。——译者注

素一直是激烈的选择压力的焦点。配偶的选择、后代的繁衍、抚养关系的形成，这些过程可以维系婴儿度过不同的依赖生活期（对于人类来说尤其漫长），然而，这仅仅是个体生存和物种存活所需的少数几个相互依存的复杂过程。我们许多生理和行为的潜能都是为这些目标服务的，包括一些在发展过程中到适当时候才能激活的高度保守的、基于大脑的系统。我们假设，对于这些古老的适应过程的深度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洞悉我们所具有的各种精神病理学症状的易感性。

在本章中，“连结”这个术语指的是调节父母行为和婴儿反应的生理过程，而“依恋”这个术语更具有心理学的（也是人文的）含义，尽管在使用中出现两个词的重叠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哺乳动物最初连结（initial bond）形成的标志是对与寻求亲近（proximity-seeking）、分离苦恼（separation distress）有关的某个或某些个体的选择性再认，以及因他人在场、不在场或其他线索条件不同而改变的自主反应和行为反应。亲和性连结（affiliative bond）的形成，以基本而又深远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依恋修饰了连结，它是指人际之间一种复杂的发展过程，该过程依赖于学习和记忆，并基于充满情感的互动，包括给予照顾、接受照顾、沟通、感情协商、保护、承诺，还有元认知领域（metacognitive domains）的形成。这些依恋和连结通常有利于提升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及减少未来潜在应激事件的影响力。确实，连结可以被看做是个体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的一种方式。然而，连结和依恋丧失或者受到威胁，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爱情这个词在本章中出现得很少，当它出现的时候，它仅简单地指意识的主观体验，这种经验源于并反过来影响我们人类连结和依恋的所有方面。

在连结形成和维持过程中哺乳动物的行为

亲本抚育

适应性的父母行为可以定义为对一个生殖未成熟、基因相近的同一物种成员的任何反应，这些行为可以增加存活率和成功繁衍一个或多个后代的可能性。亲本抚育（**parental care**）可以是单方的（照顾者的角色限制在父母中的一方），也可以是双方的（父母都是照顾者）。在哺乳动物中，单方的照顾体制是合乎惯例的，调查发现在大约90%的物种中母亲扮演了单方的关爱提供者（Eisenberg & Kleiman, 1983）。在有些物种中，除了亲生父母之外，其他人也会提供照顾（Hrdy, 1999）。在这些物种中，泛亲抚育（**alloparental care**）可能对后代的生存起着重要的作用。

母性行为

母性行为是一套高度保守的、对成功繁殖有决定性作用的行为能力。大多数哺乳动物在他们准备生产时都有着不同的刻板行为模式。例如，老鼠会打洞。狗会疯狂地刨泥或者刨土来挖掘准备生产的地方。在生产时，哺乳动物还伴随着一系列的固定行为模式，包括咬和舔掉羊水膜，吃掉胎盘，咬断脐带，舔并嗅新生儿，它们通常（像羊）通过嗅觉记住幼崽的气味，或者在一些啮齿类动物和狗之中，将幼崽集中到窝里，并聚在一起以便喂奶。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也表现出一些同样的行为——舔干净幼崽，用爪子将它们梳理整洁，检查幼崽，尤其是生殖器，以及吃掉胎盘。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中，对幼崽的照顾方式因物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刚出生的啮齿类动物（像田鼠和家鼠）那时不能活动，不能维持体温，因此，它们的存活必须依赖最初的一套具体的母性行为（Rosenblatt & Lehrman, 1963）。在这些啮齿类动物中，母性行为包括一套复杂的活动，如修护巢穴、嗅、检查幼崽、交流、救护、舔、清洁及各种各样的护理行为（Pryce, Bettschen, & Feldon, 2001）。除了照顾自己的幼崽之外，将

要分娩的母亲对收养的幼崽也表示出热心的救护、舔和护理等行为。相反，未交配的成年雌田鼠在初次见到收养的幼崽时并不会表现出母性行为。然而，如果未交配过的雌田鼠与幼崽同穴居住，它们将会在四到七天后最终表现出母性行为（Rosenblatt, 1976）。这个实验范式被称做“敏感化”，这在母性行为的评估中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在美洲很常见的狨（一种小型长尾猴），母亲可能会寻找树洞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生产。出生以后，孩子（或孩子们，因为双胞胎在狨中是比较普遍的）会爬到母亲身上，钻到它的胳膊底下，爬到它的背上。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猴子和大猿，对单生儿具有排他性的母性关爱。它们的幼崽经常紧紧跟着母亲，并且只有母亲才吃胎盘（Kraemer, Ebert, Schmidt, & McKinney, 1991; Kraemer, 1992）。在对野生大猩猩生产过程的观察中发现，雌猩猩在吃胎盘的时候会把幼崽放在地上，之后将自己的孩子抱起，将它放在胸前。在一些旧世界猴（Old World Monkey）中，母猴试图在生产时不被打扰。在很多物种中，雌性对幼崽具有强烈的占有欲。然而，在一些物种中，雌性允许别的群体成员从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带走她自己的幼崽。在野生物种中，长大的幼崽至少有50%的白天时间与其雌性亲属在一起，而不是自己的母亲。通常，雌性会在夜里照顾自己的孩子，并且幼崽一般只喝自己母亲的奶水。

与哺乳动物相比，人类的母亲除了本身的劳动体验之外，它们表现出相对较少的普遍而又固定的行为模式。在各种文化下所观察到的普遍性模式包括检查婴儿，关注婴儿的健康状况。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也特别关注生殖器官，以及其他身体结构的特征。人类在灵长类中是独特的，然而，如果基于一些特征辨别的话，例如丢弃确实或认为有缺陷的婴儿，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和许多哺乳动物并无差别（Hrdy, 1999）。一般来说，由母亲和/或她的伴侣帮助新生儿清洁，但是，完成这项实际任务的方式取决于可用的方法和习俗。通常，经过一番仔细的视觉和触觉检查后，用水或者油冲洗新生儿，然后撒上土、染料、木炭、玉米粉甚至是干粪。对胎盘的处理也是因人而异的（可能丢弃或者进行仪式性的埋葬，但是，大多数文化都不倡导吃掉胎盘）。许多母亲

在孩子出生后会立即紧紧地抱起他，然后给予喂养，但并非所有的母亲都会这样做，有的则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采取这种做法。初乳（母亲刚开始母乳喂养时分泌的第一次乳汁）可能会给婴儿喝，或者（在许多非洲和海地国家）也可能洒在地上。一般来说，婴儿第一次喝的奶肯定是从母亲那儿来的，但是，在中非的俾格米人中，一个新生儿可能首先从不是自己母亲的妇女那里喝奶。虽然母亲在怀孕和生产之间的心理变化最初使母亲变得具有母性，并且在生产后婴儿的暗示和与泌乳联系的心理过程能在维持母性承诺方面起作用（Fleming, 2005），但对于人类来说，母亲的认知过程起着更重要的作用（Keverne, 2005）。

哺乳动物物种之间的差异

物种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关于辨别后代的感知方法。实际上，所有研究的哺乳物种都用到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和视觉系统。系统各自的作用在各物种之间是独立的；对于啮齿动物和羊来说，嗅觉系统是关键，但是对于人类和灵长类就没有那么重要，而视觉辨别才是最重要的。

双亲照管

双亲照管在鸟类中是非常普通的，但在哺乳动物中只占 10%。虽然在很多灵长类物种中均发现亲本抚育（像针对该群体幼崽们的泛化保护一样的初级形式），但是，雄性付出巨大的代价，排外性地照顾幼崽（即指大多数时间，由父亲照顾孩子），却只在雄性伴侣关系高度确定的物种中才出现。在人类文化中，父亲在保护和觅食、甚至照顾小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家庭成员随着时间会发生变化，照顾者的身份可能会改变，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也有可能参与扮演这些角色。

处于婴儿期的哺乳动物需要喂奶。而在没有奶瓶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只有泌乳的母亲才能胜任。女性将喂奶描述为一种非常独特的亲密的、身体上的、

有时又是感觉上的一种体验。它使母亲及其婴儿成为特殊的统一体。清洁、理毛、穿衣等行为提供了对婴儿身体和外表的亲密检查，在各种物种中都会出现这种行为。这样的行为可能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亲近婴儿，而这在所有的灵长类动物看来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然而，人类中有较少的固定行为模式，在人类的意识中，出生被看做是有潜在危险的超自然控制的一种事情，人们广泛地认识到出生对母亲和婴儿可能造成生命的危险，因此，可能会要求举行宗教仪式，这些宗教仪式包括净化和祈求等活动，也有围绕婴儿命名的特殊活动，还有得到社会团体的认可，即一个新成员顺利降生，并且需要他们的指导和支持。

在跨文化层面上，我们对产后母亲的全神贯注（*mental preoccupation*）知之甚少，但是，莱克曼（*Leckman, 1999*）等人将母亲对婴儿照顾和幸福感的各种产后贯注编成目录，这种全神贯注主要是西方（大部分是中产阶级）母亲的特征。在这种文化中，预产期这段时间有强烈的父母关注（*Leckman & Mayes, 1999; Leckman et al., 1999; Winnicott, 1956*）。正如表6-1所表现的，全神贯注的内容包括对能否胜任做好父母以及婴儿安全和幸福感的侵入性担忧（*intrusive worries*），这些想法和他们做出的避免受伤害的行为，与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出现的症状相似。甚至在孩子出生前，父母便会集中精力为婴儿营造出安全和可靠的环境。当人类筑起自己的爱巢后，打扫和修复爱巢便成了家常便饭。父母最担心的是安全和能否一帆风顺的问题，安全问题包括婴儿即刻所处的环境的清洁，在生产后，这种同样高度的责任感会促使父母频繁地查看婴儿，即使有些时候，他们明明知道婴儿很好。

与这些焦虑、侵入性思维和避免受伤害的行为相比，人类的父母还常常称他们的孩子是“完美的”。例如，莱克曼等人（1999）报告声称父母的这种体验在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达到顶峰，其中有73%的母亲、88%的父亲赞同这种体验。长期仔细地审视婴儿的外貌特征，及婴儿与双亲或单亲的相似之处，这占用了父母大量的时间。

表 6-1 早期父母之爱、婴儿应答性和浪漫之爱的突出特征的比较

特征	早期父母之爱	婴儿应答性	浪漫之爱
选择性再认——焦点排除	+++ /++++	+++	+++ /++++
改变心理状态——因他人在场、不在场或其他线索条件不同而随之改变的自主反应和行为反应	+++ /++++	+++ ^a	+++
清楚的开始——享乐转换	+++	++	+++
侵入性思维和意象（全神贯注）			
——渴望互惠	++ [*]	+++ ^a	++++ [*]
——将他人理想化	+++ [*]	+++ ^a	++++ [*]
——对他人意识的提高	++++	+++ ^a	+++
——对他人幸福感的担心和自己责任感的增加	++++	++ ^a	+++
——对自己或他人的焦躁不安和攻击性的想法	+ [*]	+++ ^a	++ ^{b*}
改变的重复性行为			
——寻求亲近，身体接触和分离苦恼	++++	+++	+++
——情感关爱：聊天、唱歌、喂养和修饰	++++	+++	++
——要求事情安全、可靠、“刚刚好”	++++ [*]	++	++ [*]
——为保护孩子/伴侣做出的攻击行为	++++	++	++++ ^b
二分性的解决方案			
——建立亲密关系，相互满足的互动交流范式。它通常以文化定义的仪式和元认知表征的重组和持续发展为标志	+++	+++	+++
——拒绝	+ [*]	+	+++ [*]

^a 婴儿最初的心理过程是不可言喻的，并且是超越意识层面的。

^b 可能在两性方面存在男性大于女性的情况。

* $p > 0.01$ 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次检验。

注：该等级评定是在柏林举行的历时一周的达勒姆会议后（2003），以 21 位连结和依恋方面的专家（7 位女性，14 位男性）的观点为基础进行的。等级划分使用五点顺序量表（0-4），平均值处于最近的整数周围，除了呈现的两个整数的中间值之外（3.5 +++/++++），男性和女性评定者没有表现出差异。

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次检验（ $p > 0.01$ ），与早期父母之爱相比，浪漫之爱被认为要求更多的相互性，更倾向于把他人理想化，更有可能对他人怀有攻击的想法，更有可能因拒绝而结束关系。然而，早期父母之爱被认为是更加关注对于婴儿来说“刚刚好”的那些事情。婴儿应答性和其他两种形式的爱之间的差异不符合进行统计检验的条件，因为只有不到一半的评定者完成了等级评定。然而，直观观察表明，参加评分者都认为婴儿对照顾自己的人持有更具攻击性的想法。

来源：取自莱克曼和梅斯（Leckman & Mayes, 1999）和莱克曼等（Leckman et al., 2005）。

人类的父母通常会为婴儿的出生准备一个特殊的地点(医务室,在中产阶级的西方社会)。对于雌性猴子或者类人猿的观察来说,它们没有建造任何为生产作准备的窝,那些没有固定居所的游牧者也没有这种作准备的习惯。通常将人类所说的筑巢本能可能解释为母性对婴儿身体环境、安全和幸福感关注的产物才更加令人信服。

婴儿的应答性

对婴儿和父母之间社会连结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某种形式的社会约定(social engagement)。在生产的时候,哺乳动物的后代表现出来的行为,要么使婴儿主动与母亲接触,要么使母亲主动与新生儿接触。确切的行为表现因物种的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变化,并且也随着生产时的状况而变化。通常,在成熟状态下出生的婴儿会表现出诸如紧贴(例如一些灵长目物种)或接近(例如羊、豚鼠)之类的行为。在一些物种中,婴儿在不成熟的状态下出生,婴儿的特征(包括他们的发声)会使母亲被婴儿所吸引。然而,即使在这些物种中,一些难以察觉的婴儿寻找亲近的行为有时也是明显的。例如,新生的田鼠幼崽试图将鼻子朝向散发熟悉的羊水气味的方向(Teicher & Blass, 1977)。因为母亲在生产时流出了羊水,掠湿了她的下腹,幼崽所做的这种行为就会引导它们接触到乳头。

非常明显的是,婴儿对照顾者的觉知在生命的早期已经开始,并且这种意识与关于温暖、喂食、液体与水平衡的生理平衡密切相关。人类婴儿注意到监护人的面部表情、体态、声音和应答的能力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Trevarthen, 2005),这为人类语言加工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例如,特瑞欧-马佐耶、迪斯霍耐、科瑞威欧、罗伊特、奥雅尔和马佐耶(Tzourio-Mazoyer, De Schonen, Crivello, Reutter, Aujard, & Mazoyer, 2002)观察发现,当呈现给两个月大的婴儿一张妇女的面部图片时,就会激活大脑皮层分布的一些网络,其中包括成年人的面部识别(梭状回)和语言的加工区域。这些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的形成与语言习得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祖先很可能是合作的抚养者,他

们的母性承诺是依赖于社会支持的，因此人类婴儿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迫切需要监控和理解别人的情绪和意图（Hrdy, 1999, 2005）。相比之下，那些一出生就能吸引他们母亲的婴儿更占优势。除了“所有类人猿的幼崽都会因为不适和分离而哭泣”这一特征之外，人类婴儿还面临更大的选择压力去吸引自己母亲和其他人。也许并不惊奇的是，人类婴儿一出生便开始寻找人类的面部表情，并和他人进行初步的接触。特别是在成长的早期，婴儿模仿人的面部表情，微笑，大笑，而（据目前所知）其他类人猿没有这么做（Meltzoff & Prinz, 2002; Papousek et al., 1992; Tomasello, 1999）。

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婴儿变成研究他人的专家，特别是对他们的照顾者，正当人们为黑猩猩和人类在这方面的不同表现而争论不休时，显然人类婴儿所发展的解读他人意图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类人猿（Tomasello, 1999）。在两到三岁的时候，儿童便发展出凭直觉感知别人想做什么及其为什么做的能力，理解别人对一项任务的想法，这提高了我们观察学习的能力，使人类易于积累和传授新知识（Trevvarthen, 2005）。赫尔迪（Hrdy, 2005）认为，我们遗传的合作能力有利于婴儿解读他人内心能力的出现和提高，从而导致了人类沟通器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化。

母婴双方（mother-infant dyad）的关系一旦建立，考虑到这种关系的破裂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母婴分离，尤其是在灵长类中母婴分离可能是灾难性的。当一胎多产的猕猴幼崽被带走的时候，母猴总是感到苦恼且焦虑不安，并会发出“who”的叫声，这个反应最初特别强烈，大约两到三天之后则逐渐消失。婴儿对分离的反应部分取决于他们分离时的年龄，分离的持续时间，以及他们有没有遇见合适的替代者。所有的分离都涉及“抗议”（发出叫声），继而是绝望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了“严重的”反应，其特征是厌食、厌水以及肌肉运动的减少，而这些都是致命的。通常，早期的分离（三个月以前）和五个月大之后的分离，其产生严重的绝望反应和结果的机会要小。对于猕猴来说，当三个月到四个月大的阶段是最严重的分离绝望反应发生的“危险时期”（Harlow, Harlow, & Suomi, 1971; Kraemer et al., 1991）。

与没有经历过分离的猴子所表现出的抚慰和亲社会行为相比，早期分离的持续长久作用使猴子具有攻击性或者出现退缩，这些不利的早期分离的消极后果在动物回到母亲身边时依然存在。

成人 - 成人配对连结和浪漫之爱

导致配对连结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时间参数因物种的差异而不同。在一夫一妻制的啮齿类物种中，形成配对连结的时间或许是相对较短的。对于草原仓鼠来说，味觉、嗅觉、触觉探索和性行为常常在几个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然而，这已足够产生一种长达一生的连结。这种连结以选择性的寻求亲近和地点偏爱、保护配偶和巢穴和对幼崽的双亲照管为特征。如果有联合/同居刺激的强化作用，这些连结将会维持动物的一生（Carter, DeVries, & Getz, 1995）。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人类的配对连结，因为人类在传达与社会连结的形成相关的认知和情绪过程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詹克维尔克和弗希尔（Jankowiak & Fischer, 1992）的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在所研究的168种文化中，87%的文化存在浪漫之爱的直接证据，其突出特征包括对改变的心理状态的知觉，以思想、意象和心境为典型的特征集突然频繁地侵入意识，出现特殊状态的行为、可预测的历程以及很广泛的结果。期间，实际爱人和准爱人都深深关注他们的伴侣，对他人有很明显的排斥感。这种关注导致了预测对方的象征符号、行为和欲望的能力提高，如果继续维持和互动下去，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配对连结和新家庭的形成。在古代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传统中，作家们一直把浪漫之爱描述为一种病态或者狂热的行为。《雅歌》（第五章第八节）记载了这种悲痛：“我因思爱成病。”而《罗摩衍那》史诗将 Rama（罗摩）和 Sita（悉多）之间的浪漫之爱描述为对先前存在于天国之中结合的反映。田诺（Tennov, 1979）把浪漫之爱或“深恋感”（limerence）表达为不顾一切的强烈感觉。基于对大约400个个体的访谈结果，她指出这种改变的心理状态通常有很清楚的开始，并且后来能够被回忆起来。她也把这种状态概括为一种“本质上不随意的过程”，在最初你感到轻松、得意和带有讥讽性的自由。这种状态是一种主观体验的特

殊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精神生活的正常历程被感知的变化、大范围的侵入性思维、不稳定的情绪（从欢欣鼓舞到焦虑不安和绝望）所打断。

至少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浪漫之爱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耗费时间的侵入性思维的出现，经常用来描述这种思维的词包括全神贯注（preoccupation）、强迫观念（obsessions）、想入非非（reveries）、沉思（brooding）。谢伊和亚当斯（Shea & Adams, 1984）在对 656 个大学生样本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关注自己情侣的程度（多少次或多长时间）是所报告出的浪漫之爱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关于伴侣的这些想法经常被描述为毫无来由地出其不意，但是，显然知觉的激发物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如果爱人的名字被提起，一个人经过爱人所住的街道或者看见与爱人相关的人或地点）。虽然有大量证据表明侵入性思维的存在，例如在私人杂志、诗、小说、戏剧乃至流行歌曲中实征的主题分析仍是贫乏的。轶事的描绘表明这些幻想集中于深爱的人，并且可预见地包含感情色彩、渴望和怀疑。从古至今，一贯的主题是亲近感和亲密感的重要性，以及与特殊他人互惠交往的渴望。大多数的描述包含了许多渴望（如亲密的互动），当所爱之人以爱回报时所预料到的温柔的和谐、解脱感以及欣喜若狂的感觉（Stendhal, 1975; Tennov, 1979）。在为数不多的一个实征研究的描述中，霍顿（Horton, 1957）报告了对 1955 年发行的 235 首流行歌曲歌词的分析，其中 196 首（83%）是关于爱情的对话，其中 23 首的歌词包含了对相互承诺的质疑和承诺的抒情诗。但是，鉴于在研究中使用相互排斥的归类法，这可能低估了事实。

对爱人的关注集中在对其细微和客观上琐碎的各个方面。根据司汤达描述“深陷爱河的人无时无刻不被爱人的形象所占据”。他进一步指出，爱人的形象被扭曲，它更多的是“一种被创造出的内心的美好幻象”。这个理想化的过程被司汤达称为“结晶”。通过这个过程，爱人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欣赏为美丽的。在这个过程中，“丑陋不一定是障碍，不管对方长相是否真正的美，总之情人眼里出西施”。当怀疑一个人的爱能否有回报的时候，这些理想化的想法和快乐的感觉一般被可怕的灾难感平衡了。“当你和你深爱的人关系破裂的时候”，

这些怀疑将变成被拒绝的恐惧、嫉妒、憎恶、诽谤、报复、凶残或者自杀的绝望。除了以上描述的心理状态，还有许多行为模式与这一时期典型相关。伴侣和潜在的伴侣彼此都表现出增强的责任感。吸引感和与深爱的人在一起的渴望通常会导致在行为上两个人之间身体距离的缩短（Givens, 1983; Perper, 1985）。就像田诺（Tennov, 1979）指出的那样，你要么想和深爱的人在一起，要么想去深爱的人可能去的地方。

通常，相恋中所伴随的自我怀疑期与试图改变一个人的外表和对爱人的渴望潜在增长是相关联的。因为希望吸引爱人，个人开始重视修饰和梳妆打扮。香水、古龙水、洗液和软膏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当一个人被深恋感占据的时候，音乐和歌曲似乎也起着特殊的作用，司汤达坚持认为：“完美的音乐，就如同心爱的人出现带给人的感觉一样。”并且莎士比亚写的《第十二夜》中的杜克说：“音乐是爱情的精神食粮。”当增强的互动性和配对连结出现的时候，活动地点的偏好以及像分享歌曲这样的事情就会发展起来。

最初的成功经常导致一系列的互动行为，它包括相互的对视、“加以修饰的谈话”（其中的音调、韵律和谈话的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触摸和同步时期每一人都通过往复运动折射对方（Givens, 1983; Morris, 1967; Perper, 1985）。虽然性行为通常被看做是这一过程的最高潮，但同样很明显的是性在恋爱的早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司汤达和田诺提出了关于早期恋爱过程的补充性观点。他们认为这个过程通常在一个特别的时间开始，并且以后能回忆起来。虽然一个人经常被看做是可能的性伙伴，并且最初的仰慕可能主要基于对方的外表和行为某些方面的吸引力（例如，她或他的容貌及走路或说话的方式），但实质上个体在恋爱最初的阶段并非一定需要体验到性吸引。最初的快乐状态是以轻松、愉快、希望、自由的感觉为特征的，而“自由不仅来自平常的重力束缚，也来自于情感的无负担”（Stendahl, 1822/1975）。个体越来越多地思考和反思其精神生活，那个人吸引自己的是什么，还有回顾那些在一起的记忆。

在此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如果发生了相互行为，即从相互对视到性交，则陷入爱情的焦虑和痛苦就会减少。司汤达认为，随着时间的变化，“对爱情的恐惧逐渐消失，而以彻底的沉迷和无限的信任魅力来补偿。爱情变成一种抚平生活苦痛、不断增添生活情趣的温和习惯”。伴随着早期形成的父母依恋模式，快乐、悲伤和浪漫之爱的困惑被可预测到的亲密互动的习惯所代替。为了适应他人的节奏和期望，包括会产生“情感连结”的结果，这时关注降低，并代之以更安全的依恋和真爱。这些发展通常会对社会的环境有显著的影响，包括同居和最终新家庭单元的形成。在大多数文化中，这些以婚礼为标志。在大多数文化中，婚礼的一个要素就是彼此做出承诺和共享责任，一些研究者强调了承诺在爱情关系中的作用。例如，凯利（Kelley, 1983）强调了承诺事关影响爱情关系发展的稳定性，而斯腾伯格（Sternberg, 1986）强调用认知评价和决定来维持与伴侣的关系。

另一个普遍的结果是对追求者及其幻想彼此互动的拒绝。这种情况可以在很多时候发生，从直率地第一次表示对好感的拒绝到建立关系后的拒绝。拒绝通常会导致一方很痛苦的同时仍抱有希望，另一方则仍然坚持他的拒绝：“他或她不是我想要的人。”被拒绝的追求者或者配偶所经历的情绪和行为的轨迹很复杂，情绪上从绝望到坚持，强迫妄想，甚至一小部分导致跟踪或者其他的极端行为。例如，自杀或者谋杀（Buteau, Lesage, & Kiely, 1993; Eastal, 1994）。

在主观的体验层面上，浪漫之爱的早期状态和早期的父母之爱具有很多共同点，包括一种改变的心理状态，侵入性的思维与意象，这与对另外一个人的觉知增强有关，旨在引出对方互动反应的复杂的行为表现。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改变的心理状态导致相同的结果——亲密人际关系的形成。

早期父母之爱和浪漫之爱之间的相似性

现代发展心理学的一个里程碑是对婴儿和父母依恋关系的关注（Ainsworth, 1973; Bowlby, 1969, 1973）。正如由哈赞和薛佛（Hazen & Shaver, 1987, 1994）

所提出的，应用同样的概念框架来判断成年时形成的浪漫依恋的本质和特性也是合理的。至少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浪漫之爱和早期的父母之爱都以一种改变的心理和情绪状态为特征。虽然很困难，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比较不同个体或者同一个体不同时刻的心灵内部状态。然而，证据表明，这些改变的状态有共同之处。例如，在这两个状态中，既愉快地幻想自己是另一个人的唯一，同时又都担心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都存在焦虑紧张，这使希望的结果处于危险之中。虽然还没有详细的研究量化这些关注的频率和强度，但是很多父母都很有趣地说出他们的相同感觉：“没有人告诉我那就像恋爱一样。”其他明显的相似之处包括被对方外表上的一些细节所吸引和把爱人或者婴儿看做是“完美的”倾向。或者，就像一位母亲在她的孩子出生后说的那样：“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就在这里，她那么完美，我简直不能相信她真的就是我的。”

关于浪漫之爱和早期父母之爱的行为表现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著的。浪漫之爱和早期父母之爱都存在一种迫切的渴望，即通过塑造行为来满足对方的需求。通常，这些行为反应具有“刚好”的特征，因此它们可以完全符合对方的需要。责任感的增强通常伴随着警戒水平的增加，同时行为上旨在确保婴儿和爱人的安全。除了家庭环境的亲密性，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状态都以文化背景下的习惯为标志（Leckman & Mayes, 1999, 见表一）。

求爱过程中的许多行为都是从早期的亲子关系中借鉴而来的，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Eibl-Eibesfeldt, 1972, 1989）。具体的例子包括亲本抚育动作，例如舒适的拥抱、爱抚、修饰、亲吻、喂食和相互对视，这些表示对婴儿的亲密举动的词也可以用于爱人。相似的是，由手势或者轻声低语引起的婴儿般的感染力，同样也是爱人之间行为表现的普遍元素。幼态持续的特征（惹人注目的大眼睛和与身体相比更大的头部）常被认为是女性魅力的来源，人类习性学的文献证明了这些偏好的跨文化性，以婴儿般的特征来引起别人兴趣的信号的例子，在其他物种中也存在（包括鸟类和哺乳类）。

连结形成和丧失的变化

在人际关系范围发生变化时，比如我们在生活中为某些新成员（爱人、配偶或孩子）营造空间、应对失去亲密的依恋对象的时候，需要心理和生理的高度灵活性，因为要实现新的认知、情绪和自我平衡。虽然对这一主题的科学文献进行全面探索超出本章的研究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实证研究关注的是排他连结的形成和丧失，而没有关注一种关系的形成和丧失如何影响其他亲密关系的过程和质量。例如，在浪漫之爱和早期父母之爱的过程中都会出现排他性，即他人的重要性减少，并且集中精神和情绪能量。当这种排他性在求婚或早期养育的过程中高度适应以后，可能会给伴侣或者年长的兄弟姐妹带来困难。例如，母亲和孩子之间如此深的排他性关系或许会导致母亲和父亲关系的紧张感增加，因为双方都改变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而在婴儿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Entwisle & Doering, 1981）。在一些研究中，母亲报告随着婴儿的出生，婚姻满意度降低（Belsky, Spanier, & Rovine, 1983）。

哺乳动物连结的生物学

大脑回路和荷尔蒙的影响

尽管在人类中，伴随着亲本抚育（parental care）和配偶连结的中枢神经系统大部分是未知的，然而在哺乳动物中可能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和保守。啮齿类动物模式系统（大鼠、小鼠、田鼠）的经典病变研究表明，许多大脑区域在母性行为 and 成年配偶连结的调节中起作用（Carter, Ahnert, Grossmann, Hrdy, Lamb, Porges, & Sachser, 2005；Keverne, 2005；Leckman, Carter, Hennessey, Hrdy, Keverne, Klann-Delius, Schradin, Todt, & von Holst, 2005；Numan & Insel, 2003）。脑成像研究为了解人类大脑提供了机会。洛伯鲍姆、纽曼、霍维特兹、达布努、莱德瑞德、哈蒙尼、博荷宁和乔治（Lorberbaum, Newman, Horwitz, Dubno, Lydiard, Hamner, Bohning, & George, 2002）发现当听到标准的婴孩哭声时，许

多大脑区域的活动水平会增加。其他一些人也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时使用的是不同的实验范式 and 人群 (Bartels & Zeki, 2000, 2004; Nitschke, Nelson, Rusch, Fox, Oakes, & Davidson, 2004; Ranote, Elliott, Able, Mitchell, Deakin, & Appleby, 2004; Seifritz, Esposito, Neuhoff, Luthi, Mustovic, von Bardeleben, Radue, Cirillo, Tedeschi, & Di Salle, 2003; Swain, Leckman, Mayes, Feldman, & Schultz, 2004)。这些图像研究致力于识别与亲子依恋和浪漫之爱相关的大脑区域。比如巴特尔斯和扎奇 (Bartels & Zeki, 2000) 研究热恋中的 17 个被试, 观察他们在看其配偶图片时的大脑活动, 并把这一结果与观察三个朋友的图片时产生的大脑活动进行对比, 这些朋友在年龄、性别和友谊持续时间上与其配偶相同。结果发现大脑的活动限定于特定的大脑区域, 这些大脑区域的很多部分与父母在看自己孩子图像时的大脑活动区域相一致, 从而再次证明有重叠的大脑回路卷入的观点。总之, 在成年人中, 母性行为 and 成人配偶连结的开启和维持涉及特定的神经回路。引人注目的是, 许多涉及控制母性行为的细胞群也涉及摄食行为 (吃和喝)、保持体温 (能量平衡)、社会行为 (防御和性行为)、一般的探索行为和寻食行为 (带有移动和定向成分)。在这些相同的结构中, 许多行为在应激反应中有所涉及。的确, 亲和行为在应激期间可能有很高的适应性, 而反之也成立: 亲和行为的丧失或者瓦解极具压力。

许多肽 (包括后叶催产素) 能够作用于一些大脑区域, 从而促进母性行为和配对连结。后叶催产素是一种九氨基酸神经肽, 它主要在下丘脑 (大脑的一部分, 调节睡眠—清醒循环和能量维持, 以及许多其他功能) 合成, 并通过脑垂体背部释放到血液。从脑垂体释放的后叶催产素导致子宫在分娩时收缩, 以及在哺乳喂养时乳液流出。它也显示其他那些源于下丘脑包含后叶催产素的纤维, 广泛地投射到大脑和脊髓的其他区域, 它在哺乳动物繁殖的其他几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包括性行为和配对连结, 也包括母性行为的诱导 (Numan & Insel, 2003)。因而, 许多研究者把后叶催产素当做是“亲和神经肽” (affiliative neuropeptide)。

关于后叶催产素在人类母性行为中作用的资料是很缺乏的。母婴间的抚

摸和接触被证明是可以刺激后叶催产素的释放。放在母亲胸口的新生儿通过触摸和吮吸，可以刺激母亲后叶催产素的释放（Matthiesen, Ransjo-Arvidson, & Nissen, 2001），出生后即刻的母婴皮肤接触可以提高母性后叶催产素的水平（Nissen, Llja, Widstrom, & UvnasMoberg, 1995）。有关后叶催产素在人类性行为中作用的资料更少（Meston & Frohlich, 2000）。已知的例子包括两性在性唤起和性高潮期间后叶催产素的循环水平增加。后叶催产素水平与青年男女性高潮的强度（而不是性高潮的持续时间）存在正相关（Carmichael, Warburton, Dixen, & Davidson, 1994）。

另一种被称为阿片肽的大脑神经递质在促进亲和行为中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片肽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混合物，它在大脑中起着如同鸦片或者海洛因一样的作用。可能有人会问，当成瘾是不适应和潜在致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能进化出感受器，从而对致瘾药物做出反应。最贴切的解释是这种阿片肽系统能有效地阻止肉体的疼痛。然而，近来研究者从动物和人类的研究中发现，在分娩和吮吸中会释放内源性阿片肽和后叶催产素，这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中。

大脑中内源性阿片肽的功能被假设为可以促进源于生产和吮吸的积极情感，它们能增强母性照料。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内源性阿片肽功能的阻碍损害了恒河猴母亲与后代的互动质量（Martel, Nevison, Rayment, Simpson, & Kaverne, 1993）。这时，母亲没有拒绝婴儿吮吸，但是平常对婴儿的关注降低了。母亲及其婴儿没有发展出通常应该很强烈的照料关系，并且它们允许其他的雌性在空闲时照料和触摸自己的婴儿。母亲不是正常的专心照料者，并且母婴互动经常是由婴儿发起的。

如果在猴子中的内源性阿片肽系统与母婴连结存在正相关，那么如同海洛因上瘾一样，它会慢慢向下调节阿片肽感受器，可以引起人类母性连结的一些严重结果。海洛因上瘾的女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是混乱的，这使得数据难以理清。尽管如此，事实是将近 50% 上瘾母亲的孩子在一岁的时候会离开他们的亲生母亲，到上学年龄时只有 12% 的这类孩子还和他们的亲生母

亲在一起 (Mayes, 1995)。这些被遗弃的婴儿或者由别人收养，或者由祖父母或其他女性亲属照顾。此外，在一项对 57 个要用美沙酮维持生命的母亲的跟踪研究中，与在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婴儿出生时的重量和妊娠期的年龄上配对的控制组相比，鸦片上瘾的母亲远远不能维持对孩子的原始母性行为，孩子们由于被忽视、抛弃或者受到虐待，更可能被送交到保护孩子的服务机构。类似的，使用可卡因的母亲，这是一种通过相同的大脑“奖赏”基质（腹侧纹状体）起作用的成瘾药物，这样的母亲倾向于更少和孩子待在家中，并体验到更强的敌意和有更低水平的后叶催产素 (Light, Grewer, Amieo, Boccia, Brownley, & Johns, 2004)。

理解母婴连结的一个重要的生物学问题是内源性阿片肽在大脑中的哪些区域起作用，以及它是怎样与成瘾的病理学条件联系起来的。阿片肽系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在腺侧的纹状体的感受器上起作用，与“奖赏”相关的一个系统发生的大脑的活跃部分 (Koob & Le Moal, 1997)。大脑的这个部分接收其他神经递质（包括多巴胺）是为了能更新刺激，而这些神经递质可以查出与预测不同的奖赏所发生的情境 (Schultz & Dickinson, 2000)。母婴在连结过程中需要强迫性的理毛行为，从而带来大脑中内源性阿片肽的释放 (Keverne, Martinez, & Tuite, 1989)。这种母亲的理毛行为集中在面部、手部和生殖器，这也是猴子幼崽在早期发展中显示出最大改变的表现型特征。因为灵长类动物表现出长期的产后照料，后代识别需要不断持续地更新婴儿的形态特征和行为发展中的这些变化。婴儿识别的更新包括大脑中与腹侧纹状体“奖赏”区域相关的视觉和情绪通路。婴儿可以有效地引发积极的情绪反应而使父母出现照料行为，并不需要通过怀孕和分娩来启动持续的荷尔蒙。有趣的是，通过 fMRI 技术发现，对婴儿的哭声或者浪漫伴侣的图像有反应的大脑区域包含许多有关奖赏和成瘾的大脑结构 (Bartels & Zeki, 2000, 2004; Lorberbaum et al., 2002)。

居住在巨大的社会团体中需要“社会粘剂”(social glue)，它超越择偶、怀孕、释放后叶催产素和内源性阿片肽的分娩这些生物学生活事件，这对于脑容量较小的哺乳动物的连结足够了。较大脑容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

将社会决策从由怀孕和择偶的荷尔蒙决定的排他性情境中解放出来 (Keverne, Martel, & Nevison, 1996)。要成为好母亲, 女性不一定要承担怀孕与分娩, 或者做出成为好母亲的决定。脑容量逐渐进化以及荷尔蒙释放在母系中对两性互动和母婴互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人类中, 两性连结不仅是繁殖的角色, 而母婴连结既不受到怀孕时荷尔蒙的限制, 也不受到产后荷尔蒙的限制。父母教养与泛亲抚育是对于社会群体的雌性灵长类动物来说的一生职业, 是一种对大脑进化有重要影响的进化发展。大脑发育消耗能量, 把大脑发育推迟到产后, 不仅可以减少母亲在怀孕时的能量需求, 而且也能确保婴儿的大脑在提升社会技能的环境中发展, 这种技能对于达到成人社会凝聚是不可或缺的。人类大脑的进化进一步提高了认知技能, 促进了包括合成药物在内的发明, 这种药物可以侵占用于奖赏的大脑系统发生的旧神经环路。因此, 这些药物是有价值的, 以至于它们是自我实现的, 代替了社会重视的关系, 成为上瘾的结果。

基因决定和早期环境的影响

减少变异的基因靶子实验 (Gene-targeting experiments) (基因“淘汰”研究) 证实至少有十种特定的基因对母性行为的发展是必需的 (Leckman & Herman, 2002), 其中许多基因是和相同的脑区域和荷尔蒙以及神经递质相联系的。例如, 催产素和多巴胺。相对而言, 迄今只有一种基因被看做是正常婴儿的应答性 (responsiveness) 所必不可少的, 即阿片受体 (Mu-opioid receptor) 基因。在那个研究中, 莫尔斯、基弗和依玛图 (Moles, Kieffer, & D'Amato, 2004) 提出与“正常的”老鼠幼崽相比, 这种“基因变异的”老鼠幼崽, 当它们远离母亲时, 发出较少的超声波音, 但是, 当这两种不同老鼠都被暴露于低温时, 它们发出相同数量的超声波音。这些“基因变异的”幼崽没有显示出对它们母亲的偏好, 并且在短暂的母性接触后不会发出超声波音。

基因是重要的, 但不是全部。一个关于成长个体的研究指出, 新生动物未来的母性行为 (当他们像成年动物那样繁殖时) 明显地受到出生后所受照

料的影响。更进一步地说，贯穿幼崽一生的应激反应（*stress response*）的许多方面似乎是在生命早期建立的。在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关注的是与啮齿类动物母亲表现在母性的舔和理毛行为上所自然产生的变化相关的不同结果（Francis, Diorio, Liu, & Meaney, 1999）。在随后的交叉抚养（*cross-fostering*）研究中，研究者确定一个雌性幼崽在幼年时获得的舔和理毛行为的数量与它作为一个新母亲提供给后代的舔和理毛行为的次数相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也发现有低频的舔和理毛行为的母兽的雌性后代如果被有高频的舔和理毛行为的母兽交叉抚养，那么它们也会变成有高频的舔和理毛行为的母亲，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这些行为变化的分子基础现在开始被理解。例如，韦佛、塞尔沃尼、钱普尼斯、D'阿莱西奥、夏尔马、塞克儿、戴摩乌、斯兹夫和米诺（Weaver, Cervoni, Champagne, D'Alessio, Sharma, Seckl, Dymov, Szyf, & Meaney, 2004）最近阐明，个体的差异是由于基因表达的持久改变，这种改变部分是由于在生命初期为DNA增加甲基分子的高度特异化模式导致的。这个复杂的过程似乎会影响学习和记忆方面。

对社会的灵长类研究的证据同样强调早期母爱的照顾在决定雌性后代最终将成为怎样的母亲上是很重要的（Harlow, 1963; Suomi & Ripp, 1983）。同样清楚的是，在灵长类中早期母爱剥夺的后果或许很难逆转；许多被剥夺母爱的猴子成年后，在一般条件下功能是很正常的，但是，它们不能应对心理上的应激源（Kraemer et al., 1991; Snomi, Delizio, & Harlow, 1976）。另一方面，在啮齿类动物模式中，临近发育期的丰富环境似乎可以弥补早期母性分离的后果（Francis et al., 2002）。总之，尽管存在基因的限制，在随后的母性行为、焦虑调节和应激反应模式上所存在的个体差异，早期的照料经历对其有持久的影响。关于动物研究的资料指明，老鼠的幼崽或恒河猴幼猴出生前后的时期是一个关键期，它可能产生持久的（但并非不变的）神经生物学和行为的后果。

人类早期生活体验、风险和复原力

在鲍尔比 (Bowlby, 1969, 1973) 早期工作的基础上, 我们试图描述早期监护人—婴儿双方的互动, 并评估其影响, 这在社会和情绪发展领域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和实征的工作框架 (Cassidy & Sharer, 1999; Leckman et al., 2005)。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证据, 即在早期亲子关系中的严重紊乱 (反映在孩子受到虐待和忽视这样的事件或者不安全依恋) 会使内在化和外在化紊乱的风险增加 (Sroufe, Carlson, Levy, & Egeland, 1999)。即使早期的不幸和不安全依恋可能不是后来精神病理学的确切原因, 它们的出现仍会带来风险。相反, 针对高风险婴儿的纵向研究表明, 在出生前后, 婴儿与照顾的成人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会赋予一定程度的复原力^①, 以应对生命后期精神病理学的发展 (Werner & Smith, 2001)。在亲和行为的神经系统中, 除了情感这一关键因素之外, 这些早期的交互作用对个体的世界观和它包含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成长个体的证据显示, 人类照顾者对他们孩子的应答水平可以追溯到照料者在儿时的养育历史和相关的依恋体验 (Miller, Kramer, Warner, Wickramaratne, & Weissman, 1997)。学者假设照顾者的相关依恋体验被编码为自我和他人的“内在工作模式”, 这种模式建立在情感交流的风格上, 而情感交流可以适时缓解个体压力或促进不适应情感模式和行为的调节 (Belsky, 2005; Bretherton & Munholland, 1999)。例如, 在关于母亲相关依恋记忆的成人依恋的访谈研究中发现了精神创伤的体验, 例如分离 (如住进医院, 因战争背井离乡) 或者失去家庭成员 (父亲、祖父母等)。在两次短暂的母子分离后 (每次不超过三分钟), 为了对孩子与母亲重新建立联系的策略进行归类, 把孩子放在安斯沃斯的陌生人实验情境中进行观察。结果表明在母亲过去有创伤性体验的婴儿中,

① 术语 *resiliency* (*resilience*) 在国内也被译做是“心理弹性”、“压弹”、“心理韧性”、“韧性”、“弹性”、“心理恢复力”、“心理承受力”、“抗逆力”、“坚韧性”。——译者注

更多地观察到紊乱型依恋策略的迹象（Grossmass, 人际沟通, 2003）。

认识到精神病理学中的某一些典型行为在某种生存环境下实际上是适应性的，这非常重要。例如，在受忽视的环境中，具有攻击性的、不安全依恋的婴儿（可能后来会变成行为紊乱和无情的）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生存下来，然而在同样的环境中温顺的兄弟姐妹却不能存活（Belsky, 2005）。

在这种背景下，近来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的兴趣是安全依恋在形成婴儿的体验和期望中所起的作用（Fonagy, Gergely, Jurist, & Target, 2002）。通过与婴儿进行同步的情感交流，照顾者为婴儿发展生物调节的能力提供了外在支持，从而传承了应对压力能力的精神复原力。在孩子两个月左右的时候，照顾者和孩子的情感状态的低水平配合以及面对面交互中唤醒的水平，这些为孩子们的社会发展、移情和道德内化提供了基础（Feldman, Green-baum, & Yirmiya, 1999; Feldman, Weller, & Leckman et al., 1999）。在面对面互动时，母亲的凝视、面部表情的表达、发音和唤醒状态的调节为视觉表层的成熟提供了关键的环境输入。而且，这与婴儿的唤醒状态同步，母亲调节着婴儿的生物节奏（Lester, Hoffman, & Brazelton, 1985; Feldman, Weller, Sirota, & Eidelman, 2003），这提供了内部和外部体验、自我和他人、大脑和行为的“共鸣”（Trewarthan, 1993）。对风险发展的敏感期或者复原力提高情感调节的详细本质进行研究，可能在精神创伤后（Heim & Nemeroff, 2001），或者对于高风险家庭实行干预计划。

早期干预增强父母的敏感性和 孩子的依恋安全感

依恋安全感是人的一生中的一个复原力因素。近来对 88 个干预研究的元分析中，贝柯曼斯—柯伦伯、范伊赞杜和佳芙尔（Bakermans-Kranenburg, van Ijzendoorn, & Juffer, 2003）发现，总体上，干预在增强父母敏感性和孩子依恋安全感上是有效的。关于养育技能、社会支持或母亲幸福感的干预显然是更成

功的。因此，干预既包括对母亲的干预，也包括对父亲的干预。早期干预研究强调了针对各类高风险人群设计出明确的短期行为干预的重要性。这个重要研究的缺陷之一是治疗停止之后无法系统地评估干预效果。因此，无法确定在治疗后立即观察到的改善状况对后来精神病理学的风险与复原力有短期的效果，还是有长期的效果。

因此，目前至少有三个关于随机分配和胎儿期启蒙的选择性干预研究，干预时间至少持续一年，并主要集中在对孩子行为的调整 (Leckman et al., 2004)。第一个研究设置基于包括家庭访问、家长会面和医疗护理在内的干预模式 (Brooks-Gunn, Klebanov, Liaw, & Spiker, 1993; McCarton, Brooks-Gunn, & Wallace, 1997)。这种干预模式在孩子两到三岁时显示出效果，在五岁时效果减弱。第二个干预包括由保育员所做的家庭访问、家长会面和医疗护理。这项干预在孩子四岁时显示的效果较小，而到五六岁的时候效果则非常显著 (Gutelius et al., 1972, 1977)。第三个干预主要依靠保育员的家庭访问，它集中于对低收入的未婚母亲进行干预，这项干预直到孩子十五岁时才显示出大量显著的积极结果，包括较少的后续怀孕，使用福利的减少，孩子受虐和忽视的比例降低和因犯罪行为被捕的事件减少 (Olds & Eckenrode et al., 1997; Olds & Henderson et al., 1998, 1999; Olds & Robinson et al., 2002, 2004)。这些由奥尔兹 (Olds) 及其同事所从事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即早期干预在高风险孩子的生活中产生影响。尽管这些影响的实现机制是未知的，但是，奥尔兹及其同事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母亲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怀孕之间参加家庭访问计划的时间长度。平均来看，参加家庭访问计划实验组的母亲，到第二次怀孕的间隔多于 60 个月，而对照组的时间间隔则不到 40 个月。这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参加保育员家庭访问计划的母亲给予孩子更多潜在的母性投资。近来基于丹佛 (Denver) 的一个研究，通过一个相同的调查群体，结果证明经过保育员访问的新母亲很少有随后怀孕 (29% vs. 41%) 和生产 (12% vs. 19%)，她们延长了第二次怀孕的时间间隔；在她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年，他们比对照组女性的工作时间更多 (6.83 vs. 5.65 个月)，由保育员访问的母子之间

的互动比对照组更具有应答性。在6个月的时候，由保育员访问的婴儿在面对可怕的刺激物时，更少显示出情绪的脆弱性。特别明显的是在21个月的时候，由保育员访问的、拥有较少心理资源的母亲所生育的婴儿更少表现出语言发育迟缓（7% vs. 18%）；并且在24个月的时候，他们展现的智力发展优于对照组的婴儿。总之，从选择性的早期干预计划所获得的数据表明，婴儿出生前后的时期是关键期，这个时期会产生持久的行为后果。最令人瞩目的是，数据显示早期干预计划可以减少各种不适应的结果，比如在青少年司法系统中的早期卷入。早期干预对孩子成年后的抑郁和焦虑症比率没有明显的影响。早期干预计划对个体的压力敏感度、药物滥用的易感性或作为父母的照顾者的能力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早期的选择性干预计划中，没有一项干预将母亲的关注作为个体结果差异（表6-1）最可能的预测源进行监控。不管怎样，这项计划（现在称为保育员—家庭合作关系计划）可能反映出一种助亲抚育的形式，从而造成了现实的差异。

结论

关于哺乳动物系统的行为、基因与神经生物学研究激发了生物医学研究、临床实践，尤其是针对高危险父母的早期干预计划。“足够好的”基因加上“足够好的”亲本抚育，可以保证孩子在儿童期及其他时期产生积极的结果。其中一些积极的结果包括从生活灾难中的复原力、成为下一代足够好的父母的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因而，有效的早期干预计划可能会对未来后代产生积极的结果。作为关键范围内功能改变的指标，“最初的父母关注”的测量在未来的早期干预计划中可能是很有用的。

临床医生和干预计划模式的设计者之间的亲密合作是长期存在的。这些合作现在开始包括脑成像实验师、发展和行为的神经学家、基因学家和免疫学家。我们研究基因、大脑发展和免疫健康的决定因素的能力比以往更强大。未

来的研究应该可以检验早期干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影响了大脑的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压力应对能力，以及改变后期的精神和生理疾病的易感性。

致谢

在这一章的准备工作中，我们从2003年秋季在柏林举办的达勒姆工作坊受益匪浅。我们很感谢参加这次工作坊的迈克尔·B·轩尼诗（Michael B. Hennessy）、吉塞拉·克兰·德利乌斯（Gisela Klann-Delius）、卡斯腾·施拉德登（Carsten Schradin）、迪特马尔·拉德特（Dietmar Todt）和狄尔特瑞查·霍尔斯特（Dietrich von Holst）以及他们在工作坊的课程期间的其他同事，包括丽瑟罗特·安妮特（Lieselotte Ahnert）、杰伊·班斯基（Jay Belsky）、艾莉森·S·佛兰芝（Alison S. Fleming）、克劳斯·E·格罗斯曼（Klaus E. Grossmann）、梅根·R·贡纳（Megan R. Gunnar）、格雷·W·克拉默（Gray W. Kraemer）、迈克尔·E·拉姆（Michael E. Lamb）、卡兰·里昂·鲁思（Karlen Lyons-Ruth）、托马斯·G·奥康纳（Thomas G. O’Conner）、康特·A·派德森（Cort A. Pedersen）、米里亚姆·斯蒂尔（Miriam Steele）、科尔温·特里维森（Colwyn Trevarthen）和拉里·J·扬（Larry J. Young）。其他的研究者也对这一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包括琳达·C·迈尔斯（Linda C. Mayes）、鲁思·费尔德曼（Ruth Feldman）和詹姆斯·E·斯温（James E. Swain）。这一章的部分改编自《在依恋和连结中：一种新综合》，由C. S. 卡特尔（C. S. Carter）、L. 安妮特（L. Ahnert）、K. E. 格罗斯曼（K. E. Grossmann）、S. B. 哈迪（S. B. Hrdy）、M. E. 拉姆（M. E. Lamb）、S. W. 波基斯（S. W. Porges）和N. 萨克斯（N. Sachser）编辑出版，达勒姆工作坊报告第92号（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5），pp. 303-349。

参考文献

- Ainsworth, M. D. S.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In B. Caldwell and H.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Van IJzendoorn, M. H., and Juffer, F. (2003). Less is more: Meta-analyses of sensitivity and attachment interventions in early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195-215.
- Bartels, A., and Zeki, S. (2000). The neural basis of romantic love. *Neuroreport*, 11, 3829-3834.
- . (2004).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maternal and romantic love. *Neuroimage*, 21 (3): 1155-1166.
- Belsky, J. (2005). The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achment. In C. S. Carter, L. Ahnert, K. E. Grossmann, S. B. Hrdy, M. E. Lamb, S. W. Porges, and N. Sachser (eds.),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Dahlem Workshop Report 9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elsky, J., Spanier, G. B., and Rovine, M. (1983).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marriage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5, 567-577.
-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London: Hogarth.
- .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etherton, I., and K. Munholland. (1999).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in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 construct revisited. In J. Cassidy and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p. 89-111.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rooks-Gunn, J., Klebanov, P. K., Liaw, F., and Spiker, D. (1993).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birthweight, premature infants: Changes i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ver the first three years. *Child Development*, 64 (3): 736-753.
- Buteau, J., Lesage, A. D., and Kiely, M. C. (1993). Homicide followed by suicide: A Quebec case series, 1988-1990.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38, 552-556.
- Carmichael, M. S., Warburton, V. L., Dixen, J., and Davidson, J. M. (1994). Relationships among cardiovascular, muscular, and oxytocin responses during human sexual activit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3, 59-79.
- Carter, C. S. (2005). Perspectives on social attachment and bonding. In C. S. Carter, L. Ahnert, K. E. Grossmann, S. B. Hrdy, M. E. Lamb, S. W. Porges, and N. Sachser (eds.),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Dahlem Workshop Report 9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arter, C. S., Ahnert, L., Grossman, K. E., Hrdy, S. B., Lamb, M. E., Porges, S. W., and Sachser, N. (2005).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arter, C. S., DeVries, A. C., and Getz, L. L. (1995). Physiological substrates of mammalian monogamy: The prairie vole model.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19 (2): 303-314.

- Cassidy, J., and Shaver, P. R. (eds.). (1999).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Easteal, P. (1994). Homocide-suicides between adult sexual intimates: An Australian study. *Suicide and Life Threatening Behavior*, 24, 140-151.
- Eibl-Eibesfeldt, I. (1972). *Love and Ha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Behavior Pattern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 (1989). *Human Etholog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Eisenberg, J. F., and Kleiman D. G. (eds.). (1983).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Mammalian Behavior*. Stillwater, Okla.: American Society of Mammalogists.
- Entwisle, D. R., and Doering, S. G. (1981). *The First Birth: A Family Turning Poi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Feldman, R., Greenbaum, C. W., and Yirmiya, N. (1999). Mother-infant affect synchrony as an antecedent to the emergence of self-contro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 223-231.
- Feldman, R., Weller, A., Leckman, J. F., et al. (1999). The nature of the mother's tie to her infant: The formation of parent-infant bonding in healthy and at-risk dyad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0, 929-939.
- Feldman, R., Weller, A., Sirota, L., and Eidelman, A. I. (2003). Testing a family intervention hypothesis: The contribution of mother-infant skin-to-skin contact (kangaroo care) to family interaction and touch.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7, 94-107.
- Fleming, A. (2005). Plasticity of innate behavior: Experiences throughout life affect maternal behavior and its neurobiology. In C. S. Carter, L. Ahnert, K. E. Grossmann, S. B. Hrdy, M. E. Lamb, S. W. Porges, and N. Sachser (eds.),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Dahlem Workshop Report 9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Fonagy, P., Gergely, G., Jurist, E. L., and Target, M. (2002). *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New York: Other Press.
- Francis, D., Diorio, J., Liu, D., and Meaney, M. J. (1999). Non-genomic transmission across generations of maternal behavior and stress responses in the rat. *Science*, 286, 1155-1158.
- Francis, D. D., Diorio, J., Plotsky, P. M., and Meaney, M. J. (2002).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reverses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separation on stress reactivit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2 (18): 7840-7843.
- Francis, D. D., Szegda, K., Campbell, G., Martin, W. D., and Insel, T. R. (2003). Epigenetic sources of behavioral differences in mice. *Nature Neuroscience*, 6 (5): 445-446.
- Givens, D. B. (1983). *Love Signals: How to Attract a Mate*. New York: Crown.
- Gutelius, M. F., Kirsch, A. D., MacDonald, S., Brooks, M. R., and McErlean, T. (1977). Controlled study of child health supervision: Behavioral results. *Pediatrics*, 60 (3): 294-304.
- Gutelius, M. F., Kirsch, A. D., MacDonald, S., Brooks, M. R., McErlean, T., and Newcomb, C. (1972). Promising results from a cognitive stimulation program in infancy. A preliminary report. *Clinical Pediatrics* (Philadelphia), 11 (10): 585-593.
- Harlow, H. F. (1963). The maternal affectional system of rhesus monkeys. In H. L.

- Rheingold (ed.), *Maternal Behavior in Mammals*, pp. 254-281. New York: Wiley.
- Harlow, H. F., Harlow, M. K., and Suomi, S. J. (1971). From thought to therapy: Lessons from a primate laboratory. *American Scientist*, 59, 538-549.
- Hazen, C., and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 (1994). Attachment as 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close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Inquiries*, 5, 1-22.
- Heim, C., and Nemeroff, C. B. (2001). The role of childhood trauma in the neurobiology of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Biological Psychiatry*, 49, 1023-1039.
- Horton, D. (1957). The dialogue of courtship in popular so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 569-578.
- Hrdy, S. B. (1999). *Mother Nature: A History of Mothers, Infants and Natural Selection*. New York: Pantheon.
- . (2005).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 cooperative breeding model. In C. S. Carter, L. Ahnert, K. E. Grossmann, S. B. Hrdy, M. E. Lamb, S. W. Porges, and N. Sachser (eds.),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Dahlem Workshop Report 9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Jankowiak, W. R., and Fischer, E. F.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ology*, 31, 149-155.
- Kelley, H. H. (1983). Love and commitment. In H. H. Kelley (e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65-314. New York: Freeman.
- Keverne, E. B. (2005). Neurobiological and molecular approaches to attachment and bonding. In C. S. Carter, L. Ahnert, K. E. Grossmann, S. B. Hrdy, M. E. Lamb, S. W. Porges, and N. Sachser (eds.),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Dahlem Workshop Report 9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Keverne, E. B., Martel, F. L., and Nevison, C. M. (1996). Primate brain evolution: Genetic and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262, 689-696.
- Keverne, E. B., Martinez, N. D., and Tuite, B. (1989). Beta-endorphin concentration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monkeys are influenced by grooming relationship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14, 155-161.
- Koob, G. F., and Le Moal, M. (1997). Drug abuse: Hedonic homeostatic dysregulation. *Science*, 278 (5335): 52-58.
- Kraemer, G. W. (1992). A psychobiological theory of attachment.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5 (3): 493-511.
- Kraemer, G. W., Ebert, M. H., Schmidt, D. E., and McKinney, W. T. (1991). 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 A psychobiological study of mother-infant separation in rhesus monkeys. *Child Development*, 62, 548-566.
- Leckman, J. F., Carter, C. S., Hennessy, M. B., Hrdy, S. B., Keverne, E. B., Klann-Delius, G., Schradin, C., Todt, D., and Von Holst, D. (2005). Group Report: Bio-behavioral Processes in Attachment and Bonding. In C. S. Carter, L. Ahnert, K. E. Grossmann, S. B. Hrdy, M. E. Lamb, S. W. Porges, and N. Sachser (eds.),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Dahlem Workshop Report 92, pp. 303-349.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Leckman, J. F., Feldman, R., Swain, J. E., Eicher, V., Thompson, N., and Mayes, L. C. (2004). Primary parental preoccupation: Neurohormonal circuits, genes, and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Neural Transmission*, 111 (7): 753-771.
- Leckman, J. F., and Herman, A. (2002). Matern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Biological Psychiatry*, 51 (1): 27-43.
- Leckman, J. F., and Mayes, L. C. (1999). Preoccupations and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romantic and parental love: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8, 635-665.
- Leckman, J. F., Mayes, L. C., Feldman, R., Evans, D. W., King, R. A., and Cohen, D. J. (1999). Early parental preoccupations and behaviors and their possible relationship to the symptom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00 (suppl. no. 396): 1-26.
- Lester, B. M., Hoffman, J., and Brazelton, T. B. (1985). The rhythmic structure of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in term and preterm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56, 15-27.
- Light, K. C., Grewen, K. M., Amico, J. A., Boccia, M., Brownley, K. A., and Johns, J. M. (2004). Deficits in plasma oxytocin responses and increased negative affect, stress, and blood pressure in mothers with cocaine exposure during pregnancy. *Addictive Behavior*, 8, 1541-1564.
- Lorberbaum, J. P., Newman, J. D., Horwitz, A. R., Dubno, J. R., Lydiard, R. B., Hamner, M. B., Bohning, D. E., and George, M. S. (2002). A potential role for thalamocingulate circuitry in human maternal behavior. *Biological Psychiatry*, 51 (6): 431-445.
- Martel, F. L., Nevison, C. M., Rayment, F. D., Simpson, M. D. A., and Keverne, E. B. (1993). Opioid receptor blockade reduces maternal affect and social grooming in rhesus monkey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18, 307-321.
- Matthiesen, A. S., Ransjo-Arvidson, A. B., and Nissen, E. (2001). Postpartum maternal oxytocin release by newborns: Effects of infant hand massage and sucking. *Birth*, 28, 13-19.
- Mayes, L. C. (1995). Substance abuse and parenting.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vol. 4, *Applied and Practical Parenting*, pp. 101-126. Mahwah, N.J.: Erlbaum.
- McCarton, C. M., Brooks-Gunn, J., Wallace, I. F., et al. (1997). Results at age 8 years of early intervention for low-birth-weight premature infants. The Infa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JAMA*, 277 (2): 126-132.
- Meltzoff, A. N., and Prinz, W. (eds.). (2002). *The Imitative Mind: Developmental, Evolution and Brain Ba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ston, C. M., and Frohlich, P. F. (2000). The neurobiology of sexual funct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7, 1012-1030.
- Miller, L., Kramer, R., Warner, V., Wickramaratne, P., and Weissman, M. M. (1997).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al bonding among wom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6 (8): 1134-1139.
- Moles, A., Kieffer, B. L., and D'Amato, F. R. (2004). Deficit in attachment behavior in mice lacking the mu-opioid receptor gene. *Science*, 304, 1983-1986.

- Morris, D. (1967). *Intimate Behavior*. New York: Bantam Books.
- Nissen, E., Lilja, G., Widstrom, A. M., and Uvnas-Moberg, K. (1995). Elevation of oxytocin levels early post partum in women. *Acta Obstetrica Gynecologica Scandinavica*, 74, 530-533.
- Nitschke, J. B., Nelson, E. E., Rusch, B. D., Fox, A. S., Oakes, T. R., and Davidson, R. J. (2004). Orbitofrontal cortex tracks positive mood in mothers viewing pictures of their newborn infants. *Neuroimage*, 21 (2): 583-592.
- Numan, M., and Insel, T. R. (2003). *The Neurobiology of Parental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
- Olds, D. L., Eckenrode, J., Henderson, C. R., Jr., Kitzman, H., Powers, J., Cole, R., Sidora, K., Morris, P., Pettitt, L. M., and Luckey, D. (1997). Long-term effects of home visitation on maternal life course an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Fifteen-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ized trial. *JAMA*, 278 (8): 637-643.
- Olds, D. L., Henderson, C. R., Jr., Cole, R., Eckenrode, J., Kitzman, H., Luckey, D., Pettitt, L. M., Sidora, K., Morris, P., and Powers, J. (1998). Long-term effects of nurse home visitation on children's crimin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15-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AMA*, 280 (14): 1238-1244.
- Olds, D. L., Henderson, C. R., Jr., Kitzman, H. J., Eckenrode, J. J., Cole, R. E., and Tatelbaum, R. C. (1999). Prenatal and infancy home visitation by nurses: Recent findings. *Future Child*, 9 (1): 44-65, 190-191.
- Olds, D. L., Robinson, J., O'Brien, R., Luckey, D. W., Pettitt, L., Henderson, C. R., Jr., Ng, R. K., Sheff, K., Korfmacher, J., Hiatt, S., and Talmi, A. (2002). Home visiting by paraprofessionals and by nurse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ediatrics*, 110 (3): 486-496.
- Olds, D. L., Robinson, J., Pettitt, L., Luckey, D. W., Holmberg, J., Ng, R. K., Isacks, K., Sheff, K., and Henderson, C. R., Jr. (2004). Effects of home visits by paraprofessionals and by nurses: Age 4 follow-up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trial. *Pediatrics*, 114 (6): 1560-1568.
- Papousek, H., Jurgens, U., and Papousek, M. (eds.). (1992). *Nonverbal Vocal Communication: Comparative and Developmental Approach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rper, T. (1985). *Sex Signals: The Biology of Love*. Philadelphia: ISI Press.
- Pryce, C. R., Bettschen, D., and Feldon, J. (2001).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early handling and early deprivation on maternal care in the rat.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38 (4): 239-251.
- Ranote, S., Elliott, R., Abel, K. M., Mitchell, R., Deakin, J. F., and Appleby, L. (2004). The neural basis of maternal responsiveness to infants: An fMRI study. *Neuroreport*, 15 (11): 1825-1829.
- Rosenblatt, J. S. (1967). Nonhormonal basis of maternal behavior in the rat. *Science*, 158, 1512-1514.
- Rosenblatt, J. S., and Lehrman, D. S. (1963). Maternal behavior in the laboratory rat. In H. L. Rheingold (ed.), *Maternal Behavior in Mammals*, pp. 8-57. New York: Wiley.
- Schultz, W., and Dickinson, A. (2000). Neuronal coding of prediction errors.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3, 473-500.

- Seifritz, E., Esposito, F. J. C., Neuhoff, A., Luthi, H., Mustovic, G., Dammann, U., Von Bardleben, E. W., Radue, S., Cirillo, G., Tedeschi, G., and Di Salle, F. (2003). Differential sex-independent amygdala response to infant crying and laughing in parents versus non-parents. *Biological Psychiatry*, 54 (12): 1367–1375.
- Shea, J. A., and Adams, G. R. (1984). Correlates of romantic attachment: A path analysis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3, 27–44.
- Sroufe, L. A., Carlson, E. A., Levy, A. K., and Egeland, B. (1999).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1 (1): 1–13.
- Stendhal [Beyle, H. M.]. (1822/1975). *Love*. London, Penguin Books.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s*, 93, 119–135.
- Suomi, S. J., Delizio, R., and Harlow, H. F. (1976). Social rehabilitation of separation-induced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monkey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3 (11): 1279–1285.
- Suomi, S. J., and Ripp, C. (1983). A history of motherless moth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imate Laboratory. In M. Reite and N. Caine (eds.), *Child Abuse: The Nonhuman Primate Data*, pp. 49–78. New York: Alan R Liss.
- Swain, J. E., Leckman, J. F., Mayes, L. C., Feldman, R., and Schultz, R. T. (2004). 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arent-infant attachment.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9, S195.
- Teicher, M. H., and Blass, E. M. (1977). First suckling response of the newborn albino rat: The roles of olfaction and amniotic fluid. *Science*, 198, 635–636.
- Tennov, D. (1979). *Love and Limerence: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 Love*. New York: Stein and Day.
- Tomasello, M. (1999).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 In Tomasello,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revarthan, C. (1993). The self born in intersubjectivity: The psychology of an infant communicating. In U. Neisser (ed.), *The Perceived Self: Ecological and Interpersonal Sources of Self-knowledge*, pp. 121–17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Stepping away from the mirror: Pride and shame in adventures of companionship”—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and emotional needs of infant intersubjectivity. In C. S. Carter, L. Ahnert, K. E. Grossmann, S. B. Hrdy, M. E. Lamb, S. W. Porges, and N. Sachser (eds.), *Attachment and Bonding: A New Synthesis*, Dahlem Workshop Report 9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Tzourio-Mazoyer, N., De Schonen, S., Crivello, F., Reutter, B., Aujard, Y., and Mazoyer, B. (2002). Neural correlates of woman face processing by 2-month-old infants. *Neuroimage*, 15, 454–461.
- Weaver, I. C., Cervoni, N., Champagne, F. A., D’Alessio, A. C., Sharma, S., Seckl, J. R., Dymov, S., Szyf, M., and Meaney, M. J. (2004). Epigenetic programming by maternal behavior. *Nature Neuroscience*, 7, 847–854.
- Werner, E. E., and Smith, R. S. (2001). *Journeys from Childhood to Midlife: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nnicott, D. W. (1956/1975).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 In Winnicott,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pp. 300–305. New York: Basic Books.

第二部分

爱情类型





浪漫之爱的风格

克莱德·亨德里克 (Clyde Hendrick)
苏珊·S·亨德里克 (Susan S. Hendrick)

约翰·艾伦·李 (John Alan Lee) 的《爱情的风格》(The Colours of Love, 1973) 一书出版后引发了相当大的研究兴趣。这本书基于对大量的浪漫之爱文献历史分析, 提出了一个直观上很吸引人的浪漫之爱的分类学, 并通过一种复杂的访谈法得到实征的支持, 李称之为爱情故事卡片分类 (Love Story Card Sort)。

正如李在这本书中一个 50 页的附录所描述的, 这种方法学是劳动密集型的。卡片分类包括近 170 个短句, 每个短句都写在一张绿色卡片上。例子包括“我遇见 X 的那天晚上……”和“在我深陷爱河的那段时间, 我所做的一些事情……” 每张绿色卡片都与有多种可能回答的白色卡片相匹配, 可供选择的回答从 6 种到 15 种之多。例如, 第 43 类绿色卡片写着“我遇见 X 的那天晚上”, 一些可能的回答包括“我几乎不能入睡”, “我梦见了 X” 和“我给 X 写了一封信”。一个人可以有多种选择。一个人在进行卡片分类时的方式基本可以告诉我们在他生活中特殊的爱情故事。当然, 数据分析的程序是相当困难的。

在李（1988）的《爱情心理学》那一章中，对于大多数以他的观点为基础的研究，他并不感到兴奋。他指责这些研究没有历史背景，并且他认为从一个等级评定量表中所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没有令人满意的捷径充分地分析像爱情一样复杂的体验。只有像爱情故事卡片分类这样精细的工具才能区分富有历史变化和文化表达上存在重叠的意识形态。”（Lee, 1988, p. 63）毋庸置疑，李反对使用等级量表的指责以失败告终。几乎所有基于其理论的研究都使用了等级量表。本章详细论述了我们自己在爱情风格方面成功的研究方案，其中使用了一套等级评定项目，我们称之为爱情态度量表（Love Attitudes Scale）。在完成《爱情心理学》这一章的写作和出版前，李显然接受了等级量表的普遍性，在李给我们的一封信中（J. A. 李，私人信件，1987年11月25日），他亲切称赞这是关于爱情风格的首篇实证性的文章。

将爱情定义为爱情风格

在先前部分的引述中，李（1988）将从他的卡片分类中提取的成分定义为爱情的意识形态。他也把这些成分称为爱情风格，这是在拉斯威尔和洛森兹（Lasswell & Lobsenz, 1980）的书中十分普及的标签。“风格”可能是比“意识形态”更好的标签，因为风格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互动的，而且，像李说的那样，某人也许会两个不同的浪漫伴侣同时卷入两种不同的爱情风格之中。

我们将爱情风格构想为态度或信念体系，该体系包括一个可变的情绪中心，爱情风格和人格特质也可能有一些关联。对于包含态度或信念、人格方面以及和浪漫的社会行为模式相关的一些构念，“爱情风格”看起来是更适宜的标签。

李（1973）用色轮来类比他建立其爱情类型学的概念框架，三原色映射出三种主要的爱情风格：激情型、游戏型和友谊型。三原色的合理混合产生爱情的合成色：实用型、占有型和利他型。其他的混合也是可能的，但是，李和后

继的研究者主要强调这六种爱情类型。他们用一个段落对每种爱情类型的内容做了充分的描述。简单总结如下：激情型（激情的、性爱的），游戏型（游戏式的、无承诺的），友谊型（友谊），实用型（实际的、攻于心计的），利他型（利他主义的、给予的）和占有型（强迫性的）。

作为一种研究浪漫之爱的方法，爱情风格对我们很有感染力。因为它们允许在爱情的个人定义方面有广泛的自由，并且通常和浪漫之爱的常识性观点相一致。人们大概能从分类学预料到爱情风格以分类的内容为基础。大多数行为科学家研究过程，他们相信许多的科学过程并不能由分类学获得。但是，纯粹的抽象过程不是万灵药，我们的目标是将内容转化为能够被测量和量化的变量的同时保留其内容，而这成为我们将李的爱情分类学转化为爱情理论的方法。

爱情风格：一种爱情理论

当我们开始我们的研究计划时，我们明确的目标是将这六种爱情类型转化为六个尽可能独立的维度。与许多其他的关系变量相比，爱情的六个维度可以对爱情风格做出有力的假设检验。

将理论概念化

将爱情风格概念化为六个维度，要求我们将每种爱情风格构想为一个连续变量，而测量技术会在下面的部分讨论。我们将这六种爱情风格构想为一个位于个体认知空间的六维度模型。在任一特定时刻，个体能被置于这六维度中的一个测量点上。这种方法为每个人创造了爱情风格剖面图（profile）。个体表现出每种爱情风格的“量”在图中能被如实地描绘出来。剖面图的形状，它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以及它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成为基于假设的研究所要回答的潜在的实证性问题。至此，我们的研究还没有从本质上处理剖面图，而是分别处理六个维度中的每个维度，以及个别维度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涉及个人爱

情风格的稳定性以及与其他变量的相关问题，需要在能尝试进行整合而又复杂的分析（例如剖面图分析）之前得到回答。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要的问题是这六种爱情风格是否是相互独立的，如下所述，回答大多是肯定的。第二，爱情风格容易与其他的观念相关，例如尊重、沟通方式、亲密，等等。某种爱情风格也许比其他风格更稳定，这表明了爱情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将人格特质解释为变量，这种可能性很容易得到评定。最后，当将爱情风格构建为分维度的风格，它们就容易和其他爱情理论联系起来。

一些评论者声称爱情风格并没有构成一个理论，这反映出在定量的社会科学中过程导向的思想意识。我们相信，即使是看似单纯的分类型，李的方法也是一种合理的理论类型。我们对六种类型的量化保存了分类学内容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并且又将这种方法转化为一种过程理论。因此，我们将爱情风格的研究方法归为浪漫之爱的重要内容或过程理论。此理论进展的好坏取决于其实际征结果的记录，而这些结果取决于对这六个维度测量的质量。

测量爱情风格

我们最初对爱情风格量化的尝试（C. Hendrick, Hendrick, Foote, & Slapion-Foote, 1984）使用的是由拉斯威尔夫妇（Lasswell & Lasswell, 1976）编制的一组50个正误项目，并附加四个其他的项目。我们将所有项目转化为五点等级量表。许多项目显示出性别差异，但因素分析仅部分支持由李提出的六种爱情风格。在我们对评定量表结构的进一步尝试中（C. Hendrick & Hendrick, 1986），我们修订并标准化一组42个项目（六种爱情风格的每一种用其中的七个项目评定）。在两所不同的大学进行的两个研究中，因素分析产生六种正交的因素，这些因素几乎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 α 系数和重测信度是适当的，并且六种爱情量表之间的相关也是适度的。我们得出结论李的分类学能够维度化。在对爱情态度量表（LAS）初始合理化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一项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

多年来，有一些对爱情态度量表的指正。约翰逊（Johnson, 1987）指出这些项目涉及一般关系和具体关系的陈述，并且爱情态度量表的六个量表中相关项目的比例又有所不同。相应的，我们重新编写了19个一般关系的项目，产生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态度量表的具体关系版本（C. Hendrick & Hendrick, 1990）。新版本和原版本的结果完全一致，并且由于大量的实质性研究已经完成，我们仍使用1986年的版本。

长期以来，我们注意到其他研究者“借用”七项量表中的一部分来编制更简短的量表。我们别无选择，最终只能加入这些修正者的行列，所以我们开始从七项量表中析取最好的四项量表版本。结果出乎意料（C. Hendrick, Hendrick, & Dicke, 1998），对于心理测量学来说，这个总共24项简短版本的爱情态度量表是极好的，甚至在一些方面好于更长的版本。

爱情态度量表测量什么

我们相信简短的爱情态度量表抓住了李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发现的六种构念的本质。

激情型（Eros）：强烈的身体吸引力，强烈的情绪，对外貌的偏好，以关系的必然感来界定激情型的核心。

游戏型（Ludus）：爱情是和不同的伴侣一起玩游戏。伴侣的欺骗以及没有关于自我和其他伴侣信息的表露是游戏型的主要特性。由于游戏型缺乏诚实，大学生对测量这种爱情风格项目的反应不一致。然而，李（1973）指出此类型反映出很多人想要的现实。事实上，许多大学生在他们择偶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是以游戏的方式进行的。

友谊型（Storge）：这种风格把爱情看做是友谊，它不仅安静，而且友爱。激情型的火焰与友谊型截然不同，友谊型有时被戏称为“进化爱情”，而不是“革命爱情”。

实用型 (Pragma): 在这种风格中, 爱情是一张带有期望特性的购物单 (例如, 适合家庭、好父母等)。计算机约会安排来描述实用型是个不错的比喻。

占有型 (Mania): 这种风格可称为“症状”的爱情。占有型是激烈的, 在狂喜和痛苦之间交替。占有之爱, 当人们感觉强烈时, 通常结局并不好。

利他型 (Agapa): 这种风格具有牺牲精神, 将爱人的幸福置于自己之上。在浪漫之爱中, 纯粹的利他型只是偶尔出现。在既定的关系中, 利他型通常会随长期关系中对公平的需要而减少, 随着像伴侣生病这样的生活事件而增加。

关于爱情风格的研究

和其他研究者一起, 我们在考虑许多其他相关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了六种爱情风格。这一部分提供了关于此研究的选择性概要。然而, 首先, 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 即爱情风格如何与被称为“坠入爱河”这一文化现象相关。

爱情风格与坠入爱河

“坠入爱河”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文化现象, 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薛佛、摩根和吴 (Shaver, Morgan, & Wu, 1996) 认为爱情是一种基本情绪。我们也认为爱情通常具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成分 (C. Hendrick & Hendrick, 2003b)。或许哈特菲尔德 (Hatfield, 1988) 关于激情之爱的概念最能反映出“坠入爱河”的本质。

另外一个问题是激情之爱是否包含性欲。一些人 (Regan, 1998; Regan & Berscheid, 1999) 把性欲看做是浪漫之爱的一个重要成分。哈特菲尔德 (1988) 对于这种习惯性的联系表现得更加谨慎。例如, 年轻人甚至在他们理解性爱以前就可能强烈地坠入爱河。我们倾向于支持哈特菲尔德, 而且我们也赞成费希尔 (Fisher, 2000) 的观点, 即性爱与激情之爱逐渐成为彼此分离且具有松散

联系的情绪体系。在从依恋理论的角度评论爱情风格的情境中，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坠入爱河的强烈情绪体验与爱情风格如何相关联呢？这六种爱情风格中的任何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或信念情结。情绪和人格“特质”与每种情结相关的程度取决于信念情结的内容。举例来说，激情型和占有型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转变”，但是，友谊型、实用型和游戏型在情绪方面相对缺乏。在后三种爱情风格量表得分高的人也许不会体验到“坠入爱河”的情绪高潮，而在占有型量表得分高的人可能很容易就体验到。

这种方法将“坠入爱河”的观念汇聚为“情绪风暴”，这至少导致在信念和态度范围内出现暂时性的变化，包括爱情风格的变化，也包括潜在的荷尔蒙变化和大脑的化学变化（Hatfield & Rapson, 1987; Liebowitz, 1983）。

这种思维使我们预测在“恋爱”中的大学生与“没有恋爱”的大学生在许多相关变量上存在广泛差异。我们通常的预测是“恋人们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C. Hendrick & Hendrick, 1988）。我们确实发现许多变量的差异都支持我们的预测。与没有恋爱的学生相比，恋爱的学生在性态度上较少纵容性，并且表现出较少的工具性。恋爱还提升了自尊的等级，同时降低了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恋爱的学生也会有较低的感觉寻求（sensation-seeking）。与没有恋爱的学生相比，他们更忠诚，更投入并且更敢于自我表露（self-disclosing）。在爱情风格方面，与没有恋爱的学生相比，恋爱的学生表现出更多激情性和利他性，更少游戏性。进一步的结果还表现出占有性。

我们推断这六种爱情风格是经过两千年发展起来的关于爱情相对独立的态度或信念体系（见 Singer, 1984）。最好把坠入爱河构想为一种整体的情绪现象，这种现象有广泛的态度和身体效应，在六种爱情风格中至少三种会有暂时性的变化。爱情风格与坠入爱河相关，但它们在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构念。坠入爱河的体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千差万别的，这取决于个人在哪一种爱情风格量表的得分高或者在几种风格量表上得分差不多。还是在几种风格量表上得分差不多。例如，正如在占有型量表得分高的人所体验到的一样，在激情型

量表得分高的人会体验到坠入爱河的典型症状。相比之下，在实用型量表得分高的人可能仅有坠入爱河的轻微体验，而那些在游戏型量表得分高的人则体验不到坠入爱河的感觉。因此，爱情风格以及其他变量无疑调和了坠入爱河的体验。

显然，多种因素会影响（被影响）坠入爱河和一些爱情风格本身的平均水平（C. Hendrick & Hendrick, 1988）。我们预期，由于爱情风格主要以态度为基础，因此，它们会因为关系类型和生活阶段的风格而发生改变。个体、伴侣一方、双方的互动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某些爱情风格。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尽管我们还没有将爱情风格作为一个体系进行剖面图分析，但在未来研究中这种方法可能会提供人的一生中关于爱情风格的相对强度和稳定性的有价值的信息。

爱情风格研究：内心、人际、社会结构的因素

如果爱情风格不同于坠入爱河的“情绪风暴”特征，那么它们与情绪上不太多变的被称为“友谊”的模式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呢？爱情和友谊都是包括情感连结和相互关系变化度在内的自愿关系。事实上，尽管浪漫之爱和柏拉图式友谊在性卷入和情绪强度方面有典型的差异，但是，爱情关系通常包含深厚的友谊元素。在浪漫关系的书面描述中，大学生表达友谊主题（友谊型）比其他任何一种爱情风格更频繁（S. Hendrick & Hendrick, 1993）。同样，在此研究中，当被问及谁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时，几乎一半的学生认为是他们的浪漫伴侣。

人类是本性与教养的共同产物，尽管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可能都会有“归属需要”的天性（Baumeister & Leary, 1995），但是，这种需要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人类爱情取向是气质和人格的产物，也是浪漫伴侣间的互动以及符合社会结构的情境中表达的结果。下面的部分会详述一下爱情风格这些方面的研究。

个人：爱情风格和人格

在早期的研究计划中，自尊作为人格的一个方面，我们发现它与两种爱情风格相关，即与激情型成正比（越激情的爱意味着自尊越高），与占有型成反比（越自私、依赖性的爱意味着自尊越低）（C. Hendrick & Hendrick, 1986）。自我表露也可以看做是人格的一种表达方式，也与爱情风格相关（例如，与激情型成正比，而与游戏型成反比；见 S. Hendrick & Hendrick, 1987b）。感觉寻求也表现为人格的一部分，并且游戏型与感觉寻求的一些成分成正相关（S. Hendrick & Hendrick, 1987b）。这个后期的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惊讶，认为游戏型的人对爱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相似的结果参见 Richardson, Medvin, & Hammock, 1988）。

在探讨爱情风格和人格中更传统的方面之间的关系时，怀特、亨德里克夫妇（White, Hendrick, & Hendrick, 2004）发现了爱情态度与几个人格维度之间的相关，这几个人格维度是通过修订版的NEO人格量表所测得的（Form S; Costa & McCrae, 1985, 1992）。NEOPI-R测量人格的宜人性、责任心、外倾性、神经质和开放性因素（通常称为大五人格）。其中一些因素与爱情风格相关。激情型与宜人性、责任心和外倾性成正相关，而与神经质成负相关。友谊型与宜人性不相关，但是，在其他方面和激情型与人格变量的关系相似。游戏型显示出几乎相反的模式，它与宜人性和责任心成负相关，而与神经质成正相关。实用型与责任心成正相关，而与开放性成负相关，占有型与神经质成正相关。利他型与这五种人格因素都不相关。

在与怀特等人（2004）类似的研究中，希文、达·席尔瓦、凯里和霍莱（Heaven, Da Silva, Carey, & Holen, 2004）探讨了人格、依恋和爱情风格，同样也发现了大五人格领域与爱情风格之间的广泛联系。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怀特等人的结果相一致。例如，激情型与外倾性和责任心成正相关，而与神经质成负相关。他们还发现焦虑型依恋在神经质和相关的爱情风格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怀特等人发现占有型在神经质和关系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因此，像神经质与爱情风格这样的相关构念存在复杂的联系。

因为爱情风格与个人现象相关，所以它们也与人际因素相关。

人际因素：爱情风格和性欲

尽管浪漫之爱与性欲并不相同，但我们假定它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即爱情是我们性互动的基础，而性则是我们表达爱意的媒介”（S. Hendrick & Hendrick, 1987 a, p. 159）。

为了探讨爱情风格与性欲（特别是与性态度）的联系，我们编制了性态度量表（Sexual Attitudes Scale）（S. Hendrick & Hendrick, 1987 c），这是一个由43个题目组成的李克特量表，它的分量表测量放纵（草率的性关系）、性实践（负责的、宽容的性关系）、亲密交流（理想的性关系）以及工具性（生物性的性关系）。通过一些研究，我们将性态度量表与爱情态度量表求相关（也就是将它们视为一个因素），发现这两种测量的分量表之间具有一致性的关系。草率的性关系（放纵）与游戏之爱成正相关——一个符合逻辑的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喜欢有多个伴侣的人并不想让自己和任何一个伴侣的关系过分密切。另外，激情之爱始终与理想的性关系（沟通）和负责的性关系（性实践）相关（S. Hendrick & Hendrick, 1987 a）。我们继续在研究中评定性态度与爱情风格，探讨了像性别、文化/族群、年龄、性取向和关系满意度等变量，下面会有详细介绍。

在一个试图将性与爱情联系起来的多元方法中，我们要求应答者写下在他们亲密浪漫的关系中爱情和性欲（后者解释得更宽泛）是怎样联系的。用内容分析法处理他们的回答，然后编制成爱情和性认知量表（S. Hendrick & Hendrick, 2002），这是一个17项量表，它反映出“爱情是非常重要的”、“性说明了爱情”、“先有性，后有爱”以及“性的地位逐渐下降”这几个维度。使用这种新测量方法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命题，即浪漫之爱和性欲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两者既不能彼此包含，也不能彻底分开。

社会结构的因素：爱情风格与人口学特征

性别是社会结构中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个体特征。性别是主要的身份变量 (Laumann, Gagnon, Michael, & Michaels, 1994)，它甚至可能比种族或民族的影响还要大。在爱情风格研究的早期阶段，我们发现在一些爱情风格中存在大量的性别差异 (C. Hendrick, Hendrick, Foote, & Slapion-Foote, 1984)，这使我们怀疑女性和男性实际上是否“爱得不同”。例如，男性始终更加支持（至少不太反对）游戏式的爱情，而女性比男性更赞成友谊型和实用型的爱。使用此量表的最新简短版本 (C. Hendrick et al., 1998) 进行测量，相对于女性，男性更赞同利他型或无私的爱。然而，尽管对于一些爱情风格来说，不同性别可能在其平均分数上存在差异，但当爱情量表与其他的关系构念相关时，男性和女性的相关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S. Hendrick & Hendrick, 1995)。

文化/民族是与爱情风格相关的另一个人口学变量。爱情既不是近代才有，也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基于对中国近三千年历史的文献的探讨，赵和クロス (Cho & Cross, 1995) 提出人们很早就了解到像激情之爱 (passionate love)、强迫之爱 (obsessive love)、虔诚之爱 (devoted love)、草率之爱 (casual love) 以及自由选择伴侣 (free mate choice) 这样的爱情模式。他们使用爱情态度量表评定了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台湾学生的爱情风格，并且发现虽然他们得到的六种因素与爱情态度量表的六个分量表并不完全对应，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与这些研究结果一致，斯普瑞彻、阿伦、哈特菲尔德、歌蒂丝、波塔波娃和莱维兹卡亚 (Sprecher, Aron, Hatfield, Cortese, Potapova, & Levitskaya, 1994) 探讨了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爱情风格。尽管这些群体在某些维度上存在差异 (例如日本人不太赞同浪漫信念)，但“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人在许多爱情态度和体验方面有相似之处” (Sprecher et al., 1994, p. 363)。玛斯顿、玛瑞格非和威西 (Murstein, Merighi, & Vyse, 1991) 的研究发现法国大学生更支持利他型的爱情风格，而美国学生报告更多的友谊型和占有型的爱情态度。最后，孔特拉斯与亨德里克夫妇 (Contreras, Hendrick, & Hendrick, 1996) 研究发现墨西哥裔美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的已婚夫妇在爱情态度 (在激情之爱、友谊之爱或

利他之爱方面没有表现出差异)和性态度上的差异不大。如同关于性别的研究结果,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比差异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尽管大多数爱情风格的研究是在年轻夫妇中进行的,爱情仍存在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少数的研究探索了中年夫妇的爱情和爱情风格。例如,格罗特和弗雷兹(Grote & Frieze, 1994)评定了中年已婚夫妇关系满意度方面的爱情预测因素,结果发现激情之爱和友谊之爱是满意度的积极预测因素,游戏之爱是消极的预测因素。这些结果与那些对较年轻夫妇的研究以及孔特拉斯(Contreras et al., 1996)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孔特拉斯发现激情之爱是不同年龄夫妇婚姻满意度的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

在对大学生和他们父母之间的一个直接对比(Inman-Amos, Hendrick, & Hendrick, 1994)发现,学生与其父母在爱情风格上并不相似。然而,当采用学生组和父母组对比的方式时,这两代人的爱情风格则很相似。蒙哥马利和索雷尔(Montgomery & Sorell, 1997)用四个独立组研究爱情风格和关系构念:(a)大学生年龄段年轻的未婚成年人,(b)30岁以下已婚无子女的成年人,(c)24~50岁的已婚且有子女的人,(d)50~70岁的已婚无子女的人。最大的组间差异出现在已婚人群与未婚人群之间,而其他组之间的差异很小。蒙哥马利和索雷尔指出“个人在婚姻的整个阶段一直赞同包括激情、浪漫、友谊和自我付出之爱的爱情态度”(Montgomery & Sorell, 1997, p. 61)。基于这些研究,年龄似乎并不是爱情态度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因素,而婚姻状况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也应该更深入地加以探索。

性取向也是浪漫关系中引人关注的人口学特征。尽管很少有研究评定爱情风格与性取向,但有一个研究(Adler, Hendrick, & Heridrick, 1986)涉及这个问题。询问纽约和西得克萨斯州的男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的爱情态度(和其他的浪漫关系变量)的结果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显现出性取向上的差异。然而,对于地点来说,纽约的应答者比得克萨斯州的应答者表现出更少的占有性,并且纽约的男同性恋者在支持利他之爱方面比得克萨斯州的男同性恋者和其他地区的男异性恋者都明显少很多。正如佩普劳和斯波尔丁(Peplau

& Spaulding, 2000) 推断：“将基本的关系理论应用于同性伴侣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面对所有亲密关系的问题间有很多共性，而不论伴侣的性取向如何。”(p. 123)

总之，考虑到性别、文化/民族、年龄和性取向这些人口学变量，我们可能赞同詹克维尔克和弗希尔 (Jankowiak & Fischer, 1992) 的观点，即激情之爱 (和浪漫之爱的其他方面) 是很普遍的。然而，无论是否真正普遍，浪漫之爱对于伴侣关系都是重要的。一个重要性的测量是它与关系满意度的关系，关系满意度通常是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Fletcher, Simpson, & Thomas, 2000)。

爱情与满意度

我们对爱情研究的强烈兴趣在于爱情如何与关系满意度相关。在我们最早对夫妇进行的研究中 (S. Hendrick, Hendrick, & Adler, 1988)，我们重点集中在两个重要的主题上：伴侣的相似性和对双方满意度以及在一起或分手的预测。通过对 57 对大学生情侣的评定，我们发现关系中的伴侣在激情型、友谊型、占有型和利他型方面有显著的相似之处。我们还发现，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激情型都是关系满意度的一个积极预测因素，而游戏型都是关系满意度的一个消极预测因素。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占有型是关系满意度的另一个消极预测因素。两个月之后，我们与 30 对情侣的子样本再次联系，以确定他们是否仍然在一起。结果 23 对情侣仍然在一起，7 对情侣已经分手。基于他们对关系测量之前的回答，我们确定仍然在一起的情侣比已分手的情侣在爱情风格方面表现出更多激情和更少游戏性。莫罗、克拉克和布罗克 (Morrow, Clark, & Brock, 1995) 发现了与这项研究相似的结果，他们发现伴侣在爱情风格方面是相似的。他们还发现爱情风格与几个积极的关系品质之间的相关 (例如投资和承诺)。

爱情风格预测关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关于夫妻的其他研究。正如以前所指出的 (Contreras et al., 1996)，关于墨西哥裔美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的研究

揭示了许多爱情风格和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关系，激情之爱“在所有种族中对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最一致的预测因素”（p. 412）。

在双职业和家庭工作问题这一背景下关系质量的研究中，索科尔斯基和亨德里克（Sokolski & Hendrick, 1999）调查了160对已婚夫妇，他们中的一方或双方从事法律、医药工作或是研究生。这些夫妻在激情型、游戏型、友谊型和实用型的爱情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而且，对于夫妻双方来说，激情型、友谊型和利他型都与满意度成正相关（游戏型与满意度都成负相关）。

米克斯和亨德里克夫妇（Meeks, Hendrick, & Hendrick, 1998）针对爱情风格和其他关系变量，对140对大学生情侣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情侣们在六种爱情风格中的四种（和许多其他相关构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在最终的回归分析中，积极的爱（利他型、友谊型和激情型的组合）是关系满意度的积极预测因素之一，而游戏之爱是消极预测因素之一。

因此，基于年轻情侣、年轻的已婚夫妇和年长的已婚夫妇的各种研究结果来看，伴侣们在几种爱情风格上非常相似，并且其中几种爱情风格与关系满意度显著相关，其中激情型总是满意度的积极预测因素，而游戏型总是满意度的消极预测因素。

尽管我们大多数的研究集中于爱情以及它的许多方面，但是，我们最近的工作已经从爱情和它对满意度的影响拓宽到一个正在研究和令人感兴趣的关系构念上：尊重。

尊重、爱情和关系

我们对尊重的研究始于对劳伦斯·莱特福特（Lawrence-Lightfoot, 2000）的叙事传记材料的反映。在她关于尊重的著作中，她详细描述了一些人，她相信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能够体现在尊重的各个方面。她描述了助产护士、儿科医生、高中教师、摄影师、法学教授以及面对垂死病人的牧师/咨询者，这些人

超越了性别和种族/民族的界限。他们举例说明尊重的成分包括授权、康复、对话、注意、好奇和自尊。以这些概念为基础，我们编制了一个尊重的简单量表，用来评价个人对其浪漫伴侣的尊重（S. Hendrick & Hendrick, 2004）。这种方法（六项，单因素）在心理测量上是可靠的，并且在可预测的模式上与包括爱情风格在内的一些关系变量相关。同样，这个尊重量表可以作为对尊重其他方面的一个普通测量，它在预测关系满意度的能力上仅次于激情之爱。因为菲尼、尼拉和沃德（Feeney, Noller, & Ward, 1997）同样发现，尊重是婚姻质量的一致因素，并且我们相信一份真正成熟的爱情（一份完美的爱情，如果你愿意 [Sternberg, 1986]）以相互尊重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那么，关于尊重的研究似乎是我们对爱情研究合乎逻辑的延伸。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大量研究支持爱情风格理论，然而，用严肃地质疑爱情风格可行性的另一理论来总结这一部分，也许是非常有趣的。

从依恋角度评论爱情风格

大多数关于爱情风格研究的批评都是相对次要的，它们大都关注的是涉及爱情态度量表的问题。然而，薛佛和哈赞（Shaver & Hazan, 1988；也见 Shaver, Hazan, & Bradshaw, 1988）提出的依恋理论“总括”了爱情风格和其他爱情理论。“从依恋角度来看，浪漫之爱是三种行为系统的整合：依恋、呵护和性。”（Shaver & Hazan, 1988, p. 482）那时，成人依恋被概念化为三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薛佛和哈赞认为依恋风格与爱情风格的匹配如下：安全型（激情型）、回避型（游戏型）和焦虑/矛盾型（占有型）。他们认为其他三种爱情风格根本不能代表爱情，他们声称：“友谊型是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完全不是浪漫风格……实用型恋人从情感角度来说根本不算是恋人……利他型或‘自我牺牲’的爱情，看似与我们所说的爱情的呵护因素相关。而从它本身来看，它并不是爱情风格。”（1988, pp. 496-497）

显然，我们不同意上面的这种说法，而且和其他学者一起，我们主要关注

成人依恋及其发展方式。依恋概念最初的定义是很严格的，它是指“一个生物行为的安全调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父母是孩子的主要保护者和安全的港湾”（Goldberg, Grusec, & Jenkins, 1999, p.476）。戈德伯格（Goldberg）等人抱怨现在的依恋定义过于宽泛，它仅仅指“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成人依恋的概念一开始就有必要拓宽。哈赞和泽非南（Hazan & Zeifman, 1999）充分阐述了成人的浪漫连结是依恋连结这一观点。然而，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 1998）反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在成人浪漫关系中主要涉及的不是依恋系统，而且成人连结在各种行为方式上区别于婴儿依恋。伯曼和斯柏林（Berman & Sperling, 1994）认为，依恋和呵护到成年期退化为单一系统，我们发现这一状况与我们所了解的真实的成人世界是相符的。

因此，浪漫之爱不是依恋，但是，关于两者在成年期是否相互独立的系统存在争议（更详细的说明参见 C. Hendrick & Hendrick, 2004）。实际上，依恋/呵护、性和爱情三者的关系是松散的，后来分别发展为由费希尔（Fisher, 1998）所确定的结构：依恋、性欲和吸引力。假定三个系统开始是独立发展的，但是，由于它们的适应性价值，三者随着时间逐渐联系起来（见 C. Hendrick, 2005，心理学进化理论的相关观点）。

爱情风格与其他爱情理论

虽然篇幅限制了多种爱情理论的详细比较（见 S. Hendrick & Hendrick, 2000, 综述），但爱情风格理论如何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这一问题很自然地产生了。以下简要讨论了几个例子，并提及爱情的测量。

理论比较

在许多可得的理论中，我们比较了四种理论，它们与爱情风格有某些共同点。

激情之爱与伴侣之爱

伯奇德和沃尔斯特 (Bercheid & Walster, 1978) 提供了详细的经典公式。这个理论分两步解释爱情。首先, 存在的是激情的吸引之火, 如果关系在激情之爱这个初始阶段能存活的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激情之火逐渐转变为伴侣之爱的安静与满足。在他们最初的模式中, 这个理论是爱情的“二选一理论”, 即要么是激情之爱, 要么是伴侣之爱, 但不会二者兼而有之 (C. Hendrick & Hendrick, 2003 a)。哈特菲尔德 (Hatfield, 1988) 已经缓和了这种说法, 指出人们能够同时具有两种爱情风格, 但是很难维持。在我们的研究中, 如先前所指出的, 现在年轻的恋人宣称他们的伴侣同时也是最好的朋友, 这是十分普遍的。经历了几代人, 也许有文化的变迁。当求爱和婚姻是更正式的角色关系时, 也许在婚姻开始时就不会期望得到友谊, 但是, 如果婚姻持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友谊就会发展起来。当今, 伴侣们对于情感亲密的期望开始于浪漫关系的早期。

显然, 激情之爱与激情型相对应, 在某种程度上与占有型相关。伴侣之爱与友谊型最匹配, 而且可能包含实用型和利他型的成分。游戏型既非激情, 又非友谊。

原型理论

费荷 (Fehr, 1988, 1993) 在大体获得爱情特征的基础上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详细的理论。虽然特征列表中出现了爱情的几个成分, 但是, 伴侣之爱的特征显然占主导地位。例如, 始终出现的特征包括信任、关爱、诚实、友谊和尊重 (Fehr, 1993)。当明确地排列出浪漫之爱的特征时, 所列出的信任、诚实以及幸福这些特征仍然明显地排在激情和性欲之上 (Regan, Kocan, & Whitlock, 1998)。

特征列表的方法与等级评定量表有很大的差异。结果的不同部分是由于方法的不同。显然, 爱情的风格, 例如友谊型、实用型以及利他型, 都与费荷发现的伴侣之爱的特征有关。然而, 与爱情风格研究中显示出的强预测性相比,

激情型对于原型方法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

爱情故事

斯腾伯格的爱情三角形理论也许是众所周知的（例如 Sternberg, 1986）。他新近的理论——爱情是生活故事（life story）（1996, 1998），显然与爱情风格理论更相符。就像爱情风格一样，爱情故事随着个人和时间的不同而变化。深入理解自己爱情故事的导向隐喻，也许会使一个人更有能力去建构令人满意的爱情生活，去理解自己的爱情风格。将斯腾伯格（1998）提出的 25 个爱情故事与六种爱情风格做出细致的比较是非常有趣的，但这种尝试不在本章的范围之内。

爱情方式

也许该理论与爱情风格最相似，这个理论使用的是与爱情态度量表相类似的等级评定法（Hecht, Marston, & Larkey, 1994）。研究发现的五个因素被指定为爱情的五种类型：承诺型、直觉型、安全型、传统型和伴侣型。该研究方案中的其他方法包括详细访谈和定性分析。关于爱情方式的研究仍然发展，但构造方法与爱情风格的研究方法十分相似。有待对两种方法所揭示的理论内容进行比较。

爱情测量的比较

在一项研究中（C. Hendrick & Hendrick, 1989），我们比较了评估浪漫之爱的五种等级评定工具。这五种工具包括 19 个子量表。我们目前的兴趣是把这 19 个子量表相关联系起来，并提取这 19 个子量表的因素。从中提取到五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解释变异的 32%，清晰地反映出激情之爱。第二个因素解释变异的 14%，反映出亲密性和冲突的缺乏。其他三个因素的解释变异很小，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我们注意到前两个因素与沃尔斯特夫妇（Walster & Walster,

1978)关于激情之爱和伴侣之爱的定义相符。因此,尽管项目和等级评定量表的不同,最终从工具分析中得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们开头这部分所讲的激情之爱和伴侣之爱。

无论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论观点是什么——并且显然我们自己的观点是由爱情风格得知的——适应性/可用性/实用性/应用性都应该得到真正的关注。尽管勒温声称没有比理论更实用的东西,但是他可能也注意到没有实用性的理论并不是好的理论,或者至少不那么完美。我们支持这一观点,而且爱情风格的实际和临床效用的确是它感染力的一部分。

爱情风格与真实世界： 从理论到实践

我们最初被爱情风格理论所吸引,是因为它在思索、体验和表达爱情方面提供了几种选择。而且,它的爱情类型也是这种方法的优势所在。无论是为电视或印刷媒体提供研究论文、讲授课程、提供采访,还是给社区群众作报告,我们发现当我们详细描绘这些风格时,人们表现出极度认同。他们根据爱情风格看自己、伴侣以及生活中的其他人,并且由于对爱情风格的描述是“通俗易懂的”,因此,它们在实践上是有用的。人们记住这些描述,并把它们作为常识心理学的一部分。实际上,学生们特别想让他们自己的伴侣完成爱情态度量表,社区群众也是如此,而且电视台记者或新闻播音员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后——然后“非正式地”谈论他们自己的爱情生活。

爱情风格和爱情态度量表在夫妻疗法中是很有用的工具。当伴侣已经了解自己 and 伴侣对爱情态度量表的反应时,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伴侣的爱情行为;他们获得了一种用来谈论他们关系方面的“语言”。随着语言的扩充,出现了对伴侣的爱情行为给予更积极归因的倾向(例如,“情人节那天他给我买了一本书而不是花,不是因为他不浪漫,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友好的/实际的

爱人”)。临床医学家知道更积极的归因有利于交流,冲突解决,以及许多其他的
关系行为向期望的方向发展(关于爱情风格在治疗学中更完善的论述,见
S. Hendrick, 2004)。

最后,对于理解亲密关系中非常复杂的浪漫之爱现象,我们的爱情风格研究
在长期内一直被认为是理论的/实证的/实践的选择。我们从来不把它作为
“完善”或“唯一”的方法。李(1983)最初的工作是想扩大爱情的研究,拓
展它的概念和增加它的感染力。我们仍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王晓明 初译)

参考文献

- Adler, N. L.,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1986). Male sexual preference and attitudes toward love and sexuality. *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y*, 12 (2): 27-30.
- Baumeister, R. F., and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 497-529.
- Berman, W. H., and Sperling, M. B. (1994).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dult attachment. In M. B. Sperling and W. H. Berman (eds.), *Attachment in Adults: 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pp. 3-2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erscheid, E., and Walster, E. (1978).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2nd e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Cho, W., and Cross, S. E. (1995). Taiwanese love style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self-esteem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1, 283-309.
- Contreras, R.,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1996). Perspectives on marital love and satisfaction in Mexican American and Anglo-American coupl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4, 408-415.
- Costa, P. T., Jr., and McCrae, R. R. (1985). *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Manual*. Odessa, Fl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 . (1992).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 PI-R) an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 Professional Manual*. Odessa, Fl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 Feeney, J. A., Noller, P., and Ward, C. (1997).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spousal interaction. In R. J. Sternberg and M. Hojjat (eds.),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p. 160-18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Fehr, B. (1988).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love and commi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557-579.
- . (1993). 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nsult my prototype. In S. Duck (ed.), *Individuals in Relationships*, pp. 87-120.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Fisher, H. E. (1998). Lust, attraction, and attachment in mammalian reproduction. *Human Nature*, 9, 23-52.
- . (2000). Lust, attraction, attachment: Biology and evolution of three primary emotion systems for mating, reproduction, and parenting. *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y*, 25, 96-104.
- Fletcher, G. J. O., Simpson, J. A., and Thomas, G. (2000). The measurement of perceived relationship quality components: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 approac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6, 340-354.
- Goldberg, S., Grusec, J. E., and Jenkins, J. M. (1999). Confidence in protection: Arguments for a narrow definition of attach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3, 475-483.
- Grote, N. K., and Frieze, L. H. (1994). The measurement of friendship-based lov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275-300.
- Hatfield, E. (1988). Passionate and companionate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91-21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tfield, E., and Rapson, R. (1987). Passionate love: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In W. H. Jones and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pp. 109-139.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Hazan, C., and Zeifman, D. (1999). Pair bonds as attachments: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In J. Cassidy and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p. 336-354.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eaven, P. C. L., Da Silva, T., Carey, C., and Holen, J. (2004). Loving styles: Relationships with personality and attachment style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 103-113.
- Hecht, M. L., Marston, P. J., and Larkey, L. K. (1994). Love way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 25-43.
- Hendrick, C. (2005). Evolution as a foundation for psychological theories. In S. Strack (ed.), *Handbook of Person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 pp. 3-23. Hoboken, N.J.: Wiley.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S. (1986). A theory and method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92-402.
- . (1988). Lovers wear rose colored glass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161-183.
- . (1989). Research on love: Does it measure u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784-794.
- . (1990). A relationship-specific version of the Love Attitudes Scale.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5, 239-254.
- . (2003a). Love. In J. J. Ponzetti, Jr.,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nd ed., vol. 3, pp. 1059-1065.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 . (2003b). Romantic love: Measuring Cupid's arrow. In S. J. Lopez and C. R. Snyder (ed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Handbook of Models and Measures*, pp. 235-24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 (2004). Sex and romantic love: Connects and disconnects. In J. H. Harvey, A. Wenzel, and S. Sprecher (eds.), *The Handbook of Sexual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p. 159-182. Mahwah, N.J.: Erlbaum.
- Hendrick, C., Hendrick, S. S., and Dicke, A. (1998). The Love Attitudes Scale: Short form.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137-142.
- Hendrick, C., Hendrick, S., Foote, F. H., and Slapion-Foote, M. J. (1984). Do men and women love differentl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177-195.
- Hendrick, S. S. (2004). Close relationships research as a resource for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0, 13-27.
-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1987a). Love and sex attitudes: A close relationship. In W. H. Jones and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pp. 141-169.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 (1987b). Love and sex attitud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 391-398.
- . (1987c). Love and sexual attitudes, self-disclosure, and sens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 281-297.
- . (1993). Lovers as friend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0, 459-466.
- .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sex and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 55-65.
- . (2000). Romantic love. In C. Hendrick and S. S. Hendrick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pp. 203-215.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 (2002). Linking romantic love with sex: Development of the Perceptions of Love and Sex Scal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 361-378.
- . (July 2004). Giving "respect" the respect it deser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Madison, Wis.
- Hendrick, S. S., Hendrick, C., and Adler, N. L. (1988). Romantic relationships: Love, satisfaction, and staying togeth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980-988.
- Inman-Amos, J.,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1994). Love attitudes: Similarities between parents and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amily Relations*, 43, 456-461.
- Jankowiak, W. R., and Fischer, E. F.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31, 149-155.
- Johnson, M. P. (November 1987). Discussion of papers on love style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K. E. Davis (chair), *New Directions in Love Style Research*.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Preconferenc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Workshop. Atlanta: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 Kirkpatrick, L. A. (1998). Evolution, pair-bonding, and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dult attachment. In J. A. Simpson and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353-39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Lasswell, M., and Lobsenz, N. M. (1980). *Styles of Loving: Why You Love the Way You Do*.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Lasswell, T. E., and Lasswell, M. E. (1976). I love you but I'm not in love with you.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ing*, 38, 211-224.
- Laumann, E. O., Gagnon, J. H., Michael, R. T., and Michaels, S. (1994).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wrence-Lightfoot, S. (2000). *Respect: An Exploration*. Cambridge, Mass.: Perseus Books.
- Lee, J. A. (1973). *The Colours of Lov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ays of Loving*. Don Mills, Ont.: New Press.
- . (1988). Love-style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38-6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ebowitz, M. R. (1983). *The Chemistry of Love*. Boston: Little, Brown.
- Meeks, B. S.,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1998). Communication, lov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755-773.
- Montgomery, M. J., and Sorell, G. T. (1997). Differences in love attitudes across family life stages. *Family Relations*, 46, 55-61.
- Morrow, G. D., Clark, E. M., and Brock, K. F. (1995). Individual and partner love styles: Implications for the quality of romantic involvemen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2, 363-387.
- Murstein, B. I., Merighi, J. R., and Vyse, S. A. (1991). Love sty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0, 37-46.
- Peplau, L. A., and Spaulding, L. R. (2000).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of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 In S. S. Hendrick and C. Hendrick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pp. 111-123.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Regan, P. C. (1998). 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desire. In V. C. de Munck (ed.), *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Behavior: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pp. 91-112. Westport, Conn.: Praeger.
- Regan, P. C., and Berscheid, E. (1999). *Lust: What We Know About Human Sexual Desire*.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Regan, P. C., Kocan, E. R., and Whitlock, T. (1998). Ain't love grand! A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411-420.
- Richardson, D. R., Medvin, N., and Hammock, G. (1988). Love styles,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and sensation seeking: A test of valid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 645-651.
- Shaver, P. R., and Hazan, C. H. (1988). A biased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473-501.
- Shaver, P. R., Hazan, C., and Bradshaw, D. (1988). Love as attachment: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behavioral system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68-9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aver, P. R., Morgan, H. J., and Wu, S. (1996). Is love a "basic" emo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81-96.

- Singer, I. (1984). *The Nature of Love*, vol. 1, *Plato to Luthe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okolski, D. M., and Hendrick, S. S. (1999). Fostering marital satisfaction. *Family Therapy*, 26, 39-49.
- Sprecher, S., Aron, A., Hatfield, E., Cortese, A., Potapova, E., and Levitskaya, A. (1994). Love: American style, Russian style, and Japanese styl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49-369.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135.
- . (1996). Love stori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59-79.
- . (1998). *Love Is a 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ster, E., and Walster, G. W. (1978). *A New Look at Lov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hite, J. K.,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2004). Big five personality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7, 1519-1530.





探索“爱”的真谛

埃伦·伯奇德 (Ellen Berscheid)

在《爱情心理学》一书的序言中，鲁宾 (Zick Rubin) 指出爱情科学尚不成熟。他说：“不成熟的一个标志是，本书中提到的研究者几乎没有关于爱的一个通用词汇。” (1988, p. viii) 因为每个人对于爱的理解不同，所以鲁宾建议：“研究爱的学者最好还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概念性词汇前进。” (p. ix) 的确，充分的概念化在科学发展的领域中是“永恒的真理”。对一种现象的清晰概念化优先于对它的实证调查以及随后的实证结果和相关现象的整合。一直以来，没有人不赞同鲁宾的这种观点，一个爱的共有的概念化词汇是爱研究进展的关键所在，但是存在着一个问题。

爱的概念化问题

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宣布婚约后，在电视采访中问及查尔斯王子他们夫妇是否相恋，黛安娜面带微笑迅速地代以回答“当然”，查尔斯却低声补充道：“无论‘相恋’意味着什么。” (Kantrowitz & McGuire, 2005) 查尔斯表现的不

确定并不奇怪。爱情理论家和研究者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弄清爱是什么，尽管有些人自认对这种尝试已经满意，但至今还没有一种爱的概念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爱情概念化的问题，正如玛斯顿所认为的，“在英语中，没有哪个词比爱这个词更混杂，更惹人争议”（Murstein, 1988, p. 13）。爱这个词之所以“惹人争议”，就如爱情理论家和学者苏珊·亨德里克和克莱德·亨德里克（Susan Hendrick & Clyde Hendrick, 1987, p. 162）所说，“在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爱的语言都呈现枯竭状态”；也就是说，爱这个词被大量使用，用来描述对人和物的态度、情绪、情感和行为的一个庞大范围。在这方面，爱与许多其他的词没有区别，因为所有人类语言的特征都是一词多义。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罗伊·D·安德拉德（Roy D'Andrade）说：“几乎没有一个词只有一种理解。”（1989, p. 797）爱不是一个稀有词汇，因为爱有多种意义，没有单一的爱的定义。

爱这个词有多种意义，因此很难写出一个在所有条件下都无懈可击或绝对真实的关于爱的句子。将爱作为其许多小说主题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应该也意识到这一困难，因为他只渴望写他“确切”知道的东西。当在写作中遇到阻碍，海明威（1964）自言道：“你所要做的只是写一个正确的句子。”（p. 12）但是，只写一个“正确”的句子并不容易，而且创造一个“正确”的段落有时得花费他一整天的时间（见 Hotchner, 1955）。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短小凝练的句子联合——可能涉及他只写真正句子的目的，许多人模仿他的这种风格，因为句子越长越复杂，含有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多。

人们经常想到海明威，因为关于爱的句子不计其数，却很少有句子能单独存在，并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爱是一个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句子。当然，有人认为当特尔斐（Delphi）神谕对那些寻找爱的智慧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可能会被乱石砸死。然而，当我们沉浸于对爱的推测、假想和简单地凭空想象时，寻找一个立足点是很明智的。而“爱是一个字”这一立足点乍看上去很小，其实未必。

人们使用爱这个词来表达某事，实际上用于在与人交流沟通的许多事情之中，尽管在英语中爱属于最多含义的词，当一个人用这个词来尝试沟通时，人们通常理解所表达的意义。例如，爱在短语“我爱冰淇淋”中和在“我爱你”中有着不同的意义。例如，通常人们知道在普通的谈话中爱代表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可以从一些信息中分析爱的意义，如这是谁，在什么情境下，什么文化背景中，用这个词描述他或她对人或事情的态度、情绪、情感和行为。这是在使用的情境中明确爱的意义。

因为几乎在无数的各种情境中都会用到爱这个词，所以爱也有无数的各种含义。从那些希望建构一个简单的爱的定义和一套表征因果关系的规则系统的人的观点看，这个事实不乐观。然而，很少有人打消尝试此壮举的念头。为了从爱混杂的意义中提取出“爱到底是什么”这一定义，很多学者使用分类学，试图把杂乱的爱的意义整理成几类，每一种类别反映一种爱。

爱的分类学

至少从12世纪以来，人们就一直尝试将各种各样的爱进行分类（见 Berscheid & Regan, 2005, p. 325）。实际上所有爱的分类学都始于对爱的语言的调查。对于人们爱的概念经常通过他们在日记、小说、戏剧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对爱的体验的描述来收集，或者在采访中或做问卷中直接发问，从而获得他们对爱情的理解。然后分类学者根据其相似性区分出爱的不同意义。近年来分类过程已经变得相当复杂，原型分析（如 Fehr & Russell, 1991），因素分析以及相似的分析（如 Sternberg & Grajek, 1984）经常被使用（见 Berscheid & Meyers, 1996, 关于这些和其他方法的描述），但是研究的目的仍然是相同的：即通过确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爱这个词方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明确爱的意义。爱的意义被分为几类以后，给每一类命名，以描述其内容和设想代表爱的一种类型（例如，浪漫之爱）。

目前已经建构了许多爱的分类方案。有的方案中列出的某些类型可能与其他爱的分类中列出的类型相似（例如，“浪漫之爱”经常出现），但是大多数分类也包含独特的类型（例如，“愚昧之爱”，Sternberg, 1986），和同一类型的有独特的名称（例如，“实用之爱”，Kelley, 1983/2002）。在一个特定的分类中明确出现哪种爱取决于很多情况，包括采用的分类技术，以及分类学者怎样用自己的技巧去分门别类。

把一些人对爱的理解作为样本，由于这些人的特征不同，爱的分类也不同。取样的差异，可能会造成结果在意义上的差异，因为一个词的意义和使用的频率随着个体的社会环境和交往需求而不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需求。一个词的意义具有跨文化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种文化中，由于人们在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特征上的差异，词的意义也可能不同。而且，人们的社会和物理环境随着时间而改变，结果人们需要什么以及想跟他人交流什么也随之变化。语言不是静态的，它不断地适应人们的使用需要。因此，即使在单一文化的亚文化中，一个词的意义也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先前建构的爱的分类法与现在的分类法也许有所不同。

爱的理论

爱的分类通常会带有这样的假设，即每一种确定的爱的类型在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其他类型，包括每种爱的类型的体验和可在观察行为中的表现。建构一种爱的分类学是发展一种爱的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是有关分类学所确定爱的每一种类型。正如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所写：

爱这个词涉及不同的现象……因此，在常识和科学思想中，都有许多爱的不同模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模型并不是对“爱”是单一现象的不同的竞争性观点。相反，它们是对不同现象的概念化，而每一种从历史上都可被称为爱。不同的模型是针对爱的主要形式和类

型而提出的。它们意味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应该总是被描述为一种类型或它包含的几种类型的结合。(1983/2002, p. 280)

所以，凯利认为因为爱不是单一的现象，所以不可能只存在一种爱的理论。相反，存在一些不同的现象，有时每一种现象都被称为爱，但是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在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爱。

爱这个词应该总是被描述为一种类型或类型的结合，凯利的这种说法在爱的研究中还一直没有得到关注，而且其中还存在大量关于爱的理论困惑的来源。另一个困惑来源是，即使用一个形容词来界定爱，而具体指代一种特殊类型的爱时，不同的分类学者和爱的理论家可能也会给这种类型赋予不同的名称；也就是说，单一类型的爱也许有多个别名。

总之，将不同类型的爱进行分类是建构爱的理论的基础——或者更准确地说，爱的特殊类型理论。凯利也声明说任何一种关于爱的特殊形式或类型的理论都应包括与那种爱相关的可观察现象的描述（例如，动作和情感），造成可观察现象的当前原因，当前原因和现象的历史前因，以及这种现象的未来进程。

爱的一种分类学

大约二十年前，我推断对于那些力图预测行为的行为科学家来说，区分表面相似的事物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1）每一种行为与不同行为相关的证据；（2）每一种行为由不同原因而发生的证据。当时有四种类型的爱满足这个标准，而且到今天它们仍然满足这个标准（Berscheid, 1985, 2006）。总之，在我看来这四种爱的类型是详尽无遗的爱的基本类型，或者是人们对他人可能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尽管在一段特殊的关系中，在某一时间段人们可能会体验到四种爱的类型或仅仅某一种爱的类型（我后面会再次提到）。

补充一下，这里强调介绍的这种分类中爱的四种类型并非是原创的。尽管

每一种爱的类型都有多个别名，但每一种类型都曾出现在其他爱的分类中，每一种类型都被其他一些爱的理论家详细阐述和调查研究。每一种似乎有不同的直接或者最接近的原因，但是我相信所有类型都有相同的历史或者根本原因：人类生物遗传随着进化时间而发展。由于体验四种爱中每种爱的类型的能力看来是先天给定的，所以我也认为每一种都是泛文化（pancultural）的理论。

依恋之爱

在我1985年命名的四种爱中，第一种类型的爱是“依恋之爱”。最初是由鲍尔比（Bowlby, 1979）和哈洛（Harlow, 1958）确认的，而且从依恋系统显示出“先天性”或天然性以来，这种爱的类型已被人们接受。因此它的历史原因存在于人类的进化史，尤其是婴儿要生存就需要待在保护者的身边。与这种爱相关的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威胁情境；其特征行为是增进与保护者之间的亲近性；它的人际目标通常是比个体自身年长、强壮和睿智的熟悉人。

正如鲍尔比和哈洛所强调的，报酬—惩罚原则不在依恋之爱的因果条件中。虽然鲍尔比将依恋理论化，认为它是所有人一生之中的特性，但依恋理论的这一标准特征几乎完全被忽视，而大多致力于个体差异部分的调查研究，“这种研究试图从模范的行为模式和阶段来解释稳定的系统偏差”（Simpson & Rholes, 1998, p. 4）。在依恋取向上对个体差异的调查研究，或者不同的“成人依恋风格”（例如，安全和不安全），现在已有很多这方面的专著（例如，见Cassidy & Shaver, 1999）。相比之下，对人一生中依恋的典型行为模式和阶段了解还不多。

温情之爱

第二种类型的爱包括对另一半幸福的关心和为提升幸福而采取行动，不管这些行为将来是否会给自身带来利益。在最初的分类中，我把这种爱叫做“无

私之爱” (altruistic love), 虽然它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字, 包括“仁慈之爱”、“兄弟之爱”、“共有之爱”、“利他之爱 (agape)”, 还有马斯洛 (Maslow) 的术语“B型爱” (B-love), 或者对于其他生命的爱。也许目前最常用的名字是“温情之爱” (正如我在这里重命名的一样), 因为最近当代理论家和研究者重燃对这种爱的研究兴趣 (如 Fehr & Sprecher, 2004), 并且目前使用的就是“温情之爱”这个名称。

同样, 由鲍尔比和哈洛所确认的呵护系统似乎是构成这种爱的基础。它也在理论上作为人类生物遗传的一部分。的确, 许多研究者发现没有呵护系统的补充, 依恋系统不可能得到进化。人刚出生, 是不成熟的、脆弱的, 需要年长、强壮和睿智之人对他们的求救信号作出反应, 以存活到成熟和生殖年龄。那些受到这样保护和照顾的人随着进化而生存下来, 正因如此, 可能导致人类有帮助弱小和苦难者的倾向。

然而, 温情之爱的历史原因 (historical cause) 在于人类的进化历史, 主要的直接原因 (immediate cause) 正如关于“呵护”、“社会支持”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大量社会心理学文献中所述, 是对另一人处于苦恼的知觉。它的特征性行为依赖于所知觉的苦恼的本性, 因为隐藏在行为下的潜在动机是减轻苦恼。这些行为的社会目标是苦恼之人。如果真的所有人天生就有呵护系统, 从而能对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发出的求救信号作出反应, 那么如依恋系统那样, 激活呵护系统的因果条件不遵从报酬—惩罚原则。

伴侣之爱 / 喜爱

在最初的分类中, 我将第三种类型的爱称为做“友谊之爱”, 但是目前, 相关文献更多使用的是“伴侣之爱 / 喜爱”这一称呼。除了“伴侣之爱”、“喜爱”和“友谊之爱”外, 这种爱还有几个其他的称呼, 包括“友爱”、“情感之爱”、“合群之爱”和“实用之爱”。正如“实用之爱”所表明的, 这个情感系统不像依恋和呵护系统那样, 它完全基于报酬—惩罚原则; 也就是说, 我们更

“喜爱”那些奖赏我们的人，而讨厌那些惩罚我们的人。它的历史原因同样是我们的进化遗传以及痛苦—快乐原则，该原则作为基本的动机原则，它是构成几乎全部行为心理学理论（尤其是学习理论）的基础。

喜爱的当前原因、它的相关特征性行为及其典型的人际目标，在每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的“人际吸引”一章都有列出和论述。例如，我们喜欢那些熟悉的人（相对于不熟悉的）、相似的人（相对于不相似的）、喜欢我们的人（相对于不喜欢我们的人）和外表有吸引力的人（相对于没有吸引力的）（见 **Berscheid & Regan, 2005**）。目标的这些特征会使我们同他或她之间的互动是有益的，至少比同那些没有这些特征的人之间的互动更有益。总之，我们努力获得和维持与喜欢的人之间的亲近性，并以一种对方能获得益处的方式做出行为，从而保证他们持续地与我们互动。

浪漫之爱

四种爱里面的第四种类型是“浪漫之爱”，它实质上出现在每一种爱的分类学中。在所有的爱的类型里，无论是外行还是爱的理论家一直对浪漫之爱最感兴趣，原因是在很多社会中它曾经是、而且一直都是婚姻的必要条件。这种爱也有很多其他名称，包括“激情之爱”、“成瘾之爱”和“性爱”。正如“性爱”这个词所暗示的，性欲与此类型的爱关系密切（见 **Berscheid & Ragan, 2005, p. 334**. 浪漫之爱和性欲相关的理论样本）。然而，对于性欲作为浪漫之爱前因的作用的调查还很少。的确，在《爱情心理学》中，我曾问：“古老的性欲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Berscheid, 1988**）然而，之后有很多收集到的证据支持一个观点，即性欲（也叫色欲）是浪漫之爱重要的、可能甚至是必要的因果条件——这种因果条件使这种类型的爱同其他三种类型的爱得以区分，因而满足了爱的一种分类学所包含的标准。

浪漫之爱研究中的性欲

再看坐在黛安娜旁边的查尔斯，在电视灯光闪烁下的他局促不安，他含糊地说：“不论‘相爱’意味着什么。”我也想知道“相爱”意味着什么。我尤其想知道当人们说“相爱”时与他们只说“爱”别人时所表达的意义是否不同。尽管爱的研究者常将短语“相爱”和单词“爱”视为同义，我猜测在我们常研究的大学生通用词典中却指的是不同类型的爱（Berscheid, 1985, p. 436）。

相对于“爱”这个词，为了弄清楚当人们使用短语“相爱”时所表达的意义，萨利·迈耶斯和本人（Berscheid & Meyers, 1996; Meyers & Berscheid, 1997）开发了“社会分类法”，它简单地要求个体列出在他们的社交界中属于某一社会分类的所有人；例如，“家庭成员”、“朋友”、“我爱的人”。应答者可以将一个人归到多个类别。有趣的是，不同类别中的成员事实上是有重叠的（例如，“家庭成员”和“我爱的人”之间的重叠）。大学生列出了他们社交界中属于十种不同的社会类别的人，其中三种类别特别有趣：“我爱的人”、“与我相爱的人”和“让我感觉有性吸引力或性欲的人”。

我们的假设一是“爱”的类别中的成员人数比“相爱”类别中的成员人数多。事实的确如此。人们“爱”的人远远多于和他们“相爱”的人，表明这两个词在爱的共同语言中并不同义。平均来看，大约九个人属于“爱”这一类别，而通常只有一个人属于“相爱”这个类别。女性比男性爱的人更多，并且男性和女性都爱女性更多一些。另外，正如在接受采访者时黛安娜的敏捷和查尔斯的迷惘所表明，在决定一个人是否属于“爱”的类别时，男性比女性感到更难，而在他们决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他们“相爱”会觉得更难，这表明相对女性来说这些词对男性的意义更模糊。

我们的假设二是短语“相爱”指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爱，而词语“爱”是一般的，指的是所有类型的爱。因此，我们预期“相爱”类别中的成员可以纳入“爱”的类别。确实，几乎所有属于“相爱”这一类别的人也属于“爱”这一类别（93%），而属于“爱”这一类别的人中只有较少的人也属于“相爱”

这一类别（23%）。

我们的假设三强调了短语“相爱”的意义。我们假设如果“相爱”指的是一种性爱，那么“相爱”类别中的成员也应该被列为“性吸引力或性欲”这一类别。事实如此，大多数属于“相爱”类别的人（87%）也属于“性吸引力或性欲”这一类别；相反，属于“爱”类别中很少有人（14%）也具有性吸引力。

能让人感到性吸引的人比能与其“相爱”的人更多，表明仅仅是性吸引不足以将一个人纳入“相爱”这一类别，还需要其他因素。“相爱”类别和“朋友”类别的成员高度重叠，提供了不止需要一个因素的线索。大多数属于“相爱”这一类别的人（74%）也属于“朋友”这一类别，这与亨德里克夫妇（S. Hendrick & Hendrick, 1933）的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浪漫之爱和友谊的关系密切（应该注明家庭成员通常属于“爱”这一类别，而不太可能成为“朋友”这一类别）。

从这个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应答者很清楚爱和性欲之间的联系。当一个人讨人喜欢（朋友），并有性吸引力，这个人可以作为“相爱”这一类别中的成员。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讨人喜欢（只是朋友）或者仅有性吸引力，那么这个人就不能成为“相爱”类别中的成员。因而，我们应答者便知道“亲爱的，我并不爱你”的意思了。我们推测这个语句“亲爱的”是指一般的爱，指的是关爱、尊敬、喜欢和其他积极方面的特征，而“不爱”则意味着缺乏性欲。

处于要发展为婚姻关系中（或者伴侣一方是这样认为的）的一方用“亲爱的，我并不爱你”这一理由来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时似乎常听到“并不爱你”。通常认为，缺少性欲是求婚失败的有效理由。它是否是解散一段婚姻关系的一个可接受的理由，这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如果是，那么婚姻的稳定性会受到威胁，因为某些证据表明对特殊伴侣的性欲也许是有时间限制的；例如，斯普瑞彻和里根（Sprecher & Regan, 1998）发现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们相互之间感到的激情之爱就越少。

我们也得出结论，短语“相爱”用在爱的通用词典中指的是“浪漫之爱”。

很多年前，伊莱恩[哈特菲尔德]·沃尔斯特和我区分了浪漫之爱和伴侣之爱（Berscheid & Walster, 1974, 1978），这一区分久经考量，并出现在量化得到的爱的分类中（例如，Fehr, 1994; C. Hendrick & Hendrick, 1986）。自哈特菲尔德详细阐述了浪漫之爱和伴侣之爱之间的差异（如 Hatfield, 1988; Walster [Hatfield] & Walster, 1978），迈耶斯与伯奇德（Meyers & Berscheid, 1997）研究的结果，以及其他研究（如见 Regan, 1988）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差异。他们认为：

- 浪漫之爱——带有性欲的喜欢
- 伴侣之爱——没有性欲的喜欢
- 性欲——没有喜欢的性欲

如果浪漫之爱的原因不但包括伴侣之爱/喜欢（例如，相似性）的原因，也包括性欲的原因，那么要预测一个人可能与谁在什么时候坠入爱河，这两部分的原因都要考虑到。如前所述，我们已经很清楚有助于喜欢一个人的因果条件。然而，对于性吸引/性欲的原因还知之甚少。当然，它的历史原因在于我们的进化史，因为没有性欲，智人（*Homo sapiens*）可能早已灭绝。尽管如进化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些原因通常包括良好的健康状况和适宜目标的可得性，通常有外表吸引力与生育力的异性，但性欲的当前原因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认（见 Regan & Berscheid, 1999）。它典型的特征行为包括在交配动机的驱使下有计划地追求异性配偶。

总结

在我看来，我在这里强调介绍的四种爱的类型，至少在心理学的分析层面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人类和天生就有的积极的人际情感系统。我的观点是每种类型都值得个别对待，因为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激活成因和结果（例如，相关行为和人际目标）。例如，关于不同的目标，我们可以依恋我们不喜欢或不尊敬

的人，没有性吸引力的人，正如鲍尔比和其他的动物行为学家观察到的，惩罚的来源总是比报酬的来源更多。我们能，而且也经常这样做，对于不认识、不依恋、不喜欢、也不存在性吸引力、而且我们不期望回报的人给予呵护行为。他们的苦恼激活了我们的呵护系统，我们作出回应。我们经常喜欢自己并不依恋的人，以及我们在性上感觉排斥的人，但是，我们能对不是特别喜欢、甚至讨厌的陌生人体验到性吸引。

在我对这种分类学的最初呈现中（Rescheid, 1985），我假设在一段浪漫关系和一个时间段中，可能会体验到四种爱的类型中的一种或多种。然而，需要更多地研究在一种关系中这些类型的爱随时间发生一般的进展——的确，它们随时间是否会有典型的发展。如果像一些爱的理论家一样将四种爱的类型混合，那么对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调查研究是不可能的。例如，在《爱情心理学》中，薛佛、哈赞和布拉德肖（Hazan & Bradshaw, 1988）将浪漫之爱理论转化为依恋之爱、呵护之爱和性欲的结合。对此论点的评价需要对每种类型的爱有更多的了解，而目前掌握的信息还不够。例如，需要更多地了解成年人依恋怎样快速发展和谁可能会依恋谁。并非所有的“浪漫”伴侣都是比自己年长、睿智和强壮的人，也不是在有威胁的情况下便向其求助，同时，并非所有的伴侣都是软弱、脆弱和苦恼的，从而引发呵护之爱。

再次，我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每一种类型的爱都需要分别对待，直到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所有的类型应该收纳在一把黄伞之下。这是特别正确的，因为也许有这种情况，在一段关系中爱的一种类型制约着另一种类型的发展和表达。例如，文化人类学家阿瑟·沃尔夫（Arthur Wolf, 1995）已发现了富有启发性的证据，表明依恋之爱和呵护之爱和性也许是对立的。如果不能识别和考虑爱的不同类型，研究者始终对每种类型使用一个名称，这个假设以及其他假设的调查研究都是不可能的。爱的研究者仍十分需要爱的一个通用词汇。

（王晓明、邵景进 初译）

参考文献

- Berscheid, E. (1985).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vol. 2, pp. 413-484. New York: Random House.
- . (1988). Some comments on love's anatomy: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fashioned lust?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359-374.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2006). Seasons of the heart. In M. Mikulincer and G. Goodwin (eds.), *Dynamics of Love: Attachment, Caregiving, and Sex*, pp. 404-422.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erscheid, E., and Meyers, S. A. (1996). A social categorical approach to a question about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43.
- Berscheid, E., and Regan, P. (2005).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Prentice-Hall.
- Berscheid, E., and Walster [Hatfield], E. (1974). A little bit about love. In T. L. Huston (ed.), *Foundations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pp. 355-38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 (1978).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2nd e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Bowlby, J. (1979).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ectional Bonds*. London: Tavistock.
- Cassidy, J., and Shaver, P. R. (eds.). (1999).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D'Andrade, R. G. (1989). Cultural cognition. In M. I. Posner (e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pp. 795-83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Fehr, B. (1994). Prototype-based assessment of laypeople's views of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09-331.
- Fehr, B., and Russell, J. A. (1991). The concept of love viewed from a prototyp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25-438.
- Fehr, B., and Sprecher, S. (July 23, 2004). Compassionate love: Conceptual, relational, and behavioral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hip Research, Madison, Wis.
- Harlow, H. F. (1958). The nature of lov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3, 673-685.
- Hatfield, E. (1988). Passionate and companionate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91-21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mingway, E. (1964). *A Moveable Feast*. New York: Scribner's.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S. (1986). A theory and method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92-402.
-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1987). Love and sex attitudes: A close relationship. In W. H. Jones and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pp. 141-169. Greenwich, Conn.: JAI.
- . (1993). Lovers as friend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0, 459-466.

- Hotchner, A. E. (1955). *Papa Hemingw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antrowitz, B., and McGuire, S. (February 21, 2005). Now you ask me? *Newsweek*, pp. 34-37.
- Kelley, H. H. (1983/2002). Love and commitment. In H. H. Kelley, E. Berscheid, A. Christensen, J. H. Harvey, T. L. Huston, G. Levinger, E. McClintock, L. A. Peplau, and D. R. Peterson,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65-314. Clinton Corners, N.Y.: Percheron.
- Murstein, B. I. (1988). A taxonomy of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3-3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yers, S. A., and Berscheid, E. (1997). The language of love: The difference a preposition mak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347-362.
- Regan, P. C. (1998). Of lust and love: Beliefs about the role of sexual desir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139-157.
- Regan, P. C., and Berscheid, E. (1999). *Lust: What We Know About Human Sexual Desire*.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Rubin, Z. (1988). Prefac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vii-xii.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aver, P., Hazan, C., and Bradshaw, D. (1988). Love as attachment: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behavioral system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68-9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mpson, J. A., and Rholes, W. S. (1998).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In J. A. Simpson and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3-21.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precher, S., and Regan, P. C. (1998). Passionate and companionate love in courting and young married couples. *Sociological Inquiry*, 68, 163-185.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135.
- Sternberg, R. J., and Grajek, S. (1984). The natur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312-329.
- Walster [Hatfield], E., and Walster, G. W. (1978). *A New Look at Lov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olf, A. P. (1995). *Sexual Attraction and Childhood Association: A Chinese Brief for Edward Westermarc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爱情的二重理论

罗伯特·J·斯腾伯格 (Robert J. Sternberg)

爱情的二重理论涵盖了爱的本性的两个基本元素：一个是爱的结构（爱情三角形亚理论）(a triangular subtheory)，一个是爱的发展（爱情故事亚理论）(a subtheory of love as a story)。爱情故事亚理论试图解释各种各样的爱情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认为每个亚理论与二重理论构成一个整体。

爱情三角形亚理论

爱情三角形理论 (Sternberg, 1986, 1988 a, 1988 b, 1997, 1998 a) 认为爱情可以用三个元素来理解，这三个元素可以看做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三角形”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几何模型。这三个因素是亲密 (intimacy, 位于三角形的顶点)、激情 (passion, 位于三角形的左顶点) 和决定/承诺 (decision/commitment, 位于三角形的右顶点)。这三个因素在其顶点位置的指定上是任意的。这三个因素在众多的其他爱情理论中出现，而且似乎与人们的爱情内隐理论 (people's implicit theories of love) 是高度一致的 (Aron

& Westbay, 1996)。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能以不同形式使用，所以，在此理论情境中理清它们的含义是十分重要的。

爱情的三因素

爱情三角形理论中的三个因素是亲密、激情和决定/承诺。每个因素描述了爱情的一个方面。

亲密

亲密是指在爱情关系中亲近、连属、结合等体验的感觉，因此，这个因素包括那些在爱情关系当中能促进温暖关系的感受。斯腾伯格和格瑞杰克（Sternberg & Grajek, 1984）对一些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这些数据得自鲁宾（Rubin, 1970）的爱与喜欢量表（loving and liking scales）以及李维格、兰兹和特拉伯（Levinger, Rands, & Talaber, 1977）的亲密关系量表（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得出的结论是把亲密因素分成十个要素：（1）渴望促进爱人的福祉，（2）与爱人共享喜悦，（3）对爱人高度关注，（4）在需要得到帮助时能指望爱人，（5）与爱人互相理解，（6）与爱人分享自我与所有，（7）从爱人那里得到情感的支持，（8）为爱人提供情感支持，（9）与爱人亲密交流，（10）肯定爱人的价值。

激情

激情是指引发浪漫之爱、身体吸引、性完美以及爱情关系中相关现象的驱力。激情因素包括那些在爱情关系中能引起激情体验的动机性以及其他形式的唤醒源。它包括沃尔斯特（Walster & Walster, 1981）所说的“一种非常想跟别人结合的状态”（p.9）。在恋爱关系中，性需要在激情体验中占据支配地位。然而，其他需要——比如自尊（self-esteem）、援助（succor）、关怀（nurturance）、亲和（affiliation）、支配（dominance）、顺从（submission）和

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可能也有助于激情体验的获得。

决定/承诺

从短期来讲，决定/承诺指的是一个人决定爱另一个人；从长期来讲，它是指一个人维持爱情的承诺。决定/承诺因素的这两个方面不一定同时存在，一个人可以在不承诺长久之爱的前提下决定爱一个人，一个人也可以处于一段关系，却不承认爱着另一个人。

爱情的三个因素相互影响。例如，更高程度的亲密会导致更高程度的激情或承诺，就像更高程度的承诺会导致更高程度的亲密或者激情（可能性相对较小）。总之，三个因素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尽管这三个因素都是恋爱关系中的重要成分，但是，在不同的关系或者一段关系的不同时间内，它们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确实，不同类型的爱情可以通过因素间有限的组合来实现。

爱情的类型

爱情的三个因素通过组合可以构成八种不同类型的组合。每一种组合对应着一种类型的爱情 (Sternberg, 1988 a, 1988 b)。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爱情的类型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组合：没有一种关系完全符合其中的类型。表 9-1 列出了爱情的类型。

“无爱” (non-love) 指爱情的三个因素都缺失。“喜欢” (liking) 是个体只体验到亲密，而缺乏激情和决定/承诺的因素。“迷恋” (infatuated love) 是人们只体验到激情，而缺失另外两个爱情要素。“空洞之爱” (empty love) 是指一个人爱并且承诺爱别人，却缺乏爱情的亲密和激情因素。“浪漫之爱” (romantic love) 是亲密与激情因素的组合。“伴侣之爱” (companionate love) 是亲密和决定/承诺因素的组合。“愚昧之爱” (fatuous love) 是激情和决定/承诺的组合，而缺少亲密这个因素。“完美之爱” (consummate love)，或者说完整的爱，来自三个爱情因素的组合。

表 9-1 爱情三角形的分类

爱情的类型	亲密	激情	承诺
无爱	-	-	-
喜欢	+	-	-
迷恋	-	+	-
空洞之爱	-	-	+
浪漫之爱	+	+	-
伴侣之爱	+	-	+
愚昧之爱	-	+	+
完美之爱	+	+	+

总之，爱情三个因素可能的组合构成了带有局限性的不同类型的爱情。大部分的爱情是这些爱情类型的“不纯正”的例子。它们以不同的数量分享了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爱情三角形的几何学

“爱情三角形”的几何学取决于两个要素：爱情的数量和爱情的平衡。爱情要素的数量多少由爱情三角形的不同面积表示：爱情的数量越多，所占三角形的面积越大。三种爱情因素平衡程度的不同由三角形的不同形状表示。例如，平衡的爱情（爱情的三个因素的比重大致相同）以等边三角形表示。

爱情的多样三角形

爱情不是单一的三角形。相反，它包括大量的三角形，但只有其中一些有理论和实际的价值。例如，把现实的三角形和理想的三角形作对比。一个人有不止一个三角形，可以代表他/她对别人的爱，但只有一个三角形对爱情关系

的代表是理想的（见 Sternberg & Barnes, 1985）。理想的三角形可能部分基于先前同一类型的关系经验，这形成了蒂鲍和凯利（Thibaut & Kelley, 1959）的“比较水平”（a comparison level），还有部分基于对此亲密关系的预期。区分自己和他人知觉到的三角形同样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人在一段关系中的感觉和重要他人的感觉可能对应，也可能不对应。最后，区分感觉的三角形和行为的三角形也是很重要的。

以一种特定方式来感觉重要他人是一回事，在行动上与这些感觉保持一致则是另一回事。三个爱情因素的每一个因素都有一套相关的行为。例如，亲密可能在行为上表现为分享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和时间、表达对爱人的神会、与爱人诚恳地交流等。激情在行为上表现为凝视、触摸、做爱等等。承诺可能体现在性的忠贞、订婚、结婚等行为上。当然，爱情每一种因素的行为表现由于人、关系和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管怎样，考虑通过行为表现出的爱情三角形是重要的，因为行为对关系有如此大的影响。

数据

在此呈现的数据是基于斯腾伯格（Sternberg, 1997）的研究。其他数据可以在斯腾伯格（Sternberg, 1988 a, 1998 a）的研究中找到。研究1的被试是84名美国纽黑文市的成年人，男性和女性各42位，他们是通过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的广告征集而来的。被试的参与条件是：被试的年龄不小于18岁，异性恋，已婚或近期处于亲密关系。被试的年龄从19岁到62岁不等，平均年龄为28岁，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是8岁。亲密关系的时间跨度从0.1年到22年不等，平均4.54年，标准差是4.6年。研究2的被试是101名纽黑文市的成年人，其中男性50位，女性51位，他们也是通过当地报纸的广告征集而来的。被试的参与条件与研究1相同。被试的年龄从18岁到71岁不等，平均年龄31岁，标准差是11岁。被试亲密关系的时间跨度从1年到42年不等，平均6.3年，标准差是8.6年。

所有的被试都接受三角形爱情量表 (Triangular Love Scale) (Sternberg, 1997, 1998 a) 的测量, 三个爱情因素的每一个都有 12 个李克特量表项目进行测量。比如测量亲密关系的项目可能是“我跟 _____ 有令人温暖和舒服的关系”。测量激情的项目可能是“我不能想象另一个人也能像 _____ 那样使我开心”。测量承诺的项目可能是“我觉得跟 _____ 的关系是永久的”。其他量表也被用来施测, 像鲁宾喜欢量表 (Rubin Liking Scale) 和鲁宾爱情量表 (Rubin Love Scale)。

要求一半的被试 (男女数目相同) 按心中所想根据每一个陈述对每种关系的重要程度, 对有关六种不同爱的关系 (母亲、父亲、年龄上最接近的同胞兄弟姐妹、爱人/配偶、最好的同性朋友、理想的爱人/配偶) 的所有陈述进行等级评定。要求另一半被试 (同样, 男女数目相同) 评估那些自己生命中六种爱的关系的特征。重要性是指一种价值的判断, 特征是对一段存在关系的真实状况的判断。

如果爱情三角形理论和测量是可行的, 那么关系与因素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 不同的关系应该显示出理论中三种因素的不同组合。我们得到了显著的交互作用, 事实上, 不论通过单因素、二因素、三因素还是四因素的交互分析, 都得到了最大 F 值 (58.25), 能解释最大的变异 (0.023)。

根据理论来说, 实际的平均值是有意义的。例如, 与那些激情不重要的关系中的评定相比, 在激情比较重要的爱情关系中的平均特征评定的激情的变异性比亲密和承诺更显著。爱人的激情平均等级评定是 6.91, 接下来母亲的激情平均等级评定为 4.98, 二者相差 1.93。相反, 爱人的亲密平均等级评定是 7.55, 第二位的是朋友, 其平均等级评定为 6.78, 二者只相差 0.77。同样, 爱人的承诺平均等级评定与处于第二位的母亲只相差 1.07。对重要性所做的等级评定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模式。

内部一致性分析显示出除了四个项目外, 其他 32 个测试项目都发挥了适

当的作用。而且，子量表的信度都在0.80到0.90之间。整个量表的信度高达0.90。这都是令人满意的。

相关分析显示，尽管行为平均数小于感觉平均数，这两种类型的评定存在

等级评定，亲密和承诺的相关程度比亲密和激

情。在重要性评定上，亲密与激情的相关比亲密

的三个因素与爱情三角形理论的三个因素相对

性评定的四个因素。这里将决定/承诺因素拆分为

两个因素。因素分析的结果支持了这个理论。

没有明显的会聚/区分模式。外部效度表明与鲁

宾量表的高度的相关。斯腾伯格爱情三角形量表的五个

子量表在《鲁宾喜欢量表》和《鲁宾爱情量表》更高

出现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2包括

的复本，并且修订了斯腾伯格的爱情三角形量

表的一些缺陷。主要的缺陷是，实验中过多的

子量表。在后继研究中，量表项目和其他子量表的

相关性。特别是在特征评定这个指标上。关于内部效度的

问题。因素的结构与爱情三角形理论的三个因素

满意度的相关仍然很高（三个子量表的中数为

理论确定的概念的完美测量；从整体上看，研究

分析还显示，二级观即有特征证的

情、激情和承诺的相关程度更

和承诺。激情和承诺的相关都

因素分析显示出特征评定

成决定和承诺两个单独的因素。

最后，尽管关于喜欢和爱

宾(1970)量表得分有中等到

子量表在满意度评定中的相关

研究2是为了纠正研究1

个在一定程度上比研究1更大

表，以期弥补在首次研究中出

项目。这个子量表显示出高度

表，而且这个子量表的相关也

交叉相关程度实质上降低。自

题的特征和重要性评定都显示

对应。关于外部效度，它与整体

0.76)的鲁宾量表的相类更高

总之，尽管量表不是这个

结论支持了爱情三角形理论。



爱情故事亚理论

爱情三角形源于故事。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诠释了对爱情的不同理解。其中一些故事显然就是爱情故事，而另一些故事可能在更大的故事背景中隐含着爱情故事。不管哪一类故事，都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机会了解爱情的多种概念。这些故事可以通过观察恋爱中的人或看电视、电影或读小说获得。由于不断接触这样的故事，久而久之，对于爱情是什么或者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故事。

斯腾伯格（1994, 1995, 1996, 1998 b; Sternberg, Hojjat, & Barnes, 2001）提出并检验了爱情的故事理论，个人品质与环境的互动（我们部分参与了创造）导致了爱情故事的发展，然后我们会尽可能地在生命中演绎这种故事。大量潜在的伴侣都或多或少地符合这些故事，相对于和我们的爱情故事不太相符的人，我们更可能与那些爱情故事与我们十分相符的人在关系中获得成功。尽管我们创造的故事是基于我们自身的，但它们蕴含着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的体验——小时候听到的神话故事，从我们身边的父母和亲属那所看到的爱情关系模式，电视/电影的情节与别人交谈获得的关于他们关系的信息等等。

故事的类型

尽管爱情故事的数量可能是无限的，但是，在我们对文学、电影、关系口头描述的实验性分析中，某种类型的故事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因为我们分析的故事取自美国的被试，所以我们的结论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偏差（cultural bias）。

故事含有一些重叠，如果人们在某类爱情故事中表现出高典型性的特征，那么他应该也偏好与此类爱情故事特征相重叠的爱情故事。比如，一个独裁政府的故事和一个警察的故事有相互重叠的要素——一方对另一方保持权威与监督——所以如果人们偏好其中一个故事，可能也会偏好此类型的其他故事。我

们发现故事在概念化人们的爱情观念时特别有用（见表9-2）。这个不太详细的爱情故事列表是以对文献中爱情故事的分析、作者及他人先前的心理研究和非正式渠道收集的个案资料的解释为基础的。

故事的各个方面

故事的一些方面值得注意。将这些方面记在脑中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适用于所有的故事类型。

第一，目前26种故事类型的列表呈现出广泛的爱情概念。其中一些概念（如爱情是园艺）比另一些概念（如爱情是色情的）更深入人心。

第二，每一个故事都有想法和行为的一种特征性模式。例如，赞同游戏爱情故事的人（可见亨德里克夫妇[1986]和李[1977]所描述的“游戏型”爱情风格）与赞同宗教信仰爱情故事的人，他们对爱人的行为是很不一样的（也见由哈赞和薛佛[1987]、薛佛、哈赞和布拉德肖[1988]提出的焦虑—矛盾型依恋风格）。

第三，如上面所表明的，爱情故事观点与爱情其他观点实质上存在着重叠。正如游戏型爱情故事看起来与李（1977）的游戏型爱情风格不谋而合；宗教信仰的故事似乎与焦虑—矛盾型依恋风格相通（Shaver, Hazan, & Bradshaw, 1988）；幻想型爱情故事听起来与浪漫之爱的典型概念很相似（如Walster & Walser, 1981；Sternberg, 1986）等等。正如现存的各种理论所体现的，不同之处在于爱情故事观点试图抓住故事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可能会产生不同构造的爱情关系。虽然这些理论提出了多样的构念来解释爱情关系，但是，对理论的强调超越了故事本身。参见以上讨论的故事结构。

第四，一个特殊的爱情故事引导着我们对一种爱情关系的描述，这与我们谈到的认知疗法中的“自动思维”（automatic thoughts）道理相通（如Beck, 1976；Ellis, 1973）。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持有这样的观点，或意识到

表 9-2 一些爱情故事类别

1. 成瘾 (Addiction)。焦虑型依恋, 执著的行为表现; 一想到失去伴侣, 就会感到焦虑。
2. 艺术 (Art)。因伴侣富于吸引力的外表而坠入爱河; 伴侣看起来总是状态良好, 是很重要的。
3. 商业关系 (Business)。爱情关系如同商业提案, 金钱是动力, 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如同商业伙伴。
4. 收藏 (Collection)。伴侣被看做是符合其收藏“图式”; 伴侣终究只被看做是收藏品。
5. 食谱 (Cookbook)。以特定方式 (秘方) 行动, 爱情关系更容易解决; 离开“秘方”, 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6. 幻想 (Fantasy)。总是期待着被一个穿着金色盔甲的骑士所救, 或者娶了一位公主,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7. 游戏 (Game)。爱情是一种游戏或运动。
8. 园艺 (Gardening)。爱情关系需要持久不断的浇灌与抚育。
9. 政府 (Government)。(1) 独裁 (Autocratic), 一方支配或者控制另一方。(2) 民主 (Democratic), 双方平等享有权力。
10. 历史 (History)。爱情的关系事件形成持久的纪录, 保存大量精神或物质方面的纪录。
11. 恐怖 (Horror)。当你恐吓伴侣或伴侣恐吓你时, 爱情关系变得有趣。
12. 房子和家 (House and Home)。爱情关系的核心在于家, 关系通过家的发展和维持而表现。
13. 幽默 (Humor)。爱情是奇怪而又有趣的。
14. 神秘 (Mystery)。爱情是神秘的, 你不应该让对方对自己过多了解。
15. 警察 (Police)。你需要密切注意伴侣不越雷池; 或者处于伴侣的监督下, 从而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
16. 色情 (Pornography)。爱情是肮脏的, 爱就要降低身份或被降低身份。
17. 复原 (Recovery)。存活者的心理状态; 经过以往的创伤再回头看, 一个人实际上能接受所有的事情。
18. 宗教信仰 (Religion)。把爱情看做是宗教信仰或者由宗教信仰驱使的一整套感觉和行为。
19. 牺牲 (Sacrifice)。爱就是奉献自己或一个人把他/她自己奉献给你。
20. 科学 (Science)。爱情能被理解、分析和解剖, 就像其他自然现象一样。
21. 科幻小说 (Science Fiction)。感到伴侣就像外星人一样——不但不可思议, 而且很奇怪。
22. 裁缝 (Sewing)。你让它是什么样的, 爱情就是什么样的。
23. 戏剧 (Theater)。爱情是剧本, 拥有无创意的表演、布景和台词。
24. 旅行 (Travel)。爱情是一场旅行。
25. 战争 (War)。爱情是一系列破坏性的但持续的战争。
26. 学生—老师 (Student-Teacher)。爱情是一种师徒关系。

这些观点与我们持有的特殊的爱情故事如出一辙。相反，关于“爱情是什么”或者“爱情应该是怎样”的描绘，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的观点或多或少更“正确”，如果伴侣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同样，如果我们不符合自己对关系的观点，也会认为自己是适当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将爱情视为商业关系，却几经努力仍不能形成商业类型的关系，他/她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恰当的。

第五，爱情故事中有两个互补的角色，他们可能对称，也可能不对称。我们寻找那些共享自己故事的人，或至少与自己的故事大致相符的人，而不是总去寻找正如自己的人。因此，人们所寻找的那些人，从一个层面看与自己是相似的，从另一层面看与自己又是有所差异的。由此看来，关于爱情的相似说（Byrne, 1971）和互补说（Kerckhoff & Davis, 1962）都不完全正确。相反，对于我们所寻找的人，我们以自己的层次来寻求解答。

第六，故事包含某些适应性的优势和劣势。一个故事可能或多或少地适合一个指定的文化社会环境的要求。

第七，某些故事似乎比其他一些故事更具备成功的可能。比如，一些故事中的人物可能很快分手，因此，缺乏长期的持久性，而另一些故事中的爱情可能就会天长地久。

第八，故事既是因也是果：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是互动的。关系中的故事可能导致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做出行为，甚至其他故事也会引发特定的行为。同时，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我们的互动可能会塑造和修饰我们的故事，并带入关系中。由于我们的故事与生活如此交织，因此，要明确地区分出因和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众多故事可能呈现出层次性，所以故事在显著性方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更偏爱其中的一些故事，所以对于那些与我们更显著的故事相配的伴侣，我们的满意度是不一样的。李克特类型量表呈现了多样故事，可允许被试显示出他们的偏好。

按照原型概念的意义, 故事可能很容易理解 (Rosch, 1973, 1978), 原型概念适用于多种爱情观念, 并产生了人们构想爱情的各种模型 (如 Barnes & Sternberg, 1997; Fehr, 1988; Fehr & Russell, 1991)。例如, 爱情的一个原型特征是亲密。从原型观点来看, 爱情的概念没有定义性的特征 (defining features), 但是, 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characteristic features)。它尽管不是必要而又充分的, 仍或多或少地支持着一个构念。例如, 如果一个人拥有“神秘故事”, 可能没有定义性特征表明这就是一个神秘故事, 而原型特征是神秘故事的代表性特征 (例如, 一个要被揭开的神秘之谜, 一个试图揭开神秘之谜的侦探, 一个让侦探试图弄清的神秘人物, 一些不明显或蓄意隐藏的信息等等)。

爱情故事理论试图理解人们生活中的叙事角色, 这也是同时期的主流 (Bruner, 1990; Cohler, 1982; Josselson & Lieblich, 1993; McAdams, 1993; Murray & Holmes, 1994; Sarbin, 1986; Taylor, 1989)。故事也与其他一些令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构念相关, 例如剧本 (Schank & Abelson, 1977) 和图式, 它们既有适应性 (Piaget, 1972), 又有不适应性 (Young & Klosko, 1993)。然而, 故事与其他构念之间可能存在关键性的差异。

首先, 剧本和它们的同源构念被定义为刻板行为序列 (stereotypical action sequences)。而故事则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通常来说, 故事有情节、主题以及个性丰满的人物角色, 这比剧本和相关的构念在实质上更丰富与细致。第二, 剧本和相关构念是故事的典型子集, 它们可能隐藏在故事中 (例如, 一个故事中的主人翁不仅去医务室, 还去了快餐店)。第三, 故事比剧本和相关的构念通过主题更典型地 (但并不总是) 表达潜在的意义。比如说, 没有人会从去一次医务室或快餐店中发现什么深远的意义。更多有关两者差异的细节, 还有整体的理论, 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 (Sternberg, 1996, 1998b)。

数据

在两个效度研究中 (Sternberg, Hojjat, & Barnes, 2001), 我们试着检验爱情

故事理论的一些观点。为了对爱情故事理论的一些预测做实证检验，我们设计了一份基于李克特量表的调查问卷，这份问卷用来评估人们的爱情故事。我们选择这样一份问卷而没有选择定性的陈述，这是因为量表更容易提供对理论的定量检验。

来自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导论课上的 105 名被试（55 名女性，50 名男性）参与研究 1，并以此获得课程学分。被试年龄从 17 岁到 26 岁不等，平均年龄为 19 岁。被试的参与条件是目下或过去（曾）处于一段亲密的关系之中（在他们自己看来）。50% 的被试（52 名）目下处于亲密关系之中，81% 的被试表示自己所经历的亲密关系的整个数目不超过 5 个，17% 的被试表示自己经历的亲密关系数量在 5~10 个之间，剩余 2% 的被试表示经历的亲密关系数超过 10 个。研究 2 的被试是 86 名耶鲁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是通过广播与海报征集而来的 43 对异性恋伴侣。每对被试获得 20 美元的酬劳。这些被试的年龄从 17 到 26 岁不等，平均年龄是 20 岁。被试的参与条件是关系维持一年以上，并且伴侣双方都同意参与。

所有的被试都接受了一份爱情故事量表的测量，量表的项目包括：

1. 成瘾：“如果我的伴侣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是一片空白。”
2. 艺术：“坦白说，身体魅力是我寻找伴侣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特征。”
3. 商业关系：“我相信亲密关系是合股关系，就像大多数商业关系一样。”
4. 幻想：“人们认为自己等待着梦想中的白马王子/公主。”
5. 游戏：“我认为我的关系是一场游戏，输赢的不确定性才是这场游戏的好玩之处。”
6. 园艺：“我认为一段好的关系的获得，就像打理花园一样，需要你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呵护它。”

被试也接受了其他量表的测量，比如爱情三角形量表。在研究 1 中，我们评估了爱情故事量表的信度和爱情故事测量的内部效度，并从两种不同的分析

方式（聚类分析和因素分析）表现了强调爱情故事的结构。在研究2中，我们对测量进行了外部效度检验，测量所得的分数与通过其他理论产生的测量分数成相关。我们也对理论的预测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与相似理论的满意和吸引相一致（如 Byrne, 1971），即伴侣双方的爱情剖面图越匹配，他们在亲密关系中会更满意，也较容易成功。同时，我们当然也意识到许多故事之外的因素也影响了满意度（见 Gottman, 1994; Sternberg & Hojjat, 1997）。

故事在受欢迎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最受欢迎的爱情故事依次是旅行、园艺、民主政府和历史。最不受欢迎的故事依次是恐怖、收藏家、独裁政府和游戏。在故事的喜好上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喜欢艺术、色情、牺牲和科幻小说，而女性更喜欢旅行的故事。

我们发现尽管爱情三角形理论的两个因素（Sternberg, 1986）——亲密、激情和承诺——积极地预测了满意度，那些与满意度有显著相关的故事都消极地预测了满意度的评定。成显著负相关的故事有商业关系，收藏者、游戏、统治者、被统治者、恐怖（包括恐怖者与受害人）、幽默（喜剧演员）、神秘（神秘者）、警察（探员）、复原（帮助者）、科幻小说和剧场（演员与观众）。因此，似乎不适应的故事本身就可以导致不满，但是，适应的故事并不一定导致满意。

相似理论认为，有较多相似性的伴侣更加会彼此吸引，并且在亲密关系中有更好的满意基础。但是，相似性是关于哪方面的呢？在研究2中，我们检验了爱情故事的相似性，也检验了爱情的其他方面。总之，检验结果与我们的观点相一致，即伴侣双方的故事越相似（以及爱情三角形剖面图越相似），亲密关系中的满意度越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处于亲密关系中的男性与女性的剖面图成高相关（0.65），即使在最保守的情况下仍存在相关（0.15）。此外，正如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伴侣间故事剖面图的不一致程度与爱情的满意等级成负相关（-0.45）。

结论

爱情可用描绘爱情结构的三角形来理解。有趣的是，憎恨同样可用相关的因素来描绘（Sternberg, 2003）。

三角形由三个因素组成：亲密、激情和承诺。三种因素的不同组合产生了爱情的不同类型。以我个人的观点看，所有三个因素都与关系中的幸福感、满足感密切相关。当双方三角形的面积（爱的数量）和形状（爱的类型）大致吻合时，伴侣通常会感到更幸福。

故事产生了不同种类型的三角形，虽然很可能还有更多类别，目前有 26 种故事分类。每个故事包含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可能对称，也可能不对称，故事随着个性和经历之间的互动而发展。虽然一些故事与不满意感相关，但是，没有一个故事单纯与爱情关系中的幸福感与满意感相关。当双方的爱情剖面图大致吻合时（即或多或少地偏爱某种爱情模式），伴侣在关系中感到更幸福。

如果我们希望全面地理解爱情，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方方面面。

备注

爱情三角形量表的最新最全的版本参见斯腾伯格（1998a），爱情故事量表的最新版本参见斯腾伯格（1998b）。

参考文献

- Aron, A., and Westbay, L. (1996). Dimensions of the prototyp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3): 535-551.
- Barnes, M. L., and Sternberg, R. J. (1997).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Hojjat (eds.),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eck, A. T. (1976).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yrne, D. (1971). *The Attraction Paradig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hler, B. J. (1982). Personal narrativ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P. Baltes and O. G. Brim, Jr. (eds.), *Life 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vol. 4, pp. 205-24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llis, A. (1973). Rational-emotive therapy. In R. J. Corsini (ed.),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Itasca, Ill.: Peacock.
- Fehr, B. (1988).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love and commi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557-579.
- Fehr, B., and Russell, J. A. (1991). Concept of love viewed from a prototyp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25-438.
- Gottman, J. (1994). *Why Marriages Succeed or Fai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Hazan, C., and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S. (1986). A theory and method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92-402.
- Josselson, R., and Lieblich, A. (eds.). (1993).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Kerckhoff, A. C., and Davis, K. E. (1962). Value consensus and need complementarity in mate sele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295-303.
- Lee, J. A. (1977). A topology of styles of lov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 173-182.
- Levinger, G., Rands, M., and Talaber, R. (1977). *The Assessment of Involvement and Rewardingness in Close and Casual Pair Relationship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Report DK.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McAdams, D. P. (1993). *Stories We Live By*. New York: Morrow.
- Murray, S. L., and Holmes, J. G. (1994). Storytell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id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 650-663.
- Piaget, J. (1972). *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 Rosch, E. (1973).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In T. E. Moore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pp. 111-14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and B.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pp. 27-48. Hillsdale, N.J.: Erlbaum.
- Rubin, Z. (1970). Measurement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65-273.
- Sarbin, T. (ed.). (1986).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 Schank, R. C., and Abelson, R. A.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J.: Erlbaum.
- Shaver, P., Hazan, C., and Bradshaw, D. (1988). Love as attachment: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behavioral system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68-9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135.
- . (1988a). *The Triangle of Lo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88b). Triangulating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19-138.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4). Love is a story. *The General Psychologist*, 30, 1-11.
- . (1995). Love as a stor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2, 541-546.
- . (1996). Love stori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59-79.
- . (1997). A construct-validation of a triangular love scal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 313-335.
- . (1998a). *Cupid's Arro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8b). *Love Is a 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A duplex theory of hat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o terrorism, massacres, and genocid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7 (3): 299-328.
- Sternberg, R. J., and Barnes, M. L. (1985). Real and ideal other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1586-1608.
- Sternberg, R. J., and Grajek, S. (1984). The natur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345-356.
- Sternberg, R. J., and Hojjat, M. (eds.). (1997).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ternberg, R. J., Hojjat, M., and Barnes, M. L. (2001). Empirical aspects of a theory of love as a 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5, 1-20.
-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hibaut, J. W., and Kelley, H. H. (195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s*. New York: Wiley.
- Walster, E. H., and Walster, G. W. (1981). *A New Look at Love*, 2nd e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Young, J. E., and Klosko, J. S. (1993). *Reinventing Your Life*. New York: Dutton.





爱即“共有应答性” 的给予和接受

玛格丽特·S·克拉克 (Margaret S. Clark) 琼·K·莫南 (Joan K. Monin)

“爱”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使用方式。爱可能指的是强烈的性吸引，也可能是对某人的朝思暮想，是想和某人在一起的动机，是友谊的感觉，也可能是对别人的无私奉献。没有哪种用法是精确的。在这里我们只详述一种爱的意义：爱即关系中的“共有应答性” (communal responsiveness)，即它是作用于伙伴的感觉以及伙伴所感到的作用于自身的感受。我们讨论了包含和促进“共有应答性”的人际过程，也讨论了减损“共有应答性”的人际过程以及是什么导致了那些人际过程。我们相信当一段关系以相互的一致“共有应答性”为特征时，关系中的双方都会有爱和被爱的感觉。我们还讨论了一个人的共有关系的整个定势结构可能影响爱的感觉。本文对“共有应答性”的讨论建立在两部分基础之上，一是对共有关系的长期研究方案 (比较 Clark & Mills, 1979, 1993; Mills & Clark, 1982)，二是里斯、克拉克和霍尔姆斯 (Reis, Clark, & Holmes, 2004) 关于关系中应答性的最新研究。

什么是“共有应答性”？

“共有应答性”的本性可能更容易通过提供具体的例子表达出来。考虑下面的每一种互动。

一个小男孩突然哭了，他向妈妈解释是因为同班同学嘲笑他的发型，妈妈抱着他，并且耐心地听他诉说。她让儿子确信她觉得他的发型看起来很好，但安慰不能消除他的忧虑。她询问他是怎样想的，他说不喜欢自己的发型，妈妈回答说：“如果你想要理个新发型，我们现在就去。”她取笑那个嘲弄孩子的同学，强调如果有人能关注一下他，他就不会如此刻薄。她真正关心的是孩子关于安全与接受关爱的需要。她立刻安慰孩子，使孩子高兴起来，她还竭力培养他的复原力和对他人的同情心。

想象一个不同的场景。一个女性靠在丈夫身旁，下意识地开始哼唱。丈夫露出笑容，也跟着哼唱了几句，还添加一些好玩的歌词，他们一块笑了，然后接着哼唱。每个人都感到很舒服，并意识到双方都很享受这种互动。

现在勾勒出一幅年轻女性与哥哥谈话的画面。女性抱怨她厌烦自己的工作，想要重返学校获得生物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可以在高中教生物。哥哥感到很吃惊，他觉得她现在这个高薪的销售工作很不错。但是，他更在意的是她，他询问了她现在不开心的理由以及她想要达到的目标。最后哥哥表示理解，说她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并帮助她探索完成必要课程的途径。

最后，想象一位女性，在开会中途她想起错过了与朋友的午餐约会。她感到糟糕，于是离开会场，打电话给朋友表达歉意、忧虑和内疚。她的朋友并没有生气，在朋友的语气中听不到一丝恼怒，朋友关心的是她这个忘记约定之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朋友安慰她说理解她的忙碌以及苦恼。朋友说：“不要担心，我们可以找时间再聚。”朋友还说自己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从而进行社会比较，让她感觉舒服。朋友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缓解了违约者的压力，并建议了应对方式。违约者表达了感激，得到了解脱。

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会把以上的每一种关系都看做是爱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包含着“共有应答性”。这些情境的共同之处在于一个人表露自己的需要或者渴望，也可以说自己的脆弱。另一方转而明确地关注前者的幸福，并且以促进其幸福的方式作出反应。“应答性”具有不同的形式，像试图抚平创伤（在被嘲笑的孩子个案中），和伴侣一起参与令人愉悦的活动（在“妇唱夫随”的个案中），对同伴的目标给予支持（在兄妹的个案中），或抑制自我关注（self-focused）和愤怒的反应而提供持续的关爱支持（在女性的朋友忘记约会的个案中）。此外，伙伴做这些事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更重要的是，伙伴没有以此种方式利用对方的脆弱而进一步伤害对方。母亲没有这样问孩子：“所以，你做了什么蠢事让他们嘲笑你？”丈夫没有笑话妻子的哼唱，哥哥没有嘲弄妹妹的目标，那位朋友也没有对忘记午餐约会的女性表示生气、拒绝和嘲笑。

伙伴的“应答性”似乎很少关注自己——即使在关系到自己的时候。妈妈不会担心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会反映出她的不体面，哥哥在帮助妹妹开拓受教育的机会时没有计算自己的成本。朋友既没有要求忘记午餐约会的女性道歉，也没有挂掉她的电话。

在相互的“共有应答性”关系中，伙伴关注对方的需要与幸福，满足其需要并促进其幸福。他们确信对方也同样会这样做。于是，他们在关系中感到安全、可靠和轻松。这样的“应答性”包括提供给对方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满足对方的需要（带孩子理一个满意的发型），增强伴侣生活中的享受感（与伴侣一起哼唱歌谣），而且支持同伴向着心中的目标发展（研究妹妹的职业选择）。尽管我们没有例子概括说明“共有应答性”，当一个人写给另一人鼓励的话语，送给对方一张贺卡或者花束，或只是简单地表达情感，共有应答性仍然具有其强大的象征意义。当一个人说自己爱上另一个人，我们认为这个人的意思是他/她打算向对方表现“共有应答性”，而且已经体验到这一点，同时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共有应答性”。

一段包括“共有应答性”的爱情关系把重点放在作出应答的那一方，或许还暗示着爱情关系的一个需要就是双方愿意，并且能够彼此作出应答。然而，

我们至少应该对“应答性”接受者的自我引发行为给予同等的关注。“应答性”的潜在接受者相信对方会在乎他，并且对其做出回应。在行为方面，“应答性”的潜在接受者必须公开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甚至公开他们的违背行为（以及他们对自己违背行为的感受），这样伙伴才能理解，证实并且作出共有应答——里斯和他的同事（Reis & Shaver, 1988; Reis & Patrick, 1996）认为这是建立亲密的三个关键性的过程。他们也必须愿意接受来自伙伴“应答性”的姿态：孩子表示他受到嘲笑很伤心；妹妹表明了她的目标；朋友承认了自己的违背行为，并表示她因此感到苦恼与内疚。所有这些行为促进了伙伴的“应答性”，转而，“应答性”被对方接受。

如何表达关系中以 “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爱？

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来界定爱情关系意味着，表明爱情关系质量的最好途径是两类人际过程，一类是导致“共有应答性”的人际过程，另一类是与实现“共有应答性”相对立的任何人际过程。也就是说，一段高质量的关系应该以这样的行为为特征，例如，帮助，与对方一起参与令人愉悦的活动，支持伙伴向着目标前进，自由表达其需要状态的情绪，自我表露喜悦与烦恼之事以及愿意寻求和接受帮助。良好关系的特征不是伤害性行为，也不是独立性和“保存记录”这一类的行为。

我们坚信，相互的“共有应答性”不只让人感到安全与慰藉，还促使个人的成长和保持最佳的身心状态（Clark & Finkel, 2005）。与评定关系质量的普通方法相比，例如让一个人评定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满意度，计算一段关系中冲突的次数，或者检验一段关系是否维持稳定，我们更加相信以“共有应答性”行为和支持“共有应答性”行为为特征来定义一段爱情关系，能更好地评定这段关系的质量。毕竟，人们对一段关系感到满意，可能只是因为它超出以前设置的期望，可能这段关系是低质量的，而且关于满意的等级评定显示不出一个

人满意或不满意的原因。关于冲突的评估至少抓住了关系中的人际互动过程，但是，冲突并不总是有害的。实际上，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当冲突包含的是对被忽视需要的建设性抗议（**constructive complaints**），而抗议能带来对那些需要的关注时，冲突就是“共有应答性”的一部分。最后，关系可能只是因为人们拥有较少的选择权而稳定（**Rusbult & Martz, 1995**）或者因为个人或社会的规定必须维持一段关系而稳定（**Cox, Wexler, Rusbult, & Gaines, 1997**），而不是因为这段关系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而稳定。

高质量爱情关系特有的 关系过程有哪些？

不管是在友情，一段浪漫关系，还是在家庭关系中，双方直接重复的非相倚的“共有应答性”行为有助于产生爱的感觉。这种行为出现的时间越长，期望其持续的时间越长，在此类行为中的差错则越少，爱的感觉应该越强烈。

一般来说，“应答性”是指一方采取行动来促进另一方的幸福（**Reis et al., 2004**）。然而，正如所表明的一样，“应答性”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是，当某人失去一些东西或者遭受一些伤害而迫切需要帮助时，正好一个人雪中送炭（“炭”即某人缺少的，而在他的情境中大多数人却拥有的东西）。这通常被称为帮助，并且引起了许多研究的重视。另一种类型涉及支持一个伙伴朝着他/她的目标前进，不管这个目标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共享的还是个人的。一个人的目标可能只是简单地放松一个下午，或在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做尝试，减肥10磅，或者继续一场梦幻之旅。这种类型的“应答性”没有获得心理学家足够的关注，尽管也有例外（**Feeney, 2004**）。它有很多表现形式，可以是倾听一个人的梦想，表示理解与接受，给予勇气，并克制自己认为其目标是疯狂的、不切实际的，或者提供具体的帮助。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形式，即为对方向目标成功迈进的每一步喝彩，为达成目标而庆祝（**Gable, Reis, Impett, & Asher, 2004**）。

“应答性”的第三种类型涉及与另一个人同心协力去创造一些让一方或双方都感到愉悦和有益的活动——一场愉快的谈话、一场网球比赛、一起哼唱一首歌、一个合作项目或跳一支舞。第四种积极的“应答性”类型包括以关爱行为回应伙伴的背叛行为。假设一个人在此情境中的自然反应是以牙还牙或表达怨气，那么仅仅克制自己不这样做就算是“应答性”。宽恕、持续关爱的保证和表示理解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应答性”。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应答性”类型对于另一个人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种应答性可能出现在没有明显支持或合作参与需要的活动中，它在于表达一个人真正关心着伙伴，并且如果对方需要，他将会一直陪伴。这可以通过言语（比如“我爱你”）、肢体行为（例如一个拥抱）、卡片甚至善意的玩笑来实现。“应答性”也可以通过出席伙伴的毕业典礼、参加其音乐演出或者观看其体育比赛、听伙伴的演讲练习等传达出来。

为什么“应答性”如此重要？

显然，“应答性”向伙伴提供他/她能用到的支持、物品、信息、评价和金钱。不太明显的是，它向伙伴提供一种持续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使他/她能够放松，享受生活，探索并且获得成就，让他/她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追寻幸福。得知另一个人也在关注自己的幸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使人较少关注自身，特别是不再过多保护自身，从而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包括关系中的伙伴身上（Mikulincer, Shaver, Gillath, & Nitzberg, 2005）。同时，它传达着伙伴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反过来，这又会使人产生舒服的自我开放，表露情绪，坦陈需要，寻求和接受帮助，分享目标，显示出创造性，并且参与合作性的活动——所有这些本身会引发进一步“应答性”。缺失应答性的证据显示，一个人关心的事情、情绪、目标和创造性常被牢牢地看护着，因为一个不关心自己的伙伴可能会用这些信息来利用或者伤害一个人。

非相倚“应答性”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对于促进安全感的“应答性”来说，非相倚性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个对象对非相倚的“共有应答性”作出反应。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性声明，只要妻子答应把一个月的家务活全包，妻子的亲戚来访他会很高兴，他不会对此有任何意见或者对此事表示反对。妻子会如何归因丈夫欢迎她亲戚来访的意愿呢？第一种情况是，她可能会归因于丈夫对自己的关心；第二种情况是，她感到丈夫真正只是想让她做家务，因此，丈夫关心自己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现在从丈夫的角度考虑一下。他如何归因自己在两种情况中的行为呢？自我知觉（self-perception）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会把自己看做是有爱心的，在第二种情况中他可能把自己看做是精明的、操控的、自私的。前一种情况（而非后一种情况）的结果会使妻子有被爱的感觉，而丈夫也意识到对妻子的爱。

关于关爱和关怀的积极性归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非相倚“应答性”是如此重要的，但同样还有另外的原因。非相倚“应答性”的初始动力是潜在接受者的需要及渴望。然而，相倚“应答性”最重要的动力常常是给予者渴望得到回报或者类似于“欠债还钱”。结果，伙伴的需要常被忽视，甚至可能得到不需要的或是伤害性的“利益”。

“应答性”的非相倚接受

对支持的非相倚接受也是“共有关系”的一个重要属性。简单地说，它是指一个人愿意接受伙伴的不必回报的“共有应答性”行为，也不感到必须有回报，必须得到他/她的回报。毫无疑问，愉快地接受应答，就等于发出信息：这个人对此姿态感到舒服，并且欢迎、渴望这样的关系。坚持回报或者表现出不舒适，表明这个人可能希望“共有关系”不存在（或者程度较轻）。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表达感恩或者感谢通常也是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的确，当

给予者不确定“应答性”是否适合“共有关系”的强度时，这样的表达对于确认此姿态受欢迎是很重要的。

硬币的另一面：诱发“应答性”

要在关系中建立一种爱的感觉，“应答性”是关键。但是，伙伴要作出应答，他或她必须知道怎样做才能提升对方的幸福感。有时，这是明显的，因为情境是一条有力的线索。一个人走在路上，散落了一捆纸，并慌忙想把它们收拾起来，那么他现在需要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通常伙伴的需要、渴望、目标和担忧都不明显。因此，在以高水平的“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关系中，成员必须愿意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需要、目标、渴望和担忧。这可以通过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来实现。

需要多少“应答性”？ 应该表露出多少需要？

有多少“应答性”才能使人们认为这是一段涉及爱的关系呢？我们假设对不同的伙伴的幸福有着不同层次的责任度。克拉克、米尔斯和他们的同事把责任度称为其共有关系的强度（Mills, Clark, & Johnson, 2004）。人们有共有关系的内隐层次，并且与陌生人的关系固定了此层次的基础。（大多数人甚至对陌生人都有一点“共有应答性”；例如，告知陌生人时间而不期望回报。）他们通常与熟人和邻居有较强的“共有关系”，与朋友有更强的“共有关系”（与最好的朋友还会更强一些），而与孩子和浪漫伴侣的“共有关系”最强。在共有关系中层次越高的人，人们对他们的幸福有更多的责任感，与共有关系中层次较低的人的需要相比，层次越高的人的需要拥有优先权。

人们从每一个“共有伙伴”那里期待的责任感也有内隐层次，他们更可能向处于最高层次的人们自我表露并寻求帮助。在这两个层次中的关系常常是对

称的，意味着人们感到的对伙伴的责任感和期望的伙伴对自己的责任感常处于同一层次。然而，共有关系的强度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通常父母对孩子幸福的共有责任感要远远大于孩子对父母的责任感。

回到“是什么促成了一段爱情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感到当关系超越了某些共有强度的内隐阈限时，“爱”与“亲爱的”这两个词用来指一段共有关系。然而，其他因素可能影响到一个人对以爱为特征的共有关系的感受，例如以高层次“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特殊关系的时间长度以及对高层次“共有应答性”持续时间的期待。

考虑什么促成了一种爱的感觉，再看我们的观点是有趣的，即“共有关系”不需要在强度上呈现对称。如上所述，相对于孩子对父母的感受，父母对孩子的幸福会感到有更多的责任感。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父母对孩子的爱比孩子对父母的爱更多呢？未必。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对一个人强烈的共有责任感还是感到一个人对自己的共有责任感，都能促成一种爱的感觉（不论关系对称与否）。因此，尽管一段关系以不对称的共有强度为特征，它并不以双方所感到的不对称的爱的多少为特征（虽然可能是这样）。

“共有强度”的那些阈限——过去的长度、期望的共有强度和在层次中的相对位置——肯定会影响到“爱”这个词的使用。毫无疑问，人与人在这方面是不同的。这可能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过去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他们对关系中预期的“应答性”设置的比较水平。

确定感的重要性

共有关系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强度和其他共有关系中个人层次的安排上，而且对关系共有本质的确定性感觉也是不同的（Mills & Clark, 1982）。我们对一段给定关系的共有强度的层次可能非常确定、比较不确定或者完全不确定。许多因素导致确定感，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共有关系存在的时间长度。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共有关系存在的时间越长，确定感就越强。一个人在其他共有关系中的经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她对现在这段关系强度的确定感。一段失败的共有期望的历史，可能会延续并影响一个人对现有关系的确定感。伙伴的“应答性”随时间的变异也是影响确定感的一个因素，越大的变异会导致越强的不确定感。最后，伙伴为“应答性”而牺牲他/她自我利益的程度能增强其确定感（Holmes & Rempel, 1989）。对共有关系强度的不确定感会削弱关系中爱的感觉。^①

自我在一个人共有层次中的位置

人们并不只对伙伴的需要表现出“应答性”，他们对自己的需要也有责任感。他们把自己放在其共有关系的层次中，大多时候都把自己放在顶点或接近顶点的位置上，因为大多数人都感到对自我有巨大的责任感。我们认为自我在层次中的摆放位置有关爱的感觉的潜在意义，它包括自我对伙伴爱的感觉；以及伙伴对自我的爱的感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将自我放在个人层次的最高点，尤其是自我摆放的位置远远高于伙伴，那么即使最强的共有伙伴的需要也永远不会优先于自我的需要。这时我们不会对伙伴做出牺牲，也不太可能宽恕伙伴对自己的背叛行为。虽然，自我在这样的关系中有一些爱和关怀感，伙伴有一些被爱的感觉，而事实上自我的幸福总是优先于伙伴的幸福，这给双方形成一个相当强的信号，即爱的感觉并不十分强烈。这种将自我高于所有其他人的摆放位置可能是极大削弱爱的感觉的一个因素。

如果把自己放在与伙伴同等的层次上（就像许多夫妻那样），或者把自己放在低于同伴的层次上（就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经常做的那样），情况则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况中，自我会做出牺牲，伙伴的需要有时或者经常（如果自我

^① 有趣的是，有些人把爱情定义为带标签的唤醒（如 Dutton & Aron, 1974; Berscheid & Walster, 1974）。不确定感与变异性可能与较强的焦虑和唤醒相关，因此，焦虑和唤醒与这类爱情有关，但不适用于本章讨论的爱的感觉。

的位置低于伙伴)优先于自我的需要,宽恕就会经常发生等等。少数符合这一类别的关系通常被看做是具有爱的感觉的关系。我们相信,相对于伙伴的自我位置是对此强有力的决定因素。^①我们也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牺牲自我利益而对伙伴作出应答能促进关系中共有本质的确定性(Holmes & Rempel, 1989)。

不同层次中“共有应答性”的数量

里斯等人(Reis et al., 2004)表明通常根据共有强度的层次来排列共有关系,当以这样的层次排列时,它们倾向于形成金字塔,众多低强度的共有关系为塔底,较少的关系居于中间,极少且高强度的关系则位于塔尖。

在人们(通常大体上)共有关系的三角形定势中,处于不同层次共有强度中人们的数量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关系的感受。作为共有关系众多人中的一员与作为同层次中的唯一一员或少数人中的一员,这两种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关系层次中处于绝对高的位置,他可能会有被宠爱的感觉。突然必须在一个人层次中与他人共享一个位置(例如,一个孩子有了弟弟或妹妹),会引起这个人质疑对方的爱。

什么是理想? 什么是现实?

一个人对另一人理想假定的“共有应答性”的数量和对另一人实际给予的数量是不同的。而且,一个人从另一人理想预期得到的“共有应答性”的数量和实际接受的数量也是不同的。在评估什么创造了爱的感觉时,我们认为实际的“共有应答性”是最重要的。然而,我们也相信一个人了解他/她理想假定

^① 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是一些人在“绝对融通”(unmitigated communion)特质上得分很高(Helgeson & Fritz, 1998)。他们把伙伴的需要置于自己之上,忽略自己的需要,也无法让伙伴注意到自己的需要。我们认为一个人有这样的特质是因为他的低自尊,感受不到关爱的价值,或者有强烈的渴望赢得别人,取悦别人。这一特质既不能促进最佳的“共有应答性”,也不能促进相互的关爱感。

的应答性水平会促进爱的感觉，了解从伙伴理想预期得到的“应答性”水平会促进被爱的感觉。

倾向于领悟其他人“共有应答性”的个体差异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讨论了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爱情关系。当然，在个体做出“共有应答性”（或者做出能引发“共有应答性”的行为）的一般的慢性趋势中存在差异，个体领悟他人对自己“共有应答性”的趋势中也存在差异（给定相同的客观条件）。事实上，这样的差异已成为心理学中的兴趣点。

我们不想详细地讨论这些差异。我们只想简单指出社会与发展心理学文献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些差异对于以下两方面很重要：（a）不管特殊关系是否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b）不管是否支持“共有应答性”。也就是说，关系中的成员是否将一段特殊的关系看做是有“共有应答性”的。

在这方面，许多（在概念上有重叠）特质是相关的（Reis et al., 2004）。这些特质包括：共有定向（communal orientation）（Clark et al., 1987）、自尊（Leary & Baumeister, 2000；Leary, Haupt, Strausser, & Chokel, 1998；Murray et al., 1998；Murray, Bellavia, Rose, & Griffin, 2003）、敏感性拒绝（Downey & Feldman, 1996）和依恋风格（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Bowlby, 1982；Hazan & Shaver, 1987；Shaver, Hazan, & Bradshaw, 1988）。毫无疑问，呈现出高共有定向、高自尊、低敏感性拒绝和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人，一般更有可能在一段给定关系中对伙伴表现出“共有应答性”（Simpson, Rholes, & Nelligan, 1992；Clark et al., 1987），更有可能表露出其脆弱之处，更有可能向伙伴寻求帮助（Simpson et al., 1992），更有可能领悟到伙伴的“共有应答性”，特别是在模糊情境（ambiguous situations）中（Collins & Feeney, 2004；Downey & Feldman, 1996）。他们也不太可能受到伙伴负面信息的威胁，即使面对任何拒

绝的信号，他们也不太可能停止对伙伴的依赖。的确，对伙伴的正面信息深信不疑的人甚至会从伙伴的缺点中发现优点（Murray & Holmes, 1993, 1999）。因此，我们认为这样说是保险的，即呈现高共有定向、高自尊、安全型依恋风格及低敏感性拒绝的人比其他人更可能感受到其亲密关系中的“共有应答性”以及“爱”。

什么促成了“共有应答性”？

是什么促使了“共有应答性”行为？有没有支持“共有应答性”，并且促进爱与被爱所有感觉的过程？我们相信人们在成功赢得“共有应答性”关系上的不同，不是因为其基本的共有规范的基础知识上的差异。实际上，文化已经教给我们如何在类似的关系中表现出“共有应答性”。如果详细询问，大多数人都会欣然赞同，提供帮助、为实现目标提供支持、与伙伴共享愉悦的活动、愿意宽恕伙伴和通过语言与象征性的行为表达关爱，这些行为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很有帮助。事实上，当人们渴望建立一段新友谊或浪漫关系时，大多数人都擅长于立即表现出“共有性”（Berg & Clark, 1986; Clark & Mills, 1979; Clark & Waddell, 1985; Clark, Ouellette, Powell, & Milberg, 1987; Clark et al., 1986; Clark et al., 1989; Williamson & Clark, 1989）。

信任是核心

在具有挑战性的情形下，建立、深入特别是维持共有关系的关键在于信任，（1）信任就是一个特殊的伙伴真正关心着自己的幸福，同时不会利用或伤害自己，（2）信任就是伙伴渴望得到关心并且会接受这种关心，以及一段共有关系。前一种类型的信任使一个人有勇气表达需要，寻求支持；后一种类型的信任使一个人有勇气提供支持。

在特定关系中，对特殊伙伴的信任对于一段爱情关系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这种信任的建立主要在于拥有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即使在面对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仍然会真正关心着一个人的幸福（Holmes & Rempel, 1989; Holmes, 2002）。当然，一个人的信任倾向是所谈到的与“共有应答性”相关的个体差异中的关键部分。然而，存在于特定关系中特定伙伴的信任对获得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不管一个人通常多么安全和值得信任，如果他不在特定关系中表现出来，那个人并不会体验到爱。

人们扩展“共有关系”的本性

在新关系或者共有强度有潜力增长的关系中，除了对特殊伙伴的信任，一个人扩展“共有关系”的本性可能会影响这个人表露自己脆弱之处的意愿（和引发关爱）。尽管这很少被谈及，如果一个人渴望另外的共有关系，对一个或更多的共有伙伴表现出信仰与信任，能给人以毅力去尝试发展其他的共有关系。毕竟，如果新关系没有成功，还有其他人可以依赖，自我仍被看做是良好且称职的共有关系伙伴。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感到共有关系是足够的，需要能得到满足，而且关心别人的资源有限，那么拥有强有力的共有伙伴可能会抑制伙伴关系的发展和现有伙伴关系的深化。

信任会产生什么样的增进关系 以及爱的进程？

我们觉得对伙伴真正关心一个人的信任会引发许多的人际过程，这些过程能促进共有关系的形成、维持与巩固。你可能很容易理解对伙伴关爱的信任如何促进产生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能引发支持的行为，例如表露一个人的脆弱，自我表露其需要、目标和渴望，表达情绪（Clark et al., 2004; Clark & Finkel, 2005）；以及包括直接寻求帮助的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中，信任是必要

的，因为他人能拒绝一个人（从而伤害一个人的感情或使其感到尴尬）或者甚至利用这个人表露出的脆弱之处。非相倚的接受来自伙伴的关爱，信任同样是很关键的，因为一个人这样做就等于发出信号说他愿意依赖他人。

对于非相倚地提供支持的过程来说，信任同样是必需的。当伙伴不是因为得到利益而回报以及不要求回报地给予利益时，人们更加喜欢他们（Clark & Mills, 1979）。在一项涉及已婚夫妇和每日给予利益的日记研究中，夫妇均反映出由于共有（非相倚）原因而给予他人利益，以及在共有的非相倚性的基础上获得利益，比在相倚性基础上给予或获得利益更能令人体验到积极的情绪（Clark, Graham, Lemay, Pataki, & Finkel, 2006）。但是，当一个人非相倚地给予别人关爱时，他这样做并不能同时保证别人会欢迎自己的支持，也不能保证（希望是在相互的关系中）别人会对自己表现出同样的“应答性”。我们相信，信任让人有勇气相信“应答性”会受到欢迎，信任也使人放心，相信当有同样的需要时，别人也会对自己表现出“应答性”。我们相信，缺乏信任会使人运用交换规则，包括强调保证和自我能得到支持补偿，可能不太明显，还为自己准备一个“借口”（cover），以防止别人“应答性”的努力水平会下降。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这样想，甚至这样对别人说，一个人其实是为自己寻求一些什么，而不是向别人显示自己对共有关系的渴望。来自婚姻纵向研究的初步证据显示，对别人缺乏信任确实会促使交换规则的使用。在婚姻过程中，回避型（而非安全型）个体会更多地使用交换规则，并面临配偶一方“共有应答性”的下降（Clark, 2005）。

信任也会引发许多其他的人际交往过程，它们并不直接涉及提供或接受支持，但是会支持更宏观的过程，即对伙伴的依赖性逐渐增长。默里、霍尔姆斯及其同事在探讨依赖性调节时已经阐明这一点（Murray, Holmes, & Goiffin, 2000）。他们表明，相信伙伴积极地关注自己（说得更具体一些，相信伙伴关心着自己的幸福）会使一个人“信念跳跃”（take a leap of faith），并对伙伴产生积极的错觉。他们研究这种错觉在很大程度上是认为伙伴拥有仁慈等特质，这使人们敢于表露自己的脆弱，并相信自己的共有行为会被接受。我们认

为，这增加了一个人的“共有应答性”，反过来也鼓励伙伴真正做到那些规范。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默里、霍尔姆斯和格里芬（Murray, Holmes, & Griffin, 1996）发现人们倾向于不辜负伙伴对他们的错觉。信任所引发的其他过程可能也有助于维持或增强其对伙伴的依赖，包括对伙伴的欠完美行为作出适当的归因（Fincham, 2001），表现出和解（Rusbult, Verette, Whitney, Slovik, & Lipkus, 1991；Wieselquist, Rusbult, Foster, & Agnew, 1999），而且认为自己的伙伴比其他可选择的伙伴更优秀（Rusbult, Van Lange, Wildschut, Yovetich, & Verette, 2000）。

信任的缺乏是如何减损 “共有应答性”的？

我们认为对别人关爱的低信任是干扰关系中“共有应答性”与“爱”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不信任增强了一个人的自我保护，这通常会导致（1）在一个人的共有关系层次中，将自我置于伙伴之上，有时甚至远远高于伙伴的位置；（2）使人非常不情愿表露脆弱；（3）使人不情愿对别人表现出非相倚性应答，以免别人拒绝自己主动表示的“共有应答性”（这会造成伤害）或者在自己有需要时别人不作出回应（在相互的共有关系中）。最后的附带结果往好一点想是独立于他人，往坏处想是冲突、怀疑，以消极防御的方式解释伙伴行为的倾向（Collins, 1996；Collins & Allard, 2001），还有完全消极的互动。

最近我们研究了另外两个过程，我们相信对他人关爱的不信任和由此而来的自我保护感，会导致相倚性的积极使用，即克拉克和米尔斯（Clark & Mills, 1979；Mills & Clark, 1982）所说的亲密关系中的交换规则，以及记忆中将伙伴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分离的倾向。这样，在给予和接受利益时，会首先考虑相倚性规则。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平”的，事实上，已经被作为维持关系质量的一项积极技术来提倡（Walster, Walster, & Berscheid, 1978）。但是，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伴随着的相倚性规则既损害了给予者的关爱感，也损害了接受者作为关爱对象的感觉。这还导致了“应答性”更多的是由给予者的

需要指定的，而并非由潜在接受者的需要、渴望或者目标来指定。

早期的研究证据显示，比起相倚性规则（contingent rules），人们在亲密关系中给予利益时确实更喜欢遵循非相倚性规则，这表现在当人们本来渴望拥有共有关系而伙伴却表现得遵循交换规则，当回报已得利益或者对付出的利益要求回报时，人们会不再那么喜欢伙伴（Clark & Mills, 1979; Clark & Waddell, 1985），而且，当渴望共有关系时，伙伴会避免关注利益（Clark, 1984; Clark, Mills, & Corcoran, 1989）。最新证据来自对持续婚姻的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夫妻开始都认为共有规则对于他们的关系来说是理想的（Grote & Clark, 1998; Clark, 2005），并努力做出“共有应答性”行为，但是应激性事件导致成员开始计算公平，这转而增加了冲突（Grote & Clark, 2001），并表现出与低信任和婚姻满意度的降低相关（Clark, 2005）。

对他人低信任度而引发的另一个过程是片面地将伙伴看成是“完全正面”或“完全负面”的（Graham & Clark, 2006）。格拉汉姆和克拉克（Graham & Clark, 2006）推测，尽管所有人都有归属的需要（Baumeister & Leary, 1995），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他人会关心自己的人（通过低自尊和焦虑型依恋表示）来说，接近一个看似不太完美的人是困难的。因此，在低威胁的情况下，他们趋向于将他人看做是完美的，这使他们既可以与这样的人接近和互动，又让他们感到伙伴会对他们做出积极的反应。然而，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人的缺点，就会像变魔术一样很快发现所有其他的缺点，这提供给他们一个回避依赖此人和尴尬的借口。格拉汉姆和克拉克声称，人们具有把伙伴看做是“完全正面”或“完全负面”的倾向，高自尊（和信任他人）的人并不具有这种特征，他们以更现实和稳定的方式看待伙伴。

然而，尚无证据表明，我们将伙伴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以分离（而非整合）的倾向用多种方式减损“共有应答性”。首先，伙伴强大和薄弱平衡的感觉应该既支持对那个人最佳的“共有应答性”，也支持那个人最佳的寻求帮助。例如，如果一个人知道伙伴的数学能力很好同时又很健忘，他就可以建议他/她申请一份能发挥自己能力的称心如意的工作，同时会提醒他/她申请的截

止日期；如果一个人在参加的课程上需要一些数学指导，这个人会请求帮助并且打电话提醒他/她什么时候需要帮助。除此之外，一个平衡的观点应该是稳定的，并且对伙伴跨时间和事件的“共有应答性”的平衡感（Clark & Graham, 2006; Wortman, 2005），应该会增加信任与爱的感受。相反，对伙伴“完全正面”和“完全负面”的观点，会导致对伙伴抱有过多的期望，相信他们需要很少的支持（观点是正面时）和回避支持或依赖伙伴（观点是负面时）。

总结与结论

我们相信重复一致地给予和接受“共有应答性”会让人产生爱的关系体验。在相互的共有关系中，这样的“应答性”依赖于每个成员认为他人会关心自己，并且自己也会接受他人的关心。除此之外，自己在伙伴共有关系的层次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一个人把伙伴放在自己层次的什么位置，能影响爱的感觉，相对于伙伴更高的位置，会增强爱的感觉。信任产生各种人际过程，包括“共有应答性”的实际行为（表示理解、批准和非相倚性的帮助；与他人一起参与合作性的活动；支持；发出关爱信号）和通常直接引发关爱感的行为（情绪表达、自我表露、寻求支持）。不太明显的是，信任促使一些过程的出现——例如一个人更正面和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伙伴，对伙伴的不端行为作雅量的归因，表现出和解与宽恕——这会使人舒适地维持关系，并继续以“共有应答性”方式来行动。

相反，低信任阻碍了“共有应答性”和可能引发他人“共有应答性”的自我信息的表露。取而代之，它引起一些表面上看似还不错（甚至出色）的行为，但同时损害了“共有应答性”。这样的行为包括当接受支持可能非常有效时仍然依靠自己，压抑情绪，只在相倚性的基础上给予与接受利益，以各种自卫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可能导致看待伙伴慢性有害的思维方式，例如分离关于伙伴的正面和负面想法。与高“共有应答性”相关的行为更能引发爱的感觉。

我们并不认为“共有应答性”及其相关的人际过程是对爱进行创造性定义的唯一方式。然而，我们确实认为“爱”常用来指一段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长期关系，以及关系中所伴随的舒适感、安全感和温暖感。我们深信“共有应答性”也是促进亲密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而一段亲密的爱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十分有益的（Clark & Finkel, 2004）。

致谢

此章的准备工作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批准资助的 BNS 9983417 研究计划的支持。本章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与主张，并不代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观点。

参考文献

-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C., Waters, E., and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Baumeister, R. F., and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 497-529.
- Berg, J., and Clark, M. S. (1986). Differences in social exchange between intimate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Gradually evolving or quickly apparent? In V. Derlega and B. Winstead (eds.), *Friendship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p. 101-128.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Berscheid, E., and Walster, E. (1974). A little bit of love. In T. L. Huston (ed.), *Foundations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pp. 36-37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Sadness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Clark, M. S. (1984). Record keeping in two types of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549-557.

- . (February, August 2005). Healthy and unhealthy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strong) communal relationships. Presidential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New Orleans (February) an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 Clark, M. S., and Finkel, E. J. (2004). Does expressing emotion promote well-being? It depends on relationship context. In L. Z. Tiedens & C. Leach (eds.) *The Social Life of Emotions*, pp. 105–12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Willingness to express emotion: The impact of relationship type, communal orient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Personality Relationships*, 12, 169–180.
- Clark, M. S., Fitness, J., and Brissette, I. (2004). Understanding people's perceptions of relationships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ir emotional lives. In M. B. Brewer and M. Hewstone (eds.),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p. 21–46. Malden, Mass.: Blackwell.
- Clark, M. S., and Graham, S. M. (2004). Expressing emotion facilitates partner responsiveness,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nd relationship form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lark, M. S., Graham, S. M., Lemay, E., Pataki, S., and Finkel, E. (2006). Giving and receiving benefits in marriage: The thought counts and it is good to give and receive benefi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lark, M. S., and Mills, J. (1979).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2–24.
- . (199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What it is and is no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6, 684–691.
- Clark, M. S., Mills, J., and Corcoran, D. M. (1989). Keeping track of needs and inputs of friends and strang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5, 533–542.
- Clark, M. S., Mills, J., and Powell, M. C. (1986). Keeping track of needs in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333–338.
- Clark, M. S., Ouellette, R., Powell, M., and Milberg, S. (1987). Recipient's mood, relationship type, and hel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94–103.
- Clark, M. S., and Taraban, C. (1991). Reactions to and willingness to express emotion in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7, 324–336.
- Clark, M. S., and Waddell, B. (1985). Perceptions of exploitation in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Person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2, 403–418.
- Collins, N. (1996).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Implications for explana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810–832.
- Collins, N. L., and Allard, L. M. (2001).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The content and function of working models. In G. J. O. Fletcher and M. S. Clark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pp. 60–85. Oxford: Blackwell.
- Collins, N. L., and Feeney, B. C. (2004).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shape perceptions of soci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3): 363–383.

- Cox, C. L., Wexler, M. O., Rusbult, C. E., and Gaines, S. O. (1997). Prescriptive support and commitment process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0, 79-90.
- Downey, G., and Feldman, S. 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327-1341.
- Dutton, D. G., and Aron, A. P. (1974). Some evidence for heightened sexual attrac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anx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 510-517.
- Feeney, B. (2004). A secure base: Responsive support of goal strivings and exploration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31-648.
- Fincham, F. D. (2001). Attribution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From Balkanization to integration. In G. J. O. Fletcher and M. S. Clark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pp. 3-31. Oxford: Blackwell.
- Gable, S. L., Reis, H. T., Impett, E. A., and Asher, E. R. (2004). What do you do when things go right? The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benefits of sharing positiv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228-245.
- Graham, S. M., and Clark, M. S. (2006). The Jekyll-and-Hyde of relationship partn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Grote, N. K., and Clark, M. S. (1998). Distributive justice norms and family work: What is perceived as ideal, what is applied and what predicts perceived fairnes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1, 243-269.
- . (2001). Perceiving unfairness in the family: Cause or consequence of marital distr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281-293.
- Grote, N. K., Naylor, K. E., and Clark, M. S. (2002). Perceiving the division of family work to be unfair: Do social comparisons, enjoyment, and competence matte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6, 510-522.
- Hazan, C., and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Helgeson, V. S., and Fritz, H. L. (1998). A theory of unmitigated commun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 173-183.
- Holmes, J. G. (2002). Interpersonal expectations as the building blocks of social cognition: An interdependence theory perspecti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9, 1-26.
- Holmes, J. G., and Rempel, J. K. (1989).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 C. Hendrick (ed.),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pp. 187-220.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Leary, M. R., and Baumeister, R. F. (2000).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elf-esteem: Sociometer theory.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2, pp. 1-62.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Leary, M. R., Haupt, A. L., Strausser, K., and Chokel, J. T. (1998). Calibrating the sociome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appraisals and the state of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290-1299.
- Mikulincer, M., Shaver, P. R., Gillath, O., and Nitzberg, R. A. (2005). Attachment, caregiving, and altruism: Boosting attachment security increases compassion and hel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 817-839.

- Mills, J., and Clark, M. S. (1982).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In L. Wheeler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 pp. 121-144.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Mills, J., Clark, M. S., Ford, T. E., and Johnson, M. (2004). Measurement of communal strengt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 213-230.
- Murray, S. L., Bellavia, G., Rose, P., and Griffin, D. (2003). Once hurt, twice hurtful: How perceived regard regulates daily marit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126-147.
- Murray, S. L., and Holmes, J. G. (1993). Seeing virtues in faults: Negativ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personal narrativ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707-722.
- . (1997). A leap of faith? Positive illusion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586-604.
- . (1999). The (mental) ties that bind: Cognitive structures that predict relationship resil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707-722.
- Murray, S. L., Holmes, J. G., and Griffin, D. W. (1996). The self-fulfilling nature of positive illusion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Love is not blind, but presci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1155-1180.
- . (2000). Self-esteem and the quest for felt-security: How perceived regard regulates attach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478-498.
- Murray, S. L., Holmes, J. G., MacDonald, G., and Ellsworth, P. (1998).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darkly? When self-doubts turn into relationship insecurit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1459-1480.
- Reis, H. T., Clark, M. S., and Holmes, J. G. (2004).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as an organizing construct in the study of intimacy and closeness. In D. J. Mashek and P. Aron (eds.), *Handbook of Closeness and Intimacy*, pp. 201-225. Mahwah, N.J.: Erlbaum.
- Reis, H. T., and Patrick, B. C. (1996). Attachment and intimacy: Component processes. In E. T. Higgins and A.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523-56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Reis, H. T., and Shaver, P. (1988). Intimacy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S. Duck (ed.),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ory, Relationships, and Interventions*, pp. 367-389. Chichester, U.K.: Wiley.
- Rempel, J. K., Holmes, J. G., and Zanna, M. P. (1985).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95-112.
- Rusbult, C. E., and Martz, J. M. (1995). Remaining in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An investment model analysis of nonvoluntary commit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 558-571.
- Rusbult, C. E., Van Lange, P. A. M., Wildschut, T., Yovetich, N. A., and Verette, J. (2000). Perceived superior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Why it exists and persis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521-545.
- Rusbult, C. E., Verette, J., Whitney, G. A., Slovik, L. R., and Lipkus, I. (1991). Accommodation process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Theory and preliminary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53-78.

- Shaver, P. R., and Hazan, C. (1993).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D. Perlman and W. Jones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4, pp. 29-70.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Shaver, P., Hazan, C., and Bradshaw, D. (1988). Love as attachment.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68-9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mpson, J. A., Rholes, W. S., and Nelligan, J. S. (1992). Support seeking and support giving within couples in an anxiety-provoking situation: The role of attachment sty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434-446.
- Sprecher, S. (2001). Equity and social exchange in dating couples: Associations with satisfaction, commitment, and stabi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 599-613.
- Walster, E., Walster, G. W., and Berscheid, E. (1978). *Equity: Theory and Resear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Wieselquist, J., Rusbult, C. E., Foster, C. A., and Agnew, C. R. (1999). Commitment, pro-relationship behavior, and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942-966.
- Williamson, G., and Clark, M. S. (1989). Providing help and desired relationship type as determinants of changes in moods and self-eval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722-734.
- Wortman, J. (2005). Mood and perceptions of siblings among those high and low in self-esteem. Senior honors thesi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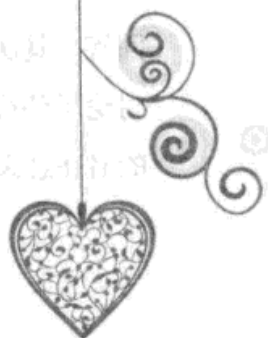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内隐理论

设计如
书

PDG



爱情研究的原型说

贝费利·费荷 (Beverley Fehr)

什么是爱情？这个由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已经使社会科学家们兴奋不已。然而，相较于莎士比亚及其之前的哲学家、诗人和作家，社会科学家对爱情的兴趣则是一种新近的现象。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鲁宾 (Rubin, 1970)、伯奇德和哈特菲尔德 (Berscheid & Hatfield, 1974) 这样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主题时，关于爱情的研究才开始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他们的概念化与实证调查研究，特别是伯奇德和哈特菲尔德 (1974) 以及伯奇德和沃尔斯特 (Berscheid & Walster, 1978) 对伴侣之爱与激情之爱的区分，激起了其他学者发展与检验爱情理论和模型 (如 Hazan & Shaver, 1987; C. Hendrick & Hendrick, 1986; Sternberg, 1986, 1988)。这一时期的概念演化形成了相当可观的专家型爱情理论文献 (这些综述可参见 Fehr, 2001; S. S. Hendrick & Hendrick, 2000)。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社会科学家眼中的爱情已经非常了解。相对而言，我们对普通人的爱情概念知之甚少。本章的目的是从原型分析的角度综述和整合有关爱情外行概念 (lay conceptions) 的研究。首先，我将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先呈现的是专家对此问题的回答，接着是普通人的

回答。其次，我考虑了爱情的外行概念是否存在文化与个体的差异。再次，我讨论了外行概念在开发测量工具中的作用。最后，我探讨了爱情概念对于关系的潜在意义。

什么是爱情？

专家的回答

爱情研究的主要发展，是鲁宾（1970, 1973）对爱情以及相关友谊构念进行的开创性分析。鲁宾将爱情定义为一种态度，它能促使一个人倾向于以特殊的方式理解爱人、感受爱人，并对其做出相应的行为。他还进一步地表述了爱情的三个成分：亲密、需要/依恋和关爱。后续的研究显示，人们认为关爱比需要/依恋更能刻画爱的含义（Steck, Levitan, McLane, & Kelley, 1982）。

第二个有影响的发展是伯奇德和哈特菲尔德（1974）的爱情模型。他们表明爱不是单一实体，而是最好概念化为两种基本类型：伴侣之爱和激情之爱。伴侣之爱被定义为“对某人的友情和深度依恋”（Hatfield & Walster, 1978, p.2）。这种爱以关爱、信任、诚实、尊重等为特征（Brehm, 1992）。它可以通过生命中的许多重要他人来体验（比如，亲密朋友、家庭成员、浪漫情侣）。相对而言，激情之爱被定义为“强烈渴望和对方在一起的状态”（Hatfield & Walster, 1978, p.9）。这种爱以极端情绪、生理唤起和性吸引为特征。激情之爱通常只有一个目标，而不是多个目标。

随后的理论发展包括亨德里克夫妇（C. Hendrick & Hendrick, 1986）以及李（Lee, 1973）对六种不同爱情风格的分类：利他型（agape，利他，无私的爱）、友谊型（storge，以友谊为基础的爱）、游戏型（ludus，玩游戏的爱）、占有型（mania，强迫、依赖的爱）、实用型（pragma，实用的爱）和激情型（eros，浪漫的激情之爱）。激情型、游戏型和友谊型被认为是爱情的三原色，占有型、利他型和实用型则是进一步的合成色。另一个卓越贡献是斯腾伯格（1986）的

爱情三角形理论。他把爱情概念化为一个以激情、亲密和决定/承诺为顶点的三角形。这三种成分的不同组合会产生八种爱的不同类型。例如，伴侣之爱由亲密和决定/承诺组成。最后，哈赞和薛佛（Hazan & Shaver, 1987）把爱概念化为依恋，并表明在婴儿期表现出的三种主要依恋风格（安全型、焦虑/矛盾型和回避型），在成人浪漫伴侣的关系模式中同样表现得很明显。严格来说，这种爱情说已经引起了上千种对依恋（现在一般概念化为焦虑型和回避型的两个主要维度）与包括爱情在内的广义关系现象之间的联系所展开的研究（参见 Mikulincer 和 Shaver[2003]的综述）。

为了整合爱情的各种专家模型，亨德里克夫妇（1989）对这些爱情模型中各成分的测度进行了因素分析。许多激情量表（例如哈特菲尔德和斯普瑞彻 [Hatfield & Sprecher, 1986]的激情之爱量表）在第一个因素上有负荷，意味着激情是爱情的主维度。尽管伴侣之爱不如前者那样被清晰界定，它还是作为次因素被抽取出来。斯腾伯格的亲密量表在这个因素上有正向负荷，游戏型（玩游戏）爱情风格在该因素上的负荷则为负值。基于这个研究以及其他类型的证据，爱情的主导理论可以概括为最初由伯奇德和哈特菲尔德所提出的“伴侣—激情”分类（参见 Fehr, 2001）。

普通人的回答

专家们对爱情做出了许多不同的界定，却没有达成共识。这一事实表明爱情可能不是一个能被经典定义的概念。按照罗希（Rosch, 1973 a, 1973 b）的说法，许多自然语言概念很难进行经典定义（即依据必要而充分的标准特征来定义）。相反，这类概念可以通过能代表它们的最清晰或最好的样例来定义，即罗希所称的原型。另外，罗希认为一类范畴内的成员可以根据他们与原型样例的相似度排序，由成员向非成员逐步过渡。因此，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不像经典观点那样精确与清晰。

罗希（见 Mervis & Rosch, 1981, 综述）用大量实验证明了她的观点，如将

水果、蔬菜和家具这样的自然语言概念构造为原型，这些概念中的某些样例比其他样例更具有原型特性。此外，她指出这种内在的构念影响了相关范畴信息的认知过程。例如，在一项反应时的研究中，对属于原型样例的范畴成员的反应比对非原型样例的反应肯定更快（如将知更鸟作为鸟类的反应比作为鸡的反应更快；Rosch, 1973 b）。

那么，像爱情这样更抽象的概念在认知表征中也可以被表征为原型吗？答案是肯定的，专家们无法在爱情定义上达成一致，恰恰为“将爱情表征视为原型”提供了可能性。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本人（Fehr, 1988）对一个假设进行了探索，即爱情更可能作为一种原型，而不是一个经典的概念。首先，我让外行（大学生）列出爱情概念的特征或属性。结果像诚实、信任和关爱这类特征被频繁地列出，而像依赖、性激情和身体吸引这类特征则相对不那么频繁。总共有 68 项特征被多个被试频繁列出，这表明外行对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复杂的认识。另外，正如这些例子表明的，爱情的外行概念看起来既包含伴侣之爱，又包含激情之爱。另一个被试组根据原型化（例子的代表性）对这些特征进行等级评定。研究表明，信任、关爱和亲密等特征被认为是爱情的典型特征，而性激情、凝视对方和心跳加速则被认为是爱情的边缘特征。换句话说，外行将描绘伴侣之爱的特征视为爱情的本质；而描绘激情之爱的特征是爱情的非原型概念。（有趣的是，这些结果与大学生根据激情和浪漫来定义爱情的刻板印象相矛盾。）

这个原型构念可通过多种方法来证实。一项研究发现，在记忆中爱情的原型特征比非原型特征更显著（Fehr, 1988, study 3）。例如，被试倾向于错误地报告他们看见了原型特征，而事实上原型特征并未呈现。但是，对于非原型特征来说，类似的错误判定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爱情的原型构念也反映在自然语言的使用中，就像在含有典型特征（而非边缘特征）的句子中插入障碍词语一样，听起来会有些别扭（例如，“帕特有点信任卡丽丝”听起来很奇怪，而“帕特有点爱慕爱丽丝”听起来更自然；Fehr, 1988, study 4）。各种研究结果都支持了这种结论，即“将爱情概念视为原型”比“对其下经典定义”更恰当。

在随后的研究（Fehr & Russell, 1991）中，重点转向爱情的风格或类型上，而不再是特征。基于原型理论，我们假设某些类型的爱情比其他类型更有可能被认为是原型，就像说某些种类的水果（例如苹果）比其他种类（例如鳄梨；Rosch, 1973 a, 1973 b）更具有原型性。一系列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假说（Fehr & Russell, 1991）。例如，我们发现家庭之爱和友谊之爱被看做是原型的，浪漫之爱、激情之爱和性爱则被看做是非原型的。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这一内在构念得到了证实。例如，在一项反应时研究中，作为一种爱的类型，被试对母爱比性爱更快地做出反应。事实上，被试也倾向于一致赞同原型的例证属于爱情的类型，对“非原型的例证是否属于爱情的类型”却意见不一。总之，研究结果与在爱情特征研究中的发现一致，即伴侣之爱是概念的核心，而激情之爱则是边缘的概念。

爱情概念的文化与个体差异

爱情外行概念的初始研究是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Fehr, 1988；Fehr & Russell, 1991）。该研究中所揭示的爱情原型可能只适用于这一特定群体，却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至少在北美内的群体所持有的爱情概念。也有可能，即使人们在原型的等级评定上意见一致，在对爱情的原型理解上仍存在个体的差异。如果爱情概念存在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那么这会对于亲密关系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当伴侣对爱情的理解一致时，他们的社会交互过程将进展得更顺利。或者像斯腾伯格（1988）所提出的，“如果每位伴侣都能理解对方关于爱情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是如何联系的，这样至少亲密关系中的一些苦恼可能会避免”（p. 120）。

爱情概念的文化差异与相似性

一些调查研究致力于检验加拿大西海岸的爱情原型（Fehr, 1988）和北美其

他地区的爱情原型是否相似。例如，巴顿和科利尔（*Button & Collier, 1991*）检验了从加拿大东海岸的大学生和社区被试那里能否获得相似的调查结果。后一群体由地方政府职员以及公众成员组成。卢比和阿伦（*Luby & Aron, 1990*）探索了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美国人是否也持有相似的爱情原型。他们的研究被试既有圣克鲁斯（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大学的学生，也有参加音乐鉴赏班的普通人。各个研究所获得的数据集之间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参见 *Fehr, 1993*），特别是在那些被费荷（*Fehr, 1988*）确认为爱情原型的特征。更具体地说，在每个数据集中，五个爱情特征出现的频率很高，并获得了最高原型化的等级评定，它们是信任、关爱、诚实、友好和尊重。亲密特征也在每一个数据集中得到了较高的等级评定。因此，至少在北美，大学生和非学生之间爱情的概念是相似的，都一致认为伴侣之爱的特征更能代表概念的真正意义。不过，在北美之外的样本中是否会出现和这些研究相似的结果，这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寻。一些证据显示，例如，处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人们（例如亚洲）比处于个人主义文化的人们（例如北美）（如 *K. L. Dion & Dion, 1993; K. K. Dion & Dion, 1996*）更赞同伴侣之爱的观点。因此，相对于北美研究中获得的结果，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爱情原型可能会更加集中在类似伴侣之爱的特征上。

目前，实质上对爱情跨文化的原型分析还很少。然而，关于情绪概念的原型分析在许多国家已经展开，包括帕劳群岛（即帛琉群岛）、密克罗尼西亚（*Smith & Tkel-Sbal, 1995*）、土耳其（*Türk Smith & Smith, 1995*）、印度尼西亚（*Shaver, Murdaya, & Fraley, 2001*）和中国（*Shaver, Wu, & Schwartz, 1992*）。薛佛和同事指出在对美国样本的情绪词的聚类分析中，爱情与其他积极的情绪词被归为一组（如喜欢、吸引、关爱；*Shaver, Schwartz, Kirson, & O'Connor, 1987*）。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爱情和被看做是相对消极的情绪项目（至少在北美人看来）进行聚类，例如向往或憧憬。（在美国，这些词是悲伤类的一部分。）在中国，爱情聚类分为两个子范畴：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Shaver et al., 1992*）。因此，有理由相信，人们的爱情概念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不同。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评估不同文化下的爱情原型（而不是简单

地让人们列出情绪词)以及确定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在爱情概念上的普遍性和文化上的特殊性。例如,可能在北美的研究中被看做是原型的爱情特征,在其他文化背景下也可能具有普遍性,也可能因文化差异而被看做是非原型的特征。

爱情原型的个体差异

女性和男性对爱情的观点是否不同?这个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提出来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是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兴趣。不同人格特质的人是否具有不同的爱情概念,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一问题同样是兴趣点。对于性别来说,学者曾经假设女性更关注爱情和浪漫。然而,当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事实上男性更浪漫(如K. L. Dion & Dion, 1993; Fehr & Broughton, 2001; Sprecher & Metts, 1989)。例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赞同浪漫信念(例如,“真爱到永远”;“当你遇到真正的意中人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发觉’这一点”),并且更多报告诸如一见钟情等方面的体验。从另一角度说,女性对爱情更具有实用取向(例如,在伴侣选择时考虑到社会经济资源;可能与许多潜在的伴侣都有一段令人满意的关系)。女性对爱情也呈现出更多的友谊取向,相信浪漫关系应该建立在坚固友谊的基础上(如Grote & Frieze, 1994; S. S. Hendrick & Hendrick, 1995)。简而言之,男性对爱情似乎持有激情的概念,而女性则持有伴侣的概念。

由于性别差异,我们往往难以摆脱这种结论(特别在大众媒体中),即当提到爱情时,男性和女性如同身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当研究者在同一项调查中通常只评估激情(浪漫)之爱或伴侣(友谊)之爱,而没有同时评估这两种爱,就很难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这排除了对于男性和女性身处于同种爱情类别的相关现象的检验。(少数研究者同时测量了两种爱情类型,主要是通过性别间分析,而不是性别内分析。)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费荷和布劳顿(Fehr & Broughton, 2001)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使用伴侣之爱和激情之爱量表(见基于原型的测量部分)对大量的女性和男性样本进行施测。与过去的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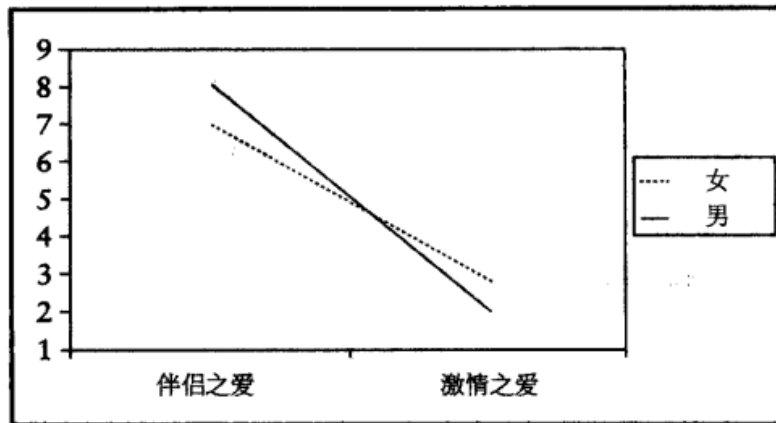


图 11-1 由费荷和布劳顿（2001）研究中得到的爱情概念的性别差异和相似性的总体模式

究相一致，男性比女性更赞同爱情的激情观。同样，也与过去的研究相符，女性比男性更赞同爱情的友谊概念。然而，性别内分析显示，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伴侣之爱都获得了最高的等级评定，而激情之爱则都获得了较低的等级评定。图 11-1 说明了这种模式。换句话说，通过对单个性别的伴侣之爱和激情之爱量表的双评估，以及对这些爱情类型等级评定的比较，浮现出一个颇为不同的画面——这个画面中更多表现出的是两性间的一致性，而非不一致性。

费荷和布劳顿（2001）也研究了爱情概念的人格差异。通过若干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示，在关怀特质上得分高的人（例如温暖宜人的）倾向于持有伴侣式的爱情观。相反，低关怀特质（例如冷酷无情的）通常与更激情的爱情观相关。总体上看，与支配相关的特质与爱情概念成低相关。

其他学者也对爱情原型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检验。例如，阿伦和韦斯特比（Aron & Westbay, 1996）假设，与那些未完成亲密阶段的人相比，那些成功完成发展中的亲密（与孤独相对）阶段的人（Erikson, 1950）对那些描述亲密的爱情特征（取自费荷在 1988 年的原型）给予更高的等级评定。这个假设得到了支持。然而，与预期相反，依恋风格的等级评定与原型化等级评定不存在相关。在另一项调查研究中，罗沙和阿伦（Rousar & Aron, 1990）检验了费荷

(Fehr, 1988) 爱情原型特征的等级评定中的性别取向、年龄和依恋风格的差异。总体而言, 这些个体差异变量与原型的等级评定之间的相关较低。

在这个话题结束之前,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只有当要求被试依据自己的爱情观评定爱情特征或类型的时候, 才会出现个体差异。当要求被试提供标准的原型化等级评定时 (即根据它们体现爱情概念的典型程度评定特征或类型), 通常不会出现个体差异。在后面一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报告更多的是各种文化共享的概念 (参见 Fehr, 1993; 对此观点的进一步探讨)。

总之, 关于爱情的意义存在普遍共识 (至少在北美), 但这并不能排除个体或文化层面上爱情概念的变异性。的确, 一些证据显示, 爱情概念因人的性别和个性而变化。然而, 在这篇文献中最显著的结果是爱情原型的一致性。

爱情外行概念的相关研究方法

其他研究者进行了以原型为基础的爱情分析。其中一个方法是获得外行对爱情特殊体验的描述, 而不像费荷的研究那样让他们描述概念的意义。例如, 薛佛等人 (Shaver et al., 1987) 要求被试描绘爱情的一个片段 (以及伴随的其他情绪), 然后从这些描绘之中提取爱情的一个原型。更具体地说, 爱情特征被抽取和归类为前情 (例如, 感到他人的需要, 发现他人的魅力)、反应 (例如, 想与对方身体亲近, 接吻, 做爱)、生理反应 (例如, 精力充沛, 心跳加速)、行为 (例如, 凝视, 微笑) 等等。菲特尼斯和弗莱彻 (Fitness & Fletcher, 1993) 将此种方法的变式应用于他们对婚姻关系背景下的爱情体验的分析中。在这项研究, 要求已婚夫妇描绘出能引发他们对配偶爱情感觉的最典型事件。结果表明, 爱情体验是由时时想着对方、接受他或她的支持、共享欢乐时光等事件所引发的。被试也提到低唤起的生理反应, 例如温暖和肌肉放松的感觉。行为包括渴望与伴侣身体亲近、赠送礼物、拥抱和亲吻, 或者什么都不做。

尽管他们不是明显地进行原型研究, 但是, 拉姆和威兹曼 (Lamm &

Wiesmann, 1997) 还要求德国的大学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向所爱之人表达感情?”(问一些被试关于喜欢的问题,还问一些被试关于相爱的问题。)将这些反应编码,得到一个特征列表。例如积极心境、信任和想与他人在一起的渴望这样的反应更频繁地被提及。研究者总结说,他们的结果与费荷(Fehr, 1988)对爱情原型分析中提及频率最高的特征存在相当大的重叠性。

为了给出一个最终的样例,巴斯(Buss, 1988)把研究重点放在爱情的行为指标上。在这项研究中,要求被试列出能代表爱情的行为。然后,这些行为通过一个新例子得到原型化的评估。事实上,爱情的一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容易被看做是原型的。例如,表示承诺的行为(如“她同意嫁给他”)获得了较高的原型代表性等级评定。其他行为(如“他与她做爱”)获得了较低的等级评定。

因此,关于爱情的原型分析采取的是不同的形式。似乎每一种方法所用的是不同类型的相关知识。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如Fehr, 2005; Fitness, Fletcher, & Overall, 1993; Surra & Bohman, 1991),爱情知识可能有不同的层面,或至少有不同的储藏库。在普遍的层面上是社会共享的爱情概念。可能当研究者要求被试描述爱情的概念(像费荷和其同事的研究那样)或列出爱情原型的典型行为时,被提取的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如Buss, 1988)。基于人们的关系体验,他们可能拥有关于爱情特定关系的表征。当要求被试描述爱情的特殊经历或片段时,这类知识能更好地提取(如Fitness & Fletcher, 1991; Shaver et al., 1987)。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人们把他们的爱情知识组成不同层面的抽象观点,以及揭示在做相关关系的决策时哪一类知识最有可能被提取,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原型的爱情测量

原型分析也被用来开发测量工具。一种方法是给被试呈现描绘爱情的特征

或爱情的不同类型（从原型研究获得）。被试的任务是评估在特征列表中所描绘出的爱情概念能代表其自身爱情观点的程度。例如，本人（Fehr, 1994）通过给被试呈现 15 种不同类型的爱情特征列表（取自 Fehr & Russell, 1991），构想了一个评估外行爱情概念的量表。在此量表中，要求被试评估每一个特征列表所描绘的爱情观与自己的爱情概念相似的程度。然后，研究者可以分析个体爱情类型的等级评定（例如，与浪漫之爱原型的一致程度）或者可以将评定分数合计，以评估更综合的伴侣之爱和激情之爱的概念。伴侣之爱的分数是由友谊之爱、家庭之爱、母性之爱等项目的等级评定之和得到的（基于聚类分析的结果请参见 Fehr, 1994）。激情之爱的分数是由特征列表中描绘激情之爱、浪漫之爱、迷恋、性爱和喜欢等的等级评定总和得到的。先前讨论的费荷和布劳顿（2001）关于爱情概念中的性别和个性差异分析也使用了这种测量。最近，这个量表也被用来评估正处于约会时期的恋人的爱情概念的含义（以及那些概念的相似性），后面会提及（Fehr & Broughton, 2004）。

另一项测量方法是由阿伦和威斯特比（Aron & Westbay, 1996）提出的，他们对费荷（1988）确定的爱情概念的 68 个特征进行因素分析。从中提取出三个因素，因为与斯腾伯格（1986, 1988）爱情三角形理论的成分相似，所以将三个因素称为亲密、激情和承诺。通过被试提供在每一个因素上有负荷的爱情特征的原型等级评定，威斯特比（Westbay, 1996）开发了量表来测量这些维度。这些等级评定分数平均为亲密、激情以及承诺的分数。因此，这种方法使研究者基于爱情原型来评估各维度。

最新的发展是“原型距离测度”（distance-from-the-prototype）的构念。在这一构念中，人们评估他们（或他们的关系）的原型描述与研究呈现的原型描绘的“匹配”程度。此方法最初是在人格心理学中发展起来的（如 Broughton, 1984）。在研究中，研究者向被试提供描绘“无意识行为”的人格特质的原型假设，并要求被试评估他们与这些原型的相似度。人格分类以这些“原型距离”的等级评定为基础。在社会心理学中，哈塞布莱克和阿伦（Hassebrauck & Aron, 2001）开发了测量关系质量概念的“原型距离测度”。要

求被试更具体地评估呈现的浪漫关系中的关系质量的原型特征与他们关系相符的程度（例如，信任、宽容；Hassebrauck, 1997），并将被试对他们关系的等级评定与关系质量的原型之间的距离计算出来。（从总数中减去被试对每个关系原型特征的等级评定，将差额平方，再把差额的平方分数相加。）最近，鲍里斯（Boris, 2002）使用这个方法获得对爱情概念的“原型距离”等级评定。在这项研究中，被试根据爱情原型特征来评定他们的恋爱关系（Fehr, 1988）。“原型距离”分数的计算如同哈塞布莱克和阿伦（Hassebrauck & Aron, 2001）的研究中那样（此研究的结果呈现在下一部分）。

总之，许多基于原型的爱情测量得到了开发。这些方法的使用主要取决于个体研究者的需要。如果目标是评估爱情的外行概念（或是爱情的不同类型），可以给被试呈现原型（即特征列表），并要求他们评估特征列表与自己爱情概念的相似程度。如果目标是评估爱情的因素（例如，亲密、激情），会要求被试提供描绘这些维度特征的特定子集的原型化等级评定（Aron & Westbat, 1996）。最后，如果目标是测量人们对自己的关系与给定原型的“匹配”程度的认知，“原型距离测度”看似值得考虑。基于原型的工具有一个优点，即依赖外行对目标概念的理解。这提高了研究者与被试在评估概念时头脑中有同等意义的可能性。这在诸如爱情概念的研究中尤其重要，但是，在这一领域中可能出现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概念与其研究被试所持有的概念存在不一致的风险。

爱情原型对于关系的潜在意义

在一项关于爱情和承诺的重要论述中，凯利（Kelley, 1983）列举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个案来说明研究对这些概念的外行理解的重要性。他认为，当人们寻求生命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回答时，依赖的是他们的爱情知识。例如，我真的爱我的伴侣吗？这是一种我应该给予长期承诺的爱情吗？当人们考虑是否维持一段关系时，同样也可能用到爱情概念。例如，不再爱伴侣是结束爱情关系时的常见理由（如 Sprecher & Fehr, 1998）。总而言之，大家几乎都赞同，人们的爱

情概念很可能对“真实世界”的动态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虽然我们在对外行爱情意义的测定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在实际的关系中这些概念如何转换成认知、情绪和行为，却知之甚少。

然而，也有一些例外。费荷（1988）进行了两个“剧本”（scenario）研究来探索爱情的原型构念对关系判断的潜在意义。在第一项研究中，呈现给被试与他们的爱情存在不同差异的各种关系类型的描绘；正如所料，原型化特征（例如，信任、关爱）被评定为适用于大部分的爱情关系。相反，非原型化特征的适用性（例如，身体吸引、对某人日思夜想）则不像爱情关系的层次那样系统地变化。随后的研究显示，违背原型特征（例如，不再信任或尊重）比违背非原型特征（例如，不再体验到性吸引力）对关系中的爱情层次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虽然这些研究表明，人们头脑中的爱情知识与他们的关系类型相关，但因为并没有研究实际情况的关系，这个调查结果仍有其局限性。

阿伦和威斯特比（1996）首先探索了爱情概念与关系体验的联系。他们让被试提供描绘亲密、激情和承诺爱情特征的原型化等级评定，也让他们评定在爱情关系中所体验到的亲密、激情和承诺水平。除了亲密特征的原型评定与体验到的亲密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之外，爱情概念（通过对原型化等级评定）与对关系的等级评定相关并不显著。

最近，一些研究检验了爱情概念与满意度（亲密关系研究中最常检验的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例如，莫斯艾威克兹（Moszkiewicz, 2002）要求恋爱关系中的个体评估费荷（1988）的每一个特征能刻画其恋爱关系的程度，结果显示爱情的原型特征（例如，信任、亲密）的评定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为0.64；非原型特征（例如，性激情，对某人日思夜想）的等级评定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为0.56。因此，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关系体现了爱情原型时，他们倾向于对关系更满意。鲍里斯（Boris, 2002）发现了相同的模式，他让情侣根据费荷的爱情特征来评估他们的关系。同样，爱情的原型特征与非原型特征与关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并且，原型特征的相关（ $r=0.73$ ）比非原型特征的相关（ $r=0.47$ ）更为显著。有趣的是，这些结果与评估关系中爱情体验

量（而不是关系概念）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结果类似。基于颇广泛的研究主体，伴侣之爱（类似于爱情的原型概念）与激情之爱（类似于爱情的非原型概念）与关系满意度都呈现相关，但是与伴侣之爱的相关更显著（如，Hendrick & Hendrick, 1986; Sprecher & Regan, 1998; Sternberg, 1997; 见 Fehr, 2001, 综述）。

最后，使用费荷（1994）的测量，费荷和布劳顿检验了爱情概念和各种关系结果之间的相关。与预测一致，那些根据原型理解爱情的情侣比那些根据非原型来理解爱情的情侣，倾向于报告对伴侣更多的爱和喜欢。还存在一种倾向，爱情的原型概念与更高关系质量和更好的关系稳定性存在相关。另外，证据显示伴侣之间爱情概念的相似性——特别是在爱情原型概念方面的相似性——与积极的关系结果成正相关。虽然这些影响相对较小，但结果至少提供了初步证据，人们考虑爱情的方式对他们的关系有广泛的潜在意义。

这些研究的潜在假设是根据原型的例子来理解爱情概念使人能体验到积极的关系结果。然而，这项研究的相关性质并不能得出其因果关系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些发现增加了有趣的可能性，即如果说服人们根据原型化特征来理解爱情，可能会提高关系满意度。或者可以通过诱导人们体验爱情的原型特征来提升关系满意度。但是研究者们可能做到这项令人相当没有信心的任务吗？在一项创新研究中，鲍里斯（Boris, 2002）试图提高情侣对爱情原型特征的体验（即亲密）通过让他们参加阿伦和其同事的亲密诱导程序（Aron, Melinat, Vallone, & Bator, 1997）。其中一项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的练习要求被试对伴侣表露亲密程度不断增加的信息。练习始于中性问题（例如，“上次去动物园是什么时候？”）。经过45分钟的讨论，他们的亲密关系层次得到了提升。在练习的最后一个阶段，伴侣们需要回答要求高度表露的个人问题。（例如，“如果今晚你将会死，而且没有机会与任何人交流，你最后悔没有把什么告诉别人？”）控制条件下的被试要求在谈话自始至终都回答中性问题。这项操作是成功的——亲密条件下的被试比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将他们的关系评估为更加亲密的关系。重要的是，那些亲密条件下的人还报告其在关系中更高的满意度与幸福感。虽然在这项研究只选定一个爱情特征，但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如先前提到的，赞成爱情的非原型特征也与关系满意度存在相关，虽然不如原型特征与关系满意度的相关那样显著。相关表明，如果提升爱情的非原型特征，也可能对关系有好处。阿伦夫妇、诺曼、麦肯纳和海曼（Aron, Norman, McKenna, & Heyman, 2000）的一项研究计划支持了这一观点。阿伦和同事设计了一个方法来增加关系中的兴奋（兴奋是爱情的一个非原型化特征；Fehr, 1988）。在此研究中，伴侣们被带到实验室并用维可牢带（一种尼龙搭扣，相合即可粘住，一拉即开）一对对地缚起来。他们的任务是爬过一条设满障碍的路，以最快速度拿到一碗糖果。很明显，经过仅七分钟的这种令人兴奋的活动后，伴侣都报告关系满意度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对于对照组，相对于伴侣先前体验满意度的等级评定）。此外，当秘密地记录下恋人的互动时，观察者发现在兴奋诱导之后比在这之前能察觉到更多的温暖与积极性。因此，证据显示体验爱情的一个非原型特征（即兴奋）对于伴侣间的幸福感是有益的。

显然，目前的研究只指向于单一的特征，未来研究需要更广泛地检验原型与非原型特征。此外，假定爱情的原型概念（和体验）比非原型概念（和体验）与满意度的相关更高，那么确定是否提高爱情的原型特征比非原型特征更有益，这将是至关重要的。在目前进行的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启动的方法，即通过被试对爱情体验的原型化或非原型化描述使其想起原型化（例如，信任）或非原型化（例如，激情）的特征。关键问题是，启动原型化的爱情体验是否比启动非原型化的爱情体验会带来更高的关系满意度。

原型说的优点与不足

在最后一部分，我讨论了爱情研究原型说的优点与不足。一些内容仍需进一步研究。

原型分析带给我们什么？

关于爱情的原型分析得出了对爱情的内容和构念进行认知表征的重要的描述性信息。仅追溯到海德（Heider, 1958）的时代，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研究“常识”心理学的重要性——外行对心理学概念和现象的理解。但是，因为没有标准的研究方法，对外行概念的实证调查研究停滞不前。罗希（Rosch, 1973 a, 1973 b; Mervis & Rosch, 1981）描述了一个概念模型，并且基于此模型得到了一套研究方法，为社会心理学对外行爱情概念的调查研究铺好道路。因此，当被问到“普通人如何定义爱情”时，社会科学家现在就可以给出很长的回答。此外，正如本章中提到的，研究者开始研究爱情概念和关系结果之间的联系。因此，通过研究普通人如何理解爱情，社会科学家至少在理解人们在亲密关系中思索、感觉和行为的方式上更近一步。

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此文的一个不足就是不同类型的爱情的外行概念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关于爱情的每一篇文章和章节都提到了爱情的多维特质，或对爱情进行方方面面的评论，有时可以用彩虹的颜色来形容它。然而，当涉及原型分析时，对爱情的不同色彩（或条纹）却知之甚少。费荷和罗塞尔（Fehr & Russell, 1991）收集了20种不同类型的爱情特征列表，但还没有把这些特征评定为原型。因此，他们的调查研究揭示的是不同类型爱情的内容，而不是此类知识的构念。一些研究者对浪漫之爱的特征原型分析，并对其进行原型化的等级评定（Button & Collier, 1991; Regan, Kocan, & Whitlock, 1998）。最近，另一种爱情类型（即伴侣之爱）成为原型分析的目标（Fehr & Sprecher, 2005; Sprecher & Fehr, 2005）。对其他各种爱情类型的原型分析不仅提供外行关于爱情更全面的理解，也使研究者能处理许多涉及概念认知表征的概念性问题。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定义特殊类型的爱情时非原型化特征所起的作用。例如，在他们对伴侣之爱的原型分析中，费荷和斯普瑞彻（Fehr & Sprecher, 2005）预测“牺牲”与“把对方放在第一位”可能被看做是这类爱情的典型特征。然而，这些特征却获得了最低的原型等级评定。爱情自身概念的原型化特征（例如，信任、关爱）获得了

最高的等级评定。

同样，在里根等人（Regan et al., 1998）对浪漫之爱的原型分析中，那些被认为是浪漫之爱的定义特征（例如，浪漫，在微风中散步，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谁）比诸如信任、诚实、尊重和关爱特征（即爱情较普遍概念的原型特征）所获得的等级评定更低。因此，可能许多类型的爱情（即使不是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被评定为非原型的特征有助于区分不同类型的爱情。

如上所述，原型分析可能解决爱情概念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问题。通过原型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人们的关系体验如何影响他们对爱情的概念。在“疯狂恋人”（那些拼命追求不适宜爱情关系的人们）的例子中，是否他们所持有的爱情原型是他人视为非原型的特征（例如，激情，对某人日思夜想）？单恋（unrequited love）的体验或者爱情关系的几次失败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爱情概念吗？这些都是原型分析所要回答的问题。

最后，原型分析为用文献证明爱情概念的历史性变化提供了希望。例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爱情被视为在婚姻之外体验到的一种极端痛苦的状态。12世纪在法国见证了高贵爱情的诞生，那时爱情被看做是一种理想、浪漫和美好的体验，而这种体验通常是一个已婚男性向妻子之外的女性求爱中获得的（Brehm, 1992）。通过对档案源（例如，信件、日记）进行原型分析来探索爱情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具有吸引力。因此，原型说有可能解决有关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关系体验中许多爱情概念的问题。

原型说的局限性

原型分析无法回答许多关于爱情的重要问题。首先，从定义来看，原型分析是一种描述性的分析。当形成爱情理论时，专家可以选择依靠这些概念，但在这些分析并不提供如何定义或解释爱情的秘方。换句话说，对于人的行为，原型分析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例如“爱情是什么”），而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重要问题（例如“人们为什么坠入爱河”）。

其次, 原型分析受到人们能否清晰表达和描述诸如爱情之类复杂概念的制约。一些社会科学家怀疑外行能否胜任此任务。伯奇德和迈耶斯 (Berscheid & Meyers, 1996) 评论说: “在一个特定领域中, 直接要求人们描述他们在理解事件时所用的文化模式, 不可能完全取得成功, 就像关于鱼类的采访很少提及水一样。” (p. 22) 作为原型研究者, 我只能说, 当被直接要求描述其生活的水域质量时, 即使是不幸的鱼似乎也能做得很好。然而, 我认为重要的是撒开一张巨大的网来确保获得有关水域质量的所有信息。因此, 在原型分析最初罗列特征的阶段, 使用较大的样本量是关键, 接下来, 对这些特征进行初始的等级评定 (以及原型结构的其他指标) 也很关键。列表特征的出现频率和原型的等级评定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如 Fehr, 2004), 这表明当被问到重要特征时 (一项检索任务), 人们可能无法说出所有重要的特征, 但是, “一看见它们, 你就知道它们” (假设提供原型的等级评定可构想为一项再认任务)。

总之, 原型分析在“外行如何理解爱情”上给出了重要的信息。毫无疑问, 这些概念在生活中人们做出潜在改变生活的重大决策时发挥着作用。这些决定包括与谁建立亲密关系, 维持还是结束关系。

致谢

这一章的准备工作承蒙“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立项资助, 我很感激苏珊·斯普瑞彻 (Susan Sprecher) 就此章给出的有用意见。

参考文献

- Aron, A., and Westbay, L. (1996). Dimensions of the prototyp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535-551.
- Aron, A., Melinat, E., Aron, E. N., Vallone, R. D., and Bator, R. J. (1997). The experimental generation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A procedure and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363-377.
- Aron, A., Norman, C. C., Aron, E. N., McKenna, C., and Heyman, R. (2000). Couples'

- shared participation in novel and arousing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d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273-283.
- Berscheid, E., and Hatfield [Walster], E. (1974). A little bit about love. In T. L. Huston (ed.), *Foundations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pp. 355-38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erscheid, E., and Meyers, S. A. (1996). A social categorical approach to a question about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19-43.
- Boris, T. S. (2002). Prototype matching on the features of love in dating relationships. Unpublished honors thesis, University of Winnipeg.
- Brehm, S.S. (1992). *Intimate relationships*, 2nd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 Broughton, R. (1984). A prototype strategy for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1334-1346.
- Buss, D. M. (1988). Love acts: The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00-118.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utton, C. M., and Collier, D. R. (June 1991). A comparison of people's concepts of love and romantic lo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nadian Psychological Conference, Calgary, Alberta.
- Dion, K. K., and Dion, K. L. (1996).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romantic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5-17.
- Dion, K. L., and Dion, K. K. (1988). Romantic love: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264-28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Gender and ethnocultural comparisons in styles of lov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7, 463-473.
- Erikson, E.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 Fehr, B. (1988).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love and commi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557-579.
- . (1993). How do I love thee . . . ? Let me consult my prototype. In S. Duck (ed.), *Understand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Individuals in Relationships*, pp. 87-120.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 (1994). Prototype-based assessment of laypeople's views of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09-331.
- . (2001). The statu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love and commitment. In G. J. O. Fletcher and M. S. Clark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pp. 331-356. Oxford: Blackwell.
- . (2004). Intimacy expectations in same-sex friendships: A prototype interaction-pattern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265-284.
- . (2005). The role of prototypes in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In M. Baldwin (ed.),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pp. 180-20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Fehr, B., and Broughton, R. (2001). Gender and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conceptions of love: 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alysi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 115-136.
- . (2004). Individual and dyadic conceptions of love: Implications for thoughts, feelings, and behavior in close relationship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Fehr, B., and Russell, J. A. (1991). The concept of love viewed from a prototyp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25-438.
- Fehr, B., and Sprecher, S. (2005). Prototype analysis of compassionate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Under revision.)
- Fitness, J., and Fletcher, G. J. O. (1993). Love, hate, anger, and jealous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 prototype and cognitive apprais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942-958.
- Fitness, J., Fletcher, G., and Overall, N. (2003).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M. Hogg and J. Cooper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258-278.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Grote, N. K., and Frieze, I. H. (1994). The measurement of friendship-based lov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275-300.
- Hassebrauck, M. (1997). Cognition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ir structure and consequenc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 163-185.
- Hassebrauck, M., and Aron, A. (2001). Prototype match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1111-1122.
- Hatfield, E., and Sprecher, S. (1986). Measuring passionate lov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 383-410.
- Hatfield, E., and Walster, G. W. (1978). *A New Look at Lov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Hazan, C., and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S. (1986). A theory and method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92-402.
- . (1989). Research on love: Does it measure u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92-402.
-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sex and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 55-65.
- . (2000). Romantic love. In S. Hendrick and C. Hendrick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pp. 203-215.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Kelley, H. H. (1983). Love and commitment. In H. H. Kelley, E. Berscheid, A. Christensen, J. H. Harvey, T. L. Huston, G. Levinger, E. McClintock, L. A. Peplau, and D. R. Peterson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65-314. New York: Freeman.
- Lamm, H., and Wiesmann, U. (1997). Subjective attributes of attraction: How people characterize their liking, their love, and their being in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 271-284.
- Lee, J. A. (1973). *The Colours of Love*. Don Mills, Ont.: New Press.
- Luby, V., and Aron, A. (July 1990). A prototype structuring of love, like, and being-in-lo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xford.
- Mervis, C. B., and Rosch, E. (1981). Categorization of natural object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2, 89-115.
- Mikulincer, M., and Shaver, P. R. (2003). The attachment behavioral system in adulthood: Activation, psychodynamic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M. P. Zanna

-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pp. 53-152.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Moszkiewicz, A. (2002). Prototypes of love in relation to satisfaction, closeness, intimacy, and communication in dating individuals. Unpublished honors thesis, University of Winnipeg.
- Regan, P. C., Kocan, E. R., and Whitlock, T. (1998). Ain't love grand! A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411-420.
- Rosch, E. H. (1973a).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4, 328-350.
- . (1973b).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In T. E. Moore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pp. 111-14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ousar, E. E., III, and Aron, A. (July 1990). Valuing, altruism, and the concept of lo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xford.
- Rubin, Z. (1970). Measurement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65-273.
- . (1973). *Liking and Lov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 (1988). Prefac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vii-xii.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aver, P. R., Murdaya, U., and Fraley, R. C. (2001). Structure of the Indonesian emotion lexicon. *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 201-224.
- Shaver, P. R., Schwartz, J., Kirson, D., and O'Connor, C. (1987). Emotion knowledge: Further explorations of a prototype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061-1086.
- Shaver, P. R., Wu, S., and Schwartz, J. (1992).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emotion and its representation: A prototype approach. In M. S. Clark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pp. 175-212.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Smith, K. D., and Tkel-Sbal, D. (1995). Prototype analyses of emotion terms in Palau, Micronesia. In J. A. Russell, J. Fernández-Dols, A. S. R. Manstead, and J. C. Wellenkamp (eds.), *Everyday Conceptions of Emotion*, pp. 85-102.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 Sprecher, S., and Fehr, B. (1998). The dissolution of close relationships. In J. H. Harvey (ed.), *Perspectives on Loss: A Sourcebook*, pp. 99-112. Philadelphia: Taylor and Francis.
- . (2005). Compassionate love for close others and human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2, 629-652.
- Sprecher, S., and Metts, S. (1989).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tic beliefs scale" and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gender-rol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6, 387-411.
- Sprecher, S., and Regan, P. C. (1998). Passionate and companionate love in courting and young married couples. *Sociological Inquiry*, 68, 163-185.
- Steck, L., Levitan, D., McLane, D., and Kelley, H. H. (1982). Care, need, and conceptions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 481-491.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135.
- . (1988). Triangulating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19-138.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7).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triangular love scal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 313-335.
- Surra, C. A., and Bohman, T. (1991).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 relationship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G. J. O. Fletcher and F. D. Fincham (eds.), *Cogni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81-305. Hillsdale, N.J.: Erlbaum.
- Türk Smith, S., and Smith, K. D. (1995). Turkish emotion concepts: A prototype analysis. In J. A. Russell, J. Fernández-Dols, A. S. R. Manstead, and J. C. Wellenkamp (eds.), *Everyday Conceptions of Emotion*, pp. 103-119.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第四部分

文化学说





爱情的进化与跨文化 观点：性别、人格和当地 生态对恋爱关系中情感 投资的影响

大卫·P·施密特 (David P. Schmitt)

为什么一些人的爱情体验比其他人更深刻？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取决于一个人对爱情的定义 (Hatfield & Rapson, 2002; S. Hendrick & Hendrick, 2002; Lee, 1973; Murstein, 1988; Rubin, 1970)。持有进化论观点的心理学家试图根据获得繁衍或提升适应度结果的情感投资来定义爱情 (Buss, 1988; Fisher, 1992; Lampert, 1997)。例如，父母间存在亲密和情感的稳定爱流，使孩子和青少年产生适应性的依恋倾向 (Bowlby, 1969; Hazan & Shaver, 1987)。爱会让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以健康的方式迅速地建立连结，爱会让人开始更认真地在择偶前发展出迷恋，爱还会使人在家庭和朋友中互换必要的社会支持 (Fletcher & Stenswick, 2003; Hrdy, 1999; Kirkpatrick & Shaver, 1992; McAndrew, 2002;

Shaver & Hazan, 1988)。爱情常常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固定在潜在的单身对象上，引发出激情与求爱行为，最后步入婚姻殿堂（Eibl-Eibesfeldt, 1989; Moore, 1995; Tennov, 1979）。最后，爱情在身体的亲密接触中得到升华，这种身体的亲密时常会导致基因繁殖。总之，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爱情与增长的适应度相关——它导致更大的生育可能性（促进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繁衍）。

在爱情进化论的支持下，情感投资的心理体现出深厚的生物学基础。许多爱情的核心感受表现出与人类生理系统和神经解剖系统之内的生物学系统的明确联系（Buck, 2002; Diamond, 2004; Insel & Young, 1997）。费希尔（Fisher, 2000, 2004）清晰地阐述一种理论，认为三种不同的生物系统与人的爱情相关。每一种生物系统都有其特定的大脑回路、激素和神经递质。简而言之，费希尔（2000）的理论提出，爱情作为一种强烈的性欲，涉及睾丸激素，从而引发人们的求偶欲望。作为浪漫与吸引，爱情与多巴胺和复合胺有关，促使人们与某个特定的对象坠入爱河。作为一种依恋，爱情引起后叶催产素活动，促使人类形成养育后代直到其能生存所需的长期承诺（在游牧文化中，大约有四年的时间，是生产间隔和断奶模式的自然史；Kelly, 1995）。之后，费希尔（2000, 2004）认为，人类所设定的功能是与他人相爱，并开始繁衍后代的爱的循环。尽管在社会背景下，这种爱情体验显然受到批判（Medora, Larson, & Hortacsu, 2002），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浪漫之爱的感觉似乎都支持进化论观点，包括“爱情普遍存在于几乎各种形式的文化中”这一事实（Fisher, 1992; Hatfield & Rapson, 2002; Jankowiak & Fischer, 1998; Sprecher, Aron, & Hatfield, 1994）。因此，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本性似乎就具有体验爱情的功能。

尽管爱情有其深层的生物学基础，但是，个体在体验到不同形式爱情的程度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K. L. Dion & Dion, 1998; Landis & O'Shea, 2000）。其中人格、文化、性别是影响爱情最重要的因素。那些具有某一人格特质的人是否更可能体验到爱情？还是来自某种文化或地区的人更可能体验到爱情？最后，还是某种性别（男性或女性）更可能体验到爱情？本章将依次对每个基本问题进行阐述。

爱情的人格差异

爱情和许多浪漫关系的感情特征都显现出与人格核心特质的紧密联系（Asendorpf, 1998；K. L. Dion & Dion, 1988；Shaver & Brennan, 1992；White, Hendrick, & Hendrick, 2004）。大五人格特质模型提供了大量启发性的人格核心特质（Digman, 1997；John, 1990）。在大五人格理论中，像爱情这样的个体差异变量，能够使情感投资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构念与其他个体差异维度相关联，也暗示情感投资与爱情体验背后的遗传学、神经学和生理学相关（Costa & McCrae, 2002；Fisher, 2000）。在大五人格维度中，有两个维度与爱情上的个体差异紧密相关：外向性和宜人性（Caralis & Haslam, 2004；Davies, 1996；Heaven, DaSilva, Carey, & Holen, 2004；Wiggins, 1979）。

施密特和巴斯（Schmitt & Buss, 2000）在一项研究中探讨了英语中的一系列与爱情相关的形容词，以鉴别出普遍意义上的爱情维度，并称其为“情感投资”。情感投资量表似乎抓住了许多爱情的核心特质，包括激情、亲密、承诺方面（Sternberg, 1988），情感投资量表是由与爱情有关的形容词的自我评估组成的，如钟情的、可爱的、浪漫的、亲切的、令人想拥抱的、富有同情心的以及充满热情的。施密特和巴斯（2000）在美国大学生的不同样本中发现，情感投资量表具有心理测量上可靠的内部信度，超过四周的时间信度，与斯腾伯格的爱情三因素有聚合效度，并通过与社会期望和关系满意度无关而显示出判别效度。在人格相关方面，施密特和巴斯发现了情感投资与外向性和宜人性的预期相关。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情感投资都与外向性和宜人性有显著的相关，其中与宜人性的相关更大。大五人格理论的其他维度对于两性而言与情感投资不存在相关。

施密特和巴斯（2000）给出的相关剖面图显示，从爱与进化、相关的情感投资维度来看，爱可能是外向性和宜人性的混合。其中宜人性比外向性更多（也可参见 Digman, 1997）。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一种观点，即爱情与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大脑回路有关（Fisher, 2004），爱也可能与这些系统中可遗传的



酶作用物有关 (Cherkas, Oelsner, Mak, Valdes, & Spector, 2004; Waller & Shaver, 1994)。有人已经用文献证明了外向性和宜人性与爱情的特殊关系, 以及由这种关系产生的结果 (Asendorpf, 1998; Schmitt, 2002; White et al., 2004)。尽管如此, 有时爱情特殊的子类型与外向性和宜人性的相关程度有所不同 (Wan, Luk, & Lai, 2000)。例如, 费荷和布劳顿 (2001) 发现, 激情之爱与支配和外向性的相关更紧密, 但是, 友谊之爱与养育和宜人性有更密切的相关。总体来说, 似乎在恋爱关系中投资情感的个体差异与外向性和宜人性有关, 这种差异在心理测量上存在于这两个维度之间的某个地方, 形成了人际圈的基本轴 (Gurtman & Pincus, 2003; Wiggins, 1979)。

爱情的文化差异

除了爱情在人格方面所呈现的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们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体验爱情 (K. K. Dion & Dion, 1996; S. Hendrick & Hendrick, 2003; Inman & Sandhu, 2002; Rodriguez, Montgomery, & Pelaez, 2003; Wan et al., 2000)。关于我们何时、与谁以及怎样坠入爱河这样的规范和许可是文化影响爱情的有力证明 (Hatfield & Rapson, 1996; Neto, Mullet, Deschamps, Barros, Benvindo, Camino, Falconi, Kagibanga, & Machado, 2000)。当人们坠入爱河时, 文化可以调节爱的感受, 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以及在我们的爱情生活中何种行为是最适合的或令人高兴的 (Landis & O'Shea, 2000; Sternberg, 1998)。从某种程度而言, 爱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体验, 它反映出爱情发生过程的时间与地点。

例如, 在美国的多元文化中, 不同的种族群体有不同的爱情体验。华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更倾向于体验到激情之爱, 而太平洋岛上的居民比欧裔美国人更倾向于体验伴侣之爱 (Doherty, Hatfield, Thompson, & Choo, 1994)。这与所发现欧裔美国人的激情之爱高于华裔美国人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Gao, 2001)。在跨国文化研究中, 斯普瑞彻和她的同事 (Sprecher et al., 1994) 发现, 俄罗斯人报告自己此时正处于恋爱中的百分比最高 (67%), 日本人最低

(52%)，而美国人位于中间(58%)。当评价一个人是否没有爱情也可以去结婚时，许多巴基斯坦人(50%)和印度人(49%)认为可以那样，而只有极少数的日本人(2%)或美国人(4%)持同意态度(Levine, Sato, & Hashimoto, 1995)。虽然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可以解释一些跨文化研究的结果(K. K. Dion & Dion, 1996; Hofstede, 2001; Triandis, 2001)，但是，研究证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爱情体验的测量之间的关系不一致(Sprecher, Aron, & Hatfield, 1994)。相对而言，进化论的观点在解释爱情的文化普遍性和变异性时十分有效，尤其是用情感投资的观点(Bowlby, 1988; de Munck, 1998; Jankowiak & Fischer, 1992; Rosenblatt, 1967)。

根据贝斯基、斯坦伯格和德雷帕(Belsky, Steinberg, & Draper, 1991)提出具有重要影响的进化模型，早期的社会化将引导儿童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儿童暴露于高压文化之下(特别是不敏感的/矛盾的养育方式、恶劣的自然环境、经济困难)，这倾向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表现出较低的情感投资(也见Rohner & Britner, 2002)。这些低水平的情感投资被看做是不安全依恋的一种形式，并与青春期提前、更多的生育和成年期的短期配偶策略相关(Chisholm, 1999; Kirkpatrick, 1998; Schmitt, 2005a)。低压文化的儿童(比如那些得到充分的照顾、教育与资源的儿童)将会发展出更多的情感投资趋向或者体验更高水平的爱(Gangestad & Simpson, 2000)。更富有爱的情感被认为是源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安全依恋，并与延后的青春期、低生育、长期的或一夫一妻的配偶策略有关。在每种情况下，情感投资或爱情的不同表现被认为是适于当地生态学中的生殖繁衍(Belsky, 1997; Chisholm, 1996)。高度的情感投资适应于长期的伴侣关系，而低程度的情感投资通常适用于短期的伴侣关系。

爱情的性别差异

一些研究表明，人们是否体验到爱情与生理性别有关(K. L. Dion & Dion, 1973; Fehr & Broughton, 2001; Hendrick, Hendrick, Foote, & Slapion-Foote, 1984;

Sprecher & Toro-Morn, 2002)。例如，当男性具有优势时，女性更可能体验到爱和吸引；而当女性具有身体魅力时，男性更可能体验到爱和吸引（Fletcher, Tither, O'Loughlin, Friesen, & Overall, 2004；Kenrick, Neuberg, Zierk, & Krones, 1994；Lucas, Wendorf, & Imamoglu, 2004；Schmitt & Buss, 1996）。女性通常根据情感承诺和安全感来考虑爱情，而男性往往更倾向于根据性承诺和交往的愉悦来考虑爱情（Buss, 2000；Cimbalo & Novell, 1993；Hazan & Shaver, 1987）。女性倾向于体验更多的爱的情绪“症状”（如感觉眩晕、脊骨发麻、心情愉快），但是，男性则报告比女性更快地坠入爱河（Kanin, Davidson, & Scheck, 1970；Brantley, Knox, & Zusman, 2002）。最后，女性倾向于在同意发生性行为之前获得爱情（Schmitt, 未发表；Simpson & Gangestad, 1991），男性则更可能和完全陌生的人发生性行为（Clark & Hatfield, 1989）。

在先前提到的与爱情相关的形容词的探索中，施密特和巴斯（2000）发现女性报告的情感投资水平适度地高于男性，这或许反映了爱情的情感沉重面，这方面构成了情感投资量表（例如，对“浪漫的”和“同情的”这些词的自我评定）。在一个描述更具人性化的量表中，描述称为色情倾向（erotophilic disposition）（用例如“好色的”和“性变态的”这样的形容词），男性的得分高于女性（Schmitt & Buss, 2000）。从美国其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样本中获得的结果似乎可以确定这种观点，即女性在源于情感亲近和亲密性的相关爱情量表中得分更高。C.亨德里克和亨德里克（C.Hendrick & Hendrick, 1986）测量了“正处于恋爱中”的自我报告水平，发现美国女性（64%）报告的恋爱水平显著高于美国男性（46%）。斯普瑞彻等人（Sprecher et al., 1994）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在许多不同的各种文化中，报告当前处于恋爱中的女性显著多于男性，报告处于恋爱状态的俄罗斯女性比俄罗斯男性高出12%，美国女性比美国男性高出10%，日本女性比日本男性高出21%。

为什么爱情中存在这些普遍的性别差异，至少在情感投资的观点来看待爱情的时候？依据亲代投资理论（Trivers, 1972），亲代投资的相对比例（对照顾后代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不同物种的雄性和雌性中有所差异。在某些

物种中，雄性比雌性给予更多的亲代投资（例如摩门教徒）。在其他一些物种中，雌性承受着更重的亲代投资负担（例如，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Clutton-Brock, 1991）。特里弗斯（Trivers, 1972）提出，亲代投资负担上的性别差异在与爱潜在相关的方式上与性选择的过程有系统的联系。在某个特定的物种中，对后代投入更多的性别一方倾向于采取更长久或以爱为导向的伴侣策略，而对后代投入较少的性别一方则倾向于采取更短暂或以性为导向的伴侣策略（见Andersson, 1994）。性选择通常导致高投入的一方较弱小、有较少的攻击性、较少冒险、更早熟和更长寿，在选择对一个潜在伴侣投资时，通常有更强的识别力（Alexander & Noonan, 1979）。

人类中，许多男性作为父亲对他们的孩子给予较多的投资，付出的投资既有直接的资源，又有通常的威望（Hazan & Diamond, 2000; Pasternak, Ember, & Ember, 1997）。尽管如此，在所有已知的文化背景中，男性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主动投入还是少于女性（Low, 1989; Munroe & Munroe, 1997; Quinn, 1997）。此外，男性在对后代必需或“最小”的亲代投资水平方面也低于女性。这是因为男性不必像女性那样为了生育能活的后代而投入那么多的资源（Symons, 1979）。女性必须承受体内受精、胎盘形成、妊娠的过程，从而生育孩子。男性要付出的生理上最低的义务则小得多——只需要提供精子。另外，所有雌性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祖先，承受着与哺乳有关所必需的负担。哺乳期在人类寻找食物的环境中持续几年，在此期间女性很难生育，也无法在其他的孩子身上投资（Kelly, 1995）。

当从进化观点看亲代投资理论时（Trivers, 1972），人类这种亲代投资责任的不对称性将会导致投资较少的性别一方（例如男性），对潜在生育伴侣和孩子显示出更低水平的爱或情感投资。在支持亲代投资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时，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男性表现出更高大的体型、更强的竞争攻击性（Archer & Lloyd, 2002; Hyde, 1986; Reynolds & Harvey, 1994）、更冒险的生活史策略（Daly & Wilson, 1998）、相对晚熟（Geary, 1998），在已知的各种文化中比女性离世更早（Alexander & Noonan, 1979）。其中许多差异在处于青春期前的孩子

间具有文化普遍性 (Freedman & DeBoer, 1979; Low, 1989)。此外, 如亲代投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 男性的配偶偏好与女性相比不是那么挑剔或有那么好的辨别力, 尤其是在没有爱情的短期交配情境下 (Buss & Schmitt, 1993; Kenrick, Sadalla, Groth, & Trost, 1990; Regan, 1998; Regan & Berscheid, 1997; Simpson & Gangestad, 1991)。因此, 根据亲代投资理论, 在我们的物种中男性显然是投资较少的一方, 应该倾向于在关系中和随后而来的后代中有更低的情感投资 (也见 Baron-Cohen, 2003; Geary, 1998; Mealey, 2000)。

另一方面, 根据社会结构理论 (Eagly & Wood, 1999; Wood & Eagly, 2002), 男性和女性可能还没有发展出不同的择偶心理。相反, 男性和女性发展出不同的生理功能 (例如, 女性照顾孩子的能力和男性外出打猎的能力) 以促进他们适应社会角色, 而这些社会角色在择偶和爱的领域中最能引起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差异。从这一观点来看, 当男性和女性承担相似的社会角色时 (例如, 在男女平等程度高的文化中), 他们应该在情感投资中没有差异。为了对比亲代投资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 情感投资的性别差异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跨文化验证。

跨国性别特征描述项目

从2000年开始, 施密特及其同事 (见 Schmitt, Alcalay, Allik, Ault, Austers, & Bennett et al., 2003; Schmitt, Alcalay, Allik, Angleiter, Ault, Austers et al., 2004) 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 即跨国性别特征描述项目 (ISDP), 目的是调查性别、人格、文化对于性别结果变量的作用, 如爱情、情感投资。来自48个国家的15234名被试 (见 Schmitt, 2005b) 完成了有关人类性别特征的“性的七测度” (Schmitt & Buss, 2000)。这个自我报告测试使用的是九点量表, 要求被试以67个具有性别特征内涵的形容词来描述他们自己, 这些形容词包括爱的、可爱的、浪漫的、深情的、激情的、令人想拥抱的、富有同情心的, 并把它们由英语翻译成27种语言。这七个形容词组成了情感投资量表, 它可以用做爱情的一个广泛基础的指示 (Schmitt & Buss, 2000)。

这一庞大的 ISDP 数据集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以检验在各种文化模式中自我报告的爱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关。例如，在进行 ISDP 测试的每个国家中，发现了高水平的情感投资与高水平的外向性和宜人性普遍相关，而与其他人格特质无关。这样的发现提供了证据，即就情感投资而言，爱情具有跨文化概念上的一致性，这将是启发性的帮助来引导研究者探寻爱情的心理学基础。

ISDP 中爱情的人格差异

在大多数接受 ISDP 测试国家中，情感投资量表具有中等到较高的内部信度（详见 Schmitt, 2005b）。在美国，情感投资量表的内部信度最高（ $\alpha = 0.87$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在“性的七测度”中与爱相关的形容词的含义可能最清晰。在参加 ISDP 测试的每个国家中，由“性的七测度”所测出的高水平的情感投资，被认为是与通过大五人格理论所测出的高水平的外向性和宜人性相关（Benet-Martinez & John, 1998）。主要的情况是，所有报告的相关都是正相关。虽然仅有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外向性和宜人性与情感投资的相关都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这可能导致无法发现预期的相关。

在大多数国家中，情感投资和宜人性之间正相关的程度高于情感投资和外向性之间的相关。然而，这些相关的差异很少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水平，所以，由“性的七测度”所测量的情感投资仅能表示其在外向性和宜人性之间所达到的程度（见 Wiggins, 1979）。在绝大多数文化中，爱与神经质不存在相关，只有少数文化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总之，这些发现表明爱情在情感投资方面以及在各文化中具有同等的概念理解，以后研究者在研究爱情的个体差异时，会将研究焦点放在外向性和宜人性下一层维度上。

ISDP 中爱情的文化差异

在 ISDP，情感投资的国家水平（即在控制被试性别后）呈现出从相对低

水平的坦桑尼亚、中国香港、日本到相对高水平的美国、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总体来看,国家对情感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在情感投资上的趋势是东亚文化中的国家得分相对更低。例如,编码每个国家的平均值,所表现出的是北美、南美、西欧、东欧、南欧、中东、非洲、大洋洲、南亚、东南亚、东亚(分组细节详见 Schmitt et al., 2003; Schmitt, Alcalay, Allensworth, Allik, Ault, & Austers et al., 2004),这在情感投资方面有世界区域的显著的主效应。东亚地区的情感投资水平显著低于所有其他地区,而北美则显著高于所有其他地区(见 Schmitt, 2005 b)。

对于不同的国家,贝斯基、斯坦伯格和德雷帕(Belsky, Steinberg, & Draper, 1991)提出的进化理论预测高水平的情感投资将与低压力的国家指标有关,如充足的卫生保健、教育、资源,与安全的爱情依恋模式、低人口出生率、更长久取向的生殖策略(也见 Chisholm, 1999; Schmitt, 2005 a)。美国国家统计局追踪了那些有充足的卫生保健、教育、资源的国家,将这些因素以人类发展指数(HDI;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2001)的形式量化。HDI分数是从参加46个国家与地区中得到的(中国台湾和塞尔维亚没有数据)。如表12-1所示,一个国家的情感投资水平与国家的HDI分数成正相关。这种相关既存在于男性,也存在于女性,这支持了贝斯基等人(Belsky et al., 1991)提出的进化理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维度上,虽然与情感投资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但所有都在预测的方向上,即高水平的情感投资与高水平的GDP相关。

贝斯基等人(1991)假设社会压力和爱情的情感投资之间的联系根植于安全型依恋(见 Chisholm, 1999; Rohner & Britner, 2002; Shaver & Hazan, 1988)。同样支持了上述观点,在国家维度上高水平的情感投资与安全型依恋成正相关,与占有型依恋成负相关,在女性中高水平的情感投资与恐惧型依恋成负相关。实际上,国家与地区中(中国台湾、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坦桑尼亚),其爱情的占有依恋都超过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平均值。情感投资和一个国家的自尊水平也有关,在ISDP中进行的罗森伯格的自尊测试(Schmitt & Allik, 未发表)以及迪纳夫妇(Diener, 1995)的

跨文化自我价值评估测试结果（见表 12-1）表明了这一观点。这些研究发现与迪恩夫妇（K. K. Dion & Dion, 1975）的结果相一致，并提供了另外的证据，即那些安全依恋的个体（即有积极自我模式的人）有更多情感投资方面的个性品质。

回顾巴斯基等人（Belsky et al., 1991）提出的进化理论，认为不安全依恋关系和低水平的情感投资是适应性生殖策略的一部分，这些策略包括高生育率、青春期提前、短期交配。来自 ISDP 的结果并不支持进化理论的所有观点。女性中低水平的情感投资与高生育率相关。尽管如此，在国家水平上，情感投资与离婚、自由的男女关系、短期交配利益以及获取短期配偶的企图（即偷情）方面成正相关。结果也显示，当短期交配在一个国家中较为常见时，情感投资问题也得到更普遍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短期交配的所有指标都与性别差异在情感投资上的影响尺度（ d ）成负相关。也就是说，当性别差异在情感投资上的影响尺度（ d ）降低时（即与零点的宽度更大或更远），短期交配在国家水平上更普遍。这主要是由于当短期交配在国家中有所增长时，女性在情感投资水平的增长高于男性。多元策略理论是对这一趋势的一种解释（SPT; Gangestad & Simpson, 2000）。根据 SPT 理论，人类发展出一系列择偶策略（见 Belsky, 1997; Chisholm 1996; de Munck & Korotayev, 1990）。使用哪种策略部分取决于具体的环境条件。当环境中蕴含丰富的资源，投入充足的养育后代的努力相对容易时，女性通常拥有她们养育后代所需的资源，因此从各方面来说，她们寻求短期配偶时会感到比较轻松自由。假如当地是资源匮乏的生态环境，从男性那里所能获得的情感投资相对较低，女性则努力保持从男性那里获得的极为有限的亲代投资，并更忠诚地留在她们的长期配偶身边。多元策略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情感投资较普遍的国家会存在高的短期交配率。在资源贫乏的国家，女性忠诚于婚姻关系，目的是要获得亲代投资。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情感投资充分，女性感到社会对性关系的限制较少，可以从短期交配中获得好处（Gangestad & Simpson, 2000; Schmitt, 未发表）。

表 12-1 在 ISDP 国家中情感投资与社会文化因素的相关水平

社会文化因素	N	情感投资			性别差异 (d)
		国家	男性	女性	
文化的发展 (UNDP, 2001)					
人类发展指标	46	.31*	.29*	.32*	-.21
国内生产总值 (GDP)	46	.18	.12	.22	-.30*
浪漫依恋 (Schmitt et al., 2004)					
安全型依恋	48	.35**	.33**	.35**	-.13
冷漠型依恋	48	-.09	-.04	-.12	.21
占有型依恋	48	-.46***	-.39**	-.51***	.35**
恐惧型依恋	48	-.22	-.17	-.27*	.28*
自尊					
RSES (Schmitt & Alik, 未发表)	48	.54***	.52***	.53***	-.14
自我价值感 (Deiner & Diener, 1995)	18	.43*	.40*	.44*	-.19
生殖因素					
生育率 (UNDP, 2001)	46	-.23	-.19	-.25*	.28*
离婚率 (UNDP, 2001)	24	.52**	.46*	.54**	-.29
社会性行为指数	43	.49***	.43**	.52***	-.29*
短期交配利益 (Schmitt, 2005 a)	43	.44**	.36**	.47***	-.33*
偷情 (Schmitt et al., 2004)	42	.55***	.50***	.57***	-.20

性别平等 (UNDP, 2001)					
性别发展指数	45	.31*	.29*	.32*	-.22
性别权利测量	33	.35*	.26	.37*	-.31*
文化价值 (Hofstede, 2001)					
个人主义 (与集体主义)	42	.31*	.25*	.32*	-.23
权利距离	42	-.18	-.14	-.19	.16
不确定性规避	42	.13	.14	.12	.04
男子气概	42	-.14	-.20	-.11	-.13

说明: * $p < .05$

** $p < .01$

*** $p < .001$

UNDP: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RSES: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ISDP 中爱情的性别差异

亲代投资理论 (Trivers, 1972) 预测男性会比女性进行较少的情感投资。在参与 ISDP 研究的国家中, 情感投资存在非常普遍的性别差异 (详见 Schmitt, 2005b)。在 48 个国家当中, 其中 34 个国家的性别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有些样本没有达到性别差异的显著性水平, 是因为样本量太小, 尽管如此, 性别差异量仍然达到 $d = -0.20$ 。例如, 将统计检验力 (beta) 设为 0.80, 统计显著性 (alpha) 设为 0.05, 那么要确保差异值 $d = -0.20$ 时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必须保证样本中多于 300 名男性和 300 名女性。

根据性别差异在情感投资的影响尺度 (d), 11 个国家的男性在情感投资上低于女性, 性别差异尺度为“从中到大” ($d = -0.50$, 甚至更大); 26 个国家的男性在情感投资上低于女性, 性别差异尺度为“从小到中” ($-0.49 \leq d \leq -0.20$); 另有 8 个国家的男性在情感投资上低于女性, 性别差异尺度最小 ($-0.19 \leq d \leq -0.01$)。但有 3 个国家无论是以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还是影响力来评估, 男性的情感投资明显不低于女性。玻利维亚的男性和女性情感投资的平均水平相同 ($d = 0.00$)。在印度尼西亚 ($d = 0.32$) 和马来西亚 ($d = 0.24$), 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非常有趣的是, 这两个相邻的国家意外地表现出男性情感投资水平高于女性的趋势。在印度尼西亚, 出现相反的性别差异是由于印尼女性自我报告的情感投资的分数远远低于全世界女性的平均分。印尼男性的分数也低于全世界男性的平均分, 但是没有像印尼女性分数那么低。在马来西亚, 导致性别差异相反的原因是由于马来西亚的男性的情感投资总体的分数接近于平均分, 但女性分数低于平均分。这两个国家也是仅有的情感投资与外向性和宜人性之间没有达到显著性相关的国家。可能是由于两个国家的语言在评估翻译过来情感投资量表中与爱情相关的形容词时, 与英语的表述不一致。

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大的性别差异, 社会结构理论表明, 性别平等的国家指标可能是非常有效的 (见 Eagly & Wood, 1999)。当一

个国家更趋向性别平等时，在情感投资上的性别差异可能会消除或至少会减弱（Wood & Eagly, 2002）。这将有助于判定性别差异的变化是由于女性情感投资水平的降低，而不是男性情感投资水平的升高，或两方面均起作用。美国国家统计局提供了性别平等的两个重要指标。第一个是性别发展指数（GDI），它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相似，但如果人类发展指标在两性中表现不均，它会降低国家分数。第二个是性别权力测量，它对性别平等在三个领域内进行量化：经济参与和决策、政治参与和决策、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能力。这两种情况中，更高的性别平等指数，与情感投资的国家水平成正相关。因此，提高性别平等可能会提升国家在情感投资上的水平。

然而，与假设相反，性别平等度越高的国家（如瑞典、澳大利亚、德国），在情感投资上性别差异越大，而性别平等度越低的国家（土耳其、韩国、玻利维亚），情感投资上的性别差异越小。瑞典在性别权力测量中位于前十位，但是在ISDP研究涉及的国家中情感投资性别差异最大（ $d = -0.86$ ，见图12-1）。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似乎应该表现的是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与更高的情感投资相关，但是性别平等在情感投资上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更为显著，这导致了在情感投资整体上更大的性别差异。这些发现与社会结构理论相矛盾（Eagly & Wood, 1999; Wood & Eagly, 2002），社会结构理论假设“当男性和女性占有同样的社会角色时，性别差异将消失”（Eagly & Wood, 1999, p.413）。相反，根据ISDP研究，性别体验越相似，情感投资的性别差异越大。

其他的跨文化研究（Costa et al., 2001; Williams & Best, 1990）发现，高度的性别平等通常与自我认知方面更大的性别差异有关。例如，一项关于26个国家的人格特质的研究表明，“社会角色模式本来假定，在国家的进展中性别差异将变小，而实际上却扩大了”（Costa et al., 2001, p.329）。一个推测是，在男女性别更多的是社会性区分的文化，人们在完成他们自我报告的调查时，将难以跨越性别而进行自我比较。然而，在男性和女性可以自由地居于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化中，人们更可能通过性别进行比较，性别差异可能更容易浮现出来。然而，这些发现好像扰乱了社会结构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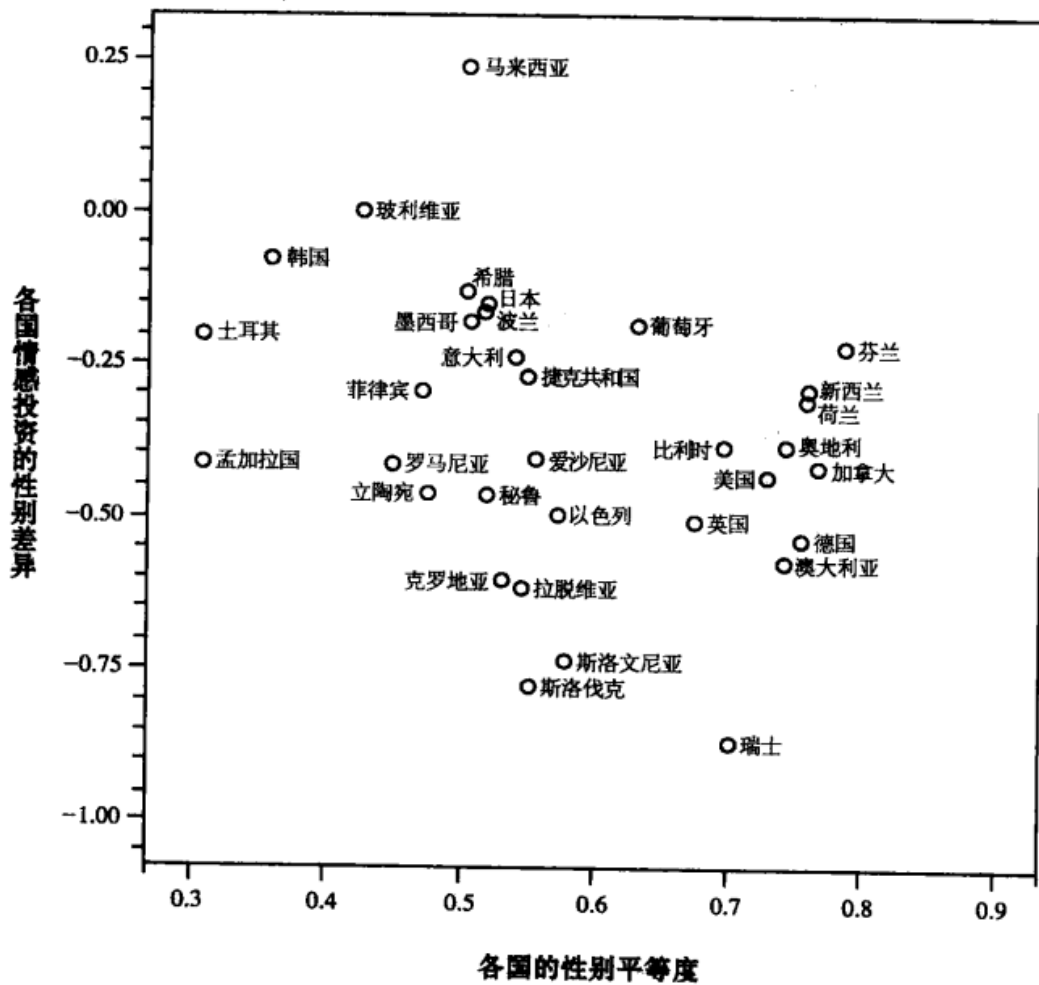


图 12-1 ISDP 国家在情感投资中性别权力与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 $r(31) = -0.31, p < 0.05$ 。

对性别、人格、文化和爱情的总结

作为 ISDP 的一部分, 来自于 48 个国家的样本完成一项自我报告的调查, 调查包含一个称为情感投资量表的与爱情相关的形容词的简单测试。这个测试包含七个项目, 在所有国家中都具有中等到较高的内部信度。在大多数国家中, 高水平的情感投资与高水平的外向性和宜人性有关, 但是与神经质无关, 这提供了爱情具有跨文化概念一致性的证据。

进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爱情的跨文化变异, 即生存压力大, 特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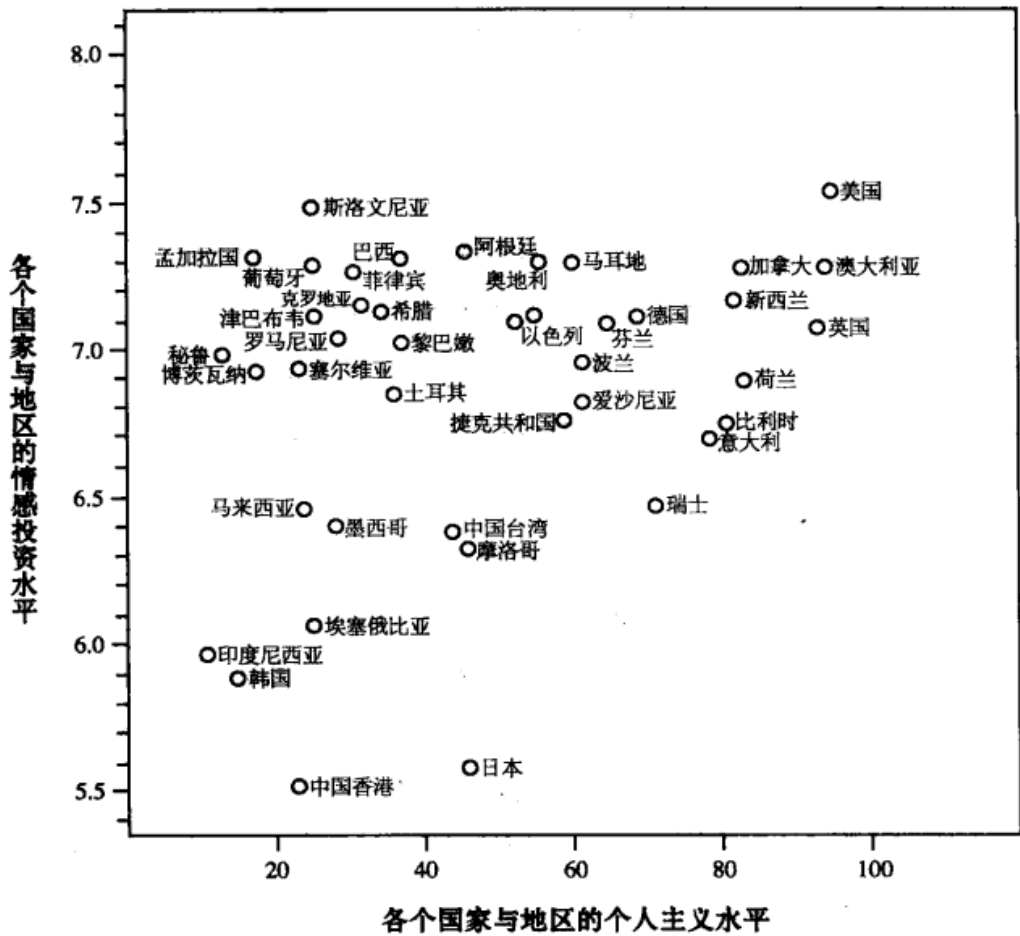


图 12-2 ISDP 国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水平与情感投资之间的关系, $r(40) = 0.31, p < 0.05$ 。

不敏感/矛盾的养育方式、恶劣的物理环境、还有经济困难——都会导致儿童形成不安全的依恋风格，最终导致在成年期情感投资的水平较低 (Belsky et al., 1991)。来自较低压力文化的人们，如有充分的卫生保健、教育、资源，将发展出安全的依恋风格和高自尊，具备更多的情感投资的浪漫人格特性。情感投资趋向也和高生育率、混乱的性态度和行为有关，尽管这些联系与贝斯基 (Belsky et al., 1991) 在爱情进化中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的。

在 ISDP 研究涉及的国家中发现，还有其他因素对情感投资的跨文化模式起作用。例如，情感投资的国家水平与个人主义的国家水平成正相关 (见表 12-1)。然而，与预期相反，在越是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在爱情的情感水平反

而越低(见图12-2; K. K. Dion & Dion, 1996)。爱情作为情感投资与霍夫斯泰德(Hofstede, 2001)的其他文化维度没有关联。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与求爱有关的社会化练习也可能会影响目前的研究发现(Medora et al., 2002)。例如,在韩国,青年人直到最近才不得不开始练习他们情感投资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在大学期间约会。直到最近,ISDP研究项目中一些国家仍有很多包办婚姻。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有选择爱情的自由。在更传统的社会中,家庭责任和社会、文化期待决定一个人的爱情态度和期望,在情感投资和择偶方面的自由较少。这样的影响可以解释ISDP中国家在情感投资方面为何存在某些差异。

尽管国家层面上对爱的研究发现看似提供了多种信息,但是ISDP中的一些局限必须要注意。首先,ISDP测试量表的翻译不是由专业人士进行的,这使翻译质量难以保证。其次,即便对情感投资量表的爱情项目可以做到翻译内容与原义一致,但是不能保证每个项目在不同文化中都完全一致(Van de Vijver & Leung, 2000)。第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偏差,包括默许偏差、否定的项目偏见、社会期待反应(Schmitt & Allik, 未发表)。因此,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充分的解释前,目前的结果只是实验性的。文化内部的一致性信度和爱情与人格之间的相关,证实了在不同的言语和文化中对相似的构念进行测量是可信的。在这些限制的背景下,当前的发现展现出人们对性别、人格、文化和爱情的前沿理解。

(李旭珊 初译)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R. D., and Noonan, K. M. (1979). Concealment of ovulation, parental care, and 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In N. A. Chagnon and W. Irons (eds.),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Human Social Behavior: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pp. 436-453.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 Andersson, M. (1994). *Sexual Sel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cher, J., and Lloyd, B. B. (2002). *Sex and Gender*,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endorpf, J. B. (1998). Personality effects on soci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531-1544.
- Baron-Cohen, S. (2003).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The Truth about the Male and Female Br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lsky, J. (1997). Attachment, mating, and parenting: An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Human Nature*, 8, 361-381.
- Belsky, J., Steinberg, L., and Draper, P. (1991). Childhood experience,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ve strategy: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2, 647-670.
- Benet-Martínez, V., and John, O. P. (1998). Los cinco grandes across cultures and ethnic groups: Multitrait multimethod analysis of the Big Five in Spanish and Englis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729-750.
- Bowlby, J. (1969/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88).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antley, A., Knox, D., and Zusman, M. E. (2002). When and why gender differences in saying "I Love You"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36, 614-615.
- Buck, R. (2002). The genetics and biology of true love: Prosocial biological affects and the left hemisphe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 739-744.
- Buss, D. M. (1988). Love acts: The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00-118.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Social adaptation and five major factors of personality. In J. S. Wiggins (ed.),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p. 180-207.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 (2000). *The Dangerous Passion: Why Jealousy Is as Necessary as Love and Sex*. New York: Free Press.
- Buss, D. M., and Schmitt, D. P. (1993).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human mat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204-232.
- Caralis, D., and Haslam, N. (2004). Relational tendencies associated with broad personality dimension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77, 397-402.
- Cherkas, L. F., Oelsner, E. C., Mak, Y. T., Valdes, A., and Spector, T. D. (2004). Genetic influences on female infidelity and number of sexual partners in humans: A linkage and association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vasopressin receptor gene (AVPR1A). *Twin Research*, 7, 649-658.
- Chisholm, J. S. (1996). The evolutionary ecology of attachment organization. *Human Nature*, 7, 1-38.
- . (1999). Steps to an evolutionary ecology of mind. In A. L. Hinton (ed.), *Bio-cultural Approaches to the Emotions*, pp. 117-1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imbalo, R. S., and Novell, D. O. (1993). Sex differences in romantic love attitud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ports*, 73, 15-18.

- Clark, R. D., III., and Hatfield, E. (1989).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ceptivity to sexual offer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2, 39-55.
- Clutton-Brock, T. H. (1991). *The Evolution of Parental Ca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sta, P. T., Jr., and McCrae, R. R. (2002). Four ways five factors are basic.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 653-665.
- Costa, P. T., Jr., Terracciano, A., and McCrae, R. R. (2001).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across cultures: Robust and surprising find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322-331.
- Daly, M., and Wilson, M. (1988).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Davies, M. F. (1996). EPQ correlates of love sty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 257-259.
- de Munck, V. C. (ed.). (1998). *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Behavior: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 de Munck, V. C., and Korotayev, A. (1999). Sexual equality and romantic love: A reanalysis of Rosenblatt's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romantic lov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3, 265-277.
- Diamond, L. M. (2004).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distinctions between romantic love and sexual desir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 116-119.
- Diener, E., and Diener, M. (1995). Cross-cultural correlates of life-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653-663.
- Digman, J. M. (1997). Higher-order factors of the Big F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1246-1256.
- Dion, K. K., and Dion, K. L. (1975). Self-esteem and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3, 39-57.
- . (1996).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romantic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5-17.
- Dion, K. L., and Dion, K. K. (1973). Correlates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1, 51-56.
- . (1988). Romantic love: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264-28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herty, R. W., Hatfield, E., Thompson, K., and Choo, P. (1994). Cultural and ethnic influences on love and attachmen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91-398.
- Eagly, A. H., and Wood, W. (1999). 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behavior: Evolved dispositions versus social rol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408-423.
- Eibl-Eibesfeldt, I. (1989). *Human Etholog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Fehr, B., and Broughton, R. (2001). Gender and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conceptions of love: 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alysi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 115-136.
- Fisher, H. (1992). *Anatomy of Lov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onogamy, Adultery and Divorce*. New York: Norton.
- . (2000). Lust, attraction, attachment: Biology and evolution of the three primary emotion systems for mating, reproduction, and parenting. *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y*, 25, 96-104.
- . (2004). *Why We Love: The Nature and Chemistry of Romantic Love*. New York: Henry Holt.

- Fletcher, G. J. O., and Stenswick, M. (2003).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mind. In K. Sterelny and J. Fitness (eds.), *From Mating to Mentality*, pp. 71-93.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Fletcher, G. J. O., Tither, J. M., O'Loughlin, C., Friesen, M., and Overall, N. (2004). Warm and homely or cold and beautiful? Sex differences in trading off traits in mate sele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659-672.
- Freedman, D. G., and DeBoer, M. M. (1979).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8, 579-600.
- Gangestad, S. W., and Simpson, J. A. (2000). The evolution of human mating: Trade-offs and strategic pluralism.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3, 573-587.
- Gao, G. (2001). Intimacy, passion and commitment in Chinese and US America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5, 329-342.
- Geary, D. C. (1998). *Male, Fema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 Differen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urtman, M. B., and Pincus, A. L. (2003). The circumplex model: Methods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s. In J. A. Schinka and W. F. Velicer (eds.), *Handbook of Psychology*, vol. 2,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pp. 407-428. New York: Wiley.
- Hatfield, E., and Rapson, R. L. (1996). *Love and Sex: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 (2002). Passionate love and sexual desir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A. L. Vangelisti and M. A. Fitzpatrick (eds.),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Relationships*, pp. 306-32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zan, C., and Diamond, L. M. (2000). The place of attachment in human mating.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4, 186-204.
- Hazan, C., and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Heaven, P. C. L., Da Silva, T., Carey, C., and Holen, J. (2004). Loving styles: Relationships with personality and attachment style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 103-113.
- Hendrick, C., and Hendrick, S. (1986). A theory and method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92-402.
- Hendrick, C., Hendrick, S., Foote, F. H., and Slapion-Foote, M. J. (1984). Do men and women love differentl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177-195.
- Hendrick, S., and Hendrick, C. (2002). Love. In C. R. Snyder and S.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472-4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Romantic love: Measuring Cupid's arrow. In S. J. Lopez and C. R. Snyder (ed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Handbook of Models and Measures*, pp. 235-24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Hrdy, S. B. (1999). *Mother Nature: A History of Mothers, Infants, and Natural Selection*. New York: Pantheon.
- Hyde, J. S. (1986).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In J. S. Hyde and M. C. Linn (eds.), *The Psychology of Gender: Advances Through Meta-analysis*, pp. 51-66.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nman, A. G., and Sandhu, D. S. (2002).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ove and sex. In L. D. Burlew and D. Capuzzi (eds.), *Sexuality Counseling*, pp. 41-62. New York: Nova Science.
- Insel, T. R., and Young, L. J. (1997). The neurobiology of attachment.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 129-136.
- Jankowiak, W. R., and Fischer, E. F.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31, 149-155.
- . (1998).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In J. M. Jenkins, K. Oatley, and N. L. Stein (eds.), *Human Emotions: A Reader*, pp. 55-62. Malden, Mass.: Blackwell.
- John, O. P. (1990). The "big five" factor taxonomy: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and in questionnaires. In L. A. Pervin (ed.),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66-100.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Kanin, E. J., Davidson, K. D., and Scheck, S. R. (1970). A research note on male-female differentials in the experience of heterosexual lov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6, 64-72.
- Kelly, R. L. (1995). *The Foraging Spectrum: Diversity in Hunter-Gatherer Lifeway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Kenrick, D. T., Neuberg, S. L., Zierk, K. L., and Krones, J. M. (1994). Evolu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Contrast effects as a function of sex, dominance, an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 210-217.
- Kenrick, D. T., Sadalla, E. K., Groth, G., and Trost, M. R. (1990). Evolution, traits, and the stages of human courtship: Qualifying the parental investment model. Special issu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ersonality: evolution, behavioral genetics, and psychophysiolo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8, 97-116.
- Kirkpatrick, L. A. (1998). Evolution, pair-bonding, and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dult attachment. In J. A. Simpson and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353-39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Kirkpatrick, L. A., and Shaver, P. (1992). An attachment-theoretical approach to romantic love and religious belie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 266-275.
- Lampert, A. (1997). *The Evolution of Love*. Westport, Conn.: Praeger.
- Landis, D., and O'Shea, W. A. (2000).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passionate love: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aly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 752-777.
- Lee, J. A. (1973). *The Colours of Lov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ays of Loving*. Don Mills, Ont.: New Press.
- Levine, R., Sato, S., and Hashimoto, T. (1995). Love and marriage in eleven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6, 554-571.
- Low, B. S. (1989). Cross-cultural patterns in the training of childre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03, 313-319.
- Lucas, T. W., Wendorf, C. A., and Imamoglu, E. O. (2004).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four cultures as a function of homogamy, male dominance and female attractiveness. *Sexualities, Evolution and Gender*, 6, 97-130.
- McAndrew, F. T. (2002). New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altruism: Multilevel selec-

- tion and costly signaling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79-82.
- Mealey, L. (2000). *Sex Differences: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Strategie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Medora, N. P., Larson, J. H., and Hortacsu, N. (2002). Perceived attitudes towards romanticism: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American, Asian-Indian, and Turkish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3, 155-178.
- Moore, M. M. (1995). Courtship signaling and adolescents: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2, 319-328.
- Munroe, R. L., and Munroe, R. H. (1997). A comparativ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J. W. Berry, Y. H. Poortinga, and J. Pandey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nd ed., vol. 1, pp. 171-213.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Murstein, B. I. (1988). A taxonomy of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3-3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eto, F., Mullet, E., Deschamps, J., Barros, J., Benvindo, R., Camino, L., Falconi, A., Kagibanga, V., and Machado, M. (2000).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attitudes toward lov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 626-635.
- Pasternak, B., Ember, C., and Ember, M. (1997). *Sex, Gender, and Kinship: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 Quinn, N. (1977).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women's statu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6, 181-225.
- Regan, P. C. (1998). What if you can't get what you want? 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ideal mate selection standards as a function of sex, mate value, and relationship contex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 1294-1303.
- Regan, P. C., and Berscheid, E. (1997).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desired in a potential sexual and marriage partner.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9, 25-37.
- Reynolds, J. D., and Harvey, P. H. (1994).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 differences. In R. V. Short and E. Balaban (ed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xes*, pp. 53-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J. P., Shaver, P. R., and Wrightsman, L. S. (1991). Criteria for scal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and L.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pp. 1-16.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Rodríguez, I. A., Montgomery, M., and Peláez, M. (2003). Actitudes amorosas y experiencias en el cortejo en adultos jóvenes de tres distintas culturas. (Love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in courtship in young adults of three different cultures). *Revista Mexicana de Psicología*, 20, 177-188.
- Rohner, R. P., and Britner, P. A. (2002). Worldwide mental health correlates of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racultural evidenc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6, 16-47.
- Rosenblatt, P. C. (1967). Marital residence and the functions of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6, 471-480.
- Rubin, Z. (1970). Measurement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65-273.

- Schmitt, D. P. (2002). Personality, attachment, and sexuality related to dating relationship outcomes: Contrasting three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 attribute inter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589-610.
- . (2005a). Is short-term mating the maladaptive result of insecure attachment? A test of competing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747-768.
- . (2005b). When will I feel love? How gender,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lov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 (in press). Sociosexuality from Argentina to Zimbabwe: A 48-nation study of sex, culture, and strategies of human mating.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 Schmitt, D. P., Alcalay, L., Allensworth, M., Allik, J., Ault, L., Austers, I., et al. (2004). Patterns and universals of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across 62 cultural regions: Are models of self and of other pancultural constr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 367-402.
- Schmitt, D. P., Alcalay, L., Allik, J., Angleiter, A., Ault, L., Austers, I., et al. (2004). Patterns and universals of mate poaching across 53 nations: The effects of sex,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on romantically attracting another person's partn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560-584.
- Schmitt, D. P., Alcalay, L., Allik, J., Ault, L., Austers, I., Bennett, K. L., et al. (2003). Universal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sire for sexual variety: Tests from 52 nations, 6 continents, and 13 islan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85-104.
- Schmitt, D. P., and Allik, J. (in press). Simultaneous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cross 53 nations: Exploring the personal and culture-specific correlates of global self-regar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Schmitt, D. P., and Buss, D. M. (1996). Strategic self-enhancement and competitor derogation: Sex and context effects on the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of mate attraction tac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185-1204.
- . (2000). Sexual dimensions of person description: Beyond or subsumed by the Big Fiv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4, 141-177.
- Shaver, P., and Brennan, K. A. (1992). Attachment styles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Their connection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 536-545.
- Shaver, P., and Hazan, C. (1988). A biased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473-510.
- Simpson, J. A., and Gangestad, S. W. (199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osexuality: Evidence for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870-883.
- Sprecher, S., Aron, A., and Hatfield, E. (1994). Love: American style, Russian style and Japanese styl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49-369.
- Sprecher, S., and Toro-Morn, M. (2002). A study of men and women from different sides of Earth to determine if men are from Mars and women are from Venus in their beliefs about love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Sex Roles*, 46, 131-147.
- Sternberg, R. J. (1988). Triangulating love.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119-138.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Cupid's Arrow: The Course of Love Through Ti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ymons, D. (1979).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nnov, D. (1979). *Love and Limerence: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 Love*. New York: Stein and Day.
- Triandis, H. C. (2001).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 907-924.
- Trivers, R. (1972).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B. Campbell (ed.),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1871-1971*, pp. 136-179. Chicago: Aldine.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 Vijver, F. J. R., and Leung, K. (2000).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ultur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 33-51.
- Waller, N. G., and Shaver, P. R. (1994). The importance of nongenetic influence on romantic love styles: A twin-family study.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268-274.
- Wan, W. W. N., Luk, C.-L., and Lai, J. C. L. (2000).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loving style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Hong Ko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9, 169-175.
- White, J. K.,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2004). Big five personality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7, 1519-1530.
- Wiggins, J. S. (1979). A psychological taxonomy of trait-descriptive terms: The interpersonal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395-412.
- Williams, J. E., and Best, D. L. (1990). *Measuring Sex Stereotypes: A Multination Study*, rev. ed.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Wood, W., and Eagly, A. H. (2002).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men and women: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699-727.





激情之爱：跨文化与进化观点

黛布拉·雷博曼 (Debra Lieberman)
伊莱恩·哈特菲尔德 (Elaine Hatfield)

“Hubb”是爱，“isbq”是令两个人缠绵悱恻的爱，“shaghaf”是深入人心的爱，“hayam”是让人徘徊迷茫的爱，“teeh”是让人迷失自我的爱，“walah”是令人伤心的爱，“sababah”是发自内心的爱，“hawa”是地老天荒的爱，“gharm”是令人甘愿付出的爱。

——阿达夫·索埃弗 (Ahdaf Soueif, 1999)

激情之爱（有时也称为“占有之爱”、“迷恋”、“相思”或“恋爱”）是一种强有力的情绪状态。哈特菲尔德和拉普森 (Hatfield & Rapson, 1993) 将激情之爱定义为“一种强烈渴望与另一个人在一起的状态”。激情之爱是一个复杂的功能体，包含评价或欣赏、主观感受、表达、模式化的生理过程、行为倾向和工具性行为 (instrumental behaviors)。彼此相爱（与对方合二为一）通常让人感到满足狂喜。单恋（分离）则令人空虚、焦虑或绝望 (p.5)。

哈特菲尔德和斯普瑞彻设计了激情之爱量表（PLS），用于评估与此种爱情相关的认知、生理和行为事件（Hatfield & Sprecher, 1986）。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激情之爱量表都是十分有效的测量工具（见 Doherty, Hatfield, Thompson, & Choo, 1994; Landis & O'Shea, 2000），并且与关于激情之爱和性欲的神经皮质和 fMRI 测量的相关密切（见 Bartels & Zeki, 2000; Fisher, 2003; Fisher, Aron, Mashek, Strong, Li, & Brown, 2004）。与此同时，神经生物学家已经开始探索激情之爱、性欲、性动机的化学和激素基础（C. S. Carter, 1998; Fisher et al., 2004; Komisaruk & Whipple, 1998; Marazziti, Akiskal, Rossi, & Cassano, 1999; Marazziti & Canale, 2004）。

以往人们对于激情之爱、性欲、择偶等主题兴趣不大，近些年，这些主题已经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中心内容。三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富于戏剧性的变化：（1）关于文化在塑造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的重要性上，科学家们已经形成全新的见解；（2）技术的进步，如 fMRI 技术，使人们能够研究以往模糊不清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些现象（如激情之爱和负面情绪）；（3）进化心理学的新进展清楚地表明，我们祖先所面临的挑战对于今天的两性行为方式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影响激情之爱和性欲的文化因素

文化与爱情的意义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理解诸如爱、喜悦、愤怒、恐惧和悲伤这些情绪词（见 Jankowiak, 1995）。然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对这些构念含义的微妙差异有着深刻的影响（见 Nisbett, 2003）。

薛佛、吴和施瓦茨（Shaver, Wu, & Schwartz, 1991）访谈了美国、意大利与中国的一些年轻人。正如所料，在这三种文化中，男性和女性都将五种情绪

词作为“基本”或原型的情绪。它们是喜悦/幸福、爱/吸引、恐惧、愤怒/憎恨、悲伤/沮丧。

在这些文化中，对于一些情绪词应该作为积极体验（如喜悦），还是作为消极体验（如恐惧、愤怒或悲伤），男性和女性对此的意见一致。然而，他们对于爱却意见不一。美国和意大利的被试倾向于将激情之爱与幸福等同，爱被看做是一种强烈的积极体验。中国北京的学生对爱情的看法比较悲观。在中国很少有形容“爱情的快乐”的词汇，爱往往和悲伤相连。这并不奇怪，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在形容激情之爱时，通常使用如迷恋、单恋、相思和“悲伤的爱”这样的表意词汇。

最近，社会心理学家探讨了在不同文化中（如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爱情的民间概念。研究者发现，尽管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对爱情和其他关于“心跳的感觉”的看法惊人地相似，但实际上仍存在着差异（见 Shaver & Murdaya, 2001；Jankowiak, 1995，此研究的综述）。

人类学家的观点

学者们曾假设激情之爱是由12世纪法国的抒情诗人“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激情之爱如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例如，苏美尔人的爱情神话传说，依楠娜（Inanna）和杜木基（Dumuzi），就是在公元前两千年，由部落里讲故事的人传诵至今。今天，大多数的人类学家认为激情之爱是一种文化普遍性。

姜克维克和弗希尔（Jankowiak & Fischer, 1992）对“浪漫的激情”和“单纯的性欲”做出区分。他们认为激情和性欲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是普遍的人类情感。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他们从标准的跨文化样本中选取部落社会样本，目的是考察在这些社会群体中浪漫之爱是如何普遍存在的。他们发现，在绝大多数遥远分布的社会群体中，年轻的恋人会谈论爱情、讲述爱情故事、唱情歌，诉说对痴心恋情的渴望与苦恼；当年轻人的爱情与父母或长辈的意愿相冲突时，年轻的情侣常常会选择私奔。据此，研究者得出浪漫之爱是全人类所共

有的特性。大量证据证实了这一观点（见 Buss, 2003; Hatfield & Rapson, 1993; Jankowiak, 1995）。

社会人类学家探索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如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尼日利亚、特立尼达岛、摩洛哥、喀麦隆北部的富尔贝）爱情的民间概念。社会人类学家还研究了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红树林、库克群岛的麦格亚、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群岛以及肯尼亚的泰塔。在所有这些研究中，人们对于激情之爱的观点出奇地相似。全球化的影响（到处存在的 MTV、好莱坞和宝莱坞电影、聊天室和海外游）使人们在谈论激情之爱时所讨论的话题基本一致（见 Jankowiak, 1995, 这一研究领域的综述）。

尽管激情之爱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普遍性（存在于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时代中的一种情绪），但是，文化因素对激情感觉的共通性具有深远的影响。文化因素还影响人们体验激情的强烈程度以及人们处理激情体验的方式。

文化的观点

所谓的跨文化研究者会声称美国人非常关注爱情。

人类学家许烺光（Hsu, 1985），比较了西方和中国关于激情之爱和亲密的价值观念。许烺光认为美国文化着重个性。因此，个性的展现和情感的表达非常重要。中国文化则重视情境。中国人处于“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中”（p. 33）。文化要求人们要遵从“社会的人际关系准则”（1971, p. 29）。因此，中国的男女更倾向于“将所有的事情掩藏在心里”（1971, p. 12）。

许烺光（Hsu, 1953）提出这种文化的差异对这两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看待浪漫之爱的方式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浪漫之爱的概念十分符合北美文化的观点，但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取向。在中国文化中，人们认为浪漫之爱不仅考虑个人的感受，还要听从他人意见，尤其是父母。许烺光写道：“一个美国人问‘我心里感觉怎么样？’一个中国人问‘他人会怎么说？’”（p. 50）他认为西方浪漫

之爱的观点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缺乏实际的感染力。他还指出，通常中国人使用爱情这个词不是指一种受人尊重的、被社会认可的恋爱关系，而是指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最近，其他跨文化研究者发现在大家庭纽带的传统文化中，浪漫之爱不被人看重（Simmons, Vom Kolke, & Shimizu, 1986）。

基于这样的证据，早期的跨文化研究者（Goode, 1959；Rosenblatt, 1967）提出浪漫之爱仅仅在现代化、工业化国家才比较普遍。然而，证据显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城市和乡村、富有和贫困）都和美国人一样浪漫。

例如，斯普瑞彻及其同事（Sprecher et al., 1994）在一项研究中访谈了来自美国、俄罗斯与日本的1667名男性和女性。他们发现在这三类社会中，大多数的年轻人“正在相恋”。他们预测美国的男性和女性最容易相恋，日本人最不容易相恋。实际上，59%的美国大学生、67%的俄罗斯学生和53%的日本学生说他们在接受访谈期间正在恋爱。在这三种文化中，访谈期间处于恋爱状态的男性略少于女性。然而，没有证据显示个体主义文化会比集体主义文化导致更多的人恋爱。

关于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华裔美国学生、欧裔美国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不同跨文化群体中，年轻男性和女性在“相恋中”的比例较高（Aron & Rodriguez, 1992；Doherty et al., 1994）。

文化和激情之爱体验的强度

文化会如何影响两性浪漫之爱的热烈程度？在哈特菲尔德和拉普森（Hatfield & Rapson, 1996）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要求欧洲人、菲律宾人与日本人完成激情之爱量表。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发现来自不同种族的群体对爱情具有同等程度的激情体验。

多尔蒂及其同事（Doherty et al., 1994）调查了欧洲裔美国人、华裔美国

人、菲律宾裔美国人、日本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居民，也得出了与上面类似的结果。

男性和女性对浪漫伴侣的渴望

自从达尔文（Darwin, 1871）的经典著作《人类起源与性选择》问世以来，进化论生物学家开始关注个体择偶偏好的问题。许多进化论心理学家主张，男性和女性对配偶的欲望具有文化普遍性。

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文化研究中，巴斯（Buss, 1989）要求来自37个国家的10,000多名男性与女性说明他们在选择潜在配偶时会注重对方的哪些特征。这些调查访谈的对象来自不同的地区、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政治、宗教信仰，说不同的语言，经济状况也不同。

研究者要求被试考虑18种人格特质，并对这些特质在择偶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行等级评定。总体来说，巴斯及其同事发现各个社会群体的人们在择偶时最注重一个特质就是“相互吸引的爱”。其次，男性和女性都比较在意对方的可靠性、情感稳定性、成熟以及令人愉悦的气质。

尽管巴斯认为爱情具有文化普遍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文化对于择偶偏好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国台湾的年轻人会坚持认为他们的伴侣应该是“贞洁的”。但是，对于芬兰、法国、挪威、荷兰、瑞典和西德的大多数年轻人而言，贞洁并不那么重要（一些被试甚至在问卷的空白处匆匆写下观点，认为贞洁是一种处境不良）。

在对巴斯（1989）的数据所做的分析中，沃尔恩（Wallen, 1989）试图确定文化或性别对个体择偶偏好有更大的影响。结果他发现，对于有些特质，如娇好的容貌、经济前景，性别会对择偶偏好有较大的影响（性别能解释差异的40%~45%，地域因素只能解释差异的8%~17%）。对于另一些特性，如贞洁、抱负心、年龄，文化的影响更大（性别仅能解释差异的5%~16%，地域因素

能解释差异的 38%~59%)。沃尔恩由此得出结论，通常文化比个体进化遗传对择偶的理解影响更大。

文化研究者提出更进一步的证据，认为不同文化、国家、种族的人们常常对浪漫的、性爱的或婚姻的伴侣怀有不同的期望。

哈特菲尔德和斯普瑞彻 (Hatfield & Sprecher, 1996) 研究了三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国家：美国、俄罗斯和日本。西方个体主义文化 (像美国、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中的男性和女性期望从婚姻中获得的东西远比集体主义文化 (如日本) 中的夫妻更多。研究者还发现，文化观念对男性和女性对其配偶的欲望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文化和与你不爱的人结婚的意愿

在西方，爱情是婚姻的必要条件 (Kelley, 1983; Sprecher, Aron, Hatfield, Cortese, Potapova, & Levitskaya, 1994)。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克哈特 (Kephart, 1967) 要求 1000 多名大学生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男孩 (女孩) 具备了你所期望的所有其他品质，即使你不爱他 (她)，你会和他 (她) 结婚吗？”在那个年代，男性和女性对浪漫之爱在婚姻中的重要性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男性认为爱情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 35% 的男性说他们会与不爱的人结婚)。女性则表现得比较实际。她们声称，没有爱情并不会妨碍她们考虑婚姻 (76% 的女性承认她们愿意与不爱的人结婚)。克哈特指出，男性为爱情而结婚，而女性则不是这样的。女性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她的丈夫，因此，她们必须更实际，多方面考虑未婚夫的家庭背景、职业状况和收入情况。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从未中止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开始要求婚姻有更多的爱情。

最近的研究显示，对于“是否会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这一问题，86% 的美国男性和 91% 的美国女性异口同声地回答“不” (Allgeier & Wiederman,

1991)。

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指出,文化观念会深刻地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因爱结合的婚姻和包办婚姻。在全球范围内,包办婚姻仍然十分普遍。在中国、印度以及日本,包办婚姻相当典型;与包办婚姻罕见的西方相比,在东方,人们赋予包办婚姻更多的积极意义。

为了检验这一观点,斯普瑞彻及其同事(Sprecher et al., 1994)调查了美国学生、俄罗斯学生和日本学生:“如果一个人具有你所期望的所有其他品质,那么即使你们不相爱,你也会和他/她结婚吗?”研究者推测,只有美国学生会要求有爱情的婚姻,他们预测俄罗斯和日本的学生会更实际。但是,研究者错了!美国人和日本人都很浪漫。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会考虑与不爱的人结婚。俄罗斯人则更实际。俄罗斯男性只比美国和日本男性的实际程度高一点。只有俄罗斯女性最实际,她们最可能接受与不爱的人结婚。

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莱文及其同事(Levine et al., 1995)调查了来自11个国家与地区的大学生,问他们是否会与不爱的人结婚,即使这个人拥有他们所期望的其他各种品质。在经济富裕的西方国家,年轻人坚持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先决条件。(在美国、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和英国,只有少数年轻人承认他们会接受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在经济富裕的东方国家中,大学生也倾向于赞成为了爱而结婚(来自日本与中国香港的伴侣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先决条件)。仅有很少来自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可以接受的(在菲律宾、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相当高比例的大学生说他们会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当然,在这些国家中,大家庭形式仍然十分重要,贫穷仍然普遍存在。

如今的研究显示,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将爱情视做是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先决条件。仅仅在东方某些比较落后的集体主义国家中,激情之爱仍是遥不可及的。

小结

以往研究发现在西方的、现代化、城市的、工业化的国家与东方的、现代化、城市的、工业化的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正在迅速消失。那些关于跨文化差异感兴趣的研究者不得不从那些最不发达的发展中的集体主义国家中寻找差异——如非洲、拉丁美洲、中国或阿拉伯国家（埃及、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然而，即便在这些国家，西化、个体主义以及社会变革之风正在兴起。尽管会受到长辈的指责，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年轻人正越来越接受“西方”的模式，即看重恋爱，倡导在爱情与性上性别平等，坚持因为爱情而结婚（相对于包办婚姻而言）。文献证明，在芬兰、爱沙尼亚、俄罗斯（Haavio-Mannila & Kontula, 2003），以及澳大利亚红树林的土著居民，还有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Jankowiak, 1995, 关于此研究的全面综述）中都能发现上述变化。

自然，文化差异仍然会对年轻人的态度、情绪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这些差异也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例如，在墨西哥，婚姻曾经是家族之间的联盟（在18世纪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非常盛行联姻），这些家族的孩子对婚姻很少或根本没有发言权。今天，尽管父母不再简单地指定他们的孩子应该与谁结婚，但是，父母的认可仍然十分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年轻人对他们的婚姻至少有发言权（见 Davis & Davis, 1995）。

今天，两股力量（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正在相互竞争，影响着人们的心灵。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全世界的公民可能趋向一致，但实际上，这种令人愉快和分裂性的文化变异，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既有趣，同时又带有危险，就像在酝酿已久的一场令人陶醉的爱情和性行为中加入调味品一样。全世界文化的融合使爱情体验和表达方式的差异日益减少，但是，传统的力量仍是非常顽强的，我们还无法对激情之爱全球化的未来进行预测。

性厌恶的演化：亲属检测与厌恶情绪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影响个体选择性伴侣的因素包括熟悉性、相似性和邻近性（例如，Berscheid & Walster, 1978）。然而，哪些人最符合这些条件呢？家庭成员！他们是熟悉的——在整个生活中，你了解他们。他们是相似的——你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化以及相似的外貌特征，比一般人有更多相同基因的可能性。最后，他们距离近，具有易得性——甚至可能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然而，对于核心家庭成员来说，他们却最不可能成为合适的性伴侣。

这是为什么？直观来看，答案就是与家庭成员的性接触是违反道德的、令人厌恶的。但是，为什么在各种文化中大多数人都把与亲密的家庭成员发生性行为看做是令人厌恶的，而不是令人兴奋和充满性爱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人类发展的进化史。纵观人类的进化史，重复的选择压力（如病原体和有毒的隐性基因）导致人类不断进化，产生了避免个体与近亲发生性关系的心理机制，并使这种心理机制得以保持延续。这样的近交规避系统（an inbreeding avoidance system）要求至少有两个部分组成：（1）系统能评估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个体是近亲的可能性（亲属检测系统）；（2）系统将这些经过计算评估的亲属关系输入其中，然后相应地调整择偶动机，或寻求或回避将一个个体作为性伴侣。

然而，对于人类使用信息，检测亲属的机能实质，我们还不了解。除此之外，关于情绪系统激发、调控性交回避，我们也没有探讨清楚。在这一节，我们将讨论支配对近亲产生性厌恶的心理机制。首先，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的选择压力理论，即选择压力使人类进化产生近交回避机制。其次，来自近交的人类和动物的证据表明，与带相近基因的个体发生性关系实际上是有害的。由此引出了对调节亲属检测的认知系统的讨论。尤其对支配特殊亲属、同胞检测的线索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人种学的研究探讨了这些线索能否调节没有血缘关系但被当做同胞抚养的个体之间性厌恶的发展。最后，研究者假定厌恶情绪是

受到亲属检测系统控制的认知程序，引发个体的性交回避。尽管性厌恶是性欲的对立面，常被忽视，但它是人类交配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选择压力和近交回避系统的进化

关于使个体避免近交的心理机制的存在有其合理的生物学原因。纵观人类种族的进化史，由有毒的隐性突变（Bittles & Neel, 1994）和近代之间携带的病原体（Tooby, 1982）所造成的选择压力，对那些近亲结婚的后代的身体健康和生存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那些避免近交而选择将没有共同的直系祖辈的人作为伴侣的人，他们成功繁衍的可能性更大。因而，这两种选择压力的存在导致系统的进化和维持，在一生中通常会遇到相近基因的物种中，这种系统会降低近交的可能性。

近交退化的影响

人们已经认识到在许多非人类物种中，近交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消极结果（Charlesworth & Charlesworth, 1999; Husband & Schemske, 1996; Keller, Arcese, James, & Hochachaka, 1994; Crnokrak & Roff, 1999）。一般而言，父母近亲结婚，如同胞兄妹，就可能生出数量更少、存活能力低的后代。这些对健康的损害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个体对致病有机体的易感性更高，因而增加了死亡率（如 Jimenez, Hughes, Alaks, Graham, & Lact, 1994; Acevedo Whitehouse, Gulland, Greig, & Amos, 2003）、认知功能受损（如 Deckard, Wilson, & Schlesinger, 1989）、缺乏性吸引力（Hoglund, Piertney, Alatalo, Lindell, Lundberg, & Rintamaki, 2002）。

人口学研究已经证实了近亲结婚会损害健康的消极结果（Schull & Neel, 1965; Adams & Neel, 1967; C. O. Carter, 1967; Seemanova, 1971; Bittles & Neel, 1994）。近亲生育会导致有毒隐性基因传递的可能性增加，因而产生更多的先天畸形儿和更高的新生儿死亡率（Bittles, Mason, Greene, & Rao, 1991）。许

多人类的研究集中于第一代堂（表）兄妹夫妻的后代，因为这种堂（表）兄妹配偶方式在许多文化中普遍存在（Bittles, 2005）。尽管人们推测第一代堂（表）兄妹的后代产生近亲退化后果的严重程度远远小于亲属相关为 0.5（父母、子孙和同胞）夫妻的后代，但在各类人口统计中仍有各种关于畸形和缺陷的报告（Stoltenberg, Magnus, Lie, Daltveit, & Irgens, 1997; Demirel, Katlanoglu, Acar, Bodur, & Paydak, 1997; Jaber, Merlob, Bu, Rotter, & Shohat, 1992; Zlotogora, 2002）。

除死亡率、先天畸形和患病可能性不断增加之外，第一代堂（表）兄妹的孩子还表现出认知性损伤。在两项早期研究中，科恩、布拉克、弗拉曼、卡达尔和戈德史密斯（Cohen, Bloc, Flum, Kadar, & Goldschmidt, 1963）和斯卡尔、尼尔（Schull & Neel, 1965）都发现，第一代结为夫妻的堂（表）兄妹其后代智商低于无亲属关系夫妻所生育的孩子。但是，无论怎样，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一些重要的变量，如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Bashi, 1977）。巴世在一项对阿拉伯人口群体的研究中控制了“父母社会经济状况”这一变量以及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他发现无血缘关系夫妻所生育的孩子，其智力（如瑞文智力测验 Raven, 1960）和学业测试成绩（如对科学、数学、语言等科目的测试）都好于第一代堂兄妹夫妻的孩子。

关于同胞之间近亲生育结果的研究发现，这类夫妻的后代与第一代堂（表）兄妹的后代相比，婴儿死亡率和发病率更高（Bittles, 2005）。与第一代堂兄妹后代产生近亲退化的比率为 2%~6%（与人口基线相比），夫妻为兄妹关系所导致的近亲退化比率可能高达 45%（Seemanova, 1971; Ralls, Ballou, & Templeton, 1988; Aoki & Feldman, 1997）。此外，由于研究没有获取关于自然流产的资料，因此人们可能明显低估了近亲结婚的影响（Bittles et al., 1991）。还有少数一些关于同胞兄妹之间所生育的后代健康问题的文献研究。但是，所有研究均发现，孩子的死亡率、心理缺陷、先天性畸形和患病的危险性都很高（Schull & Neel, 1965; Adams & Neel, 1967; C. O. Carter, 1967; Seemanova, 1971）。

乱伦回避机制的组成成分

由于近交会产生这些不良后果，自然选择会偏向那些不予近交的个体。不管怎样，要解决近交规避这一适应性问题，就需要有两个不同的系统发挥作用：（1）系统要能识别出极有可能拥有相近基因的那些个体（例如，兄弟姐妹、父母或后代）——简而言之，就是亲属检测；（2）系统要能依据对对方带有相近基因可能性的估计，调控性交吸引或性交回避。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两部分功能，并考虑大脑如何使用线索检测一类特殊的近亲关系：同胞兄弟姐妹。

亲属检测系统

具体地说，那些能区分出个体是近亲的信息的实质是什么？亲属检测系统可以将许多可能的线索输入系统。对于亲属关系而言，它有一个潜在的信息来源，即语言和文化（例如，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被告知某人是近亲，你将会对他或她产生何种感觉）。然而，这引发了几个问题。首先，人们使用亲属的词语可能超出遗传关系的界限，这会使拥有相近基因亲属类型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也会使亲属与非亲属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例如，在美国，“兄弟”可以用来指同胞兄弟、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继父或继母的儿子，被收养的男孩；在某些文化中“兄弟”指代堂兄、表兄或盟友。其次，由于亲属关系的不对称性，关于在何时帮助谁，个体可能不能享有共同“利益”（Trivers, 1974）。例如，一个孩子帮助亲兄弟（亲属相关度为0.5）与他帮助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亲属相关度为0.25）相比，在所有其他事情平等的情况下，他会从前者获得更多益处（根据整体适应度）。然而，女性通常对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而不管其父亲是谁。例如，母亲可能会说“帮帮你的姐姐（妹妹）”来鼓励每个孩子，她不会对同胞姐妹和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姐妹做出语言的区分。因此，描述亲属关系的词语可能会忽视或模糊基因之间的区分，以这样的词语作为提示亲属关系的线索不太可靠（见 Jones, 2004）。最后，

亲属检测系统存在于许多其他的动物种系中（Hepper, 1991；Hepper & Cleland, 1999），其发展进化早于语言和文化。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近期的这些发现可以消除或替代那些演化而来的古老机能。

如果单独的语言和文化输入不能提供稳定可靠的解决办法，还有什么可以做到呢？因为我们不能直接“看见”另外一个人的基因，那么最佳的自然选择能做的是形成机制，以利用祖先过去基因相关性的可靠线索来估算内部相关指数。不同的线索与特殊类型的近亲个体（例如，妈妈、爸爸、子女、兄弟姐妹）可靠的相关程度不一，因而存在不同的检测机制。例如，由于女性总要生育孩子，她能根据生产过程或通过视觉和嗅觉线索来准确辨别孩子是否是亲生的（如Porter, Matochik, & Makin, 1983, 1984）。然而，由于男性仅靠观看配偶生产孩子的过程，并不能确定其是否是自己的后代，因此男性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他们的父亲身份。另外，对于男性而言，关于父子身份的评估可能要通过妻子对自己的性忠诚度这一线索。因此，可能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亲属检测机制，以依据同样的一套信息对各种类型的亲属关系进行检测。但是，亲属选择的好处在于它能促进个体拥有特殊的检测系统，这种检测系统可以将带有某种特殊亲属关系的人锁定在较小的范围内。下面的讨论将关注人类认知结构如何使用线索检测一类特殊类型的亲属——同胞兄弟姐妹。

同胞检测线索：维斯特马克假设

纵观人类的进化史，由于母乳喂养的营养需求以及安全的需要，在童年早期由同一母亲所生育的孩子更可能被放在一起养育。同时，当狩猎—采集式的家族群分裂为一些小单元的时候（由于群体太大或是困难时期），核心家庭（包含同胞兄弟姐妹）会选择留在一起成为一个小单元（Lee & DeVore, 1968；Chagnon, 1992）。这意味着在我们祖先所处的环境中，他们童年时会有长期的亲密联系，这种童年早期经历会提供关于个体关系的宝贵信息。芬兰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维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 1891）最早提出，童年早期的联系对于评估亲属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在同胞之间缺乏性交吸引，维斯

特马克提出假设，童年早期同胞的亲近接触导致成年期发展出彼此之间的性厌恶。这就是著名的维斯特马克假设（WH）。

许多研究者检验了WH假设（见Shepher, 1971, 1983; Wolf, 1995; Williams & Finkelhor, 1995; Bevc & Silverman, 1993, 2000; Lieberman, Tooby, & Cosmides, 2003; Fessler & Navarrete, 2004）。其中一些研究检验了WH理论是否适用于没有相近基因而被收养作为同胞的兄弟姐妹中。这些研究已经成为近交规避文献中的著名研究，也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维斯特马克假设的实证性检验：人种学的测量

两个著名的人类学研究利用了文化习俗无意创造的“自然实验”。在这里，没有相近基因的孩子从其童年期就在十分邻近的物理环境中被抚养长大。第一项研究集中于以色列集体农场里的同龄群体（Spiro, 1958; Talmon, 1964; Shepher, 1971, 1983）。第二项研究是由阿瑟斯·沃尔夫及其同事共同完成的一系列广泛的调查，他们考察了在中国台湾一些自幼就被她们未来丈夫的家庭所收养的女孩（童养媳婚姻；Wolf, 1995）。这两项“自然实验”为维斯特马克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清楚地显示出线索调控同胞识别的实质。

以色列集体农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自然实验室，可以让研究者考察共同居住对性厌恶发展的作用。根据谢泼（Shepher, 1983）的研究，出生在以色列集体农场的孩子养育在同一个同伴群体之中，这个群体一般由6到8个孩子组成，他们的年龄差距在2岁之内。由于同胞兄弟姐妹被放在一起抚养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同胞的出生间隔通常在两年以上），因而在这些同伴群体中，孩子之间没有亲属关系。小组中大部分的日常活动，如上学、吃饭、洗澡、上厕所、玩耍和睡觉，都是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完成的。一位妇女会和孩子们睡在同一间屋里，她可能是这个同伴群体中某一个孩子的妈妈，但也可能不是。如此的养育环境使这些没有亲属关系的个体之间有非常亲密的身体接触，因此，研究者可以探讨这种安排对性交吸引的影响作用。维斯特马克的假设预测，个体如果在

有亲密身体接触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将会在成年期形成彼此之间的性厌恶。

三位富有开拓精神的社会学家斯皮罗（Spiro, 1958）、塔尔蒙（Talmon, 1964）和谢泼（Shepher, 1971, 1983）研究了同伴群体成员之间缺乏性吸引力和较少选择对方结婚的情况。斯皮罗（1958）在对一个以色列集体农场居民婚姻状况的调查时发现，在一个同伴群体的成员到成年时不会结为夫妻，彼此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性行为。塔尔蒙（1964）在对以色列三个居民区中125对已婚夫妻进行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她发现从小就在同一个同伴群体生活的人，在其长大后没有结婚或发生性行为的情况。

谢泼（1971, 1983）完成的调查可能是最全面的。他调查了在一个以色列集体农场生活的所有第二代成年人的性行为和婚姻模式（N=65），随后调查了211个以色列集体农场中所有第二代居民的婚姻状况。他在前面一项的调查中发现，童年早期生活在同一个同伴群体中的人，在其长大成人后，彼此之间没有发生性行为和结婚的情况。在后面的调查中，211个社区中共有2769对夫妇，其中仅有14对是小时候在同伴群体中一起长大的。谢泼进一步考察这一结果，他又发现这14对夫妇中没有一对是在6岁以前被放在一起连续抚养长大的。谢泼推论，在童年期，尤其是在6岁以前，孩子们如果一直在一起生活，持续暴露，这对性厌恶的发展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种性厌恶会在他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显现出来（Shepher, 1983）。尽管没有法律禁令或宗教禁忌反对在同伴群体中一起长大的人结为夫妻，但大部分人们并没有这样做。实际上，大多数父母还是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和幼年时的伙伴结婚（Shepher, 1971）。

在第二项自然实验情境中，人们通过对中国台湾“童养媳”的文化习俗的研究，检验了维斯特马克提出的假设。19世纪晚期，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中国台湾，期间他们编制了缜密细致的人口记录，内容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出生率、死亡率、结婚和离婚状况以及收养子女情况。资料还记录了当时的婚姻类型。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台湾，共有三种类型的婚姻：婚后居住在男方家（主要类型），婚后居住在女方家与童养媳。主要的婚姻模式是婚后新娘要去丈夫家

生活，第二种模式与之相反，婚后新郎要去新娘家生活。在这两类婚姻中，孩子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新郎、新娘在结婚当天才第一次相见。在童养媳婚姻中，童养媳（小新娘）的年龄通常在几个月到三岁之间，她们被一个家庭收养，目的是长大以后给这家的男孩作媳妇。

人类学家阿瑟斯·沃尔夫（Arthur Wolf）及其同事花了40年时间收集并分析数据，想要确定那些妻子与丈夫在童年期就生活在一起的婚姻，与那些结婚时才第一次见面并生活在一起的婚姻是否存在不同（见 Wolf, 1995）。沃尔夫推论，如果长时间共同居住会影响性交吸引，就如维斯特马克假设所预测的那样，若丈夫和妻子从童年早期就一起生活，将会减少彼此之间的性吸引力，这可以通过生殖率、离婚率、婚外恋比率测量得出。进而，沃尔夫提出假设，认为丈夫家收养的小新娘年龄越小，那么对今后的夫妻感情可能产生的影响越大。

沃尔夫调查了20000多对夫妻，发现童养媳婚姻的女性出现私通的数量是其他两类婚姻的两倍。此外，童养媳婚姻的离婚率是其他两类婚姻的三倍，生育率比其他两类婚姻低40%。沃尔夫调查了女孩被丈夫家收养时的年龄，他发现如果女孩是在3岁以前被收养，那么离婚率、婚外恋都比较高，而生育率更低一些。如果女孩3岁以后被收养，那么生育率、离婚率与婚外恋比率则可能与主要婚姻模式中的女性相似。沃尔夫根据这些数据得出结论，个体若在3岁以前和未来的配偶毫无遮掩地一起生活，会产生彼此间的性厌恶。

这些跨文化研究为维斯特马克假设提供了支持证据，研究认为如果没有亲属关系的个体在童年早期一起养育，那么会发展出彼此之间的性厌恶。上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同时也带来许多疑问：长时间在一起生活，是否可以调控有亲属关系的个体性厌恶的发展？对于长期共同生活的时期，是否存在的特殊时间范围能够激活个体的性厌恶感？长时间的共同生活是个体认知结构中辨别同胞的唯一线索吗？或者个体还使用其他线索（例如，面孔相似性，与主要相容性复合体相关的蛋白质分解作用而获得的线索，一种能够标志基因相

关性的免疫系统的成分；见 Penn & Potts, 1999）？共同生活时间是识别年长与年幼同胞的线索吗？毕竟，年长的同胞可以直接接触标志亲属关系的强有力的线索，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看到母亲怀孕，照顾（如母乳喂养）新生儿，这些都是识别亲属关系的线索（见 Lieberman et al., 2003；Lieberman et al., 审稿中）。最后，共同居住或其他线索能够调控同胞的检测，能够预测评估同胞之间性厌恶的心理测量吗？就像谢泼和沃尔夫使用的社会学测量一样。最后这个问题依赖于调节性厌恶的认知程序，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讨论的话题。

支配性厌恶的认知程序：厌恶情绪

个体认知系统除了可以从社会环境中获取线索，评估亲属关系（即亲属检测）以外，认知系统还能调节性交吸引和性交回避，达到避免近交的目的。性交回避机制是亲属关系评估机能的扩大（Lieberman et al., 2003）。例如，当评估显示亲属关系亲近时（即有线索显示个体具有可能较近的亲属关系），激发性交吸引的系统会活动减弱，激发性交回避的系统会活动加强。亲属关系估计越亲近，调控性交回避的程序激活得越强烈。然而，问题是何种程序控制性厌恶呢？

原则上，多种程序能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可能是在个体很可能与有亲属关系的对象发生性关系时，系统会使个体退出这一情境。与个体积极监控他人内心欲望、避免发生乱伦（生殖代价很高）相比，个体仅仅因为对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而表现出对性交不感兴趣，并不能有效避免事情的发生。由于存在近交的矛盾，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可能会主动与有亲属关系的女性发生性关系（Tooby, 1977；Haig, 1999）。

在古代，人们可能在其生命中遇到与自己近亲的异性。如果彼此间不存在性厌恶感，那么将会有大量的近亲间发生性关系的机会。这种不断发生的情境被心理程序选择，即当线索指示与近交欲望存在时，程序就会引发一个恰当的反应。一个已经存在的使个体从潜在的近交情境中撤退的认知体系是厌恶情

绪 (Lieberman, 2003)。从进化的观点看, 情绪是对进化的复发情境的一种协调反应, 这是一套特殊的认知和生理的机制 (Tooby & Cosmides, 1990, 2000; Rosenberg & Ekman, 1994)。作为一种重复情境, 亲密家庭成员发生性关系的统计可能性使厌恶情绪成为解决此类适应性问题的方法。

厌恶最初的作用是回避各种有害物质, 人们对此提出许多假设 (见 Rozin & Fallon, 1987; Ekman & Davidson, 1994; Izard, 1993)。更具体地说, 厌恶开始逐渐演变为禁止摄取有毒物质和接触致病物质 (例如, 粪便、死尸、腐败变质的食物; Curtis & Biran, 2001)。能让人躲避有害物质 (如病原体) 的厌恶情绪是人类进化的选择, 它能促使个体不与近亲关系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厌恶引发回避的特性意味着它可以阻止家族近亲成员的主动诱惑。而且, 当具有近亲关系的异性魅力十足, 并具有传送到性吸引系统的一些特质 (包括可接近性) 时, 厌恶能够抵消由此产生的性欲望。

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厌恶情绪可以发挥这样的新功能。例如, 由于厌恶具有对病原体回避的功能, 因此, 厌恶与性之间的联系或许原本就存在。厌恶可以阻止个体接触其他人的体液, 因为这些体液中可能含有有害的外来病原体。无论如何, 回避系统会抑制性接触的发生 (Angyal, 1941)。然而, 如果当个体与特定对象有性接触时, 回避系统激活的阈值降低 (反之则升高), 那么回避系统就成为性交回避机制, 从而很好地发挥作用。

小结

这一章所提到的人类近交规避系统模式提供了一个实征性的结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显示人们之间存在基因相近的假定信息可以得到检验。人们对于某个特殊个体产生性厌恶还是性交吸引, 可能是由社会环境中祖辈相关线索决定的。因而, 以往检测个体在每类相近基因数量上匹配的情况, 以避免乱伦的情况发生, 这类方式也可以转变为检测个体之间存在血亲关系线索的真伪来实现最佳的功能。近年来, 许多研究者采取了这种方法, 对人脑使用线索

检测个体是否为同胞的本质进行研究(例如 DeBruine, 2002; Lieberman, 2003; Lieberman et al., 2003; Fessler & Navarrete, 2004)。

在理解人类性交吸引如何产生之外,同时理解人类性厌恶的演变,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的择偶过程。关于支配择偶心理的各个系统的进化论分析以及择偶偏好和择偶行为的跨文化分析,有助于勾勒出人类择偶心理的认知结构。

(李旭珊 初译)

参考文献

- Acevedo-Whitehouse, K., Gulland, F., Greig, D., and Amos, W. (2003). Disease susceptibility in California sea lions. *Nature*, 422, 35.
- Adams, M. S., and Neel, J. V. (1967). Children of incest. *Pediatrics*, 40, 55.
- Allgeier, E. R., and Wiederman, M. W. (1991). Love and mate selection in the 1990s. *Free Inquiry*, 11, 25-27.
- Angyal, A. (1941). Disgust and related avers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393-412.
- Aoki, K., and Feldman, M. W. (1997). A gene-culture coevolutionary model for brother-sister mat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4, 13046-13050.
- Aron, A., and Rodriguez, G. (July 25, 1992). Scenarios of falling in love among Mexican-, Chinese-, and Anglo-America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rono, Me.
- Bartels, A., and Zeki, S. (2000). The neural basis of romantic love. *Neuroreport*, 11(17): 3829-3834.
- Bashi, J. (1977). Effects of inbreeding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Nature*, 266, 440-442.
- Berscheid, E., and Walster, E. (1978).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2nd e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Bevc, I., and Silverman, I. (1993). Early proximity and intimacy between siblings and incestuous behavior: A test of the Westermarck theory.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4, 171-181.
- . (2000). Early separation and sibling incest: A test of the revised Westermarck theor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1, 151-161.
- Bittles, A. H. (2005). Genetic aspects of inbreeding and incest. In A. P. Wolf and W. H. Durham (eds.), *Inbreeding, Incest, and the Incest Taboo*, pp. 38-6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ttles, A. H., Mason, W. M., Greene, J., and Rao, A. (1991). Reproductive behavior and health in consanguineous marriages. *Science*, 252, 789-794.
- Bittles, A. H., and Neel, J. V. (1994). The costs of human inbreed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variation at the DNA level. *Nature Genetics*, 8, 117-121.
- Buss, D. M. (1989).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mate preferences: Evolutionary hypotheses tests in 37 cultur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 1-49.
- . (2003). *The Evolution of Desire*, rev.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rter, C. O. (1967). Risk of offspring of incest. *Lancet*, 1, 436.
- Carter, C. S. (1998). Neuroendocrin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attachment and love.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3, 779-818.
- Chagnon, N. A. (1992). *Yanomamo: The Last Days of Ede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harlesworth, B., and Charlesworth, D. (1999). The genetic basis of inbreeding depression. *Genetical Research*, 74, 329-340.
- Cohen, T., Block, N., Flum, Y., Kadar, M., and Goldschmidt, E. (1963). School attainments in an immigrant village. In E. Goldschmidt (ed.), *The Genetics of Migrant and Isolated Populations*. New York: Williams and Wilkins.
- Crnokrak, P., and Roff, D. A. (1999). Inbreeding depression in the wild. *Heredity*, 83, 260-270.
- Curtis, V., and Biran, A. (2001). Dirt, disgust, and disease: Is hygiene in our genes?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44, 17-31.
- Darwin, C. (1871/2004).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new ed. London: Penguin Books.
- Davis, D. A., and Davis, S. S. (1995). Possessed by love: Gender and romance in Morocco. In W. Jankowiak (ed.), *Romantic Passi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 pp. 219-23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Bruine, L. M. (2002). Facial resemblance enhances trus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269, 1307-1312.
- Deckard, B. S., Wilson, J. R., and Schlessinger, K. (1989). Behavioral and reproductive differences in mice as a function of inbreeding. *Behavior Genetics*, 19, 433-445.
- Demirel, S., Katlanoglu, N., Acar, A., Bodur, S., and Paydak, F. (1997). The frequency of consanguinity in Konya, Turkey, and its medical effects. *Genetic Counseling*, 8, 295-301.
- Doherty, R. W., Hatfield, E., Thompson, K., and Choo, P. (1994). Cultural and ethnic influences on love and attachmen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91-398.
- Ekman, P., and Davidson, R. J. (1994). *The Nature of Emotion: Fundamental Ques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ssler, D. M. T., and Navarrete, C. D. (2004). Third-party attitudes toward sibling incest: Evidence for Westermarck's hypothesi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5, 277-294.
- Fisher, H. (July 16, 2003). The brain chemistry of romantic attraction and its positive effect on sexual motiv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ex Research annual meeting, Bloomington, Ind.
- Fisher, H., Aron, A., Mashek, D., Strong, G., Li, H., and Brown, L. L. (November 2004). Early stage intense romantic love activates cortical-basal-ganglia reward/mo-

- tivation, emotion and attention systems: An fMRI study of a dynamic network that varies with relationship length, passion intensity and gen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annual meeting, San Diego, Calif.
- Goode, W. J. (1959). The theoretical importance of lo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38-47.
- Haavio-Mannila, E., and Kontula, O. (2003). Single and double sexual standards in Finland, Estonia, and St. Petersburg.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0, 36-49.
- Haig, D. (1999). Asymmetric relations: Internal conflicts and the horror of incest.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 83-98.
- Hatfield, E., and Rapson, R. L. (1993). *Love, Sex, and Intimacy: Their Psychology, Biology, an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 (1996). *Love and Sex: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Hatfield, E., and Sprecher, S. (1986). Measuring passionate love in intimate relation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 383-410.
- . (1996). Men's and women's mate pre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Jap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6, 728-750.
- Hepper, P. G. (1991). *Kin Re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pper, P. G., and Cleland, J. (1999). Developmental aspects of kin recognition. *Genetica*, 104, 199-205.
- Hoglund, J., Piertney, S. B., Alatalo, R.V., Lindell, J., Lundberg, A., and Rintamaki, P. T. (2002). Inbreeding depression and male fitness in black grous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269(1492): 711-715.
- Hsu, F. L. K. (1953).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 (1971).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and jen: 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3, 23-44.
- . (1985). 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 J. Marsella, G. DeVos, and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pp. 24-55. London: Tavistock.
- Husband, B. C., and Schemske, D. W. (1996). Evolution of the magnitude and timing of inbreeding depression in plants. *Evolution*, 50, 54-70.
- Izard, C. E. (1993). Organizational and motivational functions of discrete emotions. In M. Lewis and J. M. Haviland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631-665.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Jaber, L., Merlob, P., Bu, X., Rotter, J. I., and Shohat, M. (1992). Marked parental consanguinity as a cause for increased major malformations in an Israeli Arab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44, 1-6.
- Jankowiak, W. (ed.). (1995). *Romantic Passi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ankowiak, W. R., and Fischer, E. F.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ology*, 31, 149-155.
- Jimenez, J. A., Hughes, K. A., Alaks, G., Graham, L., and Lact, R. C. (1994).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breeding depression in a natural habitat. *Science*, 266, 271-273.

- Jones, D. (2004). The universal psychology of kinship: Evidence from languag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211-215.
- Keller, L. F., Arcese, P. S., James N. M., and Hochachka, W. M. (1994). Selection against inbred song sparrows during a natural population bottleneck. *Nature*, 372, 356-357.
- Kelley, H. H. (1983). Love and commitment. In H. H. Kelley, E. Berscheid, A. Christensen, J. H. Harvey, T. L. Huston, G. Levinger, E. McClintock, L. A. Peplau, and D. R. Peterson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65-314. New York: W. H. Freeman.
- Kephart, W. M. (1967). Some correlates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9, 470-479.
- Komisaruk, B. R., and Whipple, B. (1998). Love as sensory stimulation: Phys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its deprivation and expression.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8, 927-944.
- Landis, D., and O'Shea, W. A. O., III. (2000).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passionate love: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analy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 754-779.
- Lee, R. B., and DeVore, I. (eds.). (1968).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 Levine, R., Sato, S., Hashimoto, T., and Verma, J. (1995). Love and marriage in eleven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6, 554-571.
- Lieberman, D. (2003). Mapping the cognitive architecture of systems for kin detection and inbreeding avoidance: The Westermarck hypothe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xual aversions between siblings. UMI Digital Dissertation, AAT 3103441.
- Lieberman, D., Tooby, J., and Cosmides, L. (2003). Does morality have a biological basi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factors governing moral sentiments relating to inces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270, 819-826.
- . (under review).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 kin detection: siblings, altruism and incest.
- Marazziti, D., Akiskal, H. S., Rossi, A., and Cassano, G. B. (1999). Alteration of the platelet serotonin transporter in romantic lov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9(3): 741-745.
- Marazziti, D., and Canale, D. (2004). Hormonal changes when falling in love.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9(7): 931-936.
- Nisbett, R.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 Penn, D. J., and Potts, W. K. (1999). The evolution of mating preferences and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genes.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53, 145-164.
- Porter, R. H., Matochik, J. A., and Makin, J. W. (1983). Evidence for phenotype matching in spiny mice (*Acomys cahirinus*). *Animal Behavior*, 31, 978-984.
- . (1984). The role of familia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eferences in spiny mice. *Behavioral Proceedings*, 9, 241-254.
- Ralls, K., Ballou, J. D., and Templeton, A. (1988). Estimates of lethal equivalents and the cost of inbreeding in mammals. *Conservation Biology*, 2, 185-193.
- Raven, J. C. (1960). *Guide to the 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 London: Lewis.

- Rosenberg, E. L., and Ekman, P. (1994). Coherence between expressive and experiential systems in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8, 201-229.
- Rosenblatt, P. C. (1967). Marital residence and the function of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6, 471-480.
- Rozin, P., and Fallon, A. E. (1987). A perspective on disgust. *Psychological Review*, 94, 23-41.
- Schull, W. J., and Neel, J. V. (1965). *The Effects of Inbreeding on Japanese Children*. New York: Harper & Row.
- Seemanova, E. (1971). A study of children of incestuous matings. *Human Heredity*, 21, 108-128.
- Shaver, P. R., and Murdaya, U. (2001). Structure of the Indonesian emotion lexic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 201-224.
- Shaver, P. R., Wu, S., and Schwartz, J. C. (1991).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emotion and its representation: A prototype approach.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 175-212.
- Shepher, J. (1971). Mate selection among second-generation kibbutz adolescents: Incest avoidance and negative imprinting.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1): 293-307.
- . (1983). *Incest: A Biosocial View*.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immons, C. H., Vom Kolke, A., and Shimizu, H. (1986). Attitudes toward romantic love among American, German, and Japanese student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6, 327-337.
- Soueif, A. (1999). *The Map of Love*. London: Bloomsbury.
- Spiro, M. E. (1958). *Children of the Kibbutz*.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recher, S., Aron, A., Hatfield, E., Cortese, A., Potapova, E., and Levitskaya, A. (1994). Love: American style, Russian style, and Japanese styl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49-369.
- Stoltenberg, C., Magnus, P., Lie, R. T., Daltveit, A. K., and Irgens, L. M. (1997). Birth defects and parental consanguinity in Norway.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45, 439-448.
- Talmon, G. Y. (1964). Mate selection in collective settl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408-491.
- Tooby, J. (1977). Factors governing optimal inbreeding.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Studies*, 77(1): 1-54.
- . (1982). Pathogens, polymorph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97, 557-576.
- Tooby, J., and Cosmides, L. (1990). The past explains the present: Emotional adapt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ancestral environment.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1, 375-424.
- . (2000).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emotions. In M. Lewis and J. M.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2nd ed., pp. 91-115.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Trivers, R. L. (1974).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American Zoology*, 14, 249-264.
- Wallen, K. (1989). Mate selection: Economics and affe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 37-38.

- Westermarck, E. A. (1891/1921).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5th ed. London: Macmillan.
- Williams, L. M., and Finkelhor, D. (1995). Paternal caregiving and incest: Test of a biosocial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5, 101-113.
- Wolf, A. P. (1995). *Sexual Attraction and Childhood Association: A Chinese Brief for Edward Westermarc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lotogora, J. (2002). What is the birth defect risk associated with consanguineous marriages?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109, 70-71.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和爱情心理学

卡伦·K·迪恩 (Karen K. Dion) 肯尼思·L·迪恩 (Kenneth L. Dion)

什么是爱情？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寻找和爱情普遍相关清晰的定义性特征。有关爱情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经常从假定的各种基本过程开始，比如生物学、认知或者进化过程，这些都成为理解爱情这一复杂人类体验的基础。从这个观点看，在这些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情境虽然与爱情相关，但不是中心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考虑社会结构所展现的人际关系模式来理解爱情心理学。由此观点来看，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和进化上的差异有利于关系的构建，反过来对爱情心理学的理解也是很关键的 (K. K. Dion & Dion, 1996b)。因此，另一种询问爱情本质的方式是怎样理解爱情的？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的多重框架的可能性，而每一框架都可能提供一个不同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引导着我们对爱情的思考。

当我们第一次在《爱情心理学》(K. L. Dion & Dion, 1988) 中阐述社会情境与爱情本质的关系时，只有少数社会心理学研究采取文化观点来研究亲密关

系。现在，在亲密关系领域和心理学的许多其他领域，关于文化和相关文化因素对个人内、人际过程的影响，研究兴趣在与日俱增。在我们1988年的章节中，我们曾介绍了在文化架构里对理解爱情心理学很重要的议题，这些引导了我们后来的思考与研究。

我们认为关于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关文化的信念系统，尤其是重要的内群体（如家庭），是对爱情产生不同理解的关键，我们有意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K. L. Dion & Dion, 1998）。我们将在这里探讨的是，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所检验的这种假设的相互关系。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构念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关注焦点（Hofstede, 1980, 2001; Hui, 1988; Hui & Triandis, 1986;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我们已经回顾了这些概念下许多关键性的假设（见 K. K. Dion & Dion, 1993; 1996a）。现在讨论的中心点是，当一个群体（例如家庭）内部个体成员与整个内群体的目标、需要和偏好平衡时，在每一构念下的信念系统强调了具有优先权的等级制问题。此外，每种构念既可以从个人角度，也可从社会角度分析。从个人角度分析时，我们使用“个体主义心理”（psych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心理”（psychological collectivism）；从宏观角度或社会角度分析时，我们使用“社会个体主义”（societal individualism）和“社会集体主义”（societal collectivism）。

个体主义和爱情

我们前面提到从社会角度分析，基于社会科学中不同来源的证据，建立在浪漫之爱基础上的婚姻更有可能在认可个体主义的国家中盛行（与集体主义相比）（K. K. Dion & Dion, 1993）。与假设一致，莱文及其同事（Levine, Sato, Hashimoto, & Verma, 1995）发现，许多西方社会中（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大学生）更强调把“相恋”作为婚姻的前提。通过霍夫斯泰德（Hofstede, 1980）量表对这种构念的评定，莱文及其同事发现，在考察的11个国家中，个体主义构念与认同婚姻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重要性成正相关。这

种相关的部分原因，可从亲密关系（例如婚姻）在成年人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中寻找。如果把浪漫之爱看做是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和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的机会，正如贝拉及其同事（Bellah, Madsen, Sullivan, Swidler, & Tipton, 1985）在分析美国生活中的个体主义所得到的，个体主义和把“相恋”作为婚姻的基础之间的相关是从浪漫之爱这一观点得出的。

有趣的是，一个人可以预测在关键体系（例如家庭）的性质和结构上显著的社会变化，这将在关于亲密关系功能的意识形态改变中反映出来。例如，在中国，“一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家庭结构。成长在这种背景之下的孩子可能会因为独生而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可能因此而产生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将人际关系看做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发现的方式（K. K. Dion & Dion, 1993）。如果这样，他们可能会更加强调“相恋”是婚姻的基础的重要性。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体主义和爱情的关系引起了争议。关于个体主义和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相互冲突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争议反映了人们对“个体主义”这个词的定义有不同的诠释。瓦赫特尔（Wachtel, 1983）指出“个体主义”这个词既强调每个人的独特性和身份的尊贵，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因过分关注个人利益而忽略了较大群体的需要。沃特曼（Waterman, 1981, 1984）提出了选择自由，尊重他人的完善和发挥自我潜能是个体主义的中心特征。因此，个体主义与关系质量可能存在正相关。个体主义应该能够促进发展对伴侣的爱。

但是，其他学者对个体主义或至少个体主义的一种类型作出诠释，即认为个体主义是个人自主和自控能力的极端信念，这一点在桑普森（Sampson）的“自足式个人主义”（self-contained individualism）一词有所体现。由于这种自我构建，人们尽可能做到自我满足，人们认为依赖他人和被他人依赖是情感矛盾的。贝拉及其同事（Bellah et al., 1985）得出了相似的观点，他们在讨论个体主义在公众私人/个人的生活领域中的作用时，注意到个人自由的需要和伴侣的需要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阻碍了亲密关系的发展。在赞同自足式个人主义

的人中，如果考虑到关心、相互依赖，我们预测个体主义心理的形式和对伴侣的爱质量之间成负相关。

自相矛盾的是，同时从社会角度和个人角度考虑个体主义时，即使是在标榜为个体主义的社会中，以浪漫之爱为基础的婚姻仍是一种文化的理想。但是在个体水平上，个体主义一些形式的存在阻碍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性（K. K. Dion & Dion, 1993）。我们和他人的研究都发现了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即个体主义心理使得发展和维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更加困难。许多研究发现自足式个人主义与关系质量成负相关。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根据研究阐述其主要观点。我们所做的研究检验了个体主义心理和对伴侣的感情程度以及个人对爱和婚姻的本质的信念之间的相关。

为了评估个人和群体（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关系的信念，我们使用了布里和科克（Breer & Locke, 1965）项目，项目取样既包括特殊领域的内容，也包括较普遍的项目，意在使之成为每一构念更普遍适用的指示器。此研究的被试是年轻人（大学生）。在我们的第一次研究中（K. K. Dion & Dion, 1991）通过使用一系列同时回归分析，检验了个体主义心理和集体主义心理以及被试的年龄和性别这些不同因素的作用。最一致的结果模式是个体主义心理这一因素，我们称之为反射的自足式个人主义。包含这一因素的项目强调这样一些特性：个人自由和自主的重要性，自我控制生活的能力及崇尚自我满足。自足式个人主义感越强的人，报告出曾恋爱过的可能性越小。正如李（1973）在爱情意识形态的类型学中所描绘的，个体主义者还倾向于赞成一种“游戏式”爱情观——游戏型爱情风格，这种爱情观的特点是无承诺的、自由的。

特别有趣的是，那些报告称正在相恋的人中，自足式个人主义者与所报告的爱情体验的质量以及对伴侣的爱成负相关。自足式个人主义感越强，爱情体验越不可能用某些特性（如温柔、深情、奖赏）来描述。为了评估所报告的对伴侣的爱，我们使用鲁宾（1970）的量表，分析了由斯特克及其同事（Steck, Levitan, Mclane, & Kelly, 1982）所确定的三个子量表（关爱、需要和信任），并使用了报告对伴侣身体吸引力的量表，这一量表由帕姆、普拉特切克和孔蒂

(Pam, Plutchik, & Conte, 1975) 编制。通过使用这些量表的测定, 我们发现自足式个人主义和对伴侣的爱质量之间成负相关。这种个体主义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更少的关爱、需要和对伴侣的信任以及报告出更少的吸引力。

在第二个研究中 (K. K. Dion & Dion, 1993b), 我们再次关注了个体主义心理和集体主义心理和关系质量之间的相关。在这次研究中, 我们包括了另外的一些测度: 结婚观和离婚观。我们再次使用了贝里和洛克 (Breer & Locke, 1965) 问卷中有关“自足式个人主义”因素的项目 (见 K. L. Dion & Dion, 2005, “自足式个人主义”索引的描述)。和第一次研究相似, 个体主义感越强烈, 始终“相恋”的可能性越小。正如所料, 自足式个人主义与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和晚婚的意愿相关。

其他研究者 (Agnew & Lee, 1997; Kimmelmeier, Sanchez-Burks, Cytron, & Coon, 1998, study 2) 以美国大学生为样本, 同样发现个体主义心理与关系承诺度成负相关。他们应用布里和洛克 (Breer & Locke, 1965) 有关项目编制的量表来评定个体主义, 用罗斯布特和他的同事编制的量表 (见 Rusbult, Martz, & Agnew, 1998) 来评定亲密关系的承诺度。对来自多所大学被试研究综合的证据发现, 个体主义的某些方面对爱情和关系质量有负面的影响。由于这些研究的被试主要是年轻人, 尤其是大学生, 因此有必要在更具代表性的成年群体中探讨个体主义和爱情的关系。

通过对 1993 年前人收录在《综合社会调查》(GSS) 的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对这一问题做了检验 (K. L. Dion & Dion, 2005)。《综合社会调查》是有关美国讲英语的成年人的概率调查研究, 几乎每年进行一次 (Davis & Smith, 1992)。在 1993 年, 这一调查包括了关于个体主义的五个题目。其中一个项目强调在他人面前, 把个人需要和目标放在首位, 这与自足式个人主义的核心特征相契合。在《综合社会调查》中还包括了对不同类型关系满意度的题目, 如婚姻和友谊, 也包括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题目和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其他题目。通过一系列回归分析, 这些研究结果的模式发现了“个人首位”的个体主义和报告出的关系质量以及个人主观幸福的其他方面成负相关的大量证据。

例如，个体主义越强，报告出在恋爱和婚姻中的幸福感越少，对家庭生活和朋友的满意度越低。报告出的关系结果与个体主义成负相关。举例来说，个人在家庭生活中察觉到的成就感越低，他在去年或过去的五年里离婚的可能性越大（这些研究结果的评述，见 K. L. Dion & Dion, 2005）。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以加拿大大学生还是美国成年人作为样本，其自足式个人主义与关系质量相关结果都是相似的。纵观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的模式表明个体主义的心理对亲密关系的质量及良好爱情体验起到负面作用。关于个体主义和爱情关系，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大多关注个体主义在成年人异性关系发展、质量和维持中的作用。

然而，最近的证据表明，个体主义的问题因素，在其他重要亲密关系及这些关系中爱的满意度中体现出来。派克（Pyke）及其同事虽然没有对爱情心理学进行研究，但他们通过研究成年子女对年长父母的照顾和父母对其照顾的反应，发现许多主题和我们的假设相一致，即个体主义心理的一些形式与关系质量成负相关。基于对三代人（年长父母、中年子女、成年子孙）使用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派克和本特森（Pyke & Bengtson, 1996）明确了涉及家庭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系统。有强烈个体主义倾向的家庭强调家庭成员的自主能力、自发的联系及家庭成员间松散的亲属关系纽带。有趣的是，这种家庭关系通常被认为是负面和矛盾的。

派克和本特森（1996）指出在个体主义意识盛行的家庭中，成年子女更可能对他人提供物质上的照顾（非家庭成员雇员帮助、护理院），并且关注父母的财政管理和赡养安排。当要照顾有病的父母时，其潜在动机与其说是情感，不如说是一种义务，因此呵护此时被看做是一种负担。从个体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年长父母珍视他们的自主，他们不想也不希望他们的成年子女介入他们的生活。由于自主被看得如此重要，要求或需要帮助可能会威胁到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下面的描述，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一位 89 岁的老母亲在提到她 53 岁的女儿时说：“我不想成为她的负担，因为我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地喜欢我，如果她们必须照顾你，你就不知道她们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喜欢你。”（Pyke & Bengtson, 1996, p. 384）

如果子女们认可家庭成员自主的家庭观，那么年长父母从他们的子女那里所受到的直接帮助就会相对较少。随后派克（1999）考察了个体主义家庭取向对老年人的照顾对家庭中权利流动的含义。由于坚持个体主义，年长的成年人保留他们的独立意识，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实行家长制。尽管这种信念体系和相关行为对于父母健康很重要，但依赖被视为身体不健康。派克（1999）发现，赞同个体主义的家庭观无论对年长父母还是他们的成年子女都会产生一些问题。现在子女必须提高照顾行为的水平，而这与他们的观念相冲突，并且遭到父母的反对。此外，前面提到的对自我满足的强调，意味着成年子女不会提供最及时有效的照顾，因为他们意识不到父母的喜好和意愿，也不善于提供照顾。本质上，当父母的需要最强烈时，成年子女对年长父母的需要可能至少会给予其感情上的回应。在一些案例中，派克指出，持个体主义的年长父母并不希望与他们的成年子女保持过密的关系，关系过密意味着承认对子女依赖的增长、对子女意愿的听从，最后导致与子女的同伴关系的减弱和从子女那里得到的工具性帮助的减少。

派克及其同事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研究领域内探讨了个体主义和家庭功能的相关。他们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独立设计研究，并提出了能启发我们思索的其他观点。不过，他们的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与我们关于个体主义在亲密关系中对爱的表达的作用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集体主义和爱情

前面我们提到在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中，应该较少看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文化理想，与伴侣的情感卷入不太强烈，导致在家庭关系的复杂模式中的情感扩散（K. K. Dion & Dion, 1993）。在社会层面上，G. R. 李和斯通（Lee & Stone, 1980）对117个非工业社会的人类学考察证据发现，家庭结构（核心家庭与大家庭）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和选择配偶的重要性存在相关。与大家庭（an extended family）相比，以核心家庭（a nuclear family）为主的社会，更

看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来自莱文及其同事 (Levine et al., 1995) 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 在一些传统的集体主义社会中, 很大一部分年轻人表示愿意与自己并不相恋的人结婚, 只要这个人具备一些他们喜欢的其他品质。但是, 在其他一些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社会里 (例如日本), 几乎没人愿意与自己不相恋的人结婚, 这表明在某些领域他们又向个体主义迈进一步。

从个人层面上讲, 相对于集体主义心理, 在对爱情心理学的调查研究中, 我们发现个体主义心理与其对爱情体验的作用产生了更加一致的结果模式。但是, 在我们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模式。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爱情的第二次研究中 (K. L. Dion & Dion, 1993 b, 2005), 我们发现对于构成集体主义心理的一般因素如“从属性” (belongingness) 的研究结果与这一部分开始提到的假设的第二部分相一致。集体主义心理与爱的本质和对伴侣的爱有关, 这种观点强调关爱的不同方面, 而并非强烈的情感和自我发现。特别的是, 赞同群体从属性和共有目标的重要性与报告出对伴侣的关爱成正相关 (鲁宾的量表)。这种集体主义心理还与友谊、实际的爱情观, 特别是利他的或“利他型”目标为基础的爱情观相联系。

在另一项研究中 (K. L. Dion & Dion, 1993 a), 我们发现, 与英国女性相比, 来自亚洲种族背景的女性 (大学本科生) 更可能赞同利他的爱情观。利他的爱情观强调把伴侣的需要和兴趣放在首位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表明, 集体主义心理促进了亲密关系中相互关爱的发展。前面我们提出, 集体主义心理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由于夫妻间的连结是许多家庭关系纽带的一种, 情感的纽带可能在其家庭关系网络中扩散 (K. K. Dion & Dion, 1993)。

如果事实是这样, 那么集体主义和对伴侣之爱的关系, 不仅要對婚姻的质量负责, 也要对大家庭体系内部的变化负责。英格索尔·戴汤森及其同事 (Ingersoll-Dayton, Campbell, Kurokawa, & Saito, 1996) 对日本和美国家庭中长期婚姻 (平均四十年) 做了定性研究。研究发现, 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年长夫妻

都报告自己和他们的配偶间存在着亲密感，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亲密感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在他们的婚姻的哪个阶段发展起来的。来自美国的被试夫妇表示，他们希望在婚姻中一直保持与配偶高水平的心理亲密感，但同时“为了自主发展，他们也需要独立的认同和空间”（p. 394）。这种自我独立意识发展的渴望在年长女性中特别明显。

对日本的被试进行访谈时，出现了与美国不同的情况。在他们婚姻的前几年，对于夫妻双方，他们的义务和关系涉及大家庭系统的不同方面，例如对整个大家庭需要的关注以及对亲属关系中其他成员的义务。但是，日本夫妇报告在婚后几年（也就是进行访谈的时候）与配偶会产生更强的亲密感。感到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个人双方的原因（例如，丈夫更愿意向妻子表达爱慕之情）；二是结构方面的原因（在亲密连结已经存在的大家庭中，一些家庭成员的去世）。

正如在对家庭成员的关爱质量中所显示的，集体主义心理不仅对家庭关系中报告出的亲密感，而且也对爱的具体表达产生影响。在前面的部分，派克和本特森（1996）研究了个体主义的家庭信念体系和赡养义务。派克及其同事也研究了集体主义作为一种取向，对于家庭相关的信念和行为的引导作用。在集体主义观/共有观的家庭中，成员们更加强调家庭连结，相互帮助的需要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他们经常正面地描述其他家庭成员。

从这种家庭观来看，照顾老人的主要原因是情感和依恋，而不是责任和义务，而且这种照顾不被看做是一种负担。一位女儿在谈到对母亲的照顾时说：“当然，从那之后我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因为与以前相比，我可以为她做更多的事情。”（Pyke & Bengtson, 1996, p. 384）派克和本特森表示，与持有个体主义的家庭成员相比，赞同集体主义信念的人具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特征（p. 384）。

在这种定性分析中，根据老人受到成年子女照顾的数量和质量看，这种集体主义观对老年人来说明显是有益处的。然而，派克（1999）对家庭权利关系

随后的分析中指出，接受照顾的心理代价是对子女意愿的听从，本质上是家长权利或权威的减弱甚至丧失。如果父母坚持自己的意愿或不听从子女的意愿，子女则不太愿意提供帮助。派克指出这项研究是在赞同个体主义的社会（美国）进行的，因此在更具“束缚模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中这种现象也可能有所发展，同时，派克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比较研究将成为热点。

总之，我们和其他研究者的结果表明，集体主义心理的某些方面与亲密关系中不同类型的关系质量成正相关。集体主义心理对爱情心理学和亲密关系中具体表达的影响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

文化情境和爱情心理学

先前我们提到，文化在如何理解和定义自我时起到重要的作用（K. L. Dion & Dion, 1988）。虽然现在看来文化和自我在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文献中随处可见，当我们第一次将之成文时，文化因素和自我的关系仍引起跨文化心理学、人类心理学及相关领域学者的广泛讨论。我们引用了一些亚洲学者的文章，他们认为在西方心理学理论中关于自我的定义强调每个人作为心理上的独立实体，相比之下，亚洲人在解释自我时认为人是关系网中的一部分，如“jen”。对自我的不同理解影响了对爱情的理解。下面我们将进一步阐述这方面的影响。

如果自我概念化的核心是独特的和与他人相分离的，那么爱情的一个功能便是制造连结，与他人建立关系纽带，并最终消除自我内在的孤立感和分离感。但是，发展这种连结的过程是复杂的，并且需要积极持续地协商交易。在这种情境中，口头表露和自我证实（self-validation）的意识——谈论自身及其需要、感觉被人理解、聆听他人爱的表达——可能是使这一过程持续的重要方面。因为相互依赖不能被认定为自我固有的财富，当亲密关系必须在持续的基础上协商形成时，这时口头表露对爱情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爱情是连接两个

孤立个体之间的桥梁，它是通过不断地尝试将自我他人建立关系而形成的。

与此同时，如果自我被看做是与他人分离的个体，那么，当个人的需要和目标相遇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结是可选择和维护的。这种观点不仅在你同龄人关系（好朋友；婚姻）中起作用，对其他关系也有作用（如父母—成人子女的关系被认为具有更永久的特性）。如前所述，如果家庭观念系统认为家庭成员是分离的个体，那么，那些有较多需要的家庭成员对有较少需要的成员“不会成为一种负担”，这是爱本身的一个条件。正如派克及其同事之前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这个条件没有符合，人们不再为那些有最大需要的人提供关爱和支持。

相反，如果自我存在于关系网的复杂情境中，自我和他人之间内在的相互依赖感对爱情的本质将会产生不同的动态理解。我们应较少强调把个人需要和偏好的相互表达作为形成和保持连结的基础，而应更多地强调一些行为（帮助，支持，关心他人需要），这些行为赞同和支持假定连结的存在。一些关系（例如，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及配偶之间）本身的存在，就是建立了深度和长久连结的证明。

因此，口头上的承诺和保证对诠释连结的本质是不必要的。“你爱我吗？”这样的问题显得很肤浅。例如，在描写日本家庭关系时，伊沃（Iwao, 1993）指出在亲密关系中“心照不宣的理解期望”会使爱的口头表达索然无味。的确，伊沃认为当面对一个直接询问自己对他人情感深厚的问题时，如妻子问丈夫是否爱她时，个人的疑问将会使对方受挫或恼怒，因为这种明确的表白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在社会情境中，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观点，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如何理解和表达爱可能会使关系紧张。关于自我是与他人分离的还是相互依赖的核心观念，使爱情的本质和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全然不同，同一性也表现出同样的功能。例如，K. K. 迪恩（K. K. Dion, 2006）指出在美国和加拿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许多亲密关系事件（如

配偶的选择、约会的自由、家庭的责任)紧张的基础主要是由于最佳人类发展的不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父母和成年子女对自我和同一性本质的认识可能大相径庭,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对爱和情感的表达。从移民父母角度看,“放任自流”不是父母对成年子女表达爱的成功方式,也不是最差的一种。确切地说,作为父母应该通过积极加入子女的成长生活来表达对他们的爱,从而在家庭中形成长久的相互依赖。

因此,在移民家庭的不同辈分之间,由于自我和他人的相关文化观点不同,对爱的理解也不同。例如,派克(2000)对来自移居美国的朝鲜和越南家庭的成年子女进行访谈,结果是一致的。派克认为在朝鲜和越南传统文化中,对一个家庭爱的表达更重视的是提供帮助和有利支持的形式,而不是情感和个人感受的表白。与之相反,来自这些移民家庭的成年子女希望父母更明确地表露自己的想法。下面是一个年轻人的评论,形象地说明了这两种观点的不同。访问者回忆了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和他父亲的一次谈话,孩子说:“我试着说一次‘我爱你’,他看着我说‘你现在是美国人吗?’你认为这是《脱线家族》(一部美国喜剧)?你不爱我。当你能赡养我时,你才是爱我的。”(Pyke, 2000, p. 247)。

爱情心理学的理论是它们自身的文化构念。目前许多理论被一种自我和他人是分离实体的假设所引导,因此,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个体的挑战是发展和保持亲密关系,并且爱情需要用不断肯定来创造两个分离实体之间的连结。如果开始就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在婚姻和其他亲密关系中自我和他人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也就是说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中个体是没有独立性的。爱如何被理解和表白反映了与假设不相同的结果。这些概念框架可能会提供不同的见解,为了理解爱情心理学和它对关系进程及结果的含义,我们和其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都强调社会/文化情境和涉及自我和他人的相关信念系统的重要性,例如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参考文献

- Agnew, C. R., and Lee, B. (May 1997). Individualism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ssociations with commitment, satisfaction, and self-other inclu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Washington, D.C.
- Bellah, R. N., Madsen, R., Sullivan, W. M., Swidler, A., and Tipton, S. M.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eer, P. E., and Locke, E. A. (1965). *Task Experience as a Source of Attitudes*. Homewood, Ill.: Dorsey.
- Davis, J. A., and Smith, T. W. (1992). *The 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Dion, K. K. (2006). On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Perspectives from immigrant families. In R. Mahalingam (e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mmigrants*. Mahwah, N.J.: Erlbaum.
- Dion, K. K., and Dion, K. L. (1991). Psych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6, 17-33.
- . (1993).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ic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love and intima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9, 53-69.
- . (1996a).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romantic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5-17.
- . (1996b). Introduction: Toward understanding lov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1-3.
- Dion, K. L., and Dion, K. K. (1988). Romantic love: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R. J. Sternberg and M.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pp. 264-28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3a). Gender and ethnocultural comparisons in styles of lov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7, 463-473.
- . (August 1993b).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romantic love. Symposiu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oronto, Canada.
- . (2005). Culture and relationships: The downside of self-contained individualism. In R. M. Sorrentino, D. Cohen, J. M. Olson, and M. Zanna (eds.),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The Ontario Symposium*, vol. 10, pp. 77-94. Mahwah, N.J.: Erlbaum.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Hui, C. H. (1988). Measurement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2, 17-36.
- Hui, C. H., and Triandis, H. C. (1986).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e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7, 222-248.

- Ingersoll-Dayton, B., Campbell, R., Kurokawa, Y., and Saito, M. (1996). Separateness and togetherness: Interdependence over the life course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 marriag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 385-398.
- Iwao, S. (1993). *The Japanese Woman: Traditional Image and Changing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Kemmelmeier, M., Sanchez-Burks, J., Cytron, A., and Coon, H. M. (August 1988). Individualism and romantic love: A comparison of two hypothe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 Lee, G. R., and Stone, L. H. (1980). Mate-selection systems and criteria: Variation according to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319-326.
- Lee, J. A. (1973). *Colours of Love*. Toronto: New Press.
- Levine, R., Sato, S., Hashimoto, T., and Verma, J. (1995). Love and marriage in eleven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6, 554-571.
- Oyserman, D., Coon, H. M., and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72.
- Pam, A., Plutchik, R., and Conte, H. R. (1975). Love: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Psychological Reports*, 37, 83-88.
- Pyke, K. (1999). The micropolitics of care 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ing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pow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 661-672.
- . (2000). "The normal American family" as an interpretive structure of family life among grown children of Korean and Vietnamese immigra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 240-255.
- Pyke, K., and Bengtson, V. L. (1996). Caring more or less: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 systems of family elderca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379-392.
- Rubin, Z. (1970). Measurement of romantic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65-273.
- Rusbult, C. E., Martz, J. M., and Agnew, C. R. (1998). 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 s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357-391.
- Sampson, E. E. (1977). Psychology and the American ide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767-782.
- Steck, L., Levitan, D., McLane, D., and Kelley, H. H. (1982). Care, need, and conceptions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 481-491.
- Wachtel, P. L. (1983). *The Poverty of Affluence: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Waterman, A. S. (1981). Individu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762-773.
- . (1984). *Th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lism*. New York: Praeger.



结论：各种爱情理论 的本质及相互关系

凯琳·斯腾伯格 (Karin Sternberg)

本书的作者们提出了以爱情为主题的广泛的理论和研究。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爱情现象的方方面面。根据对前面各个方面的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爱情的研究是在不断发展的。然而，有时研究的各种结果和爱情的不同方面风靡一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能涵盖所有内容的爱情理论，运用这个理论能毫无矛盾地解释爱情的各种现象。然而，这个目标似乎只是一个远景期望。由此，我们可能会问，本书中提到的理论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它们讲述的是爱情的不同方面，但是在这些理论和所得结果中仍然有许多相同之处。本章我们会探讨各种不同类型的爱情以及对应的机制。这样也许我们能看出它们是否有共同之处，如果有又能达到什么程度。因为本书中的许多理论与生物学有关，所以我们将首先考虑生物学说，然后是分类学，最后是原型说。接下来，我们会考虑个性、情境、时间对爱情的影响。再下面，我们会探索前面几章提出的文化差异，我们也会考虑人们为了达到与爱情和配偶有关的目标而发展的一些基本策略，并且讨论在这些领域中的失败可能会造成怎样

的后果。最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尚未得到解答但可能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不同爱情风格类型的结合

以生物学说为基础的观点

本书中描述的一些生物学说提出存在一些驱使爱情相关行为的系统。比较发现，多数的爱情风格和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看起来至少有一些共同点。

所有的生物学说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试图根据人类和灵长类的进化历程，理解人类认知、情感和行为。他们主张，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人类大脑和心理机制是为了解决生存的延续和促进繁殖。这些机制被假定是具有普遍性的，尽管其中有一些机制只是适用于一种性别或者特殊的年龄段。然而，本书中呈现的一些生物理论，不仅仅是它们之间，也包括和其他理论之间都存在共同之处，生物理论表明系统调节认知、情感和行为，这和其他类型的爱有一定程度的重叠。

在第三章“浪漫之爱关系中的行为系统”中，菲利普·R·薛佛和马里奥·米库利茨提出有三个内在的动机系统：依恋、呵护和性。他们部分地依据鲍尔比（1969/1982）的依恋习性理论发展了这个观点。根据这个理论，某些动机系统随着人类发展的进程而进化，因为它们能增加婴儿的存活和成功繁衍下一代的可能性。当人们遇到威胁和想退回到一个能提供庇护的依恋对象那里的时候，依恋系统就被激活。呵护系统的功能是当重要他人存在需要时，给予他们保护和支持。性系统使性伴侣双方完成生育下一代的任务。每一个系统都由具体的目标和完成这些目标的策略构成。

在第五章中，“爱情的内驱力”，海伦·费希尔采用神经学观点，同样提出三个不同的以脑为基础的爱情系统——性驱力、吸引和依恋，与薛佛和米库利

茨的三个动机系统相似。性驱力与对性的渴望有关；吸引等同于浪漫之爱，例如，它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配偶身上，并以保护配偶为特征的。依恋是与相互的理毛行为、家的建立和渴望维持与伴侣的亲近关系相关。费希尔的依恋与薛佛和米库利茨的依恋系统享有一些相同的特征，目标都是提供庇护和在威胁情境中时能成功撤退。然而，费希尔提出的系统基本将吸引等同于浪漫之爱，吸引与薛佛和米库利茨理论中的呵护对应，是一种利他形式的温情之爱，它明确地以关注另一个人的幸福为特征。

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不是唯一在爱和依恋间建立联系的一些人。依恋也是第六章的主题，詹姆斯·F·莱克曼、莎拉·B·赫尔迪、埃里克·B·凯维纳和C.苏·卡特撰写了“依恋和连结的生物行为模式”。他们区分了连结和依恋，连结强调是调节父母行为和婴儿反应的生物进程，依恋则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内涵。在他们的生物行为模式中，除了观察许多物种的亲行为和连结外，他们还探索了在人类和哺乳动物中形成依恋行为基础的生物社交机制。肽，例如后叶催产素（oxytocin）和阿片肽（opioid），与婴儿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连结相关。例如，后叶催产素似乎和性唤醒、配偶连结（pair-bonding）和母性行为相关。阿片肽在大脑中就像海洛因所起的作用。当它们释放时（例如在分娩和哺乳的时候），它们能够引起积极的情感，因此可以增强母亲的关爱感。费希尔也认为，后叶催产素在依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吸引系统和莱克曼及其同事的浪漫之爱有一些相同的行为特征，而这些行为主要是以花费大量时间、侵入性思维和强迫观念为特征的。

不同类型的爱的需要和观念在第二章中被指出，由道格拉斯·T·肯里克提出“爱的动态进化观”。他表明在爱的进化过程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一些独特的问题。不同类型的爱和这些问题相关。例如，人们需要吸引潜在的配偶，如果他们已经找到一个配偶，需要尽力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还需要用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去照料后代。由于每一代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发展出能帮助他们解决与特定目标相关的问题的决策偏差。例如，男性比女性更普遍倾向于认为吸引力是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吸引力可以作为女性生育能力的

线索。相反，女性比较注意潜在配偶的地位，并确信他有能力去抚养后代。因为，这些问题，例如一方面亲本抚育，另一方面求偶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不同类型的爱和不同的领域相关。

爱的分类学

分类学这一章节的内容是描述某些爱的类型，并且在一些情况下基于某种理论假设建立各种爱的类型表。在分类学中提到的不同类型的爱，可以部分地归到上面描述的三个脑系统和动机系统中。有时，爱是多个成分的混合。这种重叠在第八章“探索爱的真谛”中最能清晰地体现。埃伦·伯奇德认为爱情有四类：依恋之爱、温情之爱、伴侣之爱和浪漫之爱。依恋之爱是以寻求接近一个保护者为特征的，通常是在危险的情境下。温情之爱是一种利他的爱，它以他人的幸福为中心，并且不期望他人的回报。伴侣之爱或者喜欢是指人们之间的友谊，它是建立在奖赏—惩罚原则的基础上：如果某人被另一人很友好地对待，那么他或她会倾向于喜欢那个人；反之，如果某人被另一人恶劣地对待，那么，他或她会倾向于讨厌那个人。第四类爱是伯奇德提出的浪漫之爱，这是一种含有性渴望的激情之爱。伯奇德的爱情风格显示出与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的以生物为基础的系统有一些重叠。依恋之爱与薛佛和费希尔提出的依恋系统有相似之处。温情之爱似乎与薛佛和米库利茨所说的呵护系统相对应。伯奇德的浪漫之爱可能是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提出的性系统的融合，也可能部分包含了费希尔的吸引系统以及薛佛和米库利茨的呵护系统。伴侣之爱可能与依恋系统和呵护有关。

克莱德·亨德里克和苏珊·S·亨德里克的六种爱情风格（查阅第七章“浪漫之爱的风格”）也可以归类到上面提到的一种或者多种爱情类型和系统中。然而，爱情的三原色——激情型、游戏型和友谊型，不能归到其他分类的爱情类型中。爱情进一步的合成色，它们通常与其他分类学中的多种风格更吻合。例如，激情型，是以激情和性爱以及强烈的情绪为特征的。由于激情型包含性

爱的内容，它与伯奇德的浪漫之爱以及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的性驱力能够很好的匹配。另外，激情型的一些内容也可能在费希尔的吸引系统（即和人们的浪漫之爱相似）中呈现出来。游戏型很难被归类到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风格和系统中。它是一种游戏性的、以欺骗为特征的没有承诺的爱，有人认为不管哪种爱都可以没有承诺。然而，由于它的欺骗成分，它不能被真实地划分到其他大多数的爱情风格中。因为依恋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可以长时间地去依恋和保护自己的人，这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薛佛、米库利茨、费希尔及伯奇德的依恋不包含无承诺的成分。薛佛和米库利茨的呵护以及伯奇德的温情之爱也不适合游戏型的特征，因为利他的行为与游戏型的无承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游戏型与伯奇德的浪漫之爱、费希尔的吸引以及费希尔、薛佛、米库利茨的性驱力最吻合。游戏性、无承诺的成分似乎更适合发展激情关系的恋人，但这种关系意味着不一定太认真，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友谊型作为伴侣友谊的一种，很容易与其他爱情风格相吻合。它与伯奇德的伴侣之爱最吻合，并且包含了薛佛、米库利茨、费希尔和伯奇德的依恋之爱的成分，以及薛佛、米库利茨的呵护系统。对于爱情的合成色，利他型是利他和甘于奉献的爱，它与伯奇德的温情之爱、薛佛和米库利茨的呵护关系密切，它可能也包含伴侣之爱的一些成分。

对于最后两种风格，有一点复杂。实用型是比较实际的一种爱，看起来与伯奇德的伴侣之爱有关系，是以奖赏和惩罚为原则的。伯奇德提出在这种爱中我们最爱那些能够根据我们的需要而奖赏我们的人。实用型就是实现一个人的期望，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实用型，一个原因是它使个人目标的完成简易化。所以，实用型和伴侣之爱是有明确联系的。第六种也就是最后一种爱情风格是占有型。这是一种在狂喜和痛苦之间左右摇摆的强迫之爱。强迫之爱经常发生在浪漫关系的领域中。因此，占有型似乎与伯奇德的浪漫之爱、费希尔的吸引系统及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的性驱力有关。

在罗伯特·J·斯腾伯格的爱情的二重理论中（查阅第九章“爱情的二重理论”），他提出了八种爱情类型，它们是由亲密、激情和承诺因素的不同组

合而成的。最简单的爱情类型是无爱，三种因素它都不包括。既然没有爱情体验，那么这种状态与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爱情类型都没有关系。

友谊作为爱情的一种，它包括亲密，但不包括激情和承诺。因此，友谊与亨德里克的友谊型和伯奇德的伴侣之爱能很好地吻合。尽管（短时期）友谊可能包含依恋的一些因素，但实际上它和依恋并不存在重叠，因为它不包含承诺这一必要的因素（根据斯腾伯格的定义）。在费希尔、薛佛、米库利茨和伯奇德的理论的定义中，要建立依恋，某种承诺和持续性是必需的。友谊与亨德里克的游戏型爱情风格的特征一样，都缺失承诺这一因素。

痴迷之爱存在激情因素，但不存在亲密和承诺因素。它包含亨德里克的激情型的强烈情绪和占有型的强迫观念。它可能也与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的性驱力因素相关，因为激情因素在痴迷之爱中地位显著。

空洞之爱作为爱情的一种，既不存在亲密也不存在激情。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承诺爱某人。因为依恋与亲近的维持和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有关，所以尽管空洞之爱与依恋确实大不相同，但他们之间仍有一些相同的特征。虽然有些夫妻间已经没有亲密和激情，分离焦虑可能是他们仍然决定待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当然，他们之间一些舒适的习惯也可能让他们继续在一起。

浪漫之爱存在亲密和激情因素，不存在承诺。斯腾伯格的浪漫之爱较容易归到伯奇德和费希尔（吸引）的浪漫之爱。此外，浪漫之爱也和亨德里克的激情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强烈的情绪和身体吸引力都和它有关。既然涉及激情，薛佛、费希尔和米库利茨的性驱力因素也在浪漫之爱中扮演重要角色。

伴侣之爱存在亲密和承诺因素，但不包括激情。斯腾伯格的伴侣之爱和伯奇德的伴侣之爱名字相同，表明有很大的重叠部分。在伴侣方面，因为没有激情因素的存在，它和亨德里克的友谊型相关。因为在伴侣之爱中承诺因素的存在，所以它和伯奇德、薛佛、米库利茨以及费希尔的依恋之爱的特征相似。

愚昧之爱是以承诺和激情的感觉为特征，但是没有稳定的亲密因素。愚昧之爱的激情成分与亨德里克的激情型的强烈情绪以及伯奇德、费希尔的浪漫之

爱有一些相似之处。然而，在这些爱情类型中缺失的承诺因素在愚昧之爱中却是存在的。由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提出的性驱力与愚昧之爱的激情因素有一些共同特征。

完美之爱结合爱情的三因素：亲密、激情和承诺。因此，它包含上面提到的几种爱情风格。伯奇德的浪漫之爱和亨德里克的激情型是完美之爱的一部分，还包括费希尔的吸引以及薛佛、米库利茨和费希尔的性驱力因素。此外，完美之爱还意味着伴侣之间有高度的亲密感，因此，它和伴侣形式的爱更相似，就像伯奇德和亨德里克（友谊型）所提出的。因为伴侣双方都尽力维持亲近和显示亲和行为，所以完美之爱与费希尔、薛佛和米库利茨以及伯奇德提出的依恋相关。就伴侣而言，由于关注另一方的幸福，并尽力满足对方的需要。因此，薛佛和米库利茨的呵护系统不仅仅体现在温情之爱（伯奇德）和利他型（亨德里克）中，也体现在完美之爱中。

另外，薛佛、米库利茨的理论也和斯腾伯格的爱情三角形有关，爱情三角形的面积因为依恋、呵护和性三种系统的最佳功能而扩大。斯腾伯格的分类与本书中所列其他的分类学存在差异，因为这种分类学主要不是为了探寻爱情各种类型在内容或相关行为之间的差异。斯腾伯格提出爱情的三种基本因素，它们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八种不同的爱情类型。他的爱情故事理论涉及其二重理论的一部分内容。

另一种爱，即“共有应答性”，是由玛格丽特·S·克拉克和琼·K·莫南在第十章（“爱即‘共有应答性’的给予和接受”）中提出的。“共有应答性”包括对一个人已表露的需要作出反应。这个反应的重点在于无条件地关注他人的幸福和需要，因为人们如果期望对他人的帮助得到回报，这意味着作出反应的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种爱与伯奇德的温情之爱和亨德里克的利他型相似，其中都涉及他人的幸福。“共有应答性”代表着一种利他的爱，它和薛佛、米库利茨的呵护系统也有一些共同特征。然而，共有的爱与其他章节描述的爱情类型有所不同，它只是各种关系类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通过上面描述的每一种爱情风格的特征，人们可能看出他们的关系的特殊性，例如，浪漫之爱

或友谊，因为在这些爱情类型中有许多重要的性质是不同的。然而，共有的爱没有必要定义它们的本质，它包含在大量的不同关系，它可能存在于友谊，也可能存在于亲戚或夫妻间的爱。

原型分析和爱情的不同类型

原型分析探讨哪些是爱情的典型特征，它们最清晰地包含人们对于爱情的概念。原型分析能帮助发展分类，并能够帮助考察已存在的分类的相似之处，因为它们能阐明已经确认的不同种类的爱情是否有共同的核心概念。在贝费利·费荷的爱情原型分析中（查阅第十一章“爱情研究的原型说”），她发现伴侣之爱比激情之爱更有可能被看做是爱情概念的核心部分，大部分爱情理论能在区分激情之爱和伴侣之爱的基础上被概念化。对常人与爱情概念相关的 68 个特征进行了因素分析以确认各种特征能被归到哪些子类别中。它揭示的三个因素与斯腾伯格的亲密、激情和承诺成分相吻合（Aron & Westbay, 1996）。

爱情的不同类型有什么用？

在爱情领域中分类学和原型的目的是根据预定的系统把爱情的不同形式编入目录，这样所得到的概念框架可以作为深入分析和讨论的一个基础。因此，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来研究爱情，分类学都是有用的。上面的分析证明，尽管已经提出了许多爱情风格和系统，但他们之间存在相当大程度上的重叠。关于存在爱情的哪些不同类型，或许它们可能包含爱情的其他成分，看起来存在小部分的一致。然而，仍然没有确定的定义，缺乏一个共同概念上的爱情词汇来清晰地论述爱情。在参加一个学术演讲时，确信每个人所谈论的是一样的事情，并且在谈论一个特定的概念时有同样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当人们谈论浪漫之爱或依恋之爱时，在他们头脑中真的有相同的概念吗？在爱情领域的发展中，在这一点上如此明确的术语未必存在。在各种爱情类型的概念中，它呈现出需要更多深入地研究以达到会聚的领域。

情境、人格和时间的影响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多种爱情的存在，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体验爱情是否有所不同——情境是否影响体验到的爱。他们的爱情体验和他們认同的爱情类型在一生之中是同样的，还是会有所改变。

在第四章“爱情的进化”中，大卫·M·巴斯提出爱情是一种用来解决几代人中反复出现的繁衍后代问题的一种适应。因为所有人都面临这些问题，并且需要找出解决它们的方法，这些心理上的适应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它们存在的普遍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之相联系的经验是类似的。它们因人而异。例如，所有人都有感到妒忌的心理倾向，但因为有些人的配偶不会展现任何不忠的信号，不给他们任何产生嫉妒的理由，所以有人就可能不会产生嫉妒。进一步说，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感到嫉妒也取决于他们的人格。巴斯、薛佛、米库利茨承认在依恋、呵护和性系统中存在个体差异，他们强调情境和人格两者都很重要。

但是，在他或她的一生中个体会怎么样呢？亨德里克夫妇认为，爱情风格随个体和时间变化而改变，在他或她的一生的任何时刻，根据六种爱情风格每一种的显著性，都可以产生一个人的爱情剖面图。然而，这个剖面图可随时间而变化，一个女孩在20岁出头时的爱情剖面图可能和她15年或者20年以后的爱情剖面图存在很大差异。比如，主要的关注可能从激情之爱转变到伴侣之爱。这一点在斯腾伯格的爱情故事理论中也有所体现，根据这个理论在个体的一生中会有不同爱情故事，或者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有不止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是人们对于爱情拥有的不同概念的表达。例如，一些人可能把爱情看做一场游戏，然而另一些人可能把它看做园艺，这样的爱情关系需要不断地呵护和培养。

文化对爱情的影响

没有人会否定文化会影响人生的许多方面，即使不能说全部，至少也是部分。因此，对爱情的跨文化研究并不奇怪，它是心理学家探索爱情领域的一部分。本书中的文化理论的不同在于他们或者强调文化的差异或者强调相似性。卡伦·K·迪恩（Karen K. Dion）和肯尼思·L·迪恩（Kenneth L. Dion）的这一章（第十四章，“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爱情心理学”）集中从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文化角度区分爱情体验和相关行为的不同。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决策，将个体或内群体（例如家庭）的利益看得更重要。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爱情强调利他的目标并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然而，个体主义国家中的爱情倾向于游戏的和纵容的。从这种观点看，文化在解释不同人群的差异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相反，大卫·施密特（第十二章“爱情的进化和跨文化观点”）试图从进化的观点来解释差异。他指出虽然所有文化都存在差异性，但或多或少包含共同性。在他对爱情的研究中，他使用了一个称为“情感投资”的构念。情感投资包含了许多爱情的主要特征，包括斯腾伯格爱情两重理论中的亲密、激情和承诺。情感投资在不同文化间与高水平的外向性和宜人性相关，但与神经质无关。一些变量，例如生态压力，在大多数文化中有相似的后果。例如，在恶劣的物理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比在温和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倾向于表现出更少的情感投资。

黛布拉·雷博曼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Debra Lieberman & Elaine Hatfield）在第十三章“激情之爱：跨文化和进化观点”强调爱情是一种文化普及。跨文化间的相似性包括近亲繁殖回避系统的发展，比如，亲属检测和与近亲发生性关系的情境相关的厌恶情绪。然而，爱情的意义存在着文化差异。在美国，激情之爱与幸福的感觉相关；而在中国，它常和悲伤相关（Shaver, Wu, & Schwartz, 1991）。而且，浪漫之爱的概念只和西方文化契合良好。例如，在中国，爱情与对他人的义务的考虑有关，浪漫之爱对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的感染力

(Hsu, 1981)。然而，在一些方面，性别差异的影响比文化差异更重要。比如，一些特质，例如好相貌，性别对于偏好的影响比文化更大。

因此，尽管大多数理论声称爱情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然而，文化和其他因素（例如性别）的确会影响爱情的体验以及和爱情相关的行为。大多数理论承认爱情的不同方面取决于情境和人格。爱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但也覆盖了“爱情空间”的不同领域。因此，对于有多少不同类型的爱以及什么可以区分它们，仍然没有共同的理解。然而，可以承认的是，爱情存在不同的类型，并且需要存在，因为它们为不同的目标而服务。

实现一个人目标的机制

在爱情的领域中，就如同生命中的其他领域，人们有许多想要实现的愿望和目标。他们一直在寻找潜在的配偶。一旦发现，他们通常会努力拥有他或她，他们还想去繁衍后代等等。亨德里克和薛佛、米库利茨假定，人类有他们想实现的特殊目标，在他们提出的人类试图实现目标的方式上，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亨德里克强调决策偏差和认知所起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关系（例如，与朋友或浪漫伴侣的关系）与不同的决策偏差相关。正好相反，薛佛、米库利茨的重点在于依恋、呵护和性这三个行为系统以及和每一个系统相关的策略，系统包括的行为帮助达到目标，例如找寻一个合适的配偶。

但是，如果这些策略不成功将会怎样？如果人们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薛佛认为目标获得的失败或者导致过度激活策略，即人们为他或她的目标而“抗争”，或者导致去激活策略，即或多或少的“否定”目标，以避免受挫。为目标而抗争在巴斯对爱情“阴暗面”的探索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人们不再爱和处于失恋的危险之中或已经失恋，他们的伴侣和别人相恋，这些受伤害的经历会导致其对（前）配偶做出犯罪行为，特别是男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时常倾向于谋杀配偶。巴斯指出杀死配偶看似是起反作用的，

可能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存在其他原因——例如，确信失去和另一个人的性接近后，不会导致即刻的竞争。

前景展望

虽然关于爱情这一主题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寻找一个能被一致性接受的爱情词汇，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对于许多构念仍然没有合适的测量——例如在呵护领域。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关于成人依恋如何发展和在哪个时间段发展，关于谁感到被谁吸引以及为什么被吸引。更多了解爱情随时间的进展情况以及它是如何变化的，也将是很有趣的。最终的目标是整合现存的不同理论，而最终达到对爱情有更完整的理解，这种让每个人“痛并快乐着”的力量。

参考文献

- Aron, A., and Westbay, L. (1996). Dimensions of the prototyp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535-551.
- Berscheid, E. (1988). Some comments on love's anatomy. In R. J. Sternberg and M. L. Bar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wlby, J. (1969/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Hendrick, S. S., and Hendrick, C. (2002). Linking romantic love with sex: Development of the Perceptions of Love and Sex Scal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 361-378.
- Hsu, F. L. K. (1981).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 3rd ed.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Iverson, P. (1992). Taking care of the earth and sky. In A. M. Josephy, Jr. (ed.), *America in 1492: The World of the Indian Peoples Before the Arrival of Columb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Lee, J. A. (1973). *The Colours of Love: An Exploration of the Ways of Loving*. Toronto: New Press.
- Schmitt, D. P., Alcalay, L., Allik, J., Ault, L., Austers, I., Bennett, K. L., et al. (2003). Universal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sire for sexual variety: Tests from 52 nations, 6 continents, and 13 islan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85-104.

- Shaver, P. R., Wu, S., and Schwartz, J. C. (1991).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emotion and its representation: A prototype approach. In M. S. Clark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pp. 175-212.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Sternberg, R. J., Hojjat, M., and Barnes, M. L. (2001). Empirical tests of aspects of a theory of love as a 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5(3): 199-218.
- Wallen, K. (1989). Mate selection: Economics and affe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 37-38.



参加撰写人员

埃伦·伯奇德，明尼苏达大学
大卫·M·巴斯，得克萨斯大学
C. 苏·卡特，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玛格丽特·S·克拉克，耶鲁大学
肯尼思·L·迪恩，多伦多大学
卡伦·K·迪恩，多伦多大学
贝费利·费荷，温尼伯大学
海伦·费希尔，罗特格斯大学
伊莱恩·哈特菲尔德，夏威夷大学
克莱德·亨德里克，德州理工大学
苏珊·S·亨德里克，德州理工大学
莎拉·B·赫尔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道格拉斯·T·肯里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埃里克·B·凯维纳，剑桥大学
詹姆斯·F·莱克曼，耶鲁大学
黛布拉·雷博曼，夏威夷大学
马里奥·米库利茨，巴以伦大学，以色列
琼·K·莫南，卡耐基—梅兰大学
大卫·施密特，布拉德利大学
菲利普·R·薛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罗伯特·J·斯腾伯格，耶鲁大学
凯琳·斯腾伯格，海德堡大学，德国



译后记

我与本书第一主编鲍勃（斯腾伯格博士的昵称）的交往始于1996年，国内刚出现电子邮箱服务。那时我还是广州师范学院专攻社会心理学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我撰写了一篇爱情三角形理论的评介文章，也是我研究生涯的处女作，算是国内最早介绍该理论的文章，先是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心理学》全文转载，后来又广泛流传于网页。鲍勃收到我的电子邮件之后，慷慨惠赠了他的《爱情三角形》专著给我，记得那时我还就一些研究过程中的统计方法请教于他，例如为什么聚类分析采用最大距离法等等具体问题。

十年后，我萌发了翻译鲍勃（1988）的《爱情心理学》一书的想法，以此作为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流动站的一项文献研究工作。2006年11月份才知道他和康涅狄格大学博士后凯琳·斯腾伯格（2006）刚刚联袂新编了《爱情心理学》（最新版）。于是，翻译新版本的工作就这样启动了，两位主编欣然同意。但是，原书版权属于耶鲁大学出版社，必须由大陆的出版方出面洽谈版权的购买，我于是想到了中国心理学会在出版界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所以，本书能顺利面世，读者们首先要感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于彬主任、石孟磊编辑和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

由于我并非对于每一章内容都熟悉，一人难以胜任全书的翻译，故特意邀请了一些对于爱情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同仁，在我率领下一道翻译。他们是年轻有活力的心理学讲师李旭珊、王晓明、邵景进、黄美玲、徐伟，他们的具体分工都在有关章节最后注明，心理学研究生矫欣欣、刘佳、于福洋、陈思远、李颖、周晓雪、唐海波、戴美林、高学锋、李珊珊、刘晓琳、王经华、王彦胜、

艾丽丽、戚静、刘美婷等都参加我负责部分的翻译和审校工作。一路走来，紧张而有趣的合作是成功的，没有他们高质量的鼎助，本书的翻译也不可能按时完成，可惜封面署名不能全部枚举。顺便提及令我们惊奇的一件事，据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翻译这些章节的过程也是坠入爱河、结婚、孕育的过程。而我，则在签署图书出版合同的同时成为一个男童的父亲，他则是我和妻子爱情的结晶。而两位原作者也在合作出版该书之后结为伉俪！看来本书具有“神奇”（magic，凯琳语）的启动效应。

作为主要责任译者，我组织对全书译稿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审校和修改，然而毕竟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错误在所难免，建议有疑问的读者能够自己去研读英文原著。从这个意义上，本书中文版的推出是面向大众，主要不是面向同行的，因为研究人员必须要以原汁原味的文献作为支撑，正如我的望门恩师、广州师范学院已故教授吴江霖（1914—1995）博士所要求，研究生必须具备的四大能力之一就是熟练运用外语，能胜任阅读外文原著。当然，并非所有同行都能买到昂贵的原版书，所以推出中文版也能部分缓解研究文献的需求，并且可以供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选修《爱情心理学》课程时候当做教材使用。

爱情，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她的本质上看来确实适于心理学家来研究。尽管有些著名的中国学者，如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彻底否认爱情的存在，我们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不是作为心理学家来谈这个话题，当然看不到我们所能看到的细致美景。爱是人类和谐、社会安定、家庭幸福的心理基础，所以本书的翻译也有幸得到了官方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70410478）和曲阜师范大学校级科研计划项目（批准号：XJ0660）、曲阜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BSQD 200524），本书的翻译出版也是我主持上述科研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和山东省重点学科（曲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曲阜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导师 李朝旭

二〇〇七年国庆日于北师大乐育一号楼（初校稿）

二〇〇九年党的生日于曲师大老一号楼（第五稿）

二〇〇九年十月卅日于鑫朝府宾馆（校清样）